由統一到抗戰

芸生文存　第二集

前進吧中國！

——一篇幾乎流產的文章——

（前略）

最近我與一位日本外交界的人物談起中日問題，我很鄭重的對他說：『以後的中日歷史要換一個寫法了。』我說：『在過去數十年中，中國與日本的關係，眞壞過，也眞好過；但無論好或壞，都是整個的日本對付部分的中國。如甲午之戰，那是壞的時候。名義上雖是中日戰爭，實際却是日本和李鴻章一個人打仗，從地域上說，也只是日本對北洋開戰。中日兩國雖正式宣戰，北洋以外的中國實際並未參加，北洋以外的負責者，內如內閣軍機，外至封疆大吏，事實上差不多都在看李鴻章一個人的笑話。又如民國六七年的段內閣，和日本辦了許多旁人所未辦過的事，那可算是好的時候。但段政府所做的事，也只能代表段政府一系的勢力，與國民全體簡直的不相干。現在的情形不同了。中國國民已眞正認識國家的統一對於民族獨立生存的需要，而努力向統一程途前進。這種努力，現在已有相當的成績表現了。希望

日本人士注意中國這種努力將直接影響今後的中日關係。」我特別加重的說：「今後的中日關係，不是整個的好，便是整個的壞。以前那種好壞皆不澈底的情形將要過去了。以後的中日歷史一定是另外一個寫法了。』

我相信我的話並未誇大，且因爲說話的對方是一位日本朋友，在人已對照上，還不免打了相當的折扣。

我常說，九一八以來不斷的鞭撻，給我們的教訓太大了，也太有用了。現在我更相信我的話的眞理，我們沒有國家的觀念，日本逼着我們非有不可；我們沒有國防的知識，日本逼着我們非懂不可；我們像一盤散沙，日本逼着我們向一塊兒粘；我們不知道國家的獨立須要自立，我們不知道國家統一的必要，日本打着我們罵着我們教我們知道甚至我們不知道內戰的可恥，日本也使我們的拳頭再不能落在自己身上了。華盛頓會議以後，中國人整個的睡着了，都鑽到九國公約的被窩裏去了，日本把這條被子給我們揭開撕碎了，我們是被驚醒了，並且發覺自身是赤條條的，我們從此不能蒙頭盖臉的睡大覺，並且須要弄套整齊堅固的衣服穿在身上，以遮風禦寒，並且走出來見人。我們眞該謝謝日本，假使我們沒

有這樣一個鄰居，我們這個國家這個民族將不知要墮落到什麼樣子。

我對中日問題的看法，一向是——遠看不悲觀，近看難樂觀。近半年來的經驗，使我把遠的不悲觀拉近了，近的難樂觀推遠了。兩廣問題的和平解決，使國家走上統一之路，綏遠的抗戰，證實了民族自衛的眞理，恢復了我們獨立生存的自信。

今年夏天兩廣問題鬧得最厲害的時候，胡適之先生自北平出發，準備出席太平洋學會，我與他同車自北平回天津，我們談了一路，當我們握手道別的時候，我說：『希望你自美國回來時，能够看見我們國家的進步』。最近他自海外歸來，我在上海碼頭迎接他，他雖是抱恙歸來，我們見面時却是滿面笑容，不再像平津車上那樣憂鬱了。我們那天談了約莫兩個鐘頭，結論是：『我們還需要大的準備，大的苦鬥。』他很鄭重的說：『現在證明，我們在九一八以後的五年的忍耐，完全沒有錯。』

眞的，這五年的忍耐，使我們的國家逐漸走上近代的路。在這五年當中，一般人民開始認識了個人與國家的關係，且痛感自强自立的必要。在這五年當中，除了共產黨一個問題未曾安排好以外，我們未曾打過重大的內戰，尤其是今夏兩廣問題的解決，使我們的國家發現一個統一的規模。我們試打開地

國看看，中自江浙贛鄂起，南至閩粵桂湘，西至黔滇川陝甘寧青，北方的魯豫晉綏，莫不在同一的行政組織之下，這些省的軍隊也莫不在同一的軍令系統之下。行政院的命令可以通行全國，中央的軍令可以動員全國的軍隊。這種情形是民國以來所未有的。川滇黔三省向來是中央政令所不及的地方，現在這些省的軍隊，居然為了國家的任務，而應命動員了。這是我們以前所能見到的嗎？

現在的統一局面或許有人會懷疑冀察兩省是一個缺陷；但是我不那樣想。不用說冀察兩省的人民是中國人，他們愛護國家，他們願為國家効死；就是冀察兩省的負責當局，他們也一樣的是為國家服務，到必要時，自然將是國家的重要支柱。現在的缺陷是由環境造成的，將來也一定由環境來彌補。

我願意把一個局中人的話介紹給國人，以解釋冀察局面的未來。

蕭振瀛氏是華北的一個風雲人物，他是宋幕中的靈魂，且是演成冀察現局的一個重大關係者。大概是今年春天吧，他接任天津市長不久，一天在市政府內招待新聞界，在席間他有一段話，我認為很重要。

他說：『我是華北漢奸的總代表。許多人罵我姓蕭的是漢奸，我不辯白。不錯，華北現在的局面是我姓蕭的幹的，我不但未曾賣國，自問良心，我是救國。華北局面到現在這個樣子，將怎樣的繼續往下泥在

我個人，就好像兩手撐刺蝟，撐着扎手，撂又撂不下。想起這個問題，往往使我睡不着覺。我現在是一天天的往下撐，說不定哪一天會把我的命撐掉了。我愁悶極了，我需要向諸位請教。」說到這裏，蕭氏掉轉了話頭，他說：「一天徐次辰（永昌）由南京回來，過天津的時候，我向他問中央的情形，談到北方時，我把我的愁悶告訴他。次辰說，「你愁什麼？你們二十九軍這回是名利雙收。」這話太幽默了，幽默得叫人不明白，我請他解釋，他說：「華北的危險是整個的，冀察與晉綏的命運是一樣的。頂到宋蕭倒了，閻徐能多再有二十天的壽命。看穿了這一層，則閻徐只有倒霉，宋蕭還有名利可圖。你們二十九軍先抓到河北省一個肥地盤，每個人都弄上兩三個肥缺，撈把撈把，先把利收了；頂到不能再往下混的時候，槍口一朝外，二十九軍又是民族英雄了！那豈不是名利雙收了嗎？」我聽了徐次辰的話以後，心裏很高興。把我的愁悶去了一半，我覺得我還應該好好的往下幹。現在且讓旁人去罵漢奸，頂到我們帶上十萬大兵上前線去打仗，那才是宋蕭露臉的時候到了。」

蕭先生的話在我的腦海裏游泳了將近一年，我一直沒有忘記。現在蕭先生已離開了北方，最近我在上海又見着了他，我雖然沒有向他問起這段舊話，我相信他的信念一定未曾動搖；我不但如此信着，並且同樣的相信宋哲元將軍及他所統率的二十九軍。

文章寫到這裏，在十二月十二的晚上聽到西安事變的消息，張學良用突變的方式，把蔣委員長刼留在西安，並對政府提出八項要求。這眞是一個晴空的霹靂，我眞不能不擱筆了。

在我擱筆期間，那位日本朋友又來看我，他很關切西安的事情，他向我問消息，問感想，我告訴他些消息，同時把我的感想也告訴他，我說：『我們中國國民的國家意識業經覺醒，我們的國家業經具備統一的規模，我相信我們中國的復興大業絕不會爲一個人的輕舉妄動推翻了。』我不知與我對面的人的感想如何，而我自己却堅固的如此相信。在這期間我曾到大夏大學去演講，我又對一羣青年學生說出我的信念，並且要求他們也如此相信。

在此期間，我打電報給胡適之先生，請他把他對於西安事變的感想寫出來給大家看看。我很感謝胡先生，他在病中寫了一篇大文章。（便是十二月廿日津滬大公報的星期論文「張學良的叛國」）胡先生的文章中有這樣兩句話：『我們又要許多時不能抬頭見人，不能開口說響話了！』我讀到這兩句話時，深切意味到我在這幾天中精神上的苦痛；但同時我又自慰，我居然還能強項見人，硬嘴說話！我既已強項見人，硬嘴說話，爲什麼不能照樣的寫文章呢，我於是重新鼓起勇氣，來續寫這篇業已擱筆一星

期的文章。

西安事變誠然是一個極大的不幸，而這個不幸也給我們一個深省的機會，在這幾天中，我至少在思索兩個問題：一個是青年的思想問題，一個是危急期間的國際與國的問題。關於青年的思想問題，我想另外寫一篇文章發表，且不贅論關於後一個問題，我願說一說在這幾天內我的感想上的變遷。

約莫半個月以前吧，一位自東京回來的朋友對我討論起這個問題，他說：『假使不得已時對外戰爭爆發了，在我們支持了一年半載之後，蘇俄會不會起來援助我們？或竟拆我們的爛污？』他很嚴肅的說：『我很憂慮到那緊要的時候，她給我們來一下敗戰主義！先拆一下爛污，把我們的中心力量毀壞了，然後用社會革命的方式大吵一下！』這個朋友說話時的嚴重表情，把我們的談話籠罩上一層恐怖的氣氛，吾當時告訴他：『你憂慮的太深刻了，我簡直未曾這樣想過。我相信蘇俄不會那樣的。我們現在所走的路是自力更生，我們要以自己的力量擠當生存路上的一切必要，絕不可希望外援。我未曾想過要旁人替我們流血，同時也未曾想到危急中旁人來扯我們的後腿。就拿現在的情形說，我們在綏遠挺戰，是我們為生存的鬥爭，是我們自己的事，其實在客觀上也給旁人幫了不小的忙。百靈廟的收復，在國際上的意義並不小於我們的興奮。這一役使包圍外蒙的形勢一變而為包圍『滿洲偽國』這是很明顯

的事實。旁人只有希望我們挺身的，怎麼會反來扯我們的腿？』

我不知當時我的朋友是否滿意我的意見，這幾天的事情却叫我想起他的憂慮。這次西安事變，在張學良的舉動及口號中，我們雖然還看不出蘇俄的背景，但至少可以斷定有共產黨的關係，或者第三國際也有同情。西安事變的口號是『聯合戰綫』，旗幟是『救國』；而這種關後門拆爛汚的手段，實際是敗戰主義。敗戰主義的露面，使我對於那位朋友的話的印象加深；但我仍認爲那是一種顧慮，無論何黨何派，你既標榜「救國」，便不應該使用亡國的手段。在國際上我們要求獨立自由，我們接受一切善意的友情，同時抗拒一切暴力的侵凌，在國家危難中，我們要以自己的力量擔當一切，絕不需要旁人來替我們流血，同時也絕不容許旁人來扯我們的腿。本月十九日蘇俄代辦司皮爾瓦納克謁我張外長，聲明蘇俄與西安事變毫無關係。我們願意相信這個聲明的眞實。

在我續寫這篇文章的時候，已是西安事變的第九天，蔣委員長尙在難中，中央已對張學良下討伐令，軍事固已不免，但在我個人的感覺，頗以爲有牢穩解決的可能。瘡疽既已成形，擠出壞膿，便生新肌。我們還記得今夏兩廣問題發生時一般國民的焦急憂悶的情形，健全的常識卒能戰勝，使國家發現一個

統一的規模。這幾天全國人士對陝變的痛心疾首，在普遍的憂憤焦急的情緒中，充分表現出全體國民的國家愛。你相信四萬萬人所共同愛護的國家會被少數人甚至一個人斷送了嗎？我相信西安事變一定能夠解決，並且相信無論如何解決，一定將使我們國家的復興大業更得一步之推進。我這點信念，與我們國家的光明前途有同樣的深厚廣大的根據。

前進吧中國！

前進吧中國！萬里長征，當然要有些坎坷的路。目前的險阻，是催促我們努力前進的！

我願重述我自己的話，以結此文：

『我們中國國民的國家意識業經覺醒，我們的國家業經具備統一的規模，我相信我們中國的復興大業絕不會為一個人的輕舉妄動推翻了。』

廿五年十二月夜寫畢。

寄北方青年

諸位同學：

我們的國家現時正在存亡絕續之交。我們是中國的兒女，我們應該爲我們的祖國，也就是爲我們自己爭生存。現在我們民族國家的命運正落在我們這輩人的肩頭上。我們要毫不遲疑的來肩負這個神聖的重担，挺腰前進，把我們的民族國家復興起來。我們要認淸我們這輩人的任務，努力前進，不要對不起我們祖先的艱難創業，不更要替吾們的兒孫種孽根。我們需要努力，尤其需要在堅强的民族國家的觀念之下努力。

我生長在北方，我現在仍然是一個青年。我不斷同你們接觸，我現在雖然住在上海，我們在精神上仍是時時相通的。我們整個的國家在危機中，你們所在的北方恰是危機的頂點。自從塘沽協定以來，北方的危機逐日加深。一般意志薄弱的人每以爲北方已是不可救藥的了，我則絕不謂然。我何以有這樣的信念？最大的理由是因爲我們北方有數十萬有智識有熱情的青年在。這一羣青年，是我們中華民族

的精英，是我們中華民國的元氣。我常和一般師友說：平津教育界是一道穩固的國防綫。我們試想，若把平津各大中學校搬家，把數十萬青年學生撤除，北方必將成爲一片漆黑。

我曾親眼看見你們自一二九以來的苦鬥。你們在北方局勢最緊張時喊出擁護國家的口號，你們在北方大局要崩潰時阻止了國家的分裂。這些情形都曾使我感激得流淚。以後在救亡運動中，雖然你們的步驟稍有凌亂，把敵愾的怒潮一部分轉成自訌的意氣，但我總以爲這種缺憾是可以由理智來彌補的。我在天津時，有一次曾對一大羣青年學生喊出反對罷課反對吵架的要求，他們都熱烈的鼓掌，未曾加我以仇視。又有一次，一個可敬愛的學生，對我誠懇而眞摯的承認學生運動中的錯誤，幷表示懺悔。我面對着這樣勇敢的青年，當時心中有說不出的安慰。以後北方的學生運動果然逐漸轉變了，轉變得健全了。「學生與國家」的創刊號上，曾登載一篇北平市學生救國聯合會的「我們對於目前學生運動的意見和希望」，那種眞誠的流露，勇敢的懺悔，我讀後感到莫大的興奮，並加强了我對於民族國家前途的光明希望。我爲那篇文章的感動，不自禁的寫了一篇「中國的青年心理」登在津滬兩地的大公報上。我是在拿着我們北方青年對於民族國家的熱情烈愛，去向我們的强鄰誇耀說嘴。

近來北方青年的情形怎樣呢？這是我所最關心的。北方朋友的信函中不斷提起青年的情形，且逐

漸加多憂鬱的成分。我最近接到一位北平學生的來信，說：

「北方青年近日之舉動，先生當極關懷，甚或憂慮焦急，我實亦憂慮萬分。在最前一次罷課時，我即再三勸告，……然以浮動已起，勸告無力，故即有一再罷課及前日示威之舉。昨晚友人來告，謂數日內平市學生將有再度示威。事或屬實。清華燕京校內同學間又復分裂爭吵，不幸之歷史將重演。我為身受其苦者，故今日更感痛苦。

「……今日中國青年，仍有浮動現象，其主要原因，是中央未能以禦侮大計示國人，外交不能公開，思想不自由。其主要原因，是中國青年仍無一最堅強之民族觀念。第一次罷課是在百靈廟克復時，前日游行示威又是在大廟子收復之後，及千萬中國同胞恢復其黃帝子孫真面目之時，此三事，皆是可歌可泣，令人感激，令人興奮，而北方青年則對此特別冷淡，非惟無熱烈慶祝鼓舞國人，即最低表示亦無有。此何也？大家未能認識此是民族抗戰之偉大勝利，此是祖國自由自強之起點。

「……我知道，學生羣衆中有很多人是狹隘的及宗派的。尤其是學生羣衆中之幹部，無遠大眼光，無大堅忍力。對於許多事情，不從統一的民族觀念着眼，對於許多事情都是一套公式。此外最令人痛心者，是常與青年接觸之少數先生。他們給青年人的不是良好教育，而是不正確的觀念。以

前我力主青年人不與此等先生接近，但今日此意見亦非多數人所能接受。

「今日北方青年，仍可沈着前進，此我可斷言者，但少數的領導同學及少數先生，則令人痛心。」

這位青年朋友所說的，當然是少數的現象，不過也給我夢寐不忘的北方蒙上一層暗淡的色彩。

在這思想混亂的時代，標語口號是多的。我們要不爲那五彩繽紛的標語口號所迷惑，必須具備一種法寶——一個堅強的民族國家觀念。我們有了這種法寶，見了標語不致目眩，聽了口號不致神迷，而專心一志的爲我們自己的民族國家的利益奮鬥。這位青年朋友的信是在西安事變後三天寫的。因此使我很奇怪，爲什麼我平素所敬愛的北方青年對於綏遠抗戰的勝利冷淡，反有少數人對張學良表同情？我想一定是爲口號標語所迷惑了。

以下我願講幾件這幾天內我身經目見的故事：

兩件是我一位同事講給我聽的。他的一個上中學的女孩子，聽見西安事變，急得幾夜睡不着覺，整天的唉聲嘆氣。他的一個十一歲上小學的男孩子，在日記本上記上這樣的話語：「張學良這個鬼東西，你失了東三省，又來犯上作亂。張學良你若是把蔣委員長放回來，你還有打回老家的希望。」

另一件是我自己所身經的。陝變的第六天，上海大夏大學史地學會要我去演講，我當時未宜布題

日，把我的話歸納起來，內容可說是「中日問題與西安事變」我的話用了一個半鐘頭的時間，我講完了之後，一個大學生向我提出兩點質問：（一）按照國民政府的做法做下去，誰能保證將來一定抗日？（二）張學良現在的舉動，誰能保證他不是愛國？我說：「我要答覆這個質問，先要寫兩張保票，不過我願意先問問諸位同學的意見。」我要求「認為張學良的舉動於國家害多的請舉手！」在二百多位聽衆中舉手的有半數。我又要求「認為於國家利多的請舉手！」舉手的有五六個人。我說：「好！我很喜歡的知道了在座諸位同學對於目前國家大問題的認識。」不過我對於最後舉手的人說：「你們的手舉得太危險了。我們儘可在精神上對張學良表同情，但要在客觀上一定認為他的舉動於國家有利，那眞太危險了。這張保票是不容易寫的。」我說：「我願意用一個理智的推斷來答復那一位同學的問題。」我說：「我們國家走到現在這個階段，一個政府牠還能存在，并且有力的存在，牠的立脚點在那裏？假使牠的立脚點是向日本投降，牠絕不會存在的。那末，既不降日，我們雖不能確說牠必抗日，但起碼是對外不屈服的。我們不妨做一個最大的假設，假設國民政府是一個騙局，蔣某人是一個騙子，那末，直到騙局揭穿的一天，我們相信那樣的政府必不能存在，自然更不能有力的存在。我們作中國國民的，應該有這種信念，并且應該有由這種信念發生出來的力量！」我的話得到聽衆的鼓掌。

我為什麼要說這些故事？這是為了說明青年人現在怎樣爲國家發愁，怎樣着急，怎樣認識。

我以爲事情很簡單，無論何黨何派，你既標榜「救國」，便不應該使用亡國的手段。

西安事變的手段是怎樣的？開後門，拆爛污，簡直是敗戰主義。我們以五年的忍耐與努力，才做到現在這個可以抬頭見人便嘴說話的樣子。我們應該繼續苦幹，繼續努力，才能挺腰，才能翻身，怎好自己扯後腿，栽跟頭？

我們應該團結一切的力量，以打開我們民族國家的難關，而敗戰主義却是自殺！我們所要攜手的，必須是愛民族愛國家的人。

在國際上也是如此。我們要交朋友，必須自己先像個樣子。我們需要同情我們民族解放國家復興的朋友；但是我們不能空想旁人來替我們流血。我們要時時戒備當面的敵人，但同時也不願意出來一個在我們背後使用敗戰主義的朋友。

我是青年人，青年人的心情我都瞭解，我都同情。但是，經驗告訴我：「在任何場面中，不要丟了我們的法寶——一個堅强的民族國家觀念！」

二十五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於上海。

再寄北方青年

諸位同學：

這是我寄給你們的第二封信。

我寄給你們的第一封信，想來你們已有人見到了。在那封信寄出之後，我就預料它所可能引起的反響：這反響或是你們的眼淚，也許是你們的怒罵。

在最近，除了朋友們應有的話語以外，我接到兩位青年讀者的來信。一封信是從北平寄來的，寫信人是一位高中快畢業的學生，他是反對左傾的，甚至主張政府用鐵腕手段取締。我不同意這辦法，所以無須徵引。另一封信是由南京寄來的，是一位剛從初級師範畢業的青年，他的思想很可代表一般對現狀煩悶而想向左走的青年，我願意把他的來信公開給一般讀者。他的來信如下：

芸生先生：

讀你「寄北方青年」一文，我很感動，可惜這種文章太少了。你似乎專指北方青年而言，然而

南方的青年呢？這種暫時的沉默，積年累月，心頭的抑鬱，一旦爆發起來，怕更不是像今日這樣「可籠」的局面了。

我是一個初級師範畢業的學生，剛剛離開學校，社會的經驗有限，但牠給我的影像太壞了。社會彷彿是「一枝老槍，」十年，二十年的積癮，不是可能戒除的；即使暫時戒除，生理機構也崩潰不堪了。這種人還有什麼希望？何必再去亂化胡用，遺累子孫呢？我想還不如把子孫好好的教養着，這種「行屍走肉」的老朽，老實把牠送進墳墓去罷！

期待新社會的實現，作我這種想頭的，恐怕不在少數呢？

在今日這種情況之下，現狀又不能改善，處處予人以失望，甚且變本加厲，青年們忍無可忍，自然要果決地扭負起改造社會的使命了。這不僅單是一個救亡問題，而是拿救亡來做出發點，以期舊社會的迅速死滅，新世界的加速誕生。

然而社會給我們的呢？除掉威脅壓迫，陰謀搗亂，從沒有作過正當的指示，還說我們浮動，說我們怕讀書，說我們被人利用，我們還有什麼好說。有誰知道許多有爲的青年，就在這種社會劊子手下，由失望，而消極，而頹廢，慘酷地被埋沒了呢？

(2) 吞文生芸

一個青年要想在社會上做事，假使沒有有勢力的親友作「後台」，就休想站得住脚，政界固不必說，即素以淸高自負的教育界也不能例外。這已造成一種風氣，廉恥禮義在這種場合固無立足的地方，而在這種實際情況之下，要談廉恥也是徒然，青年潔白如紙，要想周旋其間，就非用最大的忍耐不可，年復一年，這張白紙也逐漸變黑，等到澈底黑了，這點「剛愎」氣質也消磨完了，社會給他的定評是「有爲」，反之「沒出息」。有些「硬化」的人，只好潦倒一世，我小學時代的一位師長，便是這種人物的典型代表。

我是學小學教員的，教員最要知道的是教育四年的教學教程，未必就完全有用。書本上的智識，等於空中樓閣，美則美矣，住則不可；又如臘製蘋果，看看可以的，拿來吃就不行了。而且大部人都喜歡表面環境佈置得富麗堂皇，內容糟糕點可以不問，觀察者看看表面也就能舉一反三了。我們沒有學到這套本領，往往吃力不討好，弄得莫明其妙，然而社會給我們的：「辦學不力」，我們又只好默忍。

其次，社會對青年也太不愛惜了，格殺勿論，恐怖的局面，現在依然存在。我想有史以來，救國犯的蓬勃，怕沒有再比中國今日這樣盛行了。而對於正在服務的青年，也一樣地執行着這種變相的

殺戮。學校裏的鐘點，弄得我們昏頭黑腦，自已吃點苦固然活該，可憐出世不久的兒童也同樣地遭磨折。在上者不問實際情形如何，不負責任的瞎定，在下者爲維持生命計，也只好死命照着執行。單以南京市辦的短期小學而言，自早至晚，要上十點鐘課，其餘還不在內，人類畢竟不是牛馬，喉嚨啞了，唾液乾了，也自然拆爛污了。不問質的改進，只要量的擴充，一年化上多少萬，不問所得的代價如何，即使辦他幾十年，我想這種國民教育不知對於國民究有多少裨益否？當局呢？不顧。取之於民，這就是「用之於民」嗎？陳衡哲先生代學生呼籲，我們做教員的何嘗不明白，何嘗不痛心？不過不能說罷了。至於本身進修的機會，固不必說，能够休息一會，已經「皇恩浩蕩」了。雖然明知落伍的危險，那也只好聽天由命。青年處在這種沉悶的「鳥籠」裏，消極，是死路一條，當局既然顧不得我們，那自然只好另找活所了。

我們並不是不聽當局的指導，我們忍耐够了，我們不能連最後一口呼吸也被窒息住了。今日的局面，不是青年妄動的結果，而是當局不顧我們的成功。

現在再看看鄉間的情形呢？貴報記者長江先生已在「中國的西北角」一書內，將西北社會的罪惡澈底的暴露出來了。其實這都是從內地學去的，這種情形也只有鄉村的小學教師最清楚，

最體貼。一個鄉長，一個地保，可以操握全鄉的生靈，同時以特殊的地位，還可以勾結上層的區縣長，相互漁民，剝削一切。老百姓在生與死的分野上，消極的，聽之於天，掙扎的，鋌而走險，流爲盜寇。盜匪是國家之累，是要清剿的，數十萬紅軍治下的民衆，便作了今日政府「安內攘外」的唯一犧牲者。

青年是火，只有燃燒，他看不慣這種生活，他無理由禁止自己，時代這樣磨折着他，他還不該起來掙命嗎？

至於侵略者呢：東三省，華北，華南……在永無休止的吞食下，我們還能忍受嗎？誰敢担保侵略者不侵略，羅馬協定剛剛公佈，墨索里尼指揮下的爪牙還不是照常進行，我們的東鄰誰能相信會就此罷手。談到準備，誰不希望道高一尺，魔高萬丈，誰還能允許我們從容準備？我們不能讓全國亡了再起來救亡，我們要蔣先生立即起來抗日，大規模的發動民族解放的戰爭，這樣我們的社會才有進步，一切封建餘孽才能斬絕。否則，頭痛醫頭，脚痛醫脚，局部的治療，是永遠弄不好的。

我是一個入世很淺的青年，智識有限，觀察錯誤，希望先生能够給我一個光明的啓示。

中國的報紙太使人失望了。今天是花柳專號，明天是性病特刊，好像中國人都是嫖客與娼妓，這種放屁報紙，離開「行將就木」的日子總不遠了。我們希望大公報能够說幾句人民要說的話

——這是一個附帶的要求。

再見敬祝

平安！

石　琳上，一月五日。

這封信可代表一個青年觀念的典型，它有痛切的煩悶，純真的情感，在憤懣中未曾失掉自信。又因為石琳先生業已離開學校，於國家出路之外，還帶有個人對社會對職業的煩悶。我這封信想單討論國家問題，關於個人社會方面的暫置不談。我不是規避，而是為了論點易於集中。

青年對社會對職業的煩悶況味，我都了解。我的年紀雖不算很大，在人生途上也已經歷了不少的甘苦。我若寫一篇自傳，我相信可以普遍博得青年人的眼淚，也許能夠給煩悶青年一些慰安，但現在不是我向人訴苦的時候。

單談國家問題，石君的來信中包括兩個要點：一個是青年的政治態度問題，另一個是抗日問題。

我想先談抗日問題。

「抗日」這個口號與「對日不抵抗」是相對的。抵抗是動物的本能，凡是動物對於橫暴的侵襲沒有不抵抗的。我以為「抗日」這兩個字，它的本身的意義就是消極的，而且是有限制的，不能成為一

種政策，更不能成爲一種主義。我們的根本問題是建國問題——建設一個獨立自由的現代國家的問題。在建國途中所遇到的一切困難和阻礙，我們都應該用全力去解決和掃除。我們四萬萬人一致把這一個大目的握在心裏，一致努力向前進行。誰要阻攔我們前進，甚或强拖我們後退，我們便向誰抵抗。日本如此，我們抵抗；其他國家如此，我們也一樣的抵抗。不過抵抗究竟是消極的，我們的積極的目的是建國。

建國是一個大目的，隨着這個大目的所發生的種種問題，却是多方面的。政治上的需要第一個是國內的統一，經濟上的需要主要的是能自給自存。在經濟上我們離開自給自存的程度還遠得很，還需要我們努力的走。在政治上的國內統一，現在總算已有了規模。我們應該先把這一點確定了。這一點可以說是我們建國的基點，必由這個基點出發，才有達到國家獨立自由的可能。在這個基點(國內統一)上，我們還有一些缺欠，先應該把它補足。西北角上要用些功夫，整頓華北也是很自然而遇到的問題。我們基於建國的要求，應該把畸形的華北正常化了。綏遠的奮鬥是我們的抵抗和自衛，接着的問題便是肅清察北，調整冀察，殷汝耕的竊據冀東，當然予以驅逐。這些事都是我們建國途中的清道工作，問題並不是抗日，「抗日」二字當然更不能概括我們的工作。

我們可以不必問政府抗日不抗日，但必須問政府是不是要做這些建國途中的清道工作？我不是政府的辯護士，也不是政府的死對頭，據我的考察和了解，政府是有做這些工作的決心和準備的。我敢說，假使政府沒有這種決心，它便不配做我們的政府！

自然，我並未曾忘記了我們的東北。海枯了，石爛了，我們中國人也忘不了這件事！不過我們的建國大業是一個萬里長征，我們要走了一程，再走一程。

談到經濟方面，我們還是個半殖民地的地位。說不定我們的國家將來在政治方面已得到獨立解放，而我們經濟還遲留在半殖民地的狀態中。在這一方面需要我們長期的認眞建設，認眞努力。近數年來政府已知在這方面努力，且已有一些成績。當然的，在建設初期不免要有些浪費和幼稚的現象，但那是可以逐漸減少的。有人看了江西公路的狀況或許會灰心，但那只是全局中的初期現象。一年以前，一位朋友對我說他要寫一篇「建設亡國論。」我當時很鄭重的對他講：「你這話若是說說笑話罷了，可以不論；你若當眞要寫這篇文章，我勸你千萬不可。」朋友明白了我的意思，那篇文章未曾出世。我的意思是這樣：在現階段的中國裏，我們需要政府有爲。「無爲政治」治不了現在的中國。行爲中將不免有浪費或錯誤，卻正可由行爲去彌補或糾正。

我們綜觀近數年來政府在經濟建設上的努力，說完全集中於國防的大目的這是對的。我們需要自衞，尤其需要有經濟基礎的自衞。我們應該先建設起國防工業，而民族工業也就自然聯帶推進了。譬如我們修鐵路，設工廠，是國防，也就是經濟。我們的建設，必須把國防同經濟兩個目的聯繫在一起。這一點要請技術專家特別注意！當我們設計及興辦一種事業時，要適合國防的目的，同時必須計及以事業的生產來維持和發展事業的本身。蔣百里先生曾幾次同我談起他的「國防經濟學」，他的理論中心點是「生活條件與戰鬥條件的一致。」他說，譬如蒙古人的馬，西洋人的船，是吃飯的傢伙，同時也就是戰鬥的傢伙。我們祖先的井田制，是一個經濟的單位，同時也就是一個戰鬥的單位。跟着農業經濟的衰退，我們漸漸失去我們祖先的這一套本領，國家因之也失去獨立的尊嚴。我們現在要講軍事和國防，便絕不能與經濟分開。蔣先生的話，就是我們所應信奉的眞理。

在經濟建設上，將不免借重於外資。這個問題或不免有人懷疑，但它是一條可能的路。日本的明治維新就曾經走過這條路，我們當然也可以走。當然，這條路失敗時將會更加深半殖民地的狀態；但是它去成功之路一條可能的階梯，我們要穩健的往上登。成功是我們的前途；假使失敗了，那不僅是政府的瀆職，我們國民也要負責任的。

其次，說到青年的政治態度問題，無疑問的，我們應該共同培植並督促現在國家的中心勢力，正確的走上建國之路。取消了現在的中心勢力，另外再建設一個勢力，那是打不清算盤，它的結果，會證明那是愚蠢。我們建國所應採取的方式，理想的烏托邦我們不應空談，我以爲土耳其復興的歷史是值得我們細讀，并且是可能取法的。從國際關係上講，也不是不可能的。在東亞有一個土耳其式的中國，不用說是蘇俄的大掩護；用遠大的眼光看，更是日本的利益；至於歐美那就更不必說了。（我這個看法，一部分日本人士或許不大了解，我將根據中日兩國的情形，另外寫一篇文章發表，題目大概是「東亞幸福的途徑」，這裏且不多談。）

其次再要談的便是現政府的做法問題了。中國的建國大運動，這個領導權是握在國民黨和國民政府的手上的。在西安事變和平解決之後，這個領導權更加確定了，國民黨和國民政府將如何執行這個大任務，那是全國國民應該一致注意的。關於這一點，我願意再發表一封讀者的來信如下：

芸生先生大鑒：

綏北匪患未平，陝甘將領又告叛變，全國人民，憂急憤慨，不可形容，向來痲木不仁之國民，一變而敏於感覺審乎利害。此是一種好現象，自建國二十五載以來所未有也。人民既深知國家生存之

條件爲領土之完整，與主權之獨立，故凡遇土地受人侵略，政權遭人破壞之時，必出全力擁護政府，以期增厚防禦力量。由擁護政府，從而信任中央掌理軍事政務之領袖，乃純粹出於恐懼亡國滅種之意念。於人既無所偏愛，於黨更無所阿私，此人民之眞意所在，辨察不可不審也。過去黨之地位，惟一不二，崇高無倫。國以黨治，固應若是；然而黨權愈高，責乃愈專。比年以來，農村經濟衰落，工廠效率減低，學風頹廢不振。匪共擾亂未平，其他天災人禍，多不勝舉。雖曰此爲失政，而以責任歸諸專政之黨，其何可辭？在國家多難之今日，民衆心理正以集中力量，齊一步驟，鞏固國本爲目標，不遑他顧。斷無餘暇，從事淸算舊賬。此爲至可慶幸之事。但人民一旦覺悟，備具鑒別能力，則今後所期望於政府者，將更懇切而熱烈。苟謀國致治之道，未能維繫民心，安知不因失望而懷疑，由沉悶而走極端乎？是不可不慮也。如何禦侮制敵，固爲重大問題，然辨其緩急，必先安內，而後可以攘外。換言之，當前之主要問題無他，即爲如何把握此千載一時之機會，保養此萬衆一心之民氣，弗加摧殘，弗令渙散而已。國家力量，全在人民，苟能猜忌悉泯，一致爲國，力量自厚，以之對外，當無不勝矣。間嘗觀察過去黨的行爲，得失參半。事實如斯，未可諱言。孰得孰失，固宜切實檢討，加以調理；至於未來大政，尤當確定方針，明白宣示，使全民曉然於國策之概要，無疑無貳，共同努力於復興邦國之工作，則其進行之順利，

收穫之美滿，可以預期。設或以爲方今民意，一致傾向中央，莫非黨員歷年活動之殊績，復興工作，基礎已固，自信功成。卽此一念錯誤，可重召十年禍患。建國以還有復興機會而不知把握者，豈止一次。言之可痛！今幸機會復至，可貴直同黃金，倘復蹉跎自滿，不知珍惜，坐令消逝，行見整個民族重墮深淵，黑暗沉淪，永無自拔之日！

執事目光犀利，度早已洞察癥結，無俟嘵嘵；顧心所謂危，終以一吐爲快。素仰

執事文章名世，見解透切，私衷佩服之餘，輒貢感想，以質　高明。倉卒以言，辭不稱意，唐突之咎，惟希

曲恕，爲幸。此頌

撰祉。

沈觀謹言，一月五日，唐山。

這封信是從殷汝耕治下的唐山寄來的，這一片愛國愛政府的苦心，使我由感動而起深切的共鳴。

沈觀先生於誠懇國民黨員或有自滿的心理之際，說：「卽此一念錯誤，可重召十年禍患。」我讀到這個警句時，竟打了一個寒戰！國民黨啊！你對於國家的任務太重大了！你將如何戒愼戒懼的來履行這個莊嚴神聖的大任務呢？我以爲國民黨及其黨員應該痛切認淸這個大任務，放寬襟度，走一條公正和平的坦途。西安事變發生之後，我就同朋友們估量，我認爲西安事變的結果如實現一個惡夢中的情景，必將

逼着國民黨走上一條狹隘而反動的路；蔣先生如平安脫險，重任國家領袖，則國民黨必將更開明的走上民主的路。這條路就擺在我們的面前，國民黨想能認識得更清楚。將於二月十五日舉行的國民黨五屆三中全會，第一個遇到的必然是國民大會問題。三中全會應該確定召開國民大會的日期，並將以前的選舉法再考慮得進步一些。經過這個階梯，我們的政治可以更民主化一些。在一個比較民主化的政治局面下，可望團結全國力量以擔當建國的任務了。

這是目前最順理成章的一條路，我們有權力要求它的實行！

二十六年一月十日於上海。

三寄北方青年

諸位同學：

這是我寄給你們的第三封信。

在這封信裏我想和你們談談共產黨及所謂聯合戰線問題。

我是靠做報吃飯的人，在政治上沒有派別，純憑國民的良知來談談這個大問題。我知道這一串問題在你們心頭上的分量，所以我顧不得忌諱，鼓鼓勇氣，在可能範圍內和你們談談。

我在許多讀者的來信中，知道我最近幾篇文章已獲得人們的注意和反響：這注意和反響大概都是充滿善意的。我希望青年人與我的意見起共鳴，同時也希望在政治上已有一種信仰的人，能够因了我的意見，更仔細的考慮考慮我們國家的當前問題。

『聯合戰線』這口號，聽來已不生疏了，在我們討論這問題之先，必須先要知道共產黨對國家的當前問題究竟持一種什麼態度。我願意發表一位讀者的來信，作我們的談話資料：——

芸生先生大鑒：

拜讀國聞週報第十四卷第一期「前進吧中國！」及第二期「寄北方青年」二篇大作，欽佩得很。二篇大作均對於西安事變有所論列，以先生透闢的見解，與夫先生在言論界的權威地位，尊見自將產生極大的影響，而大作中對於西安事變在內政外交上的前因與後果也極多平允之論。但二篇大作均草於西安事變發生以後解決以前，現在西安事變解決已經多日，解決經過，提供我人以極多的資料而為大作所未及，所以我想提出一點意見來與先生相商榷。

我想提出的第一點便是先生累次所講的西安事變對於中國抗日事業之開後門，拆爛污，敗戰主義的影響。是的，西安事變在他的開始，確實有這種影響存在，但是事變解決的結果，證明這些壞影響現在已經不存在了。使這些影響一掃而空的原因在那裏呢？第一是蔣委員長賢明的態度，他累次下令南京中央政府停戰，以致內戰沒有爆發，這是最值得我們欽佩的。第二是全國民衆對於「苦迭撻」之表示厭惡，這自然也是極大的力量。但是還有一方面的態度，是先生和許多對西安事變議論的人們所沒有談到，而且正加以攻擊的，那就是蘇聯的態度，以及中國蘇維埃政府的態度。我深信，如果蘇聯果真如許多人們所議論一樣，說他是西安事變的指使者，中國蘇維埃政府

如果以實力擁護張楊的苦迭達，循原來西安事變的方向一直向前進行，那麼事變不會在短時期內順利的解決。這一事實，當爲國內有識者所共見。這裏證明，蘇聯之對於中國的抗日事業是沒有抱「開後門，拆濫污，敗戰主義」的態度的，消息報和眞理報的社評是眞實的態度的表現而不是假惺惺作態。也證明共產黨最近提出的國共合作是具有誠意的，不是以此爲招牌來陰謀顚覆南京的中央政府的。在這一點上看，先生在「前進吧中國！」一文中對蘇聯態度的估計是完全正確的。由於中蘇兩國的共同利害，蘇聯歡迎中國對日的堅決態度，無論是「防守」或是「進攻」，祗要不是「無條件退讓。」也因爲這一點，證明蘇聯是中國抗日事業中的友人，因爲兩個國家對日有共同的利害，兩個國家在對日問題上需要合作起來。抗日事業需要我們自己實力的發動，而不能依賴他人，這是毫無疑問的事情。然以今日國際關係的複雜，而謂在對付日本時用不到找一個國際間的友邦，這自爲明斷如先生者所不取，而何況現在中央也已找了英國做我們的友邦，爲先生等所贊成的呢？因此，先生在「寄北方靑年」一文中所謂「我們要時時戒備當面的敵人，但同時也不顧出來一個在我們背後使用敗戰主義的朋友」，似乎有再加考慮的必要。

再說中國共產黨對西安事變的態度，也與一般人所估計的不同。如果中國共產黨今日提出

的「統一戰線」「國共合作」的口號，是虛偽的幌子，他們的目的是在短期內顛覆中央，那麼西安事變發生時中國共產黨必會勸告張楊殺掉蔣先生，同時以迅速的軍事行動消滅胡宗南關麟徵二部中央軍，力謀奪陝甘寧青等省於紅軍手中了。但是事實證明蘇維埃政府在西安事變發生後，立即聲明與事變無關，（據我所知，西安事變不但與蘇維埃政府確實無關，而且也與共產黨無關。張楊雖與紅軍訂有協定，但西安事變發生時，張楊未與蘇維埃政府商議而共同決定。張楊部下雖有若干共產黨員，而且也共同參加事變，但此祇可認為個別共產黨員的行動，與共黨中央未有直接關係。先生當知年來共產黨中央與各地方的黨員的聯絡不甚密切，倉卒發生的事變在方式上口號上未必能由共黨中央決定後交黨員去發動。而共產黨在最近提出的策略路綫，即國共合作，發動（非推翻）南京中央政府堅決抗日，造成國內的民主局面等等，與西安事變初起時表面上的外觀也並不相符的。共產黨最注意羣衆的情緒，並最忠實於自己的口號與政策，決不胡亂莽撞的。）并且通電主張開和平會議來解決西安事變等，也絲毫沒有顛覆南京中央政府與夫鬥後門，拆濫污的意義在內。同時，十四天內，對於失却後方困處邊陲的胡關所部中央軍，毫也沒有積極的軍事行動。這樣的態度，對於西安事變的順利解決，有極大的作用在內，自也為國內明達之士所

共見。

而在綜合西安事變前前後後的許多事實之後，我們可以說西安事變好像是中國內政外交前途的一個測驗，一個指示器。西安事變試驗出一個價值無比的結果「在國際上誰是我們的友軍，誰是我們的敵人。」西安事變也指示給我們以在內政上應走的道路。我們可以說，東西各國痛心西安事變發生的，不希望中國引起內戰的國家是我們的友邦。企圖挑撥中國內戰的是我們的敵人。事實上對於內戰發生的最大贊助者是日本，表示反對的有蘇聯和英國等，而英國還附有一個希望，希望中國不致因西安事變而對日改守勢防禦的策略爲攻勢防禦。在內政上，西安事變不僅證明中國是一個基礎鞏固的現代國家，也證明中央最近的對日強硬態度，是西安事變時維繫地方當局與中央關係的一個最堅強的連索。我想國內明達之士可以見及，如果西安事變發生於二十四年年底，事變一定不會像現在那樣結束的。中央最近「安內」的成功，還是因爲他已經在「攘外」這一點上，採取了比較堅強態度的緣故。這在內政上指示出以「攘外」手段來聯合國內一切力量，是解決複雜的國內政局的唯一辦法。

我在這裏還想舉出一些五年來國內政局的歷史來證明我的看法。安內攘外的口號，是一九

三三年提出來的牠的第一個成功是裁平閩變，第二個成功是消弭察哈爾的抗日同盟軍，第三個成功是閩，浙，贛，皖，湘，鄂，豫等省紅軍的西遷。造成這些成功的條件，除了中央優越的兵力以外，也因爲國內一般人在塘沽協定訂立後，於對日關係抱一種偏安的苟且心理，與夫當時共產黨在華中各處的行動，其威脅性太大了。因此許多人對於攘外安內政策表示同情，此時的許多成功，未始不因爲這一同情而多添了一些助力。可是自此以後，出乎一般人意料以外的日本的侵華始終沒有停頓，到一九三五年年底，苟安偏安的心理終於完全破滅。而紅軍西遷，也使一般人對於共產黨的威脅感減輕了許多。於是一九三六年內的「攘外安內」，便完全是另外一個樣子了。廣西事件的解決，與福建事件的解決便截然不相同的。我們與其把廣西事件的解決，解釋作安內的成功，寧肯把他解釋作聯合局面的展開更妥當一些。這一點，在南京領袖諸公也見到了，也覺得應該採取一些「聯合」的辦法了。五全大會，二中全會的決定，便是一個表徵。國勢的頹唐，人民因內外局勢的刺激，決不願再見內戰，是這些局面展開的理由，這些局面的展開，幫助了中央政府對日態度之轉趨於强硬，對日强硬又促成了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中央政權的鞏固，是由「排他」與「聯合」二種前後相反相成的政策造成的，這到今天已是一個事實。這事實，證明在某些時候可以執行安

內攘外的政策，但到今天這條路已走不通，因爲國民的公意——抗日反對內戰的公意，不允許再去「安內」了。

而且，自安內攘外政策執行以來，中央政令達於四川，貴州，雲南，廣東等省，固然是一個事實。但是不能否認那些地方原來的軍政長官是一些腐化的官僚與軍閥。進步的幾省如山西，廣西等地，也服從了中央政令，但那服從實際上是聯合的變形。中央費去了七八年時間努力進剿的紅軍，還儼然龐大的存在在西北。可見欲以武力統一全國是一個幻想。如果我們希望中國變成西班牙第二，那麼安內的工作儘可繼續進行。但是外侮侵凌，不允許中國這樣做，那麼除了聯合以外還有什麼辦法呢？這一前途，因西安事變的解決而愈益顯出其必然性。西安事變的解決，根本上還是走的聯合的道路。因爲，中國今日正如汪民楨先生所說，應該「兄弟鬩於牆，外禦其侮」了（國聞週報第二期中國的民氣與士氣）也正如長江先生所說「聯合是中國最高的政治理想」（大公報通訊）民衆的公意，內政外交的演變，都非向「聯合」這條路走去不可，不知先生以爲如何？

最後，西安事變中我們所得到的資料告訴我們，共產黨並沒有開後門，拆爛汚。因此先生說「無論何黨何派，你既標榜救國，便不該使用亡國的手段」若對共產黨而言是不對的。同時，如果

「我們所要攜手的必須是愛民族愛國家的人，」那麼共產黨也在應該攜手之列。這在先生諒也有同感的。

敬請著安！

吳絳楓謹上，一月七日。

吳先生這封信是由上海寄來的。這封信主要的意思，是在說明中國共產黨和蘇俄都未曾參加西安事變，都未曾施用開後門拆濫污的手段，而且共產黨也是愛民族愛國家的。我希望吳先生信中所寫的就是共產黨的態度。

這封信除了辯解這一點外，最可注意的便是「聯合」問題。我想分兩層來討論：（一）共產黨的態度問題；（二）聯合戰綫問題。

關於共產黨自西安事變以來所表現的態度，除了吳先生信中所提供的資料以外，我也得到不少相似的資料，但同時也有許多矛盾的東西。在西安事變後的兩三天內，我見到中共上海中央局的一張傳單，文字的要點大概是說：「不殺某賊，中國不能抗日；不打倒漢奸政府，革命沒有前途。」同時收到陝北紅軍的廣播無綫電報，也是對張學良的行動喝彩的。假使我見到的傳單是真的，收到的電報沒有錯，無疑的，共產黨又犯了嚴重的錯誤。『洪波震蕩，川無恬鱗，』在這樣一個大風波中，共產黨豈能無所動

靜？既動矣，又豈能無所錯誤？不過，共產黨是從羣衆中生長出來的，應能善察羣衆的心理。在西安事變中的羣衆情緒是怎樣的？這是天下共見的，羣衆所表現的情緒是：對蔣委員長的關切，對張學良的憤怒，對國家的熱愛。我想共產黨的眼睛是雪亮的，應已察知羣衆的情緒，趕快糾正了錯誤。這是對的。

有人問我：『國民黨現在是比較以前聰明些了。假使五年以前就這樣聰明，豈不省掉許多糾紛？』我說：『聰明還嫌不够，歷史將會教他更聰明些。』歷史是常換新課本的，不用說五年前的國民黨不會比現在聰明，共產黨或許更要糊塗。假使國共不分家，這十年來的中國歷史不將是另外一種寫法嗎？然則分家一幕劇，怨國民黨嗎？共產黨應負更大的責任。這十年來，共產黨一直在錯誤中過生活，從八一暴動，「秋暴」政策，立三路綫，游民蘇維埃，一直到流竄西北，哪一項不是錯誤？要知道一個行動的黨，它若執行了錯誤的政策，不僅是一個黨的損失，而是直接關係國運的！請共產黨人想一想：這十年來，你們給予國家的影響是什麼？殘酷的厮殺，斲喪了無限的國力，是給誰謀了便利？聽聽口號，看看事實，不慚汗嗎？當然，錯誤是不能完全避免的；我是希望大家以後少犯些錯誤，發現了錯誤便趕快改。我這不是爲某一黨謀，實是爲了我們國家的生命！

共產黨現在怎樣？我願相信，它已自動改正了在西安事變初期所表現的錯誤。現在怎樣呢？在楊虎

城遲不受命，東北軍猶豫觀望之際，紅軍積極東展，進入關中，越過西安。目前的現象是張楊紅三位一體的膠在一起，而想割據陝甘兩省。這一個方式和辦法是對的嗎？這一方式的前途，小說是破壞統一，影響整個國防計劃；大說則有演成西班牙第二的危險。我希望共產黨不要給面前的沙子迷了眼睛，應爲國家看一看較遠的前途。

其次，談到聯合戰綫問題。

『聯合戰綫』這一口號是屬於所謂人民陣綫的，實際是共產黨主張的。聯合的目的是什麼？當然是在於抗日。關於抗日問題，我在第二封信中已有討論。我認爲『抗日』是枝葉，而建國是根本。與其說聯合抗日，不如說團結建國，得體而無流弊。且聯合是並立的，團結則有一個中心，我們要建設一個獨立自由的現代國家，便不能沒有一個中心。

談到『中心』問題，五年來的中國情形，不能不說是近代史上的一個奇蹟。自九一八以至塘沽協定及所謂何梅協定，在重疊的對外屈辱之下，國民政府早應該倒台了；結果卻適得其反，她一直存在下來，而且是有力的存在着。這是個奇蹟。這個奇蹟的原因何在？是因爲我們國家在政治上只有國民黨是一個中心勢力。大家儘管對國民黨及國民政府不滿意，因爲顧慮取消了這個中心勢力，再樹立一個中

心勢力，不是容易的事，或將使國難更行加深，所以始終對之期待，並加以支持。這五年來的期待與支持，證明大多數無黨無派的國民的理智是不錯的。我們需要進行一個建國大運動；這個大運動的領導權，無疑的，現已落在國民黨及國民政府的手上。我想，共產黨是最能認識客觀的事實的，這一串事實自必被它明瞭認識了。

認淸了這一串客觀的事實，我們可以進一步談談聯合戰綫的問題了。

『聯合戰綫』這個口號，假使是個鬥爭的；那末共產黨儘可用這個口號，去粘合它的黨員，號召它的羣衆，再與國民黨打十年仗好了。假使覺得那不是個辦法，而這個口號又是要實行的；那末，便不能不準備十分的誠意，來考慮一些可能實行的辦法。聯合戰綫的一串要求是什麼？取消國民政府，改組各黨各派的聯合政府，……這是國民黨所能接受的嗎？請問。既談政治，便不能抹煞實際的勢力。在這一點上，國民黨自然有它的驕傲。這點驕傲是有歷史性的，而且是『易地則皆然』的。共產黨若處在今日國民黨的地位，也是不能接受那一串要求的。

我要聲明一句，我現在所討論的不是政治上的一種定型思想，而是當前的一個實際問題，並且假定共產黨是有充分誠意來考慮這問題的。共產黨假使在內外情勢的衡量上，覺得與國民黨繼續苦鬥

下去，是損耗國力，而且對於它的黨是死路一條，是基於這種覺悟提出這個『聯合戰綫』的口號，而想和國民黨攜手的；那末共產黨便應該很勇敢的作一個周到的打算了。一個現代國家，她的方式無論是資本主義的，社會主義的，法西斯的，或人民陣綫的，必須具備一個條件，便是——統一。在統一的組織之下，是不容許有一個以上的政府一種以上的軍隊的。共產黨或許要說：『我們已準備改編紅軍和取消蘇維埃了。』那末在相對的條件上，便須考慮到國民黨所能接受的程度。

我的看法，認為應該把『聯合戰綫』的口號改為『團結建國』，以國民黨為中心，共產黨和最大多數無黨無派的國民，共同督促並培植這個中心走向民主建國的大路。

我們不必另起爐灶的主張召開救亡會議或和平會議，我們應該督促國民黨就要舉行的五屆三中全會確定召開國民大會的日期，並修改選舉法。我雖不敢對國民大會預存多少幻想，但它確是和平蛻嬗走向民主政治的一條大路。

這個辦法我在第二封信信中曾經提到，現在再鄭重的把它提出，做我這封信的結論。

廿六年一月十九日於上海。

（附錄）北方青年的回響

王永興

王芸生先生連續的給北方青年寫了三封信，在文字中，我看到一個憂心謀國者對北方青年希望的殷切，我願以北方青年的資格答覆王先生，答覆對於北方青年抱着同樣希望的國人。

我是一單純的青年；年來，我曾以純潔的理智及熱誠，爲中華民國自由而奮鬥。一年來，我接觸了成千成百思想不同的青年和社會上各界人士，一年來，我經過無數次的大大小小事件，而一年來我獲得了最寶貴的經驗與教訓。這篇文章便是基于這點經驗與教訓而寫的。

王先生的三封信中，希望于北方青年者是兩件事情，（一）青年人的一言一行要以國家的福利爲前提，要擁護國家統一，要擁護統一的政府。（二）青年人的一言一行，要訴諸理智。我除了同意王先生的意見而外，我願意將北方青年的思想作一眞切分析（我認爲北方青年界一切問題的根本在于思想，）同時要論到影響北方青年思想的社會各方面。

北方青年界中，一向就分着三個大派別。積極的互相攻擊互相排斥的是左派與右派；他們雖然在青年羣中是少數，但是他們是活躍的，他們在思想上不同，因此他們中間常常有鬥爭。大多數青年是不常活躍的，他們是在左右派之外，他們無派別，無爭執，但是他們的態度及心理常是一致的，因此他們也似乎另成一派。

左派青年常常是青年羣中最優秀最活躍的，他們不但是有最大的熱誠，他們對於政治對於社會也往往有最好的認識。他們之所以被稱爲左派者，因爲他們常是不滿於現狀，有時且要積極的打破現狀；他們常是不滿意政府，常是對於政府持着責難與不信任的態度，常是持着嚴厲的批評。一二九以來，他們曾以最大的勇敢最大的熱誠，爲了衛護國家統一再接再厲的作鬥爭。他們具有很堅强的國家觀念，他們願以忠於國家爲職志。他們總是喊着爭取國家的獨立自由，爭取民族的解放。根本講起來，他們是好的。他們是國家的精英，但是在他們中間，流行着一個有毒的觀念有毒的思想。這種毒素是有歷史性的是傳統的。這種毒素是過分的左傾是狹隘宗派幼稚，是過分的幻想過分的短視，他們常是關起救亡的大門，拒人于千里之外，他們常是過分的責人而不能自省。這種毒素是恰投一些熱情青年之所好，因此在他們中間有着牢不可破的根蒂。這種狹隘宗派幼稚的觀念常常蒙蔽了國家觀念，常常使他們

忘了忠于國家這個最高職志。他們對於綏遠抗戰偉大勝利的漠視，他們對於西安事件不正確的認識，他們輕視不理甚至于壓迫一般青年一般民衆公正的意志，他們幻想着羣衆運動，但是他們不瞭解羣衆運動，他們過分誇大自己，過分小看別人，他們對於一切事情總是機械的一套公式，而忘掉了一切事情的獨立性與現實性，這些都是狹隘宗派幼稚觀念的具體表現。因此這些國家之精英的青年，本該永久有功于國家，相反的，現在他們却常常有罪于國家。

我常常覺得，以國家爲着重點來講，右派青年與左派青年是沒有大區別的。右派青年常是對現狀持保守態度，對政府持着絕對的信任與同情，他們不但具有很堅强的國家觀念，他們也常常是以忠于國家爲職志。但是在他們中間也流行着一個有毒的觀念有毒的思想。這個有毒的觀念也是有歷史性的，也是傳統的。這種觀念是過分的保守，是偶像無理智的崇拜，是宗派幼稚。他們愛護政府是對的，但是他們常常是盲目的信賴，無批評不理智的崇拜與擁護，這却不對了。這種偶像崇拜宗派幼稚的觀念，也能恰投一些熱情青年之所好，因此在他們中間有着牢不可破的根蒂。這種觀念常常蒙蔽了國家觀念，常常使他們忘了忠于國家這個最高職志。他們對于北平市學生救國聯合會以及各校學生會無理智的攻擊，他們常常把共產黨三字加到一個熱情救國青年的頭上，他們在西安事件中持着武力討伐甚

至剿淨西北各部軍隊的見解，他們對于政府許多錯誤的設施盲目的辯護，他們對于政府領袖常常是神化的崇拜，他們也同樣的輕視不理甚至壓迫一般民衆一般青年公正的意志，他們總是看不清事實，眼光太短，氣魄太小。因此他們應該有功于國家，但是他們却常常有罪于國家。

這兩派青年日常便是互相排斥攻擊，在近兩個月來，更表現了雙方的狹隘眼光短，氣量小，更表現了雙方都不忠于國家。在西安事件初起時，一方面壓迫一般青年公正的要求，而堅持不主張恢復蔣行政院長的自由；另一方面也壓迫一般青年公正的要求，而堅持不主張和平解決，而主張武力討伐。兩方面都錯了，任何一方面的主張實現，皆是國家之禍，雙方皆是國家的罪人。但是歷史循着大多數人的意志而前進的，西安事件也循着國人的公正意志而開和平解決之端了。

前面我已經說過，左派右派青年是青年羣中少數的，大多數青年常是不顧管事情的。這大多數青年也都具有堅强的國家觀念，也都願以忠于國家爲職志。因爲他們處于左右兩派之間，許多無聊的爭執攻擊排斥，使他們厭煩痛心；國家社會許多方面的失敗，很多地方的黑暗與卑鄙，使他們失望消極。因此這大多數青年的一般態度是與事無爭，消極悲觀冷漠。自己有了意見，自己也不能爲實現個人的意見而鬥爭，他們有很公正的意見，但是他們不能也不願意把那公正意見施諸事實。西安事件中，大多數

青年人的意見是：（一）請張學良氏立即恢復蔣行政院長自由並護送回京，（二）和平解決西安事件不訴諸武力討伐。這種意見是公正的，是有稱有功于國家的。但是爲什麼北方青年在西安事變後半月中一直在沉默着呢？因爲大多數青年雖然有了公正的意見，而于事于人持着消極悲觀冷漠的態度，所以不能公佈他們的意見而似乎無意見。

就是因爲大多數青年不管事情，而左右青年之爭乃益趨尖銳而終不可解。近兩個月來，我耳聞目覩很多極可痛心的事實，我親眼看見同是爲祖國爭獨立自由的朋友，在草地上跑來跑去的互相謾罵，互相毆打，同是有家歸不得的東北同鄉，互持木棍毆打。更可痛心的是北平市新舊二學聯對立，彼此皆自立門戶，彼此皆互相攻擊對方是僞，甚至于對方是漢奸。彼此都是中華民國的好兒女，而彼此却像是有不共戴天的仇恨。北方青年完全失去了他們應有的態度，完全失去了他們對于國家應有的貢獻。

我以爲北方青年之思想及行爲，所以有上述種種情形者；不僅青年本身要負責任，社會各方面也要負更多的責任。因此：第一我要論到中國共產黨和很多持有左傾思想的學者文人，因爲他們的很多號召言論，極能動青年人的聽聞，影響青年極大。第二我要論到中國國民黨，政府，和很多持着絕對擁護

政府的思想的學者文人，因爲他們是青年的直接領導者教育者。第三我要論到各校當局，因爲他們也是青年的直接教育者管理者。

年來我聽到共產黨很多言論，他們不僅提出了中國人民抗日聯合戰綫和民主共和國這兩個口號，他們更能透澈的明白歷史，主張中國要有資產階級革命，中國應該成爲近代式的國家。我很欽佩共產黨人的英明果敢和遠見。但是我要敬告你們，僅僅提出了高級的政治口號是不够的，是不能使人信服的。你們必得以具體的行爲，求諸國人諒解，求諸國人愛戴。我認爲中國今日的任何黨派，皆當以擁護中華民國獨立完整統一爲他們的最高職志；要知國家不存，任何高尚理想皆是幻影。共產黨人應該忠于國家也必得忠于國家，今日的全國人民是不許任何人不忠于國家的。共產黨人雖然提出了很好的口號，但是我覺得你們還未能澈底的打破你們一貫的傳統政策，宗派而狹隘的左傾政策。你們應該知道今日中國青年界很多左傾宗派幼稚的見解，是一部分受了你們的影響，而這些左傾宗派見解是有害于國家的。其次你們應該瞭解聯合戰綫絕不是幾個人互相聯結，而是在一個以國家福利爲前提以大數人的意見爲依歸的新政策下團結最多數人們。大多數人的意見是最重要的，你們應該尊重，但是我覺得你們是常不尊重的。（所謂尊重是指事實而非口號。）這或者就是你們在羣衆中威信很小的

緣故。

很多持有左傾思想的學者文人，我覺得他們未能忠于他們的職責。他們不該很狹隘很短見的，使青年業了很多不良的影響。

今日的中國是國民黨黨治下的國家。因此政府的許多設施國民黨要負其全責。國民黨人應該深深反省你們責任的重大與你們許多政策的錯誤。我要告訴你們全中國青年都是愛國的，無論左派右派以及大多數不管事的青年他們都有很堅強的國家觀念。但是要他們擁護政府必得政府事事都像個樣子，而絕不該出于壓迫。第一，政府需要明白過去外交上再三再四的失敗，喪失國土，喪失國權，這些是不能得到青年的諒解及同情的。因此今後，政府在外交上應該更澈底更強硬更自主的，這樣自然會使青年愛戴政府而掃除了青年界的糾紛。第二，政府不該壓迫思想，思想是可誘導而不可強制，政府應該允許思想自由。政府治國應該是民主的，民主是全中國人一致的要求，政府於此應該猛省。政府過去的不民主壓迫思想是青年界糾紛重要的原因。

很多擁護政府的學者文人，不從批評政府入手使青年瞭解政府，他們常是很短見的過分的責難了青年，這足以加強了青年的紛亂。他們常常是失去了諄諄教誨的態度，而也像作着感情意氣之爭。西

安事件初起很多先生堅決主張討伐而不主張和平解決，要知眞的討伐了是國家之福抑國家之禍呢？這個主張顯然的加強了當時青年界的紛亂，這是一例。

對於很多學校當局處置學生界紛亂的辦法，我認爲有很多處是不當的。他們對於學生的言行是消極的制止而不是積極的教誨。要知有了學生會使學生鬧糾紛固然不好，但是取消了學生會使學生失去了學習很多技能的機會是更不好的。同時，學校當局眞的負責任來教誨學生，則學生會的存在不但不會使學生鬧糾紛，且將使學生更團結，這是我敢斷言的。另外，師生間的隔離太遠，也是學生界鬧糾紛的重要原因。

我要求上述幾方面的人士皆有所猛省，眞的他們能以良知能以國家大義來教誨來領導青年，則青年界是可以統一與團結的。

最後我願以同是青年最親敬的名義告諸北方青年。

（一）我們應該明白我們所處地位之重所負責任之大，我們是中華民國北方的萬里長城。華北是處在敵人威脅之下，僅有國家軍隊是不足衛護華北的；必得有我們這些青年以赤誠熱血喚醒國人

督促國人，華北不但今日不會滅亡，華北且將永不會滅亡的。而且我們所負的責任不僅局限捍衛華北！全國青年是否奮起？是否團結？北方青年也要負其全責。中國民衆能否日近于近代化，有組織有政治認識，政府自然要負責，而青年，尤其是北方青年也要負其全責。國家對我們期待之殷，信賴之重，我們反省今日我們的言行，是否我們自暴自棄了，是否我們自毀了國家的萬里長城？儘管我們的思想不同，但那是次要的，最主要的是國家。我們必得要求國內和平，我們必得擁護中華民國的統一和統一的政府。

（二）我們是青年是學生，我們可以與聞政治但却不可幹政治。與聞政治可以使我們瞭解政治瞭解國家社會，這是學習，這是練習，這是作人必經之道。但我們却不可幹政治，如今日中國的政客一樣。這裏我要附帶報告，一切政黨，我不反對你們在學校中有何活動，但是你們的活動是要幫助青年與聞政治的，你們千萬不要強迫青年去幹政治。

（三）我覺得今日的大多數青年太缺乏智識太不讀書。救國是一件大事業，絕非不學無術所能爲的。今日青年界的糾紛一部分該歸咎于許多青年太幼稚太無知識。我們是學生，死讀書是錯誤的，但是不讀書更大錯而特錯。圖書館書庫裏很多有思想有內容的書籍，成年擺在書架上吃塵土，最爲一般青年人所愛看的，倒是那些一套公式的三五十頁的小書，三五十頁便講了什麼政治哲學堂皇的大問

題。而青年朋友看了反倒有很多人自鳴得意，這是如何可怕的現象。我們是學生，我們要學習要讀書，讀更多的書更有價值更大的更難懂的書。我們必得有知識，知識是我們生命的食糧，知識是我們救國的武器。

（四）在我們青年中間要更多的民主更多的自由，自由研究自由討論。我們該反省，不僅政府壓迫我們的思想，我們自己也互相壓迫强制，我們中間也太不民主不自由。我們中間有一個風氣，這種風氣是膚淺庸俗，什麼事情都是一套公式，什麼事情都差不多。不如此者便是不救國，便是落後，便是反動。不如彼者又便是反政府，便有什麼之嫌。讀書討論問題更不是民主更不是自由。有一種風氣在壓迫着我們，讀書是那一套，討論問題又是那一套，總是薄薄的小本子，總是什麼講話之類。不如此便被人目爲異類了，自爲落後了，這裏不允許有個性有特殊見地，因此很多人是默默了，只有少數人在那裏作公式家，宣揚而鼓勵膚淺庸俗腐化的風氣。我們是同樣愛國同樣救國的，但是我們該允許有個人的自由個人的特性，因爲我們是人哪，我們不是機械。

這裏我附帶要敬告一些出版家著作家學者。青年們這種膚淺庸俗的風氣，你們是要直接負責。我不反對你們著書立說，但你們切不可再給青年那一套公式那些淺薄的東西，那對青年是有害的，會使

青年麻痺。給青年一些真的東西吧，有個性的有思想有內容的；不然，你們可以不給。

（五）最後，我願特別敬告那些大多數既非左派又非右派的青年。在北方青年混亂局面中，你們是挽狂瀾于既倒的中流砥柱，左派右派胡鬧固然是錯了，你們看着事情壞了而不管更是錯了。你們的意見當是公正的，而且你們又是多數，你們應該奮起。應該負責任。北方青年能否團結，關鍵就在你們。

兄弟鬩于牆，外禦其侮。北方青年哪，我們是中華民國的萬里長城，我們該自愛惜該自珍重。我們該是國家的孝子，而不該是國家的罪人。

一月二十六日深夜。

（附錄）如何團結建國

田光程

一

自從西安事變發生以後，國人無日不在憂惶驚懼中過生活。經過兩個月來的磨難，才現出和平解決的曙光。吾人痛定思痛，深感某一重大問題如不亟求適當的解決，未來的憂患仍不能絕對消弭。為國家民族前途計，同時就想到共黨問題究應如何解決？武力剿共政策是否仍應貫澈？如果認為武力剿共不是最澈底最有效的辦法，應該如何改絃更張另闢途徑？這些都是當前急要的問題。

幾年來外患的嚴重壓迫，逼得中華民族走到存亡絕續的關頭。有思想的國人早在思索：站在救亡抗敵的立場國共是否應該聯合？是否可以聯合？如果可以聯合，用何種方法達到聯合為國家民族前途計，這個問題究應怎樣解決？

環境逼得我們不能不發生這個問題，不能不考慮這個問題，不能不亟求解決這個問題。這個問題應該趕快求得一個明白合理的結論，這個結論的形成極賴有力輿論的倡導。

王芸生先生談到共黨問題時，他有幾句很痛切的話：『請共產黨人想一想，這十年來你們給予國家的影響是什麼？殘酷的厮殺，斵喪了無限的國力，是給誰謀了便利？』（註一）這幾句話表現了公正國民的共同感覺。但是共產黨十年苦鬥，似乎也不可以通常匪類目之。他有主義作行動的理論，有社會經濟的條件作存在的基礎。如果共產黨問題果真是單純的匪患，十年痛剿，早已該消滅淨盡。這或者也是公正國民的共同感覺。

今日我們要以公正國民的資格，向共產黨人大聲呼籲：如果共產黨人承認這十年來的行動結果是摧殘國力，間接的助長敵焰，為國家民族利益計，應該重新考慮他們的前途，而且很勇敢的改變以往的政策，向國民作一個鄭重的表示。同時我們更以誠懇熱烈的態度，請求政府也能重新考慮十年來的武力勦共政策。如果認為武力勦共不是最澈底最根本的辦法，同時為保存血汗培成的僅有國力，不用在繼續勦共的戰爭中，似乎也應該作一個合宜的打算與措置。現在是需要國人放大眼光用冷靜頭腦考慮這個問題的時候。我們的思想與言論，要完全基於國家民族的利益，萬萬不可抱持成見，還作推波助瀾的主張，把國家民族拖入不可自拔的泥坑！

在外患所形成的民族危機下，逼得我們認為「團結建國」是當前共同的責任。如果共產黨人承

認『團結建國』是中華民族的惟一出路，應該很勇敢的作下述的決定：停止武力行動，取消蘇維埃政府，改組紅軍爲國家軍隊，在一個中心勢力下精誠合作，在這種條件下，政府應該很誠懇的接受共產黨人合作的要求，大家共同負起救國建國的責任。任何外人不能阻礙中華民族「團結建國」的要求，我們也沒有任何理由非堅持分裂自殘的政策不可！

基於這種認識，我們認爲國內團結應該實現，可以實現。現在正是需要大家凝思如何團結的時候。我願意把我的意見貢獻出來，雖不敢自信個人對於國事的見解完全正確，但愚者千慮之得或可作智者萬一之參考。

二

『團結建國』是王芸生先生首先提出來的口號，我希望這個口號成了中華民族復興的南針。今日之所謂團結，不是國民黨容共，更不是共產黨投降，而是中華民族在一個中心勢力下共負救國建國的責任。希望從今以後不再聽到『容共』或『聯合陣綫』的口號，大家共同的口號是『團結建國』。只有這個口號得體而無流弊。

明白了團結的涵意，應該指出團結的途徑。共產黨十年苦鬥，與政府十年痛勦，不是某個政黨的損

失，而是國家民族的損失，如果沒有這十年慘痛的鬥爭，國家想已不是現在這樣的局面，或者早已完成復興建國的大業。十年苦鬥的代價，是國力民氣的摧折，是外患致命的打擊。時至今日，共產革命的前途固屬渺茫，武力統一的政策又何嘗可靠？如果今日再不重新打算，仍舊繼續以往的政策十年後的局面，又恐怕不是今日所可想像的了！教訓已經够大，難道還不該覺悟嗎？

拋開國家民族的前途不談，如果以『覆巢之下焉有完卵』的意義說，大家應該毫不遲疑的考慮團結的途徑。這個途徑最好是由政治的諒解達到一致的團結。團結的先決條件是精誠與信任。如果仍不肯放棄舊賬，還在斤斤於以往的嫌怨，彼此不能以誠相見，那麼只有繼續鬥爭。結果給敵人造機會，陷民族於絕地。我輩死不足惜，但何以對祖先及後代？

二

講起團結，我們不能忽略團結的障礙。了解了團結的障礙，才能明白以往何以不能團結的原因，同時才好研究解除障礙的辦法，使團結卒底於實現。談到團結的障礙，第一，是兩黨歷史上的交惡。十年鬥爭，積仇累怨，今日倡言團結，不是很自然的事。第二，是兩黨主義與建國理論的衝突。雖然三民主義與共產主義極終的目的並無衝突，但在革命的方法與主義的實行上不能一致。共產黨以一黨專政為建國

的理論，國民黨也以三民主義爲建國的根本。如果兩黨固持定型的主義與理論，而不求適合客觀的需要，也是團結上的莫大障礙。第三，是政府勦共立場問題。今日放棄勦共，或者顧慮對國民無法解釋十年來的責任，對勦匪死難將士無以慰其英靈，對守舊元老及一部分將領無以化其成見。如因求團結反造成現狀的分裂，不能不預爲顧慮。第四，是信義問題與利害關係。有人還在顧慮『有沒有保障』，還在顧慮『共產黨的失信』，還在回憶『過去的痛苦經驗』。如果團結合作，政權上或不免發生利害衝突，凡此種種顧慮，都是當前團結的障礙。第五，是事實上的困難。今日共產黨有自己的所謂中央政府，有獨立的軍隊武力，若要團結，必須擁護一個有實力的合法政府，必須劃一軍隊組織。共產黨或者不能無條件的取消其組織，改組其軍隊。如果有條件，能否爲政府接受也是問題。第六，問題的複雜，也是主要的障礙。今假定同意團結，如何可以實現團結？政府如何變動？軍隊如何統一？主義與理論的衝突如何協調？一切政治經濟社會的設施如何趨於一致？凡此種種，均爲異常繁複難決之問題。第七，是顧慮外交上的影響。如果國共團結，某方或將施以更甚的壓迫，歐美亦慮不能同情。國家陷於孤立，敵友反趨聯合，當局不能不愼重考慮。

四

我們承認上述的障礙都有相當的理由，然而事實上更有不能不團結的原因。如果承認團結有必要，便不該因爲障礙而放棄團結，反應設法消除障礙以達到團結。關於團結的理由，可分四點來說：第一，爲國家民族的前途着想，應該完成團結。現在需要我們靜想，如果沒有十六年革命勢力本身的分裂，革命運動不會發生頓挫，不會有十年來不斷的鬥爭，不會有今日社會經濟的疲敝，不會有外患的乘虛煎迫。這些現象與共產黨的運動互爲因果，社會經濟越疲敝，外患越嚴重，共產黨的運動越無法抑止。共產黨的運動越無法抑止，政府苦於內憂，困於安內，社會經濟越惡化，外患越緊張。內憂外患是亡國的主要原因，吾人懷亡國之痛，應該解決內憂，共禦外侮。否則內憂尙未消滅，外患或已無法遏止。歷史上的教訓够多，爲國家民族前途計，不容我們再蹈歷史上的覆轍。吾人希望共產黨不要作國家民族的罪人，覺悟十年來的行動給國家的惡影響。同時希望政府爲保存國力，集中力量，接受共同建國的要求。我們一方應知道共產黨十年來苦鬥的原因，同時應了解政府不得不剿共的苦衷。站在國家民族的立場講，政府不是不能合作，但必須使政府有合作的可能。今日共產黨果以團結建國爲正當，應該在事實上有一個勇敢果決的表示。在外患的壓迫下，合作共存，分則兩傷，爲國家民族前途計，應該有這個認識。

第二，爲政府及共產黨的前途着想，應該實現團結。幾年來領土主權的喪失，使政府居於一個很不

利的地位。誠如王芸生先生所說：『大家儘管對國民黨及國民政府不滿意，因爲顧慮取消了這個中心勢力，再樹立一個中心勢力，不是容易的事，或將使國難更行加深，所以始終對之期待，並加以支持。』（註二）政府應該珍愛國民期待與支持的好意，如果因苦於內憂，而使國難更行加深，人心將不知如何轉變。國民黨已取得中心領導勢力，人心的擁護是他存在的最大保障。今日實現團結，國民黨並不會喪失它的領導權，這是大家共認的事實。共產黨爲它的前途計，也應該熱誠的促成團結。共產黨苦鬥十年，今日仍不免流浪邊荒，如果再繼續苦鬥，能否達到目的大是問題，國家的環境是否許可也成問題。一個政黨的前途，是建在民心之上的。西安事變已顯示民心所趨，共產黨應該深思。以西北的經濟基礎，生存都發生問題，更不必說以西北作共產革命的基礎。總之，團結尚有前途，否則終不免慘敗。爲國家民族利益計，政府應該考慮團結，共產黨爲共前途計，也應該促成團結。

第三，從剿共的軍事前途着想，也應該實現團結。十年剿共，生命財產的損失不可數計，到現在不僅未達到完全消滅的目的，且有在西北坐大之可能。我們相信以現在政府之武力，倘假以時日，或不難達到相當的成功。但幾年來以人民血汗培植的國防實力，實不忍有一點一滴用於同胞間之自殘。兩廣事件之和平解決，西安事變之忍耐持重，大部分受這種認識的支配。今日無論任何名義從事實際的內戰，

均不免激起有思想的國人之反感。而且西北一隅，現爲共產黨所控制，政府進剿，很難形成大包圍的形勢。就軍事前途說，縱能達到預期的目的，也要費較大的力量。我們萬不要爲敵人造乘火打劫的機會，國家節省一分力量，在救亡運動中即多一分保障。

第四，就人民心理的趨向說，也應該實現團結。數年來外患的逼迫，恥辱的加重，使人民養成一種反內戰反分裂的普遍意識。在這種意識支配下，人民不同情任何形式的內戰。大家只希望能集中全國的力量，救亡抗敵。一二八及長城戰役得到全國人民熱烈同情，最近綏遠抗戰復得到舉國精神上物質上的援助。然而十年來剿匪戰士，萬里奔波，死亡枕藉，不可謂不苦，但從未聞有任何民衆團體表示同樣的同情與援助，吾人雖欲諱言，然而事實却彰彰在人耳目。一般人民對於任何政黨沒有絕對的成見，大家所顧慮的是國家民族的存亡。凡是自損國力自亂陣容的行動，一概不能激得人民的同情。多少年來靑年人每閱剿匪勝利斬獲多少的消息，輒自嘆息，每有羣衆運動，呼籲聯合的口號響入雲霄。這是民衆心理的表現，這種心理不可一味抹殺。因此武力剿共政策似有再加考慮的必要。基於這種認識，人民也不能同情共產黨武力革命的政策，認爲這種行動的結果，足以摧殘國力，減弱抗敵力量。我們一方希望政府體察民意，有以應事實上的需要與人民的期望。同時希望共產黨人也能順應人民的心理，速作英明

果決的表示。如果這種表示有利於國家民族，共產黨應該無條件的行動，不需要任何保障，因爲民意便是最有力的保障。

五

根據上述的種種理由，可見團結應該實現，必須實現。實現團結，必須消除團結的障礙。我認爲在團結建國的大目標下。以前所述七點障礙與困難都有解除的可能，只要有團結的誠意與共同建國的認識。第一，兩黨歷史上的交惡不難在衛國建國之大目標下盡棄前嫌。今日大家被逼得不能不攜手圖存的時候，應該有『以前種種譬如昨日死，以後種種猶如今日生』的覺悟。第二，兩黨主義與建國理論的衝突也不難調和。三民主義的中心在民生，共產主義的目的也在解決民生問題。所不同的只是方法。我們希望共產黨不要固持定型的方法，應即放棄階級鬥爭的理論，以適合現實的需要。同時希望政府澈底實行民生主義中的政策，以期民生問題早告解決。關於建國理論問題，國民黨到憲政時期事實上已放棄一黨專政的理論（所謂還政於民）如果共產黨所表示的擁護民主政府的態度不是一時的策略，也應該放棄一黨專政的理論，共同促成憲政之實行。第三，對於政府剿共立場問題，我們認爲在團結建國的大目標下，不難邀得舉國一致的同情。政策須隨着環境變遷，尤須考慮國家眞正的需要。若固持成

見，竟致犧牲國家民族利益，想爲國人所不忍爲，且爲輿論所不許爲。第四，信義問題與利害關係，我們認爲倘有精誠團結的熱誠，根本就不該發生信義問題的懷疑。作事沒有絕對的是非，今日且不容大家斤斤於舊賬。彼此應披懷坦胸，開誠相見，在精誠感應下，當無懷疑與猜忌可言。談到利害問題，今日只有國家民族的利害，沒有任何個人或政黨的利害。國民的認識是：凡有利於國家者爲是，否則爲非。是非分明，利害關係似可不談。第五，事實上的困難也不難消除。共產黨果以國家爲重，果有『團結建國』之精誠，應在一個中心勢力下協力奮鬥。舉凡分裂兩歧的組織與行動，應毅然取消或停止，以示誠意於國民。在這種合理的條件下，政府當願完成團結，共負艱鉅。第六，內容複雜也不難迎刃而解。誠意是團結的要素，建國是團結的目的。爲完成這個目的，在統一的政府下應集中國內各方英才，軍隊應劃一組織齊一統帥，主義與建國理論應求得適合各觀需要之調和，一切政治經濟社會的設施應由中央政府加以調整。凡此種種，均不難在一個大目標下求得合理的解決。第七，外交上的障礙也可以免除。任何國家不能阻礙中華民族團結建國的要求，如果有人危害吾人之生存權，只有拚命奮鬥。共產黨既放棄共產革命，歐美各國亦無所顧忌。反之，在中華民族抵禦強暴的自衛戰爭中，且能得到主持正義者的同情與援助。因爲上述之障礙與困難，均可設法解除，我們深信團結有實現的可能。根據政府與共產黨的表示，已見到

團結的曙光了。

六

關於團結問題，共產黨在一九三五年就有此表示，（不過他們是用「聯合」的口號，不是用「團結」的口號）一九三五年八月及十二月所謂中華蘇維埃政府曾兩次宣言，呼籲團結，希望全國各黨各派聯合起來一致抗日。他們要求政府停止剿共軍事，並容納組織國防政府的要求。因爲這種表示不够造成團結的程度，所以只發生部分的作用（如西安事變）一九三六年秋，有外籍記者史諾（Edgar Snow）氏在陝北保安與毛澤東會晤，縱談抗日及國內聯合問題。該項談話記錄經毛氏校正後，發表於「密勒評論」七十八卷十一及十二兩期，爲極重要之史料。其中所論統一陣綫一節，很可代表共產黨的態度。毛氏謂共產黨之所以主張聯合，有三大因素：

『第一，是日本侵略的嚴重程度，一天急迫似一天。這麼一種可怕的威脅使得中國一切的力量必須來聯合了。我們深知共產黨之外在中國還有許多別的黨派和勢力存在着，而國民黨是其中最強的一個。沒有它的合作，我們的力量現在要去抗戰是不够的，所以一定要有南京來參加。

第二，自從去年八月（一九三五）共產黨發表宣言，堅持中國各黨大聯合一致抗日以來，全

國民衆都曾表示同情……他們都熱切的希望着內戰結束，否則抗日運動要遭到很大的障礙。

第三，是許多愛國份子，甚至是國民黨內的，現在都贊成跟共產黨重新聯合。……』

在這種聯合中，毛氏表示在對外抵抗的場合，紅軍一定服從一個軍事委員會的指揮與決定，他說：

『在抗日戰爭中，國家軍隊必須有一個統一的指揮，但軍事委員會必須是代議制的，必須着重反日戰綫。……』

至於紅軍是否可以變更名目，他說：

『紅軍是否變更名目，那看重新聯合的情形。』在政治方面，毛氏謂：『必須建立一個民主的國防政府。它的主要的工作是：（一）反抗外力的侵略，（二）給人民大衆一切正當的權利，（三）加强國家經濟的發展。』『設若一個共和國成立的話，中國蘇維埃一定要作它的一部分，……實現同樣的設施。』

關於蘇維埃法律與土地問題的規定是否一概作廢，毛氏謂：

『設若跟南京的統一戰綫能够成立，這個問題到時候很容易解決。』毛氏並鄭重表示：

『設若這種問題（指聯合）在國民黨裏面展開的話，我們準備和它合作來支持它。並且跟

它結成和在一九二五——二七年間一樣的那種聯合戰綫（反帝）。我們深信這是我們唯一可以救我們國家的方法。』這是共產黨方面在去年秋天的表示，我們希望這個表示含有十分誠意，並且因爲環境的轉變，到現在能有更進一步的表示。

在政府方面，我們很難找到明白確切的表示，事實上在這個問題沒有具體的進展前，也很難有明白確切的表示。不過我們相信政府諸公不會認爲應該重新考慮這個問題的人，同時在某種條件內，亦可容納團結的要求。最近某高級將領在太原談解決陝局方針時，同時談到共黨問題。他說：

『殘共如能脫離第三國際，放棄階級鬥爭，取消蘇維埃組織，解散匪軍建制之僞中央，亦可收容，否則必須痛剿。』

這幾句話很可代表有力者的態度，吾人應該相當的重視。

根據上述的態度說，共產黨以抗日問題爲團結的關鍵，政府以共黨取消一切分歧的組織及停止武裝鬥爭爲團結的關鍵。我們深信政府有衛國建國的決心與準備，近一年中且不乏有力的表現。我們亦深盼共產黨能根據國家民族的需要，採取可以達到團結的措置，千萬不要爲錯誤的政策及定型的理論葬送了國家民族的前途。我們認爲中國共產黨最正確的路綫，是先完成民族主義革命，然後徐圖

社會主義的建設。如果一方實行社會革命，一方又從事反帝戰爭，以共產黨的力量，必致兩無成就。結果毀滅了共黨的前途，而且毀滅了中華民族的前途。因此我們深盼共黨堅定民族革命的立場，脫離國際組織，放棄階級鬥爭，在民族解放運動中攜手奮鬪。

除了政府及共產黨的表示外，民衆要求也是促成這種團結的有力因素。幾年來每有學生運動，必喊出呼籲團結或聯合的口號。大家的認識是：只有團結可以加强民族解放的陣容，分裂自殘恰中敵人的毒計。今日中華民族應該不分黨派，不分階級，不分種族，大家結成堅固的民族壁壘，只有在這種堅固的壁壘下，可以克服民族的危機，完成建國的使命。

人民的心理與輿論有推動團結的力量。我們相信政府與共產黨的表示大部分受這種心理的影響。現在需要發動更有力的輿論，使中華民族大團結得以早日完成。

七

明白了大團結的需要與可能，應該進一步討論實現團結的方案。這個問題十分複雜，非個人智力所能策其萬一。茲僅述其大概，以供當局及國人之參考。

（一）政治上之統一——欲完成救國建國大業，必須共同維護一個中心勢力。因此我們希望共

產黨能毅然取消所謂中華蘇維埃政府，擁護取得國際地位之南京中央政府。取消紅區名義，取消地方蘇維埃政府以期劃一政治組織。同時希望中央政府及部分的地方政府，容納各方英才，共負建國大任。

（二）軍事上之統一——在將來民族解放戰爭中，必須有統一組織統一號令之軍隊，方克負此艱鉅，此爲各方所共認。因此我們希望共產黨毅然取消紅軍組織，改組紅軍爲國家軍隊。政府所屬中央軍及其他軍隊，似亦應統一編制，概稱爲國防軍。現在之軍事委員會，或宜改組爲國防軍事委員會。以全國高級將領爲委員，以負有聲威之軍事領袖爲委員長。此會爲國家最高軍事機關，統率全國海陸空軍。又軍隊中之黨部，似應取消，以免政治思想之歧異。

（三）主義與建國理論之調和——前已言之，三民主義與共產主義並非背道而馳之主義，而爲殊途同歸之主義。兩種主義均以世界大同爲最後之鵠的，復以解決民生爲革命之中心。三民主義之目的，於爭得民族之自由獨立後，建設民治民享之國家。中國共產黨之目的，亦在通過民族主義以達到社會主義的建設。孫中山先生自謂三民主義之中心爲民生，並謂民生主義是共產主義之實行，共產主義爲民生主義之理想，所不同者僅方法而已。吾人認爲今日民族生存較民生問題尤爲重要，故應團結各階級之力量，以爭取民族之解放。因此共產黨應放棄足以造成同胞間分裂之階級鬥爭，而以民生主義

中節制資本平均地權之方法解決民生問題。吾人耳聞西班牙政府軍及叛軍在國際操縱之下之自殘戰爭深覺痛惜，因此對共產黨第三國際指導下之武裝行動亦乏同情。故深盼共產黨今日能站在民族主義之立場，毅然斷絕國際之關係。關於建國理論之衝突，國民黨至憲政時期事實上已放棄一黨專政之理論，共產黨今日以民主政府相號召，甚而主張『建設一國會形式的代議制政府』，則一黨專政之理論，實無維持之餘地。吾人認為永遠團結之大道，莫過於實行憲政，而憲政之實行，必須尊重民意及法律精神。我們希望五屆三中全會能確定召開國民大會的日期，修改選舉法，重新舉行代表選舉，並盼紅軍亦有代表出席，俾能集中全國意志，共商救國建國之大計。更希望在相當時期內，應有一『團結建國會議』，舉凡政治軍事之統一，主義與建國理論之協調（兩黨似宜訂立一共同信守的政綱），均在此會議中決定之，庶幾共同衛國建國之大業得以早慶完成。吾人希望中國憲政時期之政治，大體採歐美政黨政治之形式，政權之交替，非決於武力而決於選舉。但此種政治，必須各黨之政策無基本之背馳。如甲黨當政實行公有財產制，乙黨當政又實行私有財產制，根本不能實行憲政。故吾人希望中國共產黨既放棄一黨專政之理論，尤須修正其革命之方法與實現主義之手段，中國兩大政黨果能在建國政策上大體協調，則吾國於完成民族革命後，復不難走上長治久安之大路。吾人平心思考，認為三民主義之

精神可以爲永遠建國之基準。今日國人最迫切的責任，是實現民族主義以求中華民族之獨立平等。然後在民主政治下，完成社會主義之建設。竊思同胞間政治信仰縱有不同，然救國建國之志願並無二致。今日合力奮鬥不難達到共期之目的，分裂自殘將不免兩敗俱傷。深盼國人此刻俱能拋棄成見，共同考慮此『團結建國』問題。今日中國正在復興或滅亡之歧路，國人肯否循遠大光明之路攜手邁進，僅繫於一轉念間耳。

（註一，註二俱見國聞週報十五卷五期王芸生「三寄北方青年」一文）

一九三七二月三日——十日在上海。

(附錄)論共產黨的問題

徐芸書

我是一個信仰共產主義的青年，我願以這樣名義來發表一點關於國家統一問題的意見，我想這樣才合乎民主政治的精神。我想一個共產主義者，應該是熱烈的民主主義者。我的立場，是個人的立場，我的見解，是個人的見解，不過，我想在全國的青年當中一定有我的許多同志。至於有的革命家們對我這樣的蹩脚的共產主義者將取什麼態度，則不能計較了。

現在所謂「共產黨的問題」，就是中國共產黨與中國統一的關係的問題。

中國共產黨在前年提出各階級各黨派合作的口號，在去年又提出「建立統一的民主共和國」的口號。這就是中共的「民族統一陣線」的新政策。現在所謂共產黨的問題，即因共產黨的新政策而引起。

民族統一陣線，我想當然是一般國民的要求。不過，關於共產黨的新政策，一般人却常有兩種疑問。一種疑問是，共產黨真的擁護民族統一陣線嗎？另一種疑問是，共產黨不會「利用」民族統一陣線嗎？

這些疑問是所謂共產黨的問題的重要焦點。

這後一種疑問，我想不是必由共產黨才能回答的問題。如果民族統一陣線是大多數國民的要求，如果共產黨對統一陣線盡忠實的努力，那當然不僅有利於統一陣線，而且有利於共產黨，使它在國民中間的地位提高。如民族的統一陣線能够使中國加快的完成鞏固的現代的國家，那麼共產黨地位的提高就無害於中國一般國民，因爲愈是在那鞏固的現代的國家，任何的過激只有愈爲減少而不會愈爲加多。但，如果民族統一陣線有廣泛的堅固的基礎，而共產黨在實際上背叛民族統一陣線，共產黨便不但不能提高它的地位，而且只能很快的失敗，因爲統一陣線可以把它壓碎。如此，共產黨是可以「利用」統一陣線的，但是它除了忠於統一陣線之外，却沒有旁的途徑可以「利用」統一陣線。

如此，更重要的，實際的焦點還是前一種疑問。這前一種疑問，我想却只有中國共產黨自己才能够回答。

中國共產黨宣布它的新政策之後，它的面目和地位的確已經改變了很多，這是一般政論家所公認的了。不過，也是很顯然的，中國共產黨還沒有澈底轉變到民族統一陣線的政策的路上來：這是人們懷疑共產黨的主要依據。這種依據，便只有中共自己才能够消除。

中共怎樣才能夠消除這種依據，換言之，中共怎樣才能澈底轉變到新政策的路上來呢？

首先，我想中共應該宣布擁護中華民國，這是中共澈底轉變的最重要的步驟。

依馬克思主義的見地，中國革命的基本任務是締造統一的民主的國家，表面的現代的國家，消滅外部的分割，內部的落後與一般生活的痛苦。我想，一般國民的要求，是如此。我想，中共新政策的目標，也應該是如此。換句話說，建立「統一的民主共和國」這個口號，應該是中共新政策的具體內容；中共是否眞的擁護民族統一陣線，要看它是否忠於統一的民主共和國的原則。而中共是否忠於這個原則，我想要看它對中華民國取什麼態度。

中華民國，它代表辛亥革命的傳統和民主國家的原則。一個馬克思主義者知道，辛亥革命沒有能够完成建立現代中國的歷史任務；但同樣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也知道，辛亥革命推翻了歷史上最久的君主專制，樹立了不可動搖的原則，開闢了豐富的改革的道路。二十五年以來，只這二十五年以來，中國的人民，包括共產黨在內，的確作了豐富的改革的努力，這些努力，互相推進（雖也有磨擦）使中國雖在這二十五年當中飽受了內外的憂患，但在今天也的確準備下了救國建國的基礎。中共在今天提出「建立統一的民主共和國」的口號，這是值得稱讚的表示，因爲今天正是完成建國事業的時機，二十

五年的歷史已使統一與民主的觀念在一般有知識的國民中間成爲普遍的信仰。可是中共若要眞實忠於這個口號，它還得表明擁護中華民國的立場，因爲完成現代國家的事業並沒有跳出辛亥革命的傳統，更因爲中華民國在一般有知識的國民的心目中，是統一的民主共和國的惟一的具體象徵。

擁護中華民國，這也就是說，放棄蘇維埃的政治系統的獨立，承認國民政府爲中央政府，爲中華民國的完全統一與民主而努力，準備擁護未來的中華民國的憲法。共產黨若能採取這樣的態度，國民政府和國民黨若也能採取妥協的步驟，我想這是完成中華民國建國事業的最便利的途徑，因爲這個妥協，足以表示中國最進步的國民要求現代國家的意志的凝結，那麼別的反統一的反民主的勢力就只有最後的運命了。

這不但不是叫中共放棄它自己的立場，而且是叫它鞏固自己的立場。因爲，擁護中華民國的表示，就是爲統一與民主而奮鬥的表示；因爲，中華民國的勝利就是中國人民的勝利，而一個共產主義的政黨除了人民的利益之外不應該有旁的利益；並且因爲，在這古老殘破的中國，一個馬克思主義的，唯物主義的政黨，應該以建立統一與民主，實現中國的現代化爲它最重要的目標，而非一個手段，也非一個策略！

不過中共若要澈底轉變到新政策的路上來，僅有一個澈底的「政策」還是不够的。一個澈底的政策，還必得以統一的行動來保證。

中國是一個古老的複雜的國家，中國共產黨是一個歷史很短的政黨，同時它開始它的新政策乃是一個十分重大的轉變，那麼現在的中共內部有思想的落後，是不足奇怪也不容諱言的。實際上，中共的中央曾不止一次在公開文件上承認它的一些黨員的行動是與它的新政策的原則抵觸的。現在的問題是：這種情形是否重要呢？這些情形，我想是完全不可輕視的。因爲，這些黨員雖然不是中共中央委員會，不是蘇維埃政府，不是紅軍的司令，但一個革命政黨或一個現代國家的基礎，正是羣衆而不是別的呀！中國共產黨若輕視這種情形，那它就不僅不是一個統一的政黨，而且是一個典型的官僚主義政黨，或者說是，受官僚主義的毒太深了。並且，這種情形，是否可以由歷史或環境的因素負責呢？這也是完全不可以的。因爲中共應該是一個負責的革命的政黨啊。一個政治行動不統一的政黨，它的政策也就不能取信於人，甚或不能被人知道。這在一個願與別的政黨合作的政黨，就更加重要了。

舉例來說吧。西安事變當中，共產黨取了什麼態度呢？依據一位吳絳楓先生（似乎是中共的一位非正式代言者）致王芸生先生的公開信看來，中國共產黨並未預聞西安事變，並且絕未擁護張楊的

苦迭撻循原來西安事變的方向一直向前。（註）我相信這位吳先生的話可以代表中共的態度，並且這種態度是符合共產黨新政策的原則的。今天（二月十六日）又見大公報載有長江先生的「動盪中之西北大局」一文，更可了然中共在西安事變當中的態度了。長江先生道：「雙十二之突發，共軍並不參加預謀，共關係人員之入西安乃在事變四日之後，彼等在西安之工作，首先在理論上反對狂熱的羣衆與青年幹部，指雙十二為革命政黨所不採的「軍事陰謀」，謂此舉有釀成長期內戰的非常危險，故力主和平，因此遭受青年派強烈的反對。」我想這是一個堂堂的無產階級政黨的態度，並且我想長江先生的記載是完全可靠的。但是，在雙十二之後，我在北平看見中共北方局的油印散發的幾個談話，就大成問題了。我手邊已找不到那些談話，並且當時我也沒有完全看懂那些談話，究竟說了些什麼，不過我可以負責的說，那些談話固然表示了主張和平，但它們的實際立場是擁護苦迭撻。那些談話似乎是主張召集國民救亡代表大會，解決立即抗日的問題，以解決西安事變。換句話說，他們乃是以為國民政府的統一或綱紀可以不算一個問題。我想這就是擁護西安事變循原來的方向進行，這就是取消了共產黨反對內爭的基本口號—這不僅有違中共新政策的原則，而且把天下的事情看得過於簡單，過於容易了。北方局當然是中共的重要機關。中共北方局的錯誤，當然是一個非常嚴重的錯誤，必得糾正，必

得澈底糾正的錯誤。

再有一說，中共對於年來的民衆救亡運動，實在有不小的影響，這可以說也應該說是中共的重要功績，這也是中共新政策的結果。但是，這種運動，又常有黨派的狹隘的色彩，因而不能轉變爲廣泛的民衆運動，甚或反有中途萎縮的情形。例如北平的學生運動，年來有不斷苦鬥的光榮歷史，但在西安事變之後，因有所謂左右兩派的派別對立，弄得不能不有長期的停滯，這眞是極可痛心可惋惜的事情。又如最近憲政的呼聲本已很高，三中全會且擬修改國民大會的選舉法，在這個時候，一切從事民衆運動者，正應該積極作一點公開的普遍的切實的團結民衆組織民衆的工作，才能爲憲政預備一點基礎，這是走向民族統一陣線或統一的民主共和國的道路。然而在這個時候，聽說在華北忽然又有一個秘密的羣衆團體，「華北各界救國聯合會」成立。這等團體，內容雖不可知，但顯然不但是個大而無當的「名稱，」而且是徒然樹立派別，滿足自己的夢幻，是以妨害民衆的團結的障礙。一言蔽之，民衆運動中間的宗派主義，無論是左是右，都是反統一反民主的腐敗思想的產物。這裏的問題就是：中共對於民衆運動中的「左」傾宗派主義，是否應該負責呢？我想中共不能不負實際的責任。這些羣衆運動固然不能代表中國共產黨，但中國共產黨如果推諉它的責任，就是否認它在民衆中間的政治影響，否認它過去的

重要功績，我想那就是中共侮辱它自己了！

高爾基說得很好，一個普羅列塔利亞如果以爲他的階級是以傲視一切其錯誤是和一個貴族誇大他的階級一樣的。中國的無產階級政黨，應該接受這位「我們自己的人兒」的金石之言，它應該嚴格檢討它的內部的思想上的落後和行動上的錯誤。它應該用統一的正確的行動，來保證它的新政策的執行。它并且應該相信，「沒有正確的理論，沒有正確的行動，」因此它也應該知道，要保證行動的統一，也非得有徹底的政策不可。如此，我想中國共產黨才能徹底變到新政策的路上來。

現在世界上的左傾潮流，是不可抹殺的。現在中國的共產黨，雖然在全人口裏面并沒有超越的勢力，但它在青年國民，青年知識份子當中的重要影響，也是不可抹殺的。這是旁人所不可抹殺，也是共產黨自已所不能輕忽的。那麼，所謂共產黨的問題，就應該拿來廣泛的討論，求其徹底的解決。那麼，中共就應該更加知道反省。那麼，中共若能徹底轉變到民族統一陣線的新政策的路上來，則不僅中共將成爲一個健全的政黨，而且我想對於中國民族的建國與進步是有利的。

不過，我想，無論是民族統一陣綫或建立鞏固的現代的國家，都是人民的事業。這個偉大的事業，不是幾個黨派的事業，因此，所謂共產黨的問題，也就不僅是共產黨自已的問題了。我相信，只有中國大多

數人民，能够保障中國的前途。

（註）原函見王芸生：「三寄北方青年。」

二月十六日天津。

東亞幸福之途徑

日本人士談起中日問題來，常把「東亞幸福」四字掛在口頭，現在我也想談談東亞幸福。

在東亞如何出現一個幸福的局面，中日兩國自然特別要負很大的責任，中日兩國對這一個問題的認識，是很富有歷史意味的。較遠的勿論，在近代史上，自日本明治維新以來，兩國的看法顯然有一個根本的不同。這個不同顯示出一部中日糾紛史，一直到現在，這個不同還存在着。這個不同是東亞幸福的大障礙。在這個不同的基點上，真正的東亞幸福是不會出現的。要實現東亞的幸福局面，必須先泯滅這個不同。

在這個時代的初期，中日兩國同受外患的壓迫，中國是給西方勢力把門戶推碎，日本也同樣的被打開了大門。近代中日兩國的關係，彼此都較晚於對西方的關係，兩國都是在西洋勢力進入之後才發生近代關係的。在這段關係開始的初期，中國對日本的觀念是很平常的，最高的理想是相安共存。李鴻章便是這個觀念的典型代表。他在光緒元年對森有禮所說的「徒傷和氣」及光緒二十一年他在馬

關和伊藤博文所講的一篇大道理，情勢雖異，而用意如一。孫中山先生是中國的近代革命家，他對於中日關係的觀念便與李鴻章相同。看他一九一四年寫給大隈重信的信及一九二四年過日本時的言論，可知。中日關係發展到現在，中國人的觀念仍不外是這個相安共存。至於日本方面，一開始野心便很大，她對付中國的手段，是抄襲了西洋人的成法而更變本加厲的。她想征服中國，進而爲東亞的霸主。明治大帝的大陸政策的涵義，若照日本一部軍人的解釋，在距離上當然還遼遠得很。經過中日，日俄及歐洲三次戰役，日本在國運進展中，更加强了對華畸形觀念的信念。問題發展到現在，九一八事變五年後的現在，這個畸形觀念是否還應該讓牠繼續發展？那却大大的值得日本人士加以理智的考慮了！

九一八到現在，中國失掉了四省掛零的土地忍受了無限的屈辱。中國之所失，即日本之所得，這筆賬是最易算的。但是，這個得失的進一步的影響是什麼？却更有明白認識的必要。

在這五年的經驗中，中國人正式懂得了一些事情，就是——國際均勢及國際條約均不可靠，要想國家獨立存在，必須靠自己的力量。日本把鐵一般的事實給中國看，同時還不斷的把可能的命運向中國作吼。吼得最響的要算天羽英二，其次便數前南京總領事須磨彌吉郎了。一九三四年四一七的天羽聲明，宣布了一個中日不共存主義，去年須磨又明白宣示「中國只有兩條路，或是依存日本，或是戰

爭。又須告訴中國中日不能共存，而中國所求的卻正是共存；須再告訴中國必須投降日本，而中國人雖三尺童子也不願向異族投降。要共存必須先能自存；要不投降便必須準備抵抗外力壓迫而來的戰爭。這是日本擺在中國面前的課題，中國人必須忠實的刻苦的去鑽研，了解。在這個課題之下，中國人已了解並力行了以下的一些事情：認識國家，擁護統一，努力建設，並愛惜自己的力量。這一串都有事實予天下人以共見了。中國人已懂得個人與國家的關係，熱烈促成國家的統一，努力國防建設，作抵抗外患的準備。在「中國人不殺中國人」的觀念下，兩廣問題和平解決了，犯殺的漢奸土匪回到他們祖國的陣營來，西安事變的大波瀾最終將演成一切內戰的解除。中國對這個課題不知才做到百分之幾，她還在努力前進，期以確定自存，以與她的強鄰共存。

這五年來的歷史，對於日本自然是加倍強化了大陸政策的信念，循征服中國的路線，以懾服蘇俄，並抵英美勢力於東亞門戶之外。歐美人說這是日本的「東亞門羅主義」，日本軍人則給自己加了一個尊號叫做「東亞安定力」，征服一個四萬五千萬眾人民一千一百一十七萬餘平方公里土地的中國，已是只有一部分日本軍人才能有的野心，而為了謀這個野心的實現在整個的算盤上，須準備與蘇俄決一個勝負，同時還須把英美的海軍勢力擊出西太平洋之外。這是日本野心主觀的發展，至於客觀

影響所反映出來的事實，那就很值得我們冷靜的檢視一下了。

九一八以來的五年事實，日本軍人的功名得來的太容易了，因為功名慾的膨脹，形成少壯軍人的跋扈，加強軍人干政的習性。下犯上，少劫長，軍紀廢弛，憲政受蹂躪。這一點已是夠動搖日本的建國精神，更兼軍人的算盤打得太大，不得不厚徵重斂，壓榨人民的血汗，以膨脹軍費，擴張軍備，把人民推到饑餓線上。世界軍備已發展到二十世紀的四十年代，舊的軍事訓練與軍事組織，對於現代戰爭絕無勝利的把握。日本對外沒打過敗仗，她的軍事組織還是歐戰以前的系統。返觀歐戰後國家，若德意志，尤其蘇俄，她們的軍事系統都在歐戰中毀滅了，現在組織起來的都是嶄新的。中國還談不到軍備，假使中國能夠建設起來一個國防系統的話，當然也是新的。日本的戰備，差不多已像大不列顛的工業上的老機器，不大適用於現代戰爭了。日本軍人很明白這一點，知道現有的本錢沒有征服中國並戰勝蘇俄的把握，所以決心進行一個大規模的六年軍事計劃，日本軍部所爭的三十萬萬大預算，便是為了這個大目的。小本錢有時固然可以贏得大收穫，但意外的營業也許會賠光了老本。日本本身有一個矛盾，去年一月我給南京「日本評論」寫的一篇文章上曾說：

「日本在外形上已是一個資本帝國主義的國家，她的內容尚未完全進化到這個階段，尤其

在農村，還是前期的生產制度。所以日本農業的生產雖然商品化了，可是他一般的還不是資本主義的經營。農村生產者的生活，一方面要跟着世界貿易顛簸，同時還受着天災人事種種的威脅。近兩年，日本城市雖已感到通貨膨脹的景氣，許多農村地方仍是日甚一日的衰落。平時農作物豐收了，則「穀賤傷農」，歉收了則農民們爲窮困所逼擁擠在買主的門前急於求售他們的米。如去年日本東北荒災，青森宮城等縣的苦況，賣兒鬻女之類的人間慘劇都演出了。日本的城市繁榮，一面靠農村賦課補助，日本商人把生產大衆的收穫，做爲廉價的商品向世界傾銷。日本工業家近年索性把工業製造的可分的部門移到農村，用低廉的工資吸收農閒及一般農村婦孺的勞動力。日本商品潮水般的湧到世界市場，使世界瞠目結舌，相與震驚，誰知牠的原動力卻是忍饑耐勞的日本農村大衆！日本商人儘力壓榨，儘力傾銷，日本軍人儘力發狂，軍費儘力膨脹，預算儘力增加，赤字公債儘力增發，結果農村窮了，生產的農民疲了。」

日本這個矛盾是日益加甚，最近在「大衆經濟雜誌」二月號上見到永井柳太郎的一篇文章，談及日本農村現狀的慘淡，眞是滿紙血淚。日本大衆的經濟生活如此，即使把他們的肚皮粘到脊骨上，恐怕也難償軍人的專慾。這是日本人上最應了解的一個問題。日本軍人說滿洲是日本的生命線，滿洲拿

到手上，結果如何？防守要兵，經營要錢，非但未曾給予人民以生活的利益，反而加重了他們的負擔。這個對外發展的眞正收穫是——軍人氣燄的增高，國家困難的擴大，人民痛苦的加深。這五年來的意外功名，使軍人增强數個支配國家的迷信，一面在政治上把持國家的政權，一面在文化上壓迫國民的思想，同時爲對外的便利，還常常撒些路人皆知的大謊。這樣自然加重社會煩悶，同時還影響了國民道德。中國的一位「日本通」，最近曾在日本住了一年，日本的小村莊他都曾考察過。去年秋天回來，他對我談起日本情形，除了對日本國民致普遍的敬意外，而對於日本一般的風紀道德却懷着一種遠見的隱憂。使我聽了最爲聳動的是日本國內已經有了吸鴉片打嗎啡針的人。日前一位朋友自東京回來，談起日本大學生的生活，也很令人感慨。據說東京的咖啡店很發達，光顧的客人要數學生占重要的成分。他們在那里同下女胡調之後，多喝得醉醺醺的回去。日本大學生的就業難，是很嚴重的一個問題。他們在畢業後很難找到五十圓一月的位置，同時在思想上也感受一種很大的壓迫：生活與思想兩無出路，他們便自然的走上「今朝有酒今朝醉」的頹廢之路。日本的現狀讓國家新血液的青年煩悶到這樣，決不是一個簡單的問題。把眼睛放得普遍些，可以看出日本矛盾的擴大，由政治到一般社會，各種勢力，各種集團，無不刻劃着很深的裂痕。日本國家的情形能否容許這種現狀繼續向前發展，已大有問題，自然

更不談，且對外有事。日本國家的情形，我想日本人應該知道得最清楚，用不着我們外人來談，而且也不便深談。我說的這些簡約的話，完全站在對日本國民表同情的立場，絕不存有一毫幸災樂禍的卑鄙心理。我希望我這些言不能盡的話，能夠給日本人上一些幫助，使他們覺悟到日本軍人所走的路線，是一條死路。為了日本，為了東亞，都應該另覓通路了。

一般中國人提起日本來，在感情上常不免有些憤慨，而我不然，我每一想起中日近狀來，常為我們的國家抱甚深的慚愧。誰使日本國民受到這樣的苦痛與壓迫？推原禍始，責任全在我們中國人身上。我常說：「東方的不安，在於缺少一個強盛的中國。」假使中國能夠自強起來，在平等的基點上，與日本攜起手來，東方將無紛擾，而一切安定了。中國人已知道自悲自悔了，近幾年來我們以悲悔的心理，努力自強，期以確定的自存，進而與我們的鄰人相安共存。一直到現在，中國人並無對日本採取絕對報復的心思，我們的理想依然是幾十年來的舊觀念——願與日本相安共存。不過，中國人現在已有進一步的覺悟，便是要實現這個理想，不必情商，也不必懇求，先決的條件是要中國能夠自立自存。

中國現在已走上覺悟的路，日本如果不再繼續走死路，東亞幸福的局面馬上便能實現。

要實現東亞的幸福局面，必須先泯滅彼此觀念的不同。日本只要不想征服中國，走最平實的相

安共存」的路，東亞的一切問題皆迎刃而解了。日本應該有一種雅量，不要對中國嫉妒，還要覺悟中國的復興是東亞幸福的源泉。在東亞出現一個獨立強盛的現代中國，東亞兩大民族攜起手來，世界任何國家誰能對我們輕視。日本不要担心中國報復，中國人很能認識他們的前途，他們根本沒有征服日本獨霸東亞的野心。也不必担心蘇俄，無論從全局或局部的眼光來看，蘇俄絕不會自動出來向日本挑戰；至於英美，她們所希望的是一個世界和平的均勢，對遠東所關切的是商業利益，誰也不能想像她們會來攻打日本。日本若放棄了征服旁人的野心，現在她的軍備已足夠自衛了。何必苛歛民富，大舉擴軍，以岌岌自苦？日本軍人雖常以「東亞安定力」自詡，其實若循日本軍人的路線走下去，只有增加東亞的動亂，惟有中國的獨立復興才是真正的「東亞安定力。」中國的復興，她將有極大潛力貢獻給她的朋友。中國這幾年在艱苦環境之下才開始她的建國工作，她的鄰居應該已感覺到一些好的影響，在中國向上的路上，無疑的，她的胃口消化力將大量的增強。中國去秋的一個大豐收，已予日本貿易很大的興奮。毀滅了中國的市場，將如割斷日本海外貿易的動脈。這是最實際而明白的事實，日本軍人何苦偏偏要做「殺雞求卵」的蠢事？所以我說中國的復興，用遠大的眼光看，是日本的利益。中國的和平貢獻，將會幫助日本解決她一切的內部困難。

日本人士的對華觀念近來顯然已有轉變的傾向，我們希望這個傾向能夠形成有力的勢力。本年初，日本貴族院議長近衛文麿公爵發表了一篇劃時代的宏論，他說：「日本對華之觀念尚欠澈底，因之對於各事亦乏適當的處置。」他提議中日提攜，謂：「吾人提議提攜，並非威脅一方爲他方面之犧牲，雙方應各以祖國之立場伸手合作。換言之，相互提攜係以中國人民愛中國日本人民愛日本爲基礎。苟將愛日本及愛中國之心擴而大之，即將成愛亞細亞民族矣。」近衛先生的話，我認爲是東亞大局的福音。我希望泯滅兩國觀念的不同，近衛先生的話，在日本實是劃時代的偉大而恰恰合於「相安共存」的中國舊觀念。兩國人士把握住這個堅實和平的觀念，東亞的幸福即在目前。

在日本識者中，近衛先生的議論不是孤獨的，日本輿論已有要求「對華重新認識」的呼聲。山崎靖純氏說：「在新時代裏唯一正當的繁榮之途，其重點實繫於如何使他民族亦獲得解放。依歷史表面所現出的種種情形，固然屢屢使人錯覺霸道的勝利，但結局，最後的勝利仍然是屬於把握着新的解放原理的正道的國家。」（見日滿支評論十二月號）山崎先生的話，真是精湛極了，我們於欽佩之餘，希望日本政治家及軍人都有同樣的覺悟。然而日本觀點的錯誤在那里呢？室伏高信先生曾經明白的指出：「最重大的，便是對於日本近鄰勃興的兩大國家蘇俄和中國的認識陷於根本謬誤。日本國際政治

的一切錯誤，都是從這個對於勃興的兩大鄰邦的認識錯誤裏出發的。」（見一月十二日東京讀賣新聞）

時代的運會要求日本修正她的對華政策了。天羽聲明所代表的「不共存主義」應該根本取消；「廣田三原則」也已不大適用。聰明的日本，應該拋棄了那些陳腐的調子，在同情中國復興的立場上調整糾紛，肅正感情，進而與中國作永久的握手。怎樣調整糾紛，肅正感情，我認為最先應該做到以下幾件事：（一）取消冀東組織；（二）根絕走私；（三）調整冀察平津等地一切畸形狀態（包括恢復察北主權及撤銷日本特務機關等。）這些事是建設中日正常關係的清道工作，這些事做到了，中日兩國同時均須有準備解決「滿洲」問題的覺悟。「滿洲」問題是中日糾紛的根源，這個問題一天不解決，中日兩國便不會有真正的握手。日本老翁議員尾崎行雄氏最近在議會中的質問演說，曾說：「苟日本對中日友好提攜確有誠意，則余可斷定，中國必樂於與日本攜手。日本為維持面子起見，自無理由退出滿洲，但對其他懸案問題，日本如能使中國相信無絲毫野心，中日友好提攜自能實現。」尾崎行雄先生的大體認識是正確的，只是對於「滿洲」問題的認識還有些閃爍。這一個問題遲早是要遇到的，我們現在就應該準備共同的覺悟，

日本放棄征服中國的野心，不妨礙中國復興，進而與中國做和平攜手，將解消日本內部的一切矛盾，並安定東亞的大局：這是東亞幸福的途徑。這一個途徑就擺在我們面前，正待中日兩國人士展足邁進！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二月二十二日於上海。

四寄北方青年

諸位同學：

這是我寄給你們的第四封信。

這封信和我寄給你們的第三封信在時間的距離上還不到兩個月，我們國家的情形却已有了很大的發展。我們所顧慮的問題，漸漸的轉變得不存在。「抗日人民聯合陣線」這一口號，原爲中共所支持，現在他們已認識這一口號的不合適而把牠放棄了。中共的轉變，我們可以從他們一年來的宣言通電裏見出他們的脚痕。關於他們的目前態度，我的一位同事長江先生，在他那篇「動蕩中之西北大局」裏說得最清楚：

「現在共產黨之轉變，在西北已有不少事實爲之證明，在他們的政治理論中，認爲中國不能倡導人民陣線，蓋人民陣線爲國內的對立，中國此時不需要國內對立，中國此時需要和平統一，以統一的力量防衛國家之生存，同時不必反對法西斯，因實質上中國無法西斯，法西斯之條件，一方

向侵略國外的弱小民族，一方面壓迫國內的工農，中國國內任何勢力皆無此第一條件也。照中國實際政治情形需要，國家的政治機構應當走到「統一的民族陣線」即是統一國力，集中力量，以對外圖存。」

共產黨的態度轉變到這樣，或會引起一些人的詫異，但卻是「團結建國」路上所必需的條件，我們應該毫不遲疑的接受這個態度。

不斷的有人向我打聽關於這類問題的消息，我都很肯定的告訴他們：「大勢已定，所剩下的只是些枝節的技術問題。」我的答案也許含有些冒險性，但是我相信人們的理智業已增高了。我們需要和平，需要團結，需要統一，需要解消一切矛盾，需要得如飢似渴，大家自然被良知驅策着朝着這方向走。在這個方向之下，我們國家的統一可以更進一步，共產黨的「中國人不殺中國人」的主張自然也可以貫澈。

有的人或在顧慮外交方面的關係。我以為那是可以不必管的。「剿匪」也罷，「內戰」也罷，總之完全是我們自己的內政。我們厮打的時候，未曾徵求過旁人的同情；現在我們不打了，自然也用不着詢問旁人的意見。我們自己不要打仗，而旁人硬叫我們打仗，我們不要自殺，而旁人偏叫我們自殺，我想世

界上的人絕沒有那麼泥賬的。假使竟有這種泥賬主張出現，我們自然可以完全置之不理，那是沒有什麼可躊躇的。

其次我要談到青年對於這個轉變的態度。

一向比較積極的青年，近來似乎有些消沉了，我以爲這是不應該的。

我們若把一部分青年現在趨向消沉的原因加以分析，當不外以下兩種原因：一是過去的認識對於現實距離太遠，因而發生心理的炫惑；二是標語口號所遺留下來的惰性作用。這兩種原因都是可以用努力認識現實來醫治的。

目前一位實際參加青年運動指導工作的青年朋友來看我，他告訴我現在有些青年很消沉，失望，甚至懷疑了，說「你們不是救國的嗎？怎麼現在不救了呢？」問我以後的青年運動怎樣進行。我說，一部分青年的消沉，失望，完全由於過分相信過去的標語口號，對目前的現實起了炫惑。創造標語口號的人，其最初的用意，是在於號召羣衆，發動鬥爭，而最先被這標語口號麻醉的也必定是他自己。我想人們差不多都有這種經驗吧，當他用某一個觀點寫文章，或者說話，在起始時總覺有些勉强，甚至有些欺飾，久而久之，他自己必定首先相信那是眞理了；雖然最初他是爲騙人的，結果必首先騙了自己。現在的情形

是最初受騙的人（假定如此說），已覺悟到不應繼續騙人（也是假定如此說），換了一個方式說話，而許多跟着受騙的人（當然也是假定如此說）却還遲留在第一個標語上。這是心理上的惰性作用。遲留在這種心理惰性中的人們，對於驟變的現實，自然目眩神迷了。

舉例來說，譬如去年二月間毛澤東導演的一齣「下河東，」他們的口號是「過境抗日。」現在事過境遷，假使我們有機會問問當時的主持者：「你們那時是不是眞正要去抗日？」他會給你一個會心的微笑，答曰：「那是假的。」若事後論當時的戰略，假使當時中央軍不從運城間道入晉去防堵，而紅軍之背去收復陝北赤區，結果一定是共產黨失掉陝北根據地，同時却也不敢衝到河北去抗日。那麼，朱毛是要吃大虧的。但是中央軍不曾那樣做，共產黨還一面宣揚國民黨阻礙他們抗日，一面滿載晉西的金錢糧米而退回陝北。把罪名加到對方身上而自己能載而歸共產黨是「名利雙收」了。我們揣想蔣先生並非看不到這一層，但他所負的是國家的全局責任，不能走險路，他不能敞開大門，讓共產黨去給國家放火。由這個例子來看，標語口號有時只是一種姿式或策略，若過分誤信，便不免爲牠所迷惑了。

那麼，現在共產黨的轉變，會不會又是一種姿式或策略呢？有人或不免要這樣追問。我以爲這是可以不用問的。他們目前的做法是放棄理論的爭點，解消武裝的對立，走和平統一的大路，做建國禦侮的

工作，這些都是「四萬萬人惟一心」的事情。共產黨順着這條路線往前走，可以博得四萬萬人的同情與支援，那一天他對這條路線不忠實了，則必爲四萬萬人所壓倒，那是毫無問題的。

至於「救國」這兩個字可以成爲一個名詞，也可以成爲一種工作；但是，我們卻希望牠是個暫時的名詞，不是一種做不完的工作。我們的國家需要救，這救國的工作也許我們這輩人做不完，敎我們的兒女接着來做；但是我們不希望救國成爲中國人世襲不已的工作，總要使我們的國家有不用再救的一天。我這段話的意思，大概不至被人誤會了吧。救國的目的只有一個，而救國方法卻有多端。「革命」同政府拼命，雖常成爲救國的手段的一面，但有的時候就許用不着。共產黨一向是領頭幹這類事的，現在大家聽見共產黨放棄了「人民陣線」的口號，不同政府作對了，甚至不主張「立即抗日」了，於是失望了。共產黨也在那裏講笑話，說「我們現在變成右派了！」其實，失望的人錯了。現在國家的情形已不需要我們幹抵消國力的傻事了，要求大家攜起手來共走一條路綫了。這有什麼可懷疑的，難道只有自家門氣要拳頭才算救國嗎？

我們現在只有覺得更奮發的，自然不該消沈，我們現在只有更積極的，自然不該失望。

在近兩月來，我幾乎每天都接到青年讀者的來信，有的憤慨，有的憂慮，都充滿了對於國家的熱情

還要有一位學陸軍的青年讀者，在一個多月前給我寄來一封信，字裏行間充滿了悲憤的情緒，他許把現在的南京比作法國大革命後左翼執政時代的巴黎。他當然是有所感而發，但究嫌太悲觀了些。我久想寫封信安慰安慰他，終以冗務牽累而未執筆。現在我希望他能夠在一個積極的態度下，於努力自己的工作中得到一些安慰。

最近又接到一位住在北平的青年朋友的來信，他的態度顯然是受到國家現狀的反映而積極了。他說，預計北方青年界將有一種新運動發生。他說今日的中國需要一種現代化中國的新運動。我願意把他的來信節錄在下面，當做我這封信的結束：

「這樣長的時間，我沒有給先生寫信；這樣長的時間，我在興奮與喜悅之中。今日的中國，誰能再疑慮國家的統一獨立；誰能再疑慮辛亥革命傳統的建國原則。一則以喜，一則以懼，正可以形容現在我的心情，也應該正可形容全中國人民的心情。因為建國是一個大事業，需要真實的本領，需要每飯每沐都要戰戰兢兢的。重大而神聖的責任，遼遠而艱苦的前途，使我興奮，使我感懼。

……北方的青年界，今日是沉寂的。所謂左派青年，在西安事變後，為環境所迫，不得不回頭反省。

……我預計北方青年界將有一種新運動發生，這一種新運動將使北方青年成為中華民國建

國途中基本的力量。

我覺得，今日的中國，需要一種新運動，需要一種現代化中國的新運動。中國現代化是獨立自主的基石。中國是一個全世界無匹地大人多的國家，因此中國現代化的責任，不僅政府要負，一般國民，知識份子，尤其青年中的知識份子，更得去担負。政府應該有膽量有計劃的，把這種責任交給知識階級，而知識階級也應該有勇氣有遠見有本領的負起這個大的使命。科學運動，工業建設，消滅文盲，改良農業，成了今日中國迫切的工作。政府要來做，知識階級更得艱苦的來做，而青年將是這條道路上最有效力的工人。

今日的中國，存在着兩個大政黨，都有革命的傳統，我承認國民黨對中國的功績，我也不否認共產黨有過賢明而英勇的政策，但是這兩個大政黨都有很大的缺點。我覺得今日的國共兩黨還都不成爲眞正健全的政黨，組織行動的不統一，沒有民主精神，沒有政黨風度，都是國共兩黨應該覺悟的地方。我覺得這兩個政黨的進步與否，也是中華民國建國途中的大問題，國民是應該督促他們進步的。……—

二十六年三月十三日於上海。

(附錄)學生運動的前途

鄭遠明

在一個正常的國度裏，學生運動是不存在的！國家大事等着學生們拋棄課本，衝出課堂，作些熱烈的表現和要求，形成一種運動，這個國家的命運的悲慘，不問可知。這表示在這國家裏，一定有些非常的現象，纔會激動起人民的極大的注意和願望。更表示這國家很落伍，以致人民全體還在蚩蚩送日，而由少數國內菁英的知識份子出來問政。因此學生運動是個不正常不幸的東西。我國的宋代清末，都有類似的情形，十九世紀的帝俄，目前的埃及，阿剌伯，西班牙，也曾開展着熱烈的學生運動。反之，無論在資本主義高度發展的英美法德或是社會主義的蘇聯，儘管學生也有時提出各種的抗議，可是他們都不曾爆發過像中國這樣狂熱激烈震驚世界的遊行示威和支持年餘的學生運動。站在一個國民的立場，看見這些非常的現象，我們不禁爲國家悲，爲學生悲。

自從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九日北平學生請願反對華北自治到今年三中全會閉幕爲止，全國各地的學生運動都曾在斷斷續續地進行着。不管怎樣，對於中國政治，它已經成爲許多因素之一。十年來國

內發生的事件，像兩廣異動，中日交涉，綏遠抗戰，西安事變，三中全會都多少和它發生直接或間接的關係。究竟功過何如，自然有目共覩，無容妄贅；可是它之鼓動起一部份青年的情緒和積極問政的興趣則是事實。尤其顯著的是在積極活動的學生之中，左傾的勢力日見擴大，這由大衆生活每期銷到二十萬份，哲學講話一類的書籍屢次出版的現象可以證明。加以當時受到的都是無情的打擊，大批的逮捕，遂更使學生失望，愈趨激烈，在學校中造成一種「特種人」。

筆者身為學生之一，熱情激動時也曾參加多次的遊行示威，宣傳講演。當時身受辱打，對當局由漠視而仇視；在去年三月三十一日為北平高中同學郭清君舉行抬棺遊行時，一種憂鬱的心理和憤怒的情緒築成一片，不禁流下哭母以後最傷心的眼淚。這不過是個例子，說明學生容易左傾和情感激動的原因。不了解學生的人把學生看成洪水猛獸，殊不知果能早期對學生有適當的了解，則洪水猛獸未必不能變成安份良民。這一點是當局應注意的。

處在今日的世界，思想的左右本非十分嚴重的問題。在英美法諸先進國家，左傾政黨且能公然在政治舞台與其他黨派爭長短；人民自承為共產黨黨員亦非犯法；而在中國則因種種原因，或畏左傾如蛇蠍，或視激烈為時髦，形成文化界最危險的現象。筆者素來崇信自由主義，覺得青年左傾本有它的歷

史的原因，無庸過度驚異。不過，看到一年來的發展，針對目前的事實，又不禁為今後的學生運動抱無限之隱憂。

目前學生運動之接受左傾的領導或影響，似頗明顯。一年中左傾黨受到事實的教訓，深知稱兵割據不足號召國人，徒為國家危害，已漸趨轉變，變更過去態度，擁護團結禦侮。三中全會閉幕以後，蔣氏評論周報等西文雜誌皆稱頌政府對共產黨的態度。最近國聞周報登載徐芸書君「共產黨的問題」一文也多所發揮。但是，也就有許多人在同聲惋惜：「為什麼共產黨本身都有覺悟擁護統一的中華民國，承認中央政府，而受其指導或影響的學生運動反不能納於正確之途，依舊與政府成對立之局？」這種話，和從前一味盲目地侮辱或諷虐學生絕對不同，它對學生與其說是責備的，毋寧說是愛惜的。是的！這個謎不打破，將無法了解今日之學生，更無法將北方百萬青年結成各方交譽之「精神的萬里長城」，無法遂行熱烈青年追求嚮往之神聖的愛國的任務。這到底是什麼緣故呢？

聞人言：「今日無愛國的學生。大多數同學不動，「左派」站在愛人類的立場來愛國，「右派」站在愛領袖的立場來愛國，對國家均無真摯的愛護之意。」筆者自學運發生後即被目為左傾，所交遊亦多「左派」，對於所謂「右派」既少接近，自難測其隱衷，未敢妄加月旦；而於所謂「站在愛人類的立

場來愛國」一語，深感慚怍，自覺殊無理由受此美譽。今日的左傾青年有所表現，多爲九分熱情一分理智的作品，愛國誠愧不忠實，愛人類恐亦無此大志。這固然不是說前進青年果無一二明達之士能瞻顧前後，審密周詳，計劃工作；而是承認大多數高呼革命，鼓吹抗日的同學於某一行動之前多半未能作一理智的分析，一人激動，萬衆非呼，形成脫離大多數中立同學以及各界人士的現象。這樣看來，眞正左傾的青年，眞正能用左派理論把握現實，推動現實的青年實在太少，所謂「愛人類」云云，實屬過譽了。而且對於中國警察，尙且目爲走狗，斥爲漢奸，無愛惜之誠，感化之力，遑云於人類幸福有何憧憬？所以，事實上，一個眞正的國際主義者，處茲國族危亡之秋，爲了自己理想的實現，也早已放棄成見，變成一個眞正的愛國主義者。目前學生羣中，眞正的國際主義者眞正的愛國主義者實在是太少了。

學生運動，本在愛國，一年變遷，亦有進步，這都是不容否認的事實。尤其在日軍演習，綏遠抗戰之時，平津學生冒寒忍飢，宣傳募捐，慰勞服務，其艱苦卓絕的精神，已爲國人所感佩。不過從過去的行動中，我們依然可以找出不愛國的例證。最顯明的便是西安事變以後北平學生的大分裂，和各地青年在左派勢力誘導下所受之訓練。前者還只是在一貫的錯誤領導之下所表現出的最嚴重的現象之一，而後者則關係學生前途，國家前途，不得不予以深刻之注意。

一二九學生運動爆發的時候，學生情緒雖很熱烈，可是並未左傾。當時大家感到胸中一團悶氣，無處發洩，眼看禁宛故都，即將脫離祖國，淪爲異域，爆發爲一種爭解放的呼聲。除去極少數的思想比較激烈而外，大多數同學都是基於純眞樸茂的愛國心而來參加行動的。以後，環境愈趨惡劣，大部同學漸見沉寂，一部則由積極而左傾，進而有普遍各校的統一的組織，一年以來，勢力更見澎大。筆者身爲學生，朋友儕輩時時談到學運問題，得由各種場合觀察他們的生活，思想，言行舉動，每每感到他們有許多缺點：

（一）感情超越理智——青年人閱世未深，易動感情，本是常事。但既然矢志救國，理當知挽救危亡，決不是一次示威，兩篇熱辯所能奏效。現在專憑感情來判斷事實，決定擁拒的情形仍然所在多有。從學生羣衆動喜集體表現，研究問題不能客觀，鄙棄課本，鄙棄師長，仇視政府等都可看出。爲時一年，這種褊狹激厲之氣，未能袪除淨盡，見機即發。西安事變之前，筆者曾參加一近二千人之擴大座談會，遇有教授演說，痛陳政府措施不當，立即掌聲雷動，憤慨高呼；而間有冷靜言詞，分析時勢，指明强敵虎視的危機，反而無人重視，一若無足聽取。迨至陝變爆發，雖亦呼籲和平反對內戰，而實質則一一相視而笑，莫逆於心，」以爲中央政權行將崩潰。這證明他不但對於追隨孫總理手創革命奠定國基實力已成不可動搖之國民黨的地位未能洞悉，就是對眞正的左傾政黨的主張也沒有淸楚的認識。內戰爆發，對中國究竟

利弊怎樣，當時好像不足介意，而主要的問題倒是如何排洩心中對某一兩個人的積恨，青年學子，心地純潔，本來可以多加寬恕；可是站在國民愛國的立場看來，這種態度和不問一切力主討伐的主張同有顛覆祖國的危險。在偏的青年，既以唯物的辯證的自居，對於這些問題究將如何解釋？

（二）淺薄勝過精深——青年思想既有偏於是大家鄙棄了過去受到的教育，厭倦了父母的教訓，更無視了遠古近代聖哲偉大的知識上的成就。我親眼看見許多中學生毫無選擇地買着××生活，××知識一類的雜誌，上課的時候捧着薄薄幾十頁的大綱，講話在偷看，從報紙上，雜誌上，書本上，知道了許多美麗而空洞的名詞，輸入些模糊移謬的觀念，開口罵人「機械」，讀書不求甚解。這種可怕的流行的風氣，最能誘發青年的感情，減低判斷的能力。汩沒純樸的天真。舉個例說，西班牙內戰包括着許多駁雜淆亂的成份，可是半年以來，並沒有聽見有一篇客觀的分析，把大小的癥結指示出來，而所有的結論總是些同情和憎惡，阿Q主義的勝敗的推斷而已。痛心至此，所謂繼洋雄潑刺的一二九運動以來的文化發展，不過爲千篇一律的一知半解，不過爲短命刊物之紛躍雜陳，不過爲自欺欺人之油腔滑調的總和，以較五四運動之尚能規模粗備介紹西學，何啻天壤之別！學校教育，誠嫌呆板空洞，青年思想，亦患蕪亂淺薄。吾見大多數同學又轉而讀課本，讀宇宙風，讀奇俠傳，讀淫書矣！前進之反動乃更爲落後，以

表保一二九前之關心國事，亦逐漸不可復得。胡適之先生至今已爲靑年所遺忘，然所言「爲學當如埃及塔，要能博大要能高」則尚無大謬，親愛的靑年人幸三思之。

（三）工作決定生活——學生運動的使命，除去振聾發聵，齊起救國之外，尚有一較低理想，即在健全學生生活。從恐慌中，從飢溺中，從精神的無寄託中，排除萬難，始得走進課堂的，不知凡幾；不但物質生活，多數發生問題，即言精神生活，亦已不堪設想。學生運動未起之前，能够善自處理生活的人本已不多，學生運動發生以後，基於情感的過分衝動，生活更見散漫。生活散漫的原因，推本究原，大多是由於工作的威脅。自從學生運動發生以來，學生領袖多數廢其流亡獄囚的生活，而神經失常，身染肺病心病者亦已數見不鮮。就是支持學運的同學也多半感覺到生活的痛苦。連夜不眠，飲食不繼者有之；奔走呼號，曠廢課業者有之；衣冠不整，起居紊亂者有之；失戀消極，灰心喪氣者亦有之。往往某人稍見積極，各種職務，紛至沓來，破壞健康，浪費精力。又因作事時間太多，思考時間太少，一件工作做完，還不了解它的意義。意義不了解，工作易致錯誤。結果心神不健，工作無功。公私雙方，兩受其害。

有了上述三種缺點，所以種種努力即能徹得效果，終難避免錯誤。馴至屢遭打擊，退至低潮；即有熱情未泯之士，亦唯躑躅街頭，空勞懷想而已。現在國內統一，外交得手，一切現象均有起色，從此學生運動

果能納入正軌，自能發揚光大，對政府，對人民，均有督促愛勵之功。願就所見，略供一得。

第一，基本態度的改變——三中全會的結果為中國歷史上劃時代的成功。九年來的剿匪政策，到現在因為共產黨的改變態度而中止，造成國難後的第一次的大團結。中央政府禦侮的決心，昭然可見，共產黨的擁護統一，亦成事實。學生運動是時代的產物，絕對不應與政治孤立。中國政局既這樣急遽的轉變，學生運動似乎也應該改變其過去的方向，放棄褊狹的門戶之見，擁護政府，獻身國家，促成河山光復，主權完整。即就左傾青年而言，左派勢力已進為行政機構中之一部，擁護政府亦即擁護素所傾心之左派。無論如何，今後國家的日趨昌隆，收復失土之可能日益增大，已為不可否認之事實。以民衆言，以黨派言，對中央政府而不盡其愛護之忱，均不能成理。何況，學生運動本為民衆的運動，而非黨派的運動，更無對立之必要。所以，改變過去的態度為一個最基本的原則。

第二，造成全體學生的運動——過去的學生運動除去在一二·九，一二·一六兩次示威中參加的人數較多以外，始終都是由左傾青年包辦的行動，參加的雖可達四五千人，以較北平一地十萬學生，終屬不成比例。單就一校而言，同學共為千人，左派佔十之二，右派佔十之一，而不動的達十之七。結果少數同學，叫囂撲鬥，佔十之七者則在苦悶，彷徨頹喪。實際上愛國愛群，人具此心，所以造成偌大多數之無視政

治，都應該由學生運動的黨派性負責。希望會得接到同學來信，訴說自己的痛苦，他說：

「……外面看，我是自發地在縱容自己；實質上，我的心是在哭泣。我沒有麻木，麻木是那些逼着我忘記現實的人給我的一個名詞。對於祖國，我何嘗不愛，然而我沒有地位來愛；課本，參考書是那樣地乾燥，可是我嫌閉門自己，無聊周圍，也只得一頁頁冰涼地翻下去。心裏受着真正的苦，臉上浮着輕佻的笑——這便是我。

「你們少數人勇敢地踏上征途去，可是你忘了我們。五年來的國難對那少數像是風把你們吹到更前面去。對我們這些不幸的苦難的青年則像是把笨鈍的鋸，在那裏欲斷不斷地摧損着我們的肉體和靈魂。世界給予你們的是干涉，拘捕，甚至槍殺，可是你們並不感到寂寞，你們因此收到一點新的補償，你們更驕傲了。世界給予我們的也許只是冷淡，輕視，甚至皮相的讚揚，但我們却覺得這好像是鋒利無比的刺傷。對着你們的驕傲，撫摩自己的傷痕，我不相信我會好起來。啊！告訴我，我的前途究竟是什麼呢？

「因此，世界上談論着青年問題：鼓勵着這少數的灌輸給他們以宗派的理論，把四五百人的合唱誇大成千萬人的歌聲；反對你們的又硬指你們是什麼什麼，連那一點忍飢冒寒的精神都否定了，

使你們愈發不願回來。好像中國的青年問題，把你們解決了，就完全解決了。

「你們光榮地代表了全體青年，我們却無聲無臭強顏歡笑地在支撐着自己，我們蒙了莫大的羞辱，我們將永遠忘不了你們啊。……」

不知道這種苦悶在青年裏佔有着什麼位置，也許有同感的還不在少吧！是過去學生運動的宗派主義是要不得的。我們應該把中國一切的青年團結起來，造成一種偉大的洪流，有祖國的獨立與自由，爲政府的尊嚴和統一，爲民衆的疾苦和厄運，作一番最有力的奮鬥。同時亦願爲所謂右派青年進一言：統一救國，需要強有力之中央政府，需要精誠賢勞之領袖，均爲不可否認之事實。近年以來，國難嚴重，民生凋敝，造成人民怨望政府心理，實在是國家的不幸。但是我們如果爲了救國，爲了愛政府，愛領袖，那就應該注意這不幸現象的存在和它能够存在的原因。今天的左派青年如果主張繼續階級鬥爭，推翻政府，固屬爲敵人造機會，但於事態可能適用其他途徑求得挽回之前，而竟昌言軍事行動之必要，似亦稍嫌鹵莽，感情用事。所以，眞正擁護政府要處處爲政府計，貢獻所見，靜候採擇。即以此次西安事變而言，堅主討伐之聲浪至洪且大，而賢明偉大如蔣公者竟能於萬分危難之中力拒衆議，主張和平解決。又得張楊悔禍，冒死入都，求得國策之見納，纔有三中全會的召集。自稱爲擁護蔣委員長者，實不顧及果爾討伐

實施，蔣公安全，有無保障？再加感情極易衝動，忠言莫入，爭者此文，果於當時發表，勢必視爲附逆叛國。由此可知，愛護政府，愛護領袖，當始終以中華民國之國運爲前提。中國不亡，政府籌定大計，領導全國，則何懼不得人民愛護？同時，人民苟能一致擁護政府，完成對外第一主義之實現，則國家又何致有滅亡之虞？此點微義，關係重大，實望全國上下予以極大之考慮。

第三，學生運動當與日常生活有密切之聯繫——學生運動若果局限於救國之範圍，而不謀生活之健全與改善，結果必致空喊甚於實踐。今日青年之各種問題，在社會現象中已成不可忽視之一部。如何讀書，如何健身，如何修養，如何戀愛……在在重苦吾青年，不可不爲謀適當之解決。學生生活健全，則所謂激厲叫囂之氣，必可平反。則感情云云，淺薄云云，過度的工作云云，亦均不成問題矣。

兩年以來，目擊國家命運，由失望之深淵，踏上康莊大路，不禁欣喜至極。學生運動發軔至今，雖偏隘之氣未除，如能痛自悔改，自亦有其正確光明之前途。萬般悲喜，彙集心頭，發爲和平奮發之聲音，敬祝國家與盛，青年運動獲得偉大的新生，青年同胞得勿速起決定今後努力之方向乎？

三月十二日於清華

（附錄）申論青年問題

（一）

靜涵

自從去歲陝變解決之後，北方青年界在表面上看來是很平靖了。然而暗中壁壘相對，仍存在着敵此的畛域。且青年本身的病根未除，實未得將青年問題與陝北的解決連在一起而抱樂觀的。

關於北方青年的問題，自從王芸生先生的「寄北方青年」發表了之後，已引起了不少的反響；所見未必盡同，結論亦不免互有差異，然時人關心青年的問題，顯然可見。近日偶然與友人談及東北大學改歸國立，北平及西安兩處接收之經過及學生對於此事之感想與態度等情形，因小及大，陡然間又掀起了我心頭的青年運動與思想的感觸了。的確，青年的運動與思想是值得注意的，今日的青年，便是數十年後的社會主人。這時青年運動與思想的趨向，便是幾十年後的社會的傾向，今日青年的思想的健全或衰退，便是幾十年後的社會國家的強弱治亂的關鍵。在我國今日極度積亂之後，正高唱「自力

用事」的時候，百業待舉，底定國力，自是當前之急務。青年思想，實又是國家的一種最基本的最生動的「生活力」，所以培植和訓導青年思想，亦爲建國途中一種不可缺少的工作。安可聽其偏激，縱其奔放呢？又安可臨之以威力，嚇之以武器，迫其更偏激，激其更奔放，而驅策之使走入歧途呢？青年的思想是可以善導，不可以威迫的，可以學說誘導，不可以限制其奔放範圍的。今日青年界的現象，已種根於十數年前，入之既深，欲挽回之，自非一朝一夕所可奏效，然若處之非當，則怒馬斷韁，其前途恐怕更不堪設想了。

遍觀今日實際負教育青年責任的教育當局，和直接管理各地行政的行政長官，其處理青年問題，大半都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或以威力迫青年改變信仰，或襄助一部分青年，以圖消滅其他一部分青年的勢力。這種結果，必將使青年的思想愈分歧，青年的行動愈激烈，欲納青年於正軌，是越來越離事實遠了。眼見得瞎馬懸崖，急待回頭，骨鯁在喉，吐之爲快。略抒已見，以供當局之參考，倘得挽救今日之危機，則來者可追，豈僅我國家民族之幸而已乎？

（二）

大凡近日論青年思想問題的，多側重於青年思想之偏激，實則今日青年思想上最大的危機，不在

偏激，而在幼稚，輕浮與毫無堅忍力……這種現象，當然不是陡然而有的。我國數千年前的先賢大哲即創「士不與聞政事」的說法，繼之君主專制，既籠絡之以科舉又威嚇之以嚴刑峻法士妄言政，是爲犯上。于是養成了不關心國政的風尚。近年歐洲文明東漸，學子頭腦一新，知「國家興亡匹夫有責」。適民國七八年間，政府當局尚多具一副封建頭腦，作事上不脫官場的腐敗敷衍的習氣，於內於外，皆不能差强人意，逼成了「五四運動」。「五四運動」實中國青年打破了數千年來傳統的呆板習氣，而走向政治社會之道的「破題兒第一遭」，從此中國的十字街頭，漸有了青年學生們的蹤跡。

十三年革命初興，風聲所及，遍於全國，各地青年，紛紛響應。雖窮鄉僻壤之中學生，「投筆從戎」者，背數見不鮮，即華北各省區，亦數十相從，遠走廣東，入黃埔軍官學校，實開中國歷史上未有之先例。當此時期，國中之反動的腐敗的勢焰尚高，革命的勢力尚未至引人注目之時，故一般鑽營之徒，多未插足於革命。參與者皆爲有眞識有決意的人們，他們是不滿於現狀，不忍於糊塗當局的因自私而向帝國主義者屈辱，而喪權辱國，更不忍見四萬萬衆的民族淪於衰亡，所以他們的從事革命，是發之眞情，出於本心的，除奉行革命主義，努力革命事業之外，毫無苟且的趨炎附勢之意。所以他們都能有不爲威武所屈，不爲勢利所移的堅決志向，有赴湯蹈火的勇氣，有殺身成仁，捨生取義的慷慨。所以有「五四運動」和民

國十七年國民革命的成功。這時的青年運動，眞可以說是「黃金時代」。

革命興起後，年餘之間，勢力達到全國，聲力浩大。人民心目中，皆視革命人物若神聖，以談革命為時髦。素無正業，專以投機取巧為事的人們，和慣走江湖的老滑頭，亦追隨或依附在革命人士的驥尾，對人炫耀，借便以遂其私。此輩咸以革命為招牌，以傾軋為手段，而以出風頭，或取得飯碗為目的，濫竽充數，材學不足，學識缺乏，革命主義，到此輩之手，遂蒙上了一層灰暗，失去了原來的光明。有識之士，久已知青年運動為此輩所領導，步入了錯誤的途徑。

兼之革命軍北定平津，東北易幟之後，軍事初畢，統一粗成，各地多歡喜若狂，上述濫竽充數的人員，更以佈置會場為其唯一的任務。開會，遊行，慶祝，響應，反對，追悼……等所費之時日，竟佔去學生全學年三分之一，所最可採者，禁賭，禁毒，放足等，亦必使七八齡之幼童，隨同穿行市街。今日慶祝，紅彩滿目，高唱遏雲；翌日即可追悼，素白高懸，肅穆哀傷。最受其影響者，當為一般青年。——養成了浮囂之氣質，遇一表面的無謂的輕微的勝利，便狂歡到廢寢忘食；少不如意，輒氣憤填膺，立施抵抗。猶憶六七年前，故鄉某初級中學，曾以紀念驅逐前指導主任（後改訓育主任）某成功週年紀念日為理由，要求放假一日，結果未遂，即引起全校罷課，學生離校之舉。而發宣言時，則「壓迫青年意志，任用私人，私吞公款，摧殘教育，阻

礙革命行動」「……」等等罪名，一齊加諸校長之身。而推究其原因，不過一二人倡導放假於前，他人隨聲附和於後而已。時我猶親與其事，至今思之，殊覺事出非宜。在此二三數年中，學生會（後改學生自治會）之舉措，師長雖明知其非是，亦不敢置喙其間。此種結果，未能說非極度的浮泛的領導青年運動的結果。此時參與青年運動的人，擴展到了中小學生，而運動的目標，在革命運動的真義上來說，則離青年運動的本來意義，差得太遠了。

迨政局稍定，當局亦感到此種流弊，遂汰無識冗員，減少紀念日，消弭無謂的運動，然青年由沈靜入浮囂易，由浮囂返沈靜難，此風既成，一時難改。又兼東北事發青年陡然間又受到極度刺激，精神苦悶，心情激越，乃勢所必然。一般別具心腸者，趁機挑撥，從中鼓動，二十年學生請願，致有毆擊蔡孑民及陳銘樞之事實。各地縣長之被毆擊者亦甚多。青年運動至此，除浮囂幼稚之外，又蒙上一層惡意的灰塵。

同時，因強鄰壓逼，中國之土地主權，將次淪喪，青年的情感，隨極度的奔放澎漲。他們曾向國內作了不少的團結救亡的呼籲，對外亦作了不少的示威遊行，尤其在前年華北危急的時候，他們曾一致的走上維護統一的戰線上，終于阻止了國家的分裂。這自然不能不說是青年運動的重新入軌。然而這些青年的情感是熱烈的，是好動的，而知識是不足的，眼光是狹隘的，經驗是幼稚的。且這時政府因國內多故，

無暇且亦無力立時明白的强力對外，維護我將喪的主權，規復我既失的土地。致久不能見諒於一般的情感更熱烈，眼光更狹隘的青年，隨甚成了一部分青年的卑視政府，反對政府的意念。由於這幾個弱點，被些別有用意的人們抓着了，就在這種純正的愛國運動之中，便演出了帶偏激色彩的事實。這時的青年運動，舉的是救亡的旗幟，喊的是統一的口號。而作的是自相磨擦的工作。

因爲這個時機，實在太使青年們苦悶了。所以在救亡統一的口號之下，便形成了左傾勢力的極度高漲。他們很有號召的能力。民族解放先鋒隊，遍佈在各校。而右傾思想的青年，亦爲了保持他們的勢力，貫澈他們的主張，積極的整頓旗鼓，組織團體，照例的是勢力相當的兩團體易起衝突的，去年的北方青年界的衝突，暗鬥，便是因此而起。

(三)

提到去年青年界的衝突，實在使人衷心，他們都是爲的救國，不過只是緩急的不同。他們不能以和平的態度，討論出一個澈底的究竟辦法，竟至於互相傾軌，互相仇讎。對外倒是暫時的停止了抗爭，而在自己間作起了「磨擦」工作。論者每以雙方的背景爲論點，其實左傾的未必便是共產黨，右傾的亦未

必便是國民黨或政府的雇傭。自然其中亦不免有幾位是含有別項作用，而借題做文章的，然據我所知，十分之九都是些純潔的青年。他們的大多數是犯着情感過分熱烈，眼光短，器量小的毛病。當去年陝變發生，一位同學曾雙足跳着高興得了不得，多數人卽認爲他必有背景的。其他幾位知道他清楚些的，問他高興的原因，他的回答是：「中國立時便可以對敵人宣戰了。」我想這樣的青年，恐不在少數。

去年青年界的衝突，以陝變的前後爲最烈，使身歷目覩的人們，爲青年運動的前途抱悲觀，爲中華民國，爲四萬萬民衆抱憂懼心。去年十二月中旬，我適留滯南方，北方朋友曾致我一函，中有一段云：

「……北方的風，刮得還是這樣的冷，塞北的飛沙，照樣的還是敲擊着我們的面皮；西天濃厚的烏雲，一點亦沒有散，誰知牠是一場大雪呢？還是一場迅雷疾雨的前兆？有些人駡我胡塗，說我在嚴冬還怕有迅雷疾雨，然而我到覺得他們，不識這個年頭兒！

「學校裏好像是個戲園子，有裝匪的，有裝兵的，戲報子粘了滿牆，紅的綠的，唉！奇怪的戲報子，在報着要演西班牙的劇！

「每天煩惱極了，耳朵裏一陣東風，一陣西風，於是一部人合起來眼睛，塞起耳朵，在心境上求高興，一部人乾脆的亦作了戲子，不看清華，師大，都曾經眞刀眞槍玩過大彩麼？

可見當時北方青年界的情形，和一般人的感想了。

——————

在這種情況之下，最使人痛心的，是幾位青年運動的領導者，和幾位指導青年的教師。我覺得青年界的分裂，衝突，他們要負最大的責任。北平某大學學生的衝突，卽相當的激烈，數十人互相對打者，不下五六次。主張保守些的幾位青年，常常巡行全校，凡遇有張貼他方標語，或談論國事而涉及其對手方者，不問此人之立場爲何，其談論之本意爲何，輒拳足交加。某次因同學談論語氣稍偏左，竟持武器向之尋釁，大鬧不休。學校聞之，乃將談話者開除學籍，而尋釁者則絲毫未受處罰。某某教授且曾於全體同學之前說道：「只要有共產黨，你們就揍，揍死一個少一個。」致其他客觀的同學亦覺得處之太過，而抱不平。同時某大學則與此校適得其反，因學校之變動，致引起左右兩派之鬭爭。木棒鐵鏈，磚瓦石塊之不足，後更繼之以沸水。混戰二小時，受重傷者十餘人，血淋滿地。而於惡戰之際，其校負責人竟高呼：「揍，揍死走狗們，死了我對命。」推其意，蓋不外乎欲逞其威勢，使異己者附己，至少亦使青年們之思想不同者，勿相混居，以成青年思想之統一。然此種方法，定然徒使青年之思想更趨激越，青年的團體更要對立，青年間的衝突，更要慘烈而已。試看清華大學，校方完全自居於學生團體之外的超然地位，處理學生衝突，惟以

公平爲主，不作左右袒。是以其校學生之衝突亦不過數十人揮足舞拳，互擁互推而已，受傷者絕然少見。某大學更於學生間將分裂未分裂之際，招集全體學生作剴切的訓話，曉以國勢之危殆，環境之惡劣，與青年救國之眞道，並指摘當時青年界最流行的各種言論主張之謬妄。此大學之學生，終於不過只作言論主張上的筆墨戰，絕無武劇之演出。處理青年問題，孰是孰非，當可想見。

陝變既告解決，平方青年，各依己見，相對的開了兩個慶祝會。一個的標識寫的是「慶祝領袖出險，中華民國重生。」一個的標識寫的是「慶祝陝事和平解決，各實力派眞正聯合。」雖然這兩個會是一個大一個小不能相埒的，然而足可證明這兩個勢力的確是仍然在對立中存在着。寒假之後，各黨門墻，各校皆競取學生會之席位。此一幕醜爭劇，很明顯的仍然在暗地裏繼續進行。

青年們太早熟了。他們的許多基本學問，都還沒有，却要先來談些大問題，習性是這樣的浮泛，這樣的毫無堅忍力，眼光既如此的狹隘，器量又如此的淺狹，精神上是如此的煩悶，在不同思想的青年之間，互仇的成見，尚未見泯滅的象徵。這種現象一日存在，即中國將來的危機一日存在，即中國建國的大道上，尚存在着一層障礙。雖然共產黨可以完全就範，青年間的這種情形，亦不能不認爲是國家的危機，所以青年問題，的確是值得注意的，而且是刻不容緩急待設法改正，設法解決的問題。

(四)

青年思想激越浮動的原因，除於軍政時期於不注意中爲一般濫竽者所倡導外，約略尙有四端：

1.社會制度不良，不能與人民以生活上的保障，努力上的安慰，凡有勢力的親友作後台者，雖難辨「之」「無」，亦可安居高位。而一般普通人雖具有求生之力，亦難尋求生之門。那些將進社會和已進社會的青年，自然要常感不安。他們只感到社會對他們威脅，壓迫，陰謀搗亂，感不到社會對他們正常指示和安慰，覺得此種社會爲腐敗的社會，是行尸走肉，是不可救藥的。他們受到了威脅，被逼得無路可走，所以使產生出一種破壞現社會的念頭，至於破壞後的結果如何，與各方面所受到的影響如何，亦許是他們暫時所想不到的問題。

2.我國內政不整，積弊已非一年。地方官吏常有不能體察民隱，推行國家愛民之德意者。敝鄉數年前有一縣長某，到任六月，得賄款七八萬，多年大盜，他可以放掉，二人爭訟，有錢的便打勝官司，欺壓善良，包庇毒販。……凡他可以拿錢的，他無一不幹，人民之無辜受罪者，大有人在，地方官得罪人民，人民乃不見諒於政府，對於與政府持相對之說者，無形中便增出了許多同情。前者某友致書於我曰：

「北方住着感到無聊，南方居處亦是苦悶，此乃中國社會整個的毛病，豈異地即非然哉？嗚呼！豺狼當道！壯士失色；蛇蝎橫行，英雄落淚，此賈長沙之所以痛哭也。中國不亡於×××，而亡於貪財黷法之汚吏，可勝嘆哉！」

時某友爲某縣長放出之大盜，將其家洗刼一空後也。

3. 近年外侮凌逼，國勢凋頹，自塘沽協定後，北方的危機逐日加深，青年們尤其是北方的青年們，眼見得國土日削，主權日促，基於愛國的熱誠，遂開始有救亡的活動。政府自知內部尚不一致，力不足以對外，唱出了「安內攘外」的口號，努力在預備上作工夫。一部青年認爲政府是推延，是屈辱，以恨強敵之心，轉而怨及政府——怨政府不能立即發動抗敵，不能以大計示人，外交不公開。更有一部分青年認爲「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自己準備，人亦準備，則永無可勝人之日，早晚均歸於失敗，倒不如早日發動。他們的熱誠是值得嘉獎的，他們的思想見解，終不免不脫幼稚。他們見到了國家受欺，立時急得要火併起來，他們顧不到我國今日之受欺，是由於幾十年或更可說是數百年的積病所致。久病之人，是不能立時求愈的。只要自己不再自己斲傷，努力向着保養的方面作去，待健康稍微恢復，我們能站得起的時候纔是我們揮動拳頭的時候呢。雖然到那時我們亦不能担保必勝，至少亦可以使對方吃兩

拳頭。決不能就像現在，只嘴唇一動，便被人家打得嗚呼哀哉了。

4. 在中國一切尚未上軌道之前，滿地瘡痍，自然容易使青年們景仰別人。青年的知識經驗皆尚未足，中無所主，自然易於見異思遷。聽到了天花亂墜的宣傳，和任意敲擊的漫罵，多半沒有辨別眞僞的能力。不經一番客觀的堅忍的審査的工夫，便輕易的起一種信仰或憎惡，接着信仰憎惡而來的，便是盲目的忠誠的受這種被信仰者的指使，向被憎惡者攻擊。這種結果，亦只得歸罪於教育的不完善，不能給他們以辨別的能力吧？

（五）

在我們討論了青年運動的流變，和構成今日青年界現狀的原因之後，最後有一點願望要寫出來：

1. 青年們要客觀的冷靜的澈底的思想。在覆巢之下，是沒有完卵的。國家是各種政體各種制度的最基本的先決條件，我們處在異族的鐵蹄之下的時候，便是手足被綑綁的時候了，想實現理想，恐怕終于是個幻夢而已。我們現在要學一學英國的風氣，越是思想主義不同的，越是要常到一塊兒談談，縱然有時在討論上，在辯論上是站在敵對的地位，我們反對的是主義，是主張，而不是人。試看外國的政黨

領袖，在下令後，都可以是親密的好朋友。這種精神實在可作我們的一個模範。我們有一個建造自主自立的國家民族的大目標，我們都要向着這個目標努力，其餘的手段上的枝節問題，是不必爭執的。自己的爭執，終於是有害的於己而利於敵的行爲。

社會是我們的社會，國家是我們的國家。改善成理想的社會，建造出堅強的國家，都是我們的責任。我們不能空想別人替我們流血，同時我們亦不能替別人去流血。我們抱定我們的主義，睜大了眼睛，抬起頭來，不要只看目前的咫尺。看見了標語，聽到了口號，要想到社會是複雜的，不經過自己的體驗的，不要輕於相信。青年同志們，我們國家民族的前途是光明的。

2. 學校的導師們，和社會上的言論界，要對青年多加以開導，使他們多得到些知識，多長些經驗，多有些判斷世事的能力。在某日的北平實報上，陶希聖先生所作的一篇星期偶感中，有一段大意這樣說：「我們中國的壞處，在于中年人不負責任。中年人馬馬虎虎，把社會弄糟了，却叫青年人來着急。」的確，中年人是要多負些責任的，既要保衛國家，推進社會，還要培植青年，養成國家社會將來的精力。你們要鼓勵青年的勇氣，矯正青年的錯誤，灌輸給青年知識與經驗。倘使青年有分裂的兆示的時候，對他們再施以勸導，事發後雙方並懲，已顯得不當了。幫助一方，壓制一方，更是不可或用的手段。

3。國家的主宰者和地方當局，首先須澈底明白青年的熱誠和錯誤，對青年總要懷一種愛惜的心理。須知道「青年是我中華民族之精英，是我中國民國的元氣。」是建設我理想的國家的生力軍。不要認爲青年運動沒有什麼力量，他們已作過了「北方的長城。」他們的思想是可善導，不可以壓迫的，不要再想用威力轉移他們的思想和信仰了。我數月前曾聽到教育部的一位朋友說：「當他前年奉命到西北去考查教育的時候，最受感動的，是甘青的些青年們，沒有不會唱共產黨歌的，共產黨在教育上，的確努力。我軍所到的地方照例是禁止唱這些歌的，——聽到有唱的，沒有別的辦法，只有將他們捕去處罰。」不錯，我覺得應當請些音樂專家，作出些更好的歌，教給他們，使那些不願意使他們唱的歌，漸漸的受淘汰，不應當以武力來制裁這些青年的無意的流露的行動。恐怕這類似的事實，正不在少數。這個實爲急應更正的一點。倘使青年的思想行動有錯誤，亦要好好的解釋勸導，他們心誠悅服的改過，才是真正的自新。同時希望你們要多負責任。嚴懲貪污，不要多刺激青年們的神經。

現在各地的青年，雖然仍在對立中互峙着，雖然各方仍在努力共壁壘的建築，然而像去年的眞刀眞槍的衝突，近數月以來還沒有；他們間的情感，現在亦還未至於像去年樣的極度激越。在這時候，是容易思考審量的時候，是較易接受訓勉的時候。青年們要冷靜的審量審量過去的行爲，是否出自本心？是

否與國家民族有利？若永還這樣作下去將要怎樣？教師們和行政長官們亦不要以為這時青年問題，即已完全解決了。若一旦又因故爆發，却又感到事出倉猝，手足無措。未雨綢繆，事則易舉，防患未然，是端賴大家在這時深自反省，齊加努力的。

(附錄)給我自由!

——一個青年的吶喊——

梅凱

"The man
Of virtuous soul commands not, nor obeys,
Power, like a desolating pestilence,
Pollutes whate'er it touches; and obedience,
Bane of all genius, virtue, freedom, truth,
Makes slaves of men, and of the human nature
A mechanized automation."

——Shelley

我年青，我狂戀地追求生命；然而這世界冰冷地棄絕我。我無邪，我好奇，我飢渴。我需要知識，眞理，來滋潤我，充實我的靈魂。然而我發覺這無非是奢望，什麼眞理，什麼知識，早被魔鬼所埋葬，與我絕緣。每日所呼吸的不過是充滿毒菌的，令人窒息的空氣。這使我開始厭惡這世界，使我憂鬱的心情更加沈重。我愛太陽，然而撒但的手蒙着我的脖子，死神的黑衫蔽翼了陽光；吾不免太息了，「生活到了不能忍受的時候，不如用暴力來把它毀掉」罷！

近來，思想問題成爲我的一個難解決的問題，而這是必須解決的。我想，「好的書籍」該是我最可親的朋友，於是書便與我結緣。肆上的成堆的「講話」「叢書」便毒蛇樣地吃噬我的血，等到我自覺到我已成爲貧血病患者時，我要感到醫生的不可信任了。

一個自命聰明的人曾帶着嘲諷的口風警告我：任何人的思想非左卽右，你應找你自己的立場。接着他便滔滔的說了一套怪玄奧的理論。最後，他很堅定給他自己下了一個結論：「我是左傾的。」我笑了一笑。我不知道我爲甚麼發笑。於是，我的「立場」便被「他們」所「決定」了。

我自己，一向是被人目爲「右派」的。這，我該慚愧。

如果有人讓我解釋我自己，雖然我感到這解釋的不必需，與發問者的愚昧；但是我仍能借用托羅

麥基在他的自傳裏的話來生動地說明的。

「在我自己的習慣上，無需說我是有書生氣和帶保守性的人。我酷愛，且尊重，紀律和體系。……一本寫得很好而可以找到新思想的書，一枝能夠把自己思想轉達給別人的筆，在我過去和現在，都認為是文化最可實貴和最近的果實。我從未拋棄過學習的志願。……」

可是，我如何能自由地學習呢！周圍的人們都戴着有色的眼鏡監視我！

我想：我的教授應該幫助我學習，幫助我認識這世界罷！不久，我發覺這不過是奢想。政治學系的教授能舞動他們的唇講政治思想，能由希臘哲人柏拉圖，亞里士多德，馬克維黎（Niccolo Machiavelli；摩爾（Sir Thomas More），直說到霍布斯（Thomas Hobbes），洛克，孟德斯鳩；講政治制度，能將英國政府與政治恭維到頭；而不能更確切為我們說明現世界政治的利弊在那裏。經濟學系的教授，自邊際效用至高深的貨幣學說，繁複的匯兌理論，重農學派，自由貿易，都肯引經據典，說得頭頭是道；而獨對經濟制度不肯厳正的批判。歷史教授懂得尋找史料，背誦史料，而不知由史料中取出精粹，告訴我們歷史演化的形勢，我們在歷史上的地位；懂得講說過去，不知解釋現在，將來。至於那些理工的教授們，我是早就寬恕他們的，實驗室外的事物所理解的程度，恐怕和我也差不許多罷！我們的學校當局行

「導師制，」據說是「試行，」導師們將「被指導」的學生請到他們華貴的廳堂裏，讓學生們的軀體埋在舒適的沙發裏，文雅地呷飲咖啡，聽他們演講，又是在黃金國度裏「寶貴的經驗」─我知道許多同學對導師只抱一個希望：宴會。難道這便是教育─左傾教授以學生爲宣傳對象，訶諫式的演說他們的「上帝，」及他們憧憬的理想……。右傾教授亦復不能容物，不能虛心地，客觀的接納新思想，缺乏「學者態度。」

我想：書籍應該幫助我學習，幫助我認識這世界罷─這又是奢想。世界上雖不乏「好書，」不過有一部份是被列爲禁書了，我總不能了解其中的原因。我總以爲當局在鉗制出版自由上是一種失計，尤其是在文化上。英國大詩人密爾頓在他的第一篇政論"Aeropagitica"中曾這樣非薄這種檢查出版內容政策：

「此種取締出版之陰謀，其所給予吾人之巨大損失與危害，較之設若敵人封鎖吾國之一切海岸港口，尤多且烈，因爲它阻止及遲延吾人最豐富的貨品──即眞理。」見（J.A. St. John, "The Prose Works of John Milton," Vol. II, p. 53)

「殺死一篇佳著與殺死一個活人，其相去有幾希：殺死一個人不過殺死一個道理的動物……至

於毀滅一篇佳著眞是殺死道理本身。」（同上，Vol. II, p. 55）

眞理必須有充分討論研究的自由，始能發現，始能存在。賢明的當局是不會仇視眞理，做文化的盜賊的。

約翰摩萊(John Morley)在他的傳記集（Biographlical Studies）裏曾說過幾句動人的話：

「每值困苦與混亂時代，人類羣衆對於其當日所需要之片段眞理，往往具有本能的覺悟；且對於旣能表顯其痛楚，復能映射其希望之公式方案，亦往往得到自然的領會。在世界偉大的變動中，爲領導的勢力者，並非任何學派或文字之『形式邏輯』，而乃社會利便(Social Convenience）之『應用邏輯』。人們從其所崇師之學說與主義中祇擇其需要切合者儘量採取，而其餘一切則棄置不問。」

我認爲這節話是很有意義的。在不安的國度裏，政府正應儘量給予人民以思想上的自由，惟其如此，才能獲得宏偉的效果。每個人思想信仰之不同，猶如每個人面貌，性格之不同一樣。想統一思想，恐怕與想統一面貌一樣的愚笨。政府應該了解青年，信任青年：我們的羣衆中皆以民族復興爲最大前題。同時，我們青年人應拋棄所謂「左」「右」的立場，我們的團體是整個的，是不可分的，左右對峙，只是阻止國家的復興，並且促使國家的滅亡。我們應高呼：祖國利益高於一切！祖國利益高於一切！

當我想到那幅圖畫時，我便不免爲國家偷偷流淚的。那便是當「今日之蘇聯」（U.S.S.R. in To-Day）在北平眞光電影院上映，瘋狂了不少左傾青年。在未開演之前，許多人合唱「國際歌」；開演後，史達林每次映在銀幕上，必有掌聲！我可憐這羣無知而終是可愛的青年，染了重症，左傾幼稚症，一種難治亦易治的流行病。他們自負，傲岸，以爲只自己才是最「前進的」。容我大膽地冒犯他們一句：他們所讀的書籍并不多，他們對現階段的中國并沒有深刻的認識。我們該原諒他們。政府該不猶豫地負起醫生的任務來救治這些青年。最有效的藥方，我以爲，便是充分地予他們以閱讀的自由，使他們能充分地讀任何書籍，左傾的與右傾的，智識豐富，認識社會必能正確。同時，他們必能反省以前在深夜中燭光搖曳中讀甚麼「講話」是浪費，甚至是在飲鴆！

另一方面呢，又有不少青年染了右傾幼稚病。他們的幼稚程度，與前者相較，是有過之無不及的。他們擁護政府，愛戴領袖，這種態度是可佩的。現在中國的確需要一個強有力的中央政府與有救亡決心的領袖。法儒勒朋在其革命心理一書中曾謂「觀念」「領袖」「軍隊」「羣衆」四者爲一切運動中所不可缺少之四大要素。（見Le Bon, "The Psychology of Revolution," Miall英譯本，第六十六頁。）不過過於倚重一個人而忽略了整個民族，那麼這個政府的基礎未免太不鞏固了。他們短視，是沒

有看到這點的。他們抨擊左傾思想，咒駡左傾份子，然而對左傾思想的書籍，則視若洪水猛獸，決不肯虛心地看一看的！這種畸形的態度，希望他們能自行矯正。

我感覺空氣的悶人陰鬱。讓我呼吸些自由空氣！給我光亮！

威尼斯之Pozzi古堡的獄室的牆壁上，佈滿了囚徒們所刻的字跡。其中有一個教士因受人誹謗含冤下獄，在壁上寫了兩句：

Dagli amici mi guardi Iddio;

Che ai nemici penso io.

（上帝可在朋友之前保護我，

至仇敵之前則我自己會防禦的。）

他有虔誠的宗教信仰與熱心，可以防禦敵人。我呢！給我自由！

四月七日，清華。

招魂

——一個新聞記者的弁言——

我是一個新聞記者，從事本業已有十年以上的歷史；但我從來不談關於本業的話，不大寫關於本業的文章。「三句話不離本行，」在我是却是例外。我何以一向持這種態度？并不是因爲新聞事業沒有可談的，而是覺得我自己還不配做一個新聞記者。

新聞記者這種職業，就現在的情形看來，似乎人人都可以幹，但要幹得盡職却不是一件容易事。一個能克盡厥職的新聞記者，他須具備幾種異乎常人的條件。他須有堅貞的人格，強勁的毅力，豐富的學識；對於人類，對於國家，對於自己的職業，要有熱情，要有烈愛；然後以明敏的頭腦，熱烈的心腸，冰霜的操守，發爲「威武不能屈，富貴不能淫」的勇士精神，兢兢業業的爲人類，爲國家盡職服務，自問良心，我還不配。

在這十多年的光陰中，我始終在新聞界中當着一個小夥計，我的心雖常爲國家悲，爲國家喜，我的

筆雖也常爲國家爲人羣而動而忙，但回首檢點一下自己的成績，究竟對國家對人羣會有些什麼貢獻？不用旁人指摘，我自己先流汗了。

八年前，我曾親耳聽見一個黃包車夫罵「幹報館的沒有好人」。從那時候起，我便立志要新聞記者努力做一個社會上的好人，把新聞事業做成一種好人的事業。這樣我們對國家社會縱使無益，也還不至有害。在這一點上，我常反省，我常警戒；但在過去十年中吾曾否無意中害過人，也還使我異常擔心。

前幾天，在一個機會上，有一羣學新聞的學生包圍住我，要我對他們講話。我就告訴他們，「你們是預備做新聞記者的，但做新聞記者不是一件容易事。因爲新聞記者手上有個武器，容易受人恭維，也容易被人誘惑。你們儘管看見有許多新聞記者很得發，若從某一個角度上去看，他們是成功了；但是我却希望你們不要走這條成功的捷徑，希望你們每個人都努力做一個有靈魂的新聞記者。」我說的是良心話。老實說，在我的眼中，便有許多被人恭維做「無冕之王」的，實際上是「無魂之鬼」。假使有一種高明醫生，我願意受他的檢查，看看我的身體中是否也有這種可憐蟲的血液。假使有的話，我願意自動把我自己的生命毀滅了，免得給新聞記者貽羞！

這幾天，我正在爲一件事難過，難過得使我睡不着覺，不敢見人。

聽說北平有十幾位同業，每人接受日本人幾百塊錢的津貼，由北平出山海關，經過僞滿洲國及朝鮮，到日本去考察。這幾天，到處聽見人們談論這件事情，假使沒有熟人在場，我絕不敢開口，恐怕叫人知道我也是一個新聞記者，有機會我必偷偷的溜掉，免得被人家罵得臉紅。

爲這些位北平同業設想，他們不是沒有理由的。東北是我們的領土，別離了五年，我們應該去看看；日本是我們的鄰邦，我們應該常常去考察。但是我們應該自動的去。東北那塊土，是被日本軍人奪去的，現在你們拿了日本人的錢，被日本人引導着，踏過這條傷心的地帶，去到日本觀光。到那裏，你們一定照例的要講些「中日親善」一類的話，日人本士也莫明其妙的在鼓掌歡迎你們，說是「中國的輿論來了！」哎呀，天啊！糟透了！那是猴子戲，那是豬玀國，天下事還有比這再糟糕的嗎？那簡直是整個的開我們中國人的玩笑，我們流汗了，臉紅了！

我向不排日，並且主張眞正的中日親善，但你們這樣做法我是不敢贊成的。因爲你們這樣不啻是放棄了中國人的立場，而被人當做豬仔販賣了。

雖然如此，你們這趟也並沒白走，我以爲。你們出榆關東行，乘南滿車，經過遼東沃野，而至朝鮮，這一

地帶，在耶穌紀元前兩世紀時，便已收入我們中華民族的版圖了。在這塊地上，埋着的是我們祖先的骸骨，活着的是我們的同胞。當你們經過這一條地帶時，你們的腦海中或會湧起我們祖先的光榮史，同時還要爲我們這一羣中華民族的孽子孽孫悲悔，感奮。在鄰國，你們若看見那白頭的富士山，千萬想着我們的長白山也不低；當你們欣賞島上的爛熳的櫻花時，切莫忘記我們的遮陰了遼吉天空的菁莽的森林。在你們的心靈上，只要有這麼一道閃光，那你們便不虛此行了。

春天偉大啊！人間萬物皆已欣欣向榮了。失去的靈魂啊，返回有血有肉的軀殼吧！歸來！歸來！魂兮歸來！

二十六年四月十一日上海。

五寄北方青年

諸位同學：

這是我寄給你們的第五封信。

在我的第四封信發表後，我又接到許多讀者來信，討論其中所涉及的問題。我現在想擇要的答覆幾點。

馬華先生自陝西淳化來信，他對於我所說的：『「抗日人民聯合陣綫」這一口號，原爲中共所支持，現在他們已認識這一口號的不合適而把牠放棄了。』表示不同意。他引證了許多共產黨要人的言論，證明中共自九一八以後並未主張過「抗日人民聯合陣綫，」他們主張的是「民族統一戰綫。」馬先生說我遠在江南，對於西北的眞象不大淸楚。這話我相當的承認；但是我的話却不是無所根據的。我說：「中共的轉變，我們可以從他們一年來的宣言通電裏見出他們的脚痕。」我說他們主張過「抗日人民聯合陣綫，」便是根據他們的宣言通電而來的。中共在一九三六年四月二十五日發表了一個一

創立全國各黨各派的抗日人民陣綫宣言」那篇宣言的口號便是「各黨各派抗日人民陣綫萬歲。」又在去年冬天「共產黨致國民黨書」中，最後的警句是「讓我們的敵人在我們的聯合戰綫面前發抖罷。」這都是最近一年來的中共主張，自然不是九一八以前的事。我認爲目前的局面，共產黨的轉變是一個重要因素，而我對於這個轉變是充分同情的。我所謂：「既動矣又豈能無所錯誤?」察知錯誤，趕快糾正，便已是值得讚揚的英勇。若謂共產黨是天生聖哲，無往而不正確，那反倒不合分際了。

其次，馬先生對於我所說的標語口號的騙已騙人的問題，表示異議，並謂毛澤東「過境抗日」的口號不是假的，教我去問問曾見過周恩來的人，說那是一種「含有冒險性的企圖，他們的目的在由他們發動了整個的中日戰爭。」這自然可以成爲一個正面的說法，但我敢那樣說，不全憑我的推想，而是我的朋友聽到比周恩來還直接的人物所說的。至於標語口號這東西的作用及反響，包含着很複雜的心理問題，討論無益，還是請常幹宣傳工作的人冷靜的想一想吧。

呂洪甚先生自天津來信，提出了一個很重要的問題，玆錄如下：

芸生先生：

你寄給我們北方青年的第四封信，最近業已拜讀，當我拜讀之後，覺得有以個人的感想向你

提出反響的必要。

你開頭就說，「這封信和我寄給你們的第三封信在時間的距離上還不到兩個月，我們國家的情形卻已有了很大的發展。我們所顧慮的問題，漸漸的轉變得不存在。」關於你前者寄給我們的三封信裏邊，所顧慮到的問題，固然多而且大，但現在我爲敍述上的便利起見，不妨簡括的說是政治思想的問題，在時間的距離上還不到兩個月，而我們已往所最感煩悶的政治思想問題，於今已經會「漸漸轉變得不存在。」對於你這種樂觀的論調，我很替你高興，如果事實理由充足的話，我也很願替無數的青年高興。

你所以樂觀的理由，據你在這封信裏邊說給大家聽的，大致是這樣：「共產黨的態度轉變到這樣，或會引起一些人的詫異，但卻是『團結建國』路上所必需的條件，我們應該毫不遲疑的接受這個態度」及「大勢已定，所剩下的只是些枝節的技術問題。」你更相信「人們的理智業已增高了，」「大家自然被良知驅策着朝着這方向走；」「在這個方向之下，我們國家的統一可以更進一步。」在這裏你認爲「共產黨的『中國人不殺中國人』的主張自然也可以貫澈。」以上便是你所以樂觀的理由的全貌。

你這種樂觀的理由在直覺上是相當充實的，你這種樂觀的理由是否含有些冒險性？那只有讓將來的事實去證明，姑可不論。現在我們惟一的希望，是共產黨這次的轉變，能夠不會又是一種姿式或策略，頂好共產黨也能夠和你一樣的老實，能夠有一個單純的堅定的信念走上我們所希望的方向，和所必須的方向。若然，我們毫不遲疑的相信，這樣在理論上是救了中國，在事實上也不會亡了中國。若然，對於你前邊一些樂觀的理由，我完全同感！

根據這個同感，我們要討論到「大家攜起手來共走一條路線」的問題了。自然這是用不着懷疑的，你說的很對：「難道只有自家鬥氣要拳頭才算救國嗎？」這裏不問事實上北方青年界是否將有一種新運動發生，但在理論上北方青年界能有一種新運動發生，這却是很需要的，並且我們極相信這種新運動的第一步工作，便是以「大家攜起手來共走一條路線」為目標，然後第二步第三步才能談到救國建國的實際技術問題。這也是用不着懷疑的了。那麽，現在「鬥氣要拳頭」的北方青年界，以及全國青年界，全國知識份子，都應該平心和氣，把拳頭各自縮回。

這裏我們要再進一步討論的，目前應該平心和氣，把拳頭各自縮回的人究竟是那些人？關於桂問題的國民黨西南派不必提了，鬧西安事變的東北軍左派轉變了，高唱「人民陣線」的西北

共產黨也跟着轉變了，北方響應西安事變八項主張的青年們也跟着反省了，誰佔便宜誰吃虧，過去的帳一筆勾銷，這都不說了。此外還有沒有人呢？此外的不曾把拳頭縮回的大多數在野政治團體，在在有之大多數無黨無派的純潔國民觸目皆是，他們要求開放黨禁，要求實現民主政治，至今日，他們的主張未見實現，而他們又未見放棄其原有的主張，這是不是幾年來內亂的有力因素，這是不是容許我們忽視？

你在「大家攜起手來共走一條路綫」的前提下，很相信一位青年的話：「今日的中國存在着兩個大政黨，都有革命的傳統，我承認國民黨對中國的功績，我不否認共產黨有過賢明而英勇的政策，但是這兩個大政黨都有很大的缺點。我覺得今日的國共兩黨，都還不成為真正健全的政黨，組織行動的不統一，沒有民主精神，沒有政黨風度，都是國共兩黨應該覺悟的地方。我覺得這兩個政黨的進步與否，也是中華民國建國途中的大問題，國民是應該督促他們進步的。……」這段話是你借作了結論的，這裏你當然也願意負這個結論的全責，雖然你開頭說過「所顧慮的問題，漸漸的轉變得不存在」，算是丟開了你前三封信所談的一些問題，但我仍然覺得你在前三封信裏邊發表的意見有不應由你自己放棄之點，你在「再寄北方青年」的末尾，曾為國民黨「打了

一個寒戰，」但那時你並不十分悲觀，你很希望國民黨「更開明的走上民主的路，」你也很主張「三中全會應該確定召開國民大會的日期。」至今日，你如果不曾放棄你這種希望和主張，那麼你這封信的結論却有了毛病，而且這個毛病還相當的嚴重。

國共兩黨的覺悟與進步與否，關係中華民國的建國前途很大，這是不會錯的，本來打算建立一個民主國家，是須要培養健全的政黨的，并且越是民主化的國家，政黨越容易健全，政黨也越多：極左也好，極右也好，不左不右的中立政策也好，在多黨並存的國家，政府有傾圮，國家無破裂，這自然不消細說，我相信你也許比我知道的多些，那麼國共兩黨能不能負起這個救國的重擔？在事實上國共兩黨「攜起手來，」「縮回拳頭，」能不能就建立成功一個民主政治的國家？中國現存的政黨是不是就只國共兩黨？其餘的政黨勢力是不是可以完全忽視？這都是希望你重加考慮的問題。並且希望你在政治思想問題上，對於煩悶而消極着的青年界，尤其是北方青年界，多予以更開明的指針。

用這一點點不客氣的回響，藉以報答你對於北方青年的熱忱，頗不相稱，惟希原諒！

再談！祝你康健！

呂洪基拜啓，三月二十九日。

我讀了呂先生這封信後，很感愉快，他很周詳的考慮了當前的國家問題，同時還給我一個進一步說明我的意見的機會。

我應該特別聲明：我過去寫給你們的四封信，在觀點上是完全一致的；在那四封信中的意見和主張，我絕未放棄，而且覺得還有引伸貫徹的必要。

我在第四封信所表示的樂觀氣氛，是爲了共產黨的轉變，尤其是爲了在這個轉變中所出現的思想上的國家路綫。一般人儘管對共產黨不放心，我却始終抱着一種不可挽救的樂觀成見。我以爲共產黨轉變過來固是國家之幸，即使共產黨再轉變回去，而這條思想上的國家路綫也已建立，共產黨非但不能用違反國家利益的手段來破壞這條路綫，反之，共產黨如不忠實的話，則必將爲此路綫所粉碎。

呂先生的信中，充滿要求民主的氣氛，那正是我所信仰的。我雖不大願意講「各黨各派」，但却始終相信民主政治是我們的建國通路。我在第四封信中所引述的那位青年朋友的話，我同意他對於國共兩黨的責望，但他的意思並未說國共兩黨之外便沒了人。

在這裏我願意鄭重說明：一黨專政不是最理想的辦法，當然我也不贊成由兩黨來包辦。雖然實際

在國共兩黨之外，我們還很少其他有力量的政黨，但大多數無黨無派的國民是不容擱在政治圈外的。

我們目前的路綫是「團結建國」—其方式是以國民黨為中心，由其他政團及大多數無黨無派的國民共同培植並督促這個中心，一同走上民主化的大路。

國民黨雖以憲政的保姆自居，但她的訓政是有期限的。國民大會現已確定於本年十一月十二日開會，國民大會的組織法及代表選舉法，正在研討修正之中。我們要注意這是目前政治上的一條路，我們雖不敢幻想由這個大會中出現一個完善無缺的憲政，但這却是走向民主政治的一個階梯。我們要把握住這個階梯，不要放任得使牠變成一個四肢不靈意志不全的東西。

現在無論是誰，只要是中國國民，都有對修正中的國民大會組織法及代表選舉法發表意見的權利。我以為要實現一個真正民主化的國民大會，除了在立法技術上注意之外，最根本的是觀念問題。在觀念上，應該根本洗刷掉包辦的思想。這一點是應該由國民黨來放大襟度的。

我所指出的觀念問題，實是一個要點。我們能在觀念上加以適當的估量，則國民大會的組織以及憲法的產生，均將面目一新。例如我是一個無黨無派的國民，大體上表同情於國民黨，並且對國民大會寄有很大的期望。但是，我除了在口頭及文字上喚起大家的注意之外，至於如何實際參加這個政治運

動，把自己的意見直接貢獻給國家，便根本無從考慮起。因為我們要參加國民大會的選舉，須先取得中華民國公民的資格；如何纔算一個中華民國的公民，須經過一次公民宣誓。我從各方面來審查我自己，或尚勉强够一個公民的資格。我誓願盡忠國家，永不做違反國家利益的事；但是叫我舉手宣誓信仰三民主義，却躊躇了。我不反對三民主義，并且在原則上是贊成的，但若一定叫我舉手宣誓，承認不折不扣的信仰，最低限度，還得給我一個充分的時間再把三民主義仔細的讀幾遍。這是第一道門坎，遲留在這個門坎外邊的，想來當不止我一個人吧。

由這個觀念出發，便形成「憲草」上的「三民主義共和國」我想在一個尊嚴的國家之上，還是少加些形容詞的好。

國民黨應該澈底認識她的地位的重要，在一個恢宏廓大的新態度下擔任起「團結建國」的中心使命。國民黨應有以孫中山先生十三年主張召開國民會議的精神，在這次國民大會之中，給國家樹立一個民主政治的基礎。我願意借用本月十七日大公報社評的幾句話，以作我這封信的結論：

「吾人衷心祈禱黨國領袖，宏其襟度，堅其定見，以開放政權為鞏固政權之賢明手段，領導國家入於新階段。」

二十六年四月二十日於上海。

(附錄)苦悶中的六年

——一個南方青年的自由

沈·起·煒·

潛伏在軟綿綿的江南，遙望北國的兄弟姊妹們，憑着一片眞純的赤誠，爲國家造成精神上的萬里長城，眞令人興奮鼓舞；更自感慚愧，爲什麼我們南方的青年消沈無聲呢？可是別說了北國青年鬧政爭的激烈，狹隘的宗派觀念竟使許多優秀的知識份子，對國事作謬誤萬分的認識，以致派別分歧，自相爭鬥，不覺又爲之嘆息，又自感幸在南方，遠離政爭的漩渦，不會被捲將進去，作無益的犧牲。

雖則如此，南北青年所遇的環境畢竟大同小異。將近六年的國難同樣刺痛了我們的心；九一八，嫩江之戰，淞滬之戰，熱河長城之戰，察北冀東，華北自治的要求，這些奇恥大辱，那個中國的兒女不作此可忍孰不可忍之想！過去國內的政治環境正像漫漫的長夜，使人都對於現狀起憎惡不滿之念。憤恨，絕望和反抗，誰都企望打開沈悶的局面，爲祖國尋求新出路！青年人思想的偏激，正是這種情勢的產物。就是我們南方的青年，就是我自己，也何嘗不在內心中作過左右的紛爭，頭腦中充滿過偏激危險的思想！數

年來當局對於我們顯然缺少良好的指導，更缺少機會讓人民明白政策的用意。青年們只能於黑暗裏摸索着，聽從謬誤危險的指示，一步步陷入深淵裏去。

幸而今日是比較可以心平氣和地檢討過去的時光，社會上有一種企圖以合理方法解決青年問題的空氣。我打算不作抽象的分析，具體地一訴六年來的苦悶，將一個有救亡決心，熱愛自由，毫無宗派的易於激動的年青人，怎樣地摸索思想，如何苦悶絕望的經過和盤托出，也許於本問題的解決，不無些微益處吧。

民國二十年的初秋，自己正是個大學校的「新鮮人」Prashman，同伴們的心頭全部輕快地裝載着幸福，臉上洋溢着歡笑。可是那意外的事變一下子把我們打擊得呆若木雞，趕走了所有的快樂。我此刻還分明記得在那閒光線略嫌黯淡的閱報室裏，黑壓壓地擠在報紙旁邊的人堆，大家懷着窒息似的心情讀那大號字的標題，焦灼的目光緊射住紙張，似乎從那後面會發現什麼解決的方案似的。抬起頭噓了口氣，我定了定神，希望所看到的只是惡夢中的幻象，可是那是無可疑慮的現實呀！

我們將怎樣呢？我們有的是百十架的飛機，風燭殘年的又破又小的軍艦，一二百萬號令不一，器械惡劣的陸軍，封建割據的局面，民窮財盡的社會；憑着這點力量去和強大的鄰國爭一日之長，我們當時

誰不知道[illegible]然而那是片多可愛的土地，在那裏我們寄託了多少的希望，更熟知這個寶庫會使敵人具備莫可搖撼的力量。我們絕望地想着：莫非這個民族的喪鐘響了，除了率四萬萬人以身殉之，還有什麼路可以走得！再說，讓我們含垢忍辱，埋首苦幹，待到羽毛豐滿，實力充沛之時，再光復故物。這是種太老了的說法，我們已經聽過多少次了。每受一次嚴重的刺激，我們總得聽一番。錯嗎？誰說的，這正是絕對的真理！可是，可是以前準備的成績在那兒呢？

循環不息的瘋狂的內戰，水深火熱的黑暗的政治，永遠是那樣的一套！十年生聚，十年教訓，只是過去執政者蒙混民衆的口頭禪。在慘酷的現實的壓迫下，我們不由的警覺：再來十年，只怕也不會勝於今日罷！與其呆呆地等候宰生的宰割，何如拚死一戰，還多少有點兒死裏逃生的希望。記起了歷史上一些可歌可泣的事蹟，更鼓舞起青年人戰鬥的熱情，幻想着侵略者踏着拿破崙征俄的覆轍，不可挽回地在中國毀滅敗亡。

燃燒似沸熱的血，從四面八方把青年人趕向首都，喊出對侵略者宣戰的要求。我們認為只有這一紙宣戰的命令，方能造成團結統一的國家，也就能使全國的軍民一致抗戰，也就能從血花裏迸出中國的新生命。我又分明地記起當日的情景。當鵠候於蘇州車站半天以後，想望中的西去的列車依然無蹤

影，只扣下了一列東去的空鐵篷車。大夥兒搭這車到上海，和那裏的學生一同進京，於是我踏上露頂的車廂，在繁星密佈的夜間，穿過江南的原野東去。在崑山，遇到快將開出的請願列車，當我們循着鐵橋換車時，從那邊車廂中一個洪大焦燥的聲音向我們喊着：「上南京請願去！」聽得這呼聲，我頓然自負起來，激昂起來，覺得全中國的生命都抓在我們的掌握中了！我和我的同伴們前進，正像大將軍統率着部隊向敵人出擊，滿懷都是興奮和緊張。

我們只在軍校禮堂中聽取了蔣先生的一番演說。後來知道繼我們而來的受到鞭打和驅逐。青年人把滿懷的熱情換得如此的待遇，眼看着革命的政府把青年看作搗亂者，不禁對於政府起了强烈的反感。也許僅有混在青年羣中的反政府派，可是單純地爲國奔走的熱誠青年畢竟是多數，如今每人都感到了冷淡和壓迫，環境壓迫我的思想漸漸左轉。再加上當時依賴國聯的軟弱外交，黑龍江省馬占山氏孤軍的苦戰，錦州前線的自動退却，我懷疑着政府，大家懷疑着政府。這分明是個媚敵求榮，無意恢復的小朝廷；我和我的同伴們無不這樣地想着。

環境驅使着我，以悲壯慷慨的心情，憤恨政府的意旨，開始去研究解剖社會環境和國際問題。我看見那些害人的軍閥官僚資本家，驅使牛馬般的民衆向我們進攻，好裝滿他們的肥大的錢囊，造成他們

的豐功偉績，而民衆呢，只分享到死亡和貧窮。我又看透了中國的賣國者，出賣了民衆的生命財產，以換取敵人口中的唾餘。於是我和我的同伴想起來了：那似乎永遠不打算抗戰的政府，或許竟熱中於那些唾餘罷！對於執政者的猜忌和憎恨，又深了一層。我堅決地認爲中日的大衆應得一致起來，擺脫自己的枷鎖，推倒目前的統治者。如此地，我的思想益發偏激了。

一二八的時期，我密切地注視事態的發展。兵士，農工，小販，學生，各種各樣的人物興奮地在前線或後方工作。可是租界上喚不醒的金迷紙醉；有幾位富人延請高僧高道，日夜打醮以祈求和平；更聽說一些商界聞人，曾於戰前請求軍部不抵抗，以免自己受到損失。看到這些自私者的醜態，使我感覺到只有無產者的熱忱是可愛的，於是我更想到他們過的是獸類似的饑寒交迫的生活，燃燒起無限的同情。民國二十一年二月十六日的日記上，我寫着：「受剝削的羣衆在我的心頭作怪。」十九日，我又寫：「三萬萬以上的農工過着獸類似的生活，而不知反抗，不起來把剝削他們的一階級打倒。他們是朦朧的；我要以獅吼聲，來喚醒這些可愛可憐的人們！」從心的深處，我作了如此的決意：把自己獻給於革命罷！

沒有多時，我的自由主義的傾向開始徹底的抵抗。我想到法國革命和俄國革命中一些慘酷的場面，階級爭鬥的殘暴，遠離平等主義的立場的無產階級獨裁。我們生於這些史實學說之後的人，難道還

不打算找一條和平途徑麼？是的，偉大的孫中山先生不是就努力於開闢這條途徑的麼？為什麼我不預備跟從他的啓示呢？可是我不信任國民黨，不信任政府；為着國家，我忍痛把自由主義打了個大大的折扣，對共產主義表示同情。這樣的，我不願意左傾，偏在我的思想上抹了濃厚的赤色。

戰後回到了學校，平靜的生活讓自由主義漸次抬頭。我怕看見大革命中無情屠殺，也明白國家的元氣實在受不了過度的摧殘，誠心地希望現狀的改善，中山先生遺教的兌現。可是五年以前，我覺得那種希望不過是夢想而已。我怕看見客觀的現實；黯淡的政治，軟弱的外交，使我害怕地想：大革命是逃不了的。我害怕地打算避開現實，鑽到故紙堆裏研究平日最愛的文學。然而二十一年秋季一個明朗高爽的日子，我在文學史的教室中，猛然想起戎馬倉皇的時代，多難多患的國家，我居然還有高談南北曲的演變等的閒暇，不打算學習點更有益於國家的科學，竟有點神明內疚。這點不安逼迫我改行去讀社會學。絕望於現狀，無可奈何地摸索着救國的途徑。

偶然地聽見「現代學生」雜誌的徵文題：「我們今後應該怎樣對付日本？」我靜悄悄地坐在書桌前，自思如此政府，如此國勢，那裏有什麼却敵妙計。然而我畢竟提起了筆，咀咒了一番政府的軟弱，否定了在現狀下準備的可能，主張發動全民族的抗戰，組織民衆，武裝民衆，以大衆的武力為基礎，去作長

期的，艱難的反日民族戰。這篇文章後來獲得了首獎，發表在二卷五號的「現代學生」上。如今想起，總覺得那是何等空虛可怕的方案，組織民衆和武裝民衆，誰去開始這種工作呢？怎樣去開始工作呢？那種孤注一擲的無條件的抗戰，將把中國毀壞到什麼程度呢？政令軍令不一的問題，將怎樣去解決呢？我以及當時多數的青年誰也不願意考慮這些「枝節」。我們有的是一些標語和口號，把發動抗戰當作呼吸空氣一樣輕而易舉。我們以滿懷熱情，向着自以爲是正當的道路邁進，不信任政府有抗日的決心，不信任政府能統一全國，更不相信政府在磨礪以須。除以武力來解決學潮，壓迫思想以外，政府究竟是否在做抗敵的準備工作，我們是一無所知的呀！

二十三年的開始，中央表示對日軍攻擊熱河，將全力抵抗，這使我對於政府發生了些新希望。眞的，對於一個犧牲了空前的代價造成的粗具規模的中央政府，如果眞能領導民衆，保衛國土，又有誰願意捨之他圖？可是七天的戰事，輕易地失陷了固如金湯的熱河。轟轟烈烈的長城戰役又以塘沽協定獲得了虎頭蛇尾的結果。政府雖聲明只是暫時避免戰事之衝突。可是我們絕不相信政府有捲土重來的準備，只以爲這正是苟安度日的表現，充分懷疑談判含有政治的意味。熱情的年青人簡直徹頭徹尾地對於國民黨和政府失望了。記得一位我素所欽佩的女同學，讀了我爲黨義課寫的應制式的關於民衆運

動的文章後，很鋒利地詰問我：「難道你以爲國民黨還能夠領導民衆麼？」這是那時候頭腦清明，思想進步的知識青年共同的感覺。我十二分不願意作如此想，可是也不得不如此想了。

閩變敉平的迅速，表示出南京政府統治全國的力量，那確是民國成立以來所未有的。這樣繼續下去，也許有完成統一的希望罷，我又暗暗地作樂觀之念。可是國難依然清清楚楚地在我的眼前。對於外侮，政府究竟有無抗戰的誠意呢？究竟在準備沒有呢？我心中老存着這不可解的疑團。我們要的不單是一個統一的國家，而且要一個對外抗戰的國家，對內傾向民主發展民生的國家。中央政府如果不能負起這責任，爲了國家，我不能不對之抱反感。

再說，反政府的心理向爲救國志士的傳統態度。從一八四〇年以來，政府永遠對外屈服，喪權辱國；事變以後，又永遠是醉生夢死，苟且度日。因此，青年老覺得政府不足以有爲，要救國，非推翻了他另起爐灶不可。我們存了這種先入爲主的見解來看國民政府，只看見些不斷的內戰；失了東三省，又添上熱河察北；上海停戰協定，更加上塘沽協定；於是我們認定這仍是無恥沒用的東西。雖則有時也想：也許這無非是暫時忍耐的手段，總有一天，南京會雄獅似的吼起來，然而我又詰問自己道：如果這樣的話，那麼中央做了些培養國力的工作不曾呢？那麼中央對於急燥熱情的知識分子，爲什麼不加愛護而一味以槍

失來壓迫呢？想了這些問題，我又對政府失望了。

政府對於所做的工作成績，一向忌於公開，使我們永遠不信確在培養國力。政府對於稍稍急進的人民，總是加以反動的頭銜，使我們永遠以爲執政者是人民的死對頭，而與敵人聲氣相應。人民與政府的隔膜既增長了對於執政者的憎恨；政府對於人民之猜疑越發強調了反感。知識份子無不知中國應當有強固統一的中央政府，以負起救亡建國的重責，但幾乎公認眼前這政府沒有希望。傳統的反政府心理，客觀環境的惡劣，亡國禍機的緊迫，種種都令人絕望於現狀，在黑暗中摸索着前途。於是我們危險地想着：反政府黨總是好的。眼前又有一個突飛猛進的蘇聯作榜樣，一般青年思想的左傾簡直是不可挽回的趨勢。

我怕看見浪費國力的大革命，而始終感覺那是避免不了的。於是社會上又有一些人爲着與左傾思想對抗起見，開始鼓吹着獨裁。於是我們肯定地想：執政者一定是在打算步墨索里尼希特勒的後塵了。自由主義的傾向反對這傾向，左傾思想更反對這傾向。誰打算扶植這勢力以企圖壓倒左派，更刺激了左派以及自由主義者的反感；更擴大當局與人民間的距離。

青年的心裏盡是憤恨，盡是反抗的決心，盡是國家危機的陰影。狂熱的情感指揮着我們全部的動

作。我們感覺到必須立即動作，立即反政府，立即對日宣戰。我們痛感到不能再費時間去修養自己，去讀繁複的書，去平心靜氣檢討自己的思想行動。一些口號標語，一些富有刺激性的宣傳文字，這或者竟是我們對於文化的全部需要了。就是這樣，無數青年的思想，單純化了，公式化了，被一股狂熱捲向前去了。

幸而我那平靜的環境，強烈的自由主義的傾向，容許我常常思考。我那日滋月長的對於讀歷史的興味，使我看到多少懆急無知的執政者，輕於一決，而遇到不可挽回的覆亡；也看見多少興國英雄，無不經過忍耐屈辱的準備。這種看法讓我慢慢地懷疑立即背城一決的價值。可是我依然消釋不了對於政府的懷疑。真正使我以及許多人漸漸同情於政府的力量，是二十四年時日本方面發散出來的反蔣的聲浪。這使我們明白政府並不該死，的確是願意抗日的。於是我開始以同情的態度觀察一切，感覺到中央確是勵精圖治，秣馬厲兵。最近二年以來，赤匪的收復，西南事件以至陝變的和平解決，國內外輿論的改善，無論友敵都稱讚中國統一的完成。外交之轉趨強硬，博得了多數人對於中央的擁護，這種態度充分地表現於陝變以後。共產黨的願意放棄軍事對抗，更顯示國人都有各捨成見，共同救亡的決心。日本陸軍省力言中國陸軍實力的增進，愈足見國防的逐漸充實，而超越一切以招致國民好感的舉動，無疑為綏遠的光榮的抗戰。綏戰以前，我鑑於熱河之役，頗恐又見雷大雨小的結果，心中十分惴恐。可是百靈

廟的克復，粉碎了日本西進政策，一般國民皆與最高軍事當局同有此爲民族復興起點之感。爲了這成績，陝變後百分之九十九的國民方會熱烈地擁護中樞，否則，那裏會有如此舉國一致的表現！

這種擁護中央的國民心理，絕不是封鎖言論勒令停刊，捕殺異己，提倡讀經一類事情所能造成的。這完全是中央強硬的外交，眞正的備戰，統一的完成所招致的。只有這種貨眞價實的成績能使政府的地位鞏固，能使反對派自然而然銷聲匿跡。四萬萬個阿斗畢竟會做最高的公平的裁判。

然而這一些雲霧的化消，並沒有把整個的中國問題解決；這減少了我的苦悶，可是並沒有把他消滅。我們太久沒有一個統一的政府，所以今日以此自喜。我們太久沒有對外取強硬的態度，所以今日也以此欣慰。我們太久不能消除成見以一致努力，所以今日滿心歡喜。但是同時我們太久沒有很好的政府，對之總存憂慮。東北故土未復，人民生活尚未改進，政治距民主尚遠，這些人民厭惡政府的根芽猶在。我之同情和擁護現政府，因爲他有強大的能力，以促使這些目標實現；並不認爲其已完成建國大業。如果政府以今日的成績自滿，便不啻自己毀壞其前途。我們愛護領袖因爲他在領導人民前進；如果他不從實際上作救國救民的事業，而打算使人歌功頌德，一定會弄得怨聲載道。我們所說舉國一致，並不是主張以槍尖威脅人民非如此想不可，那只會引起反感的；而是主張舉國一致地向建國救亡的大目標

邁進。今日的政府應當明白；幾年來壓迫左傾思想，除强化青年反政府的心理以外，實在沒有什麼別的成績。而關係方面之扶植右傾勢力，使多數青年認爲這批右傾者皆急於功利，缺乏正義感，萬分嫌惡。非但沒有收到預期的結果，反使一些中間份子也向左轉了。我的一位朋友對我說：「我不敢想，我一想就左傾了！」我們這些中間份子的態度，實在是值得注意的。

中央政府絕對不必怕什麼人民陣線，共產黨等組織；你能救國，人民自然會擁護你；你要賣國，四萬萬個阿斗都會變成你的敵人。開放思想，開放言論，努力做你的工作，誰想破壞，阿斗們會加以制裁的。如果丢了這樣的大路不走，整天打算統一思想，剷除異己，這就是黑暗的專制政治，人民又要對你失望的。雖則許多青年還迷戀着公式，口號與標語；然而當你的成績日積月累地多起來時，他們會知所選擇的。如果還有人執迷不醒，阿斗們會處罰於他們的。用槍尖威脅，用右傾份子來對抗，用統一思想來恐嚇青年人的感情和血液將更趨狂熱，而永遠使無數優秀青年不能與政府合作。這正是自己抵銷國力的再笨也沒有的舉動，我們不要再錯下去罷！

我們青年自己也實在需要反省。我們自以爲思想前進，實則走入了狹隘的宗派觀念。我們主張科學地研究社會，其實只搬來了幾條公式。我自己就懷疑，爲什麼這些開口客觀，閉口科學的前進思想家

的理論，往往非常的武斷和抹殺一切呢？可是我不敢異議，因爲據說那正是眞理呀！這種淺薄狹隘的見解，現在應得拋棄了。我們應當多用理智，於這等口號標語宣傳文字以外，多求學識，充實自身，那麽以後也許不致盲無頭緒跟在人家後面就走。我們也得明白，我們的目的在救國建國，政府不肯這樣做，應當攻擊。現在政府着手做了，應當擁護。大目標既已一致，小處不能盡如人意，只可善意地批評，督促。以反政府爲思想進步的那種心理，讓他永作過去的陳跡罷。

最後，我再鄭重地說：希望我們的政府永遠對外強硬，對內寬容。惟有這樣做法，政府的地位方能鞏固；青年的煩悶纔能消滅；國家的前途也方能光明。我自己在煩悶中度過了大學生活，又度過了兩年愁居生活，許多應當用來修養求學的時光都爲焦灼的憂慮輕輕地浪費完了；只希望以後這種憂慮永遠不再得到出現的機會罷！

如何建立太平洋的新秩序

據本月二日路透社倫敦電報告：泰晤士報星期刊外交訪員探悉，日本刻正在重大努力，以期恢復英日在遠東之合作。其發動來自日本，其方案包括以下數項：（一）日本保證中國土地之完整。（二）英國承認日本在華北之特殊經濟與軍事策略上利益，但滿洲國之承認並不爲主要條件。（三）英日美法以債欵借與中國。（四）以文化社團之發展，增進中日友誼云云。這個消息自極引起各方的注意。嗣據英國外交副大臣在下議院答覆議員的質問，據稱，「近數月來，曾與日本駐英大使吉田茂作若干次非正式談話，以期改善英日一般關係。」英日談判，既證實確有其事，從目前形勢上觀察，也可確信此事係由日本發動，則此事的發展，不僅直接涉及中國，且將整個觸及太平洋國際秩序的問題。我願乘此機會，從英日兩國在華地位的演變及中國將來在太平洋國際關係中的地位，進而推論到如何建立太平洋的新秩序。對此次英日談判可能的發展及其意義，作一個比較遠大的討論，敬請世人注意。

英日兩國在歷史上曾有二十年的同盟關係。在此期間，英國在遠東結交了一個與國，幫她看守住東方的利益，日本則形成了一個東方霸權者。這個同盟條約是在一九二二年華盛頓會議席上消滅了，而歷史的根株却還遺留於英日兩國人的腦中。日本人士在近十數年中，每當國際問題苦悶之時，輒起謳歌英日同盟之聲，甚至憧憬英日同盟的復活。在英國方面，比較保守些的人物，也多注意於對日妥協。譬如現任首相包爾溫及財相張伯倫兩氏，便是日本人士認爲可以主持英日妥協的人物。但自九一八以來，日本一手戳破華盛頓會議以來的太平洋上的國際秩序，單就英日關係論，英國在東方的殖民地的安全感受威脅，在華利益尤其感到動搖的危險。她在冀東的投資事業很大，整個爲日本的鐵爪所籠罩，從這個漏洞裏流出來的走私狂潮，幾乎整個淹沒了她在北中國的商業。再看「東亞門羅主義」的氣燄，英國是被日本拒出中國的門外了。英國對於在東方的利益是不能放棄的。但是她將如何保持她的東方利益呢？國際聯盟及九國公約既已不能範疇日本，自己又不願武力爭霸，便只有與日本謀得妥協了。在一九三四年，英國曾派遣一「滿洲」視察團，一部分政治學者甚至縱論放棄國聯所決議的不承認「滿洲國」的原則。以後英國財政顧問李滋羅斯爵士的東來，是英國人公認爲對付遠東問題最有力的一個辦法了，而李氏最初的用意仍在取得對日的妥協。他曾勸中國政府承認「滿洲國」，本爲

中國接受，他兩次到日本，均碰了日本軍部的硬釘子。自此英國對於東方問題纔有進一步的認識，知道在日本迷信武力萬能的時候，無法同日本謀得正面的妥協。這個認識，對於東方大局是很有用的。她覺悟要使東方安寧，並保持以至發展她的東方利益，惟有在中國國家地位穩固的情況之下纔能做到。於是她同情了中國的自力更生運動，並在精神及物質上予中國這種運動以援助。英國自已也在東方開始佈置比較可以對日本放心的軍備。在最近兩年的努力之下，中國在自力更生的途上出現了一個新興的統一局面，英國也完成了新加坡海軍根據地，並進行香港的防禦計劃。現在太平洋已開始步入無條約時代，環繞太平洋的許多國家，因為担心日本的衝撞，都在設防禦，整軍備。日本軍人對於他們的武力是有自信力的，他們為着發展更大的雄心，又定下一個六年軍事計劃。但是旁人也並不敢落後，當日本正為她的三十萬萬圓大預算掙扎時，俄法英美也通過龐大的軍事預算，尤其英國，不動聲色，一下便通過一個四萬萬鎊的軍事預算，使世人不禁發生一種驚異之感。基於這個認識的努力，英國已得到相當的成功。在這個局勢之下，日本軍人或已得到一點認識，武力獨霸的局面非但並未穩固，且難於形成。這五年多的武力獨霸既逼出來外面勢力的抬頭，同時並加深了內在的困難。外受形勢局限，內遭輿論責難，日本政府應該換一個做法了。就在這個局面之下，佐藤外交上台了，它一面對中國唱調整提攜，

一面想在國際上找一條反孤立的和平出路。這是這次英日談判的由來。

我們揣想日本現在頗悔當初對李滋羅斯深閉固拒的不聰明，所以掉轉頭來向英國移樽就教。英國的傳統政策，天然的帶有妥協色彩，對於日本的前來請教，自將予以歡迎。根據這兩點觀察英日談判將有相當的開展，甚至有達到妥協的可能。

英日談判的主要內容，大勢判斷當有以下兩點：（一）海軍及太平洋設防問題；（二）對華問題。關於第一點，海軍的無限度競爭，在目前日本雖尚有此力量，長久的支持下去，將非日本的財力所能勝。在這一點上，日本頗有欲向英國對於太平洋設防及海軍問題謀得妥協的可能。太平洋問題的中心在中國，所以中國問題也是必然觸及的。

關於中國問題，英日雙方雖皆聲明尚未提出任何具體建議，然就二日路透電所報告的四個項目看來，頗近真相。第一項所謂「日本保證中國土地之完整」，已是一句歷史的空話，無論在文字及精神上皆不能發現絲毫的誠意。第二項「英國承認日本在華北之特殊經濟與軍事策略上利益……」則不啻英日間來一個「蘭辛石井協定」，實質上就是勢力範圍的復活。第三項「英日美法以債款借與中國」，如以共同方式，便是一個新新四國銀團。二三兩項，前者是分裂，後者是壟斷，都是違反中國的利

益而非中國所能承認的。看英國自九一八以來在華北的消極態度冀東變色了，她便準備出賣開灤煤礦，在塘沽協定前後華北的詭譎風雲中，她甚至準備退出華北。在她的傳統妥協性上，我們眞不敢保險她不拖廉價主義，在走私問題得一個解決，她的固有利益得到日本保證時，便與日本妥協了。在這一點上，我們願意申明一下中國的立場。中國對於日本的覓取和平出路及英國對於東方問題的好意關切，都願表示懇切的同情及歡迎。但若涉及中國的利益及立場，必須徵得中國的同意並參加，不能由英日兩國做片面的妥協。若勢力範圍式的分割，國際銀團式的壟斷，中國必反對到底。

× × × ×

五國海軍公約已由日本通告滿期廢棄，太平洋四國協定業已滿期，遠東九國公約也實際被日本撕毀，華盛頓會議所建立的太平洋和平秩序業已不存；自今年起太平洋的國際關係開始進入無約時代。在太平洋無約時代，西太平洋上蹲着一隻負嵎的猛虎，大家將怎樣維持生存的安全呢？一個很自然的趨勢，便是大家各在自已的門前設備防虎的工事。在這個趨勢下，我們看見蘇俄增強了西伯利亞北滿間的國防，英國完成了新加坡築港及香港的防禦計劃，美國正進行着太平洋的防禦工事，沿太平洋的國家如澳洲紐西蘭荷屬東印度等都在強化軍備，在這一環中，中國也在新的覺悟下，走上自力圖存

的路。在大家分頭設防中，便自然形成一個軍事的新均勢。胡適之先生在第一三〇號「獨立評論」發表的「日本霸權的衰落與太平洋的國際新形勢」一文中指出這個新均勢可以引領我們走上世界第二次大戰爭，但同時指出：

　　如果世間還有遠見的政治家，他們一定可以從這個新均勢裏看出一線和平的新曙光，看出一個「國際新秩序」的新礎石。他們應該可以明白，這一羣新興勢力正可以用來建立一個太平洋區域的「集體安全」的和平新機構，在那個新機構裏，蘇聯，美國，英國（和她的太平洋上屬國，和中國日本都應該平等的參加，共同的商榷解決太平洋與世界的安全和平。有許多問題，彼此不能單獨的解決的，在那個國際新機構裏，應該比較容易有尋得解決的可能。

我同意胡先生的看法，這看法絕非幻想，有被有遠見的政治家加以考慮的可能。

　　目前的英日談判，假使牠的內容涉及太平洋，海軍及中國問題，不應該，也不可能由英日兩國成立單獨的妥協。一般的，英國應與美國等取得合作，涉及中國的，英國在道義及實際效果上，均應知會中國，取得中國的同意並參加。從這一個基點上推論，我認爲現在的英日談判，應該，也可以發展成爲一個類似太平洋和平會議性質的國際會議。在這個會議裏，英美俄法中日及與太平洋有關係的其他國家都

應該平等的參加，共同商討建立一個太平洋和平新秩序。

這幾年來太平洋的變態形勢是由日本造成的，現在如要重新建立太平洋的新秩序，主要的關鍵還要看日本是否有充分的覺悟而定。日本如欲重返正常的國際軌道，做建立太平洋新秩序的一份子，首須覺醒武力獨霸的迷夢，放棄所謂「東亞門羅主義」，一切優越感及支配慾都應該從觀念上洗刷掉，所謂「東亞安定力」一個名詞也應該修正爲「東亞安定力的一部分」。在這個前提下，大家纔能從容考慮太平洋國際問題及中日關係。我在「東亞幸福之途徑」一文中曾說：「日本放棄征服中國的野心，不妨礙中國復興，進而與中國做和平攜手，將解消日本內部的一切矛盾，並安定東亞大局，這是東亞幸福的途徑。」其實這不僅是東亞幸福的途徑，也是太平洋和平大局的一個主要的因素。

至於我們中國，在這個場合上，義應助成各國海軍問題及太平洋設防等問題的協調；關於中國本身的國際關係問題，我們應該絕對立於平等負責的地位，有取必有予，不僅享權利，更要盡義務。今後世界上儘管有一九二二年華盛頓會議式的國際會議的召集，但是我們絕不幻想再來一個九國遠東公約式的國際公約。我們的領土完整讓旁人來担保，太傷我們國家的尊榮了，我們應該認爲那是我們國家的恥辱。日本雖將九國公約撕毀，在精神上，我們也大可不必把牠重新裱糊起來。

最後，我願意鄭重聲明一點，建立太平洋的新秩序，在目前的國際形勢下有這種可能。太平洋的國際形勢可以導引日本走上這條路，但最後的關鍵仍繫於日本的覺悟。擺在日本面前的有兩條路：一條是覺醒武力獨霸的迷夢，大家共同和平攜手，建立太平洋的新秩序；另一條便是繼續攀力主義，給太平洋放一把大火。在這分歧點上，我們中國雖然義應促成國際關係的和平安定，但要立在一個堅實基礎上，而不可空做和平的幻想。

日本這個國家，現在正走着下坡的路，她可以基於自發的覺悟，在和平的大路上，解消她自己造成的國家艱難，但誰也不能保險她不繼續走錯誤的路徑，更加倒行逆施下去。我們對於日本本身的種種困難，不能做為我們中國的樂觀的材料。我曾屢次指出，在歷史上，每當日本社會組織發生破綻的時候，往往也就是中國受累的時候，攘外安內，是日本屢試屢驗的藥方，到她國家不得了的時候，她便向外衝。這是擺在我們身邊的大威脅。我們要想在國際關係中立足，首須準備下擋得住日本向外衝的力量。她武力衝出，我們便武力擋回。她繼續的衝，我們繼續的擋；她長久的衝，我們便長久的擋。我們要準備成和她晝夜不停「擋」兩年的力量。沒有這種決心和力量，在我們這方面，一切國際形勢皆將落空。

二十六年五月八日於上海。

六寄北方青年

諸位同學：

這是我寄給你們的第六封信。在這封信裏，我想和你們談談民主政治及各黨各派問題。

在我的第五封信發表後，我又接到許多讀者來信，從幾種不同的角度來責備我，批評我。江西星子縣丁先生給我來信，對我表示失望，因爲在我的「五寄北方青年」裏，對我發見以下幾點認識：（一）非國民黨員；（二）未履行公民宣誓，也就是還未取得一個中華民國公民的資格；（三）還未看過三民主義；（我鄭重聲明：三民主義我曾讀過幾遍，中山先生的其他著作及言論我也多少涉獵過，我認爲讀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及其言論是現代中華民國國民所必須盡的義務。）並說我那封信的影響是「破壞國家安全與統一。」天津呂洪基先生又寄來一篇長文，題爲「敲敲樂觀成見的門。」他說他願意放棄「悲觀成見，」贊同我那「不可挽救的樂觀成見，」但在國大法規修正之後，便可以從「樂觀成見」的大門裏把我拖出來。同時又在五月九日北平晨報上讀到于剛先生的「與王芸生先生談青

年政治思想」（想諸位也已看到）那篇文章是總括批評我以前五封信的，認爲我「對國民黨過分的辯護」了。這可見人們對於我的意見做着如何不同的了解，並存着如何不同的距離。

我這封信，不想從正面上答復各位對我賜教的先生，而是繼續說明我對於國家問題的意見，以求教於讀者諸君。

先談民主。Democracy 這個字，從希臘語源上，應該譯作「平民政治」，牠的定義亦可以此四字盡之。這個名詞及其運動，都發源於希臘，在歷史的演變上却形成不同解釋及方式。在大陸上是一種形態，在英國及美國又各有其不同的解釋。Woodrow Wilson 先生曾說過：

近代的德謨克拉西和羅馬或希臘時代的德謨克拉西是具着極不相同的形態，而牠們所根據的原則，更有天淵之別。近代的德謨克拉西的理論是權利平等，而不問血族和種別。牠以社會一般的福利作爲法律的歸趨與目的。牠並且宣稱，沒有一個階級或少數的貴族，無論他們的人數如何衆多，才具如何幹練，思想如何開明，能用足够的廣大眼光，或能充分的屏除偏見，以認清一個民族整個的需要，或是爲了大衆的利益而領導牠的趨向的。凡是製造法律或執行法律的人們的行爲，在每一步驟中，必須被統治者的同意，加以審核與決定。（Woodrow Wilson: The State）

威爾遜先生的解釋也是抽象的，我們所要的民主，究竟是那一種形態的呢？綜合時賢的論點，大都傾向於立憲的民選議會的代議制度。我也是贊成這種制度的，但在實現步驟上卻非一蹴而幾。胡適之先生常說民主政治是幼稚園的政治；但即使是幼稚生，也還須達到能走路會提小書包的年齡。民主思想及其運動，在我們中國的歷史太短淺了。我們還沒有以民主思想爲中心的公民教育，識字國民又那麼少，土豪劣紳軍閥官僚仍在支配包辦着我們的國家社會，這都是實行民主政治的先天的缺點。我主張中國實行民主政治，但在步驟上卻須逐漸達到。我在「再寄北方青年」中主張召開國民大會時說：「經過這個階梯，我們的政治可以更民主化一些。在一個比較民主化的政治局面下，可望團結全國力量以担當建國的任務了。」這字句中的「更……一些」和「比較……的」，都包含有「逐漸」的意思。這一點在了解我的主張上很重要。如了解我是主張逐漸推行民主政治的，便可明瞭我所說的「以國民黨爲中心，共產黨和大多數無黨無派的國民，共同督促並培植這個中心走向民主建國的大路」是一個顧到實際的逐漸辦法。這辦法雖不是立即實行多黨的議會政治，但在時間觀念上，與我的民主信仰並不矛盾。

我們應該鄭重的認淸一點，我們所要求的民主，是統一的，建設的；而不是分裂的，破壞的。我們現在

所需要的民主，是開明的統一。在開明統一的局面下，大家本着一個目標，共作建國的工作。在這個目標下，我主張國民黨開放政權，但絕不主張各黨各派共同分贓。

本此前提，我們可以談談各黨各派的問題了。

我認爲各黨各派都有參加建國工作的權利，但這裏所說的各黨各派，牠必須是擁護國家的統一及國家利益的。牠若是給國家增加離心力甚至出賣國家利益的，牠便沒有取得國民承認的資格。根據這個水準，我們可以冷靜的看看各黨各派。據說有一個極左派，在西安事變之後，他們主張倒蔣反共，甚至爲實現這個手段，聯×亦所不辭。這是比殷汝耕還兇的漢奸，還談什麼民主與黨派？還有一些黨派，他們雖有政治主張，而實際工作却在鼓動殘餘的封建勢力，加強地方的割據。這反統一的分裂運動，當然也不是我們所需要的。這種給國家增加離心力甚至出賣國家利益的所謂各黨各派，我們若把牠算入民主的成分，請問我們的民主政治將成一個什麼形狀？我希望各黨各派（自然國民黨及共產黨也在內）若要取得國民的重視和信任，須先自己檢討一下，把自己的立脚點弄得穩固些。我希望諸位同學也用這個尺度去衡量各黨各派。

諸位同學！我們國家的現狀，在內部還含醞着很大的危機。我們的統一局面是比從前進步了，但內

裏還殘存着封建渣滓。這些渣滓，我們希望能爲眞誠之火所熔化，同時也要小心牠們的膨脹與活躍。西安事變以來的國家情況，最進步的一點是共產黨的轉變，他們不乘國民黨之危，反而促進解消內戰的矛盾，推動和平統一的機運。這一點進步，是值得我們大書特書的，但在別方面的進步還有不足。我們應該眞誠的保持住這點進步，並彌補其他方面的不足。

最後，我還願意簡單的談談國家的教育政策及學生的政治運動問題。

我以爲國家對於中小學的教育，應予規劃統制，給中小學生一個基礎的國民教育及訓練，對於大學生則准其自由作思想上的研究，但不准其加入各種政黨（國民黨也非例外）。這樣一面給學生灌輸了時代的做人觀念及道德水準，同時不妨害其思想的自由。至於學生入黨之害，八年前我曾寫過一篇「學生不黨論」，痛切言之，茲錄如次：

中國政治經過長時間之混沌，因之反映於一切社會組織。浪漫的耗費與殘酷的犧牲，爲數十年來之普遍現象。雖云在耗費與犧牲之中，可以殺出一條血路，躋中國於康泰；然此種耗費與犧牲，必須爲有節制的，最低限度亦應保留以後之一脈生機，否則，狂殺猛拚以後，大家同歸於盡，尚何，民族與國家之有？若青年學生之供黨爭的犧牲，實浪費與殘酷之尤者也。青年學生之愛國熱情及其

政治慾，此吾人所最同情者，且皆日近來國民黨之成功，與此有密切關係，但吾人絕不敢贊同此爲健全的現象。蓋成年皆盲職，而使救國之事侵占青年求學光陰，揠苗助長，其損失爲何如者？此就純正之目的解釋之已屬不當；至若以青年學生爲黨派競爭之工具，演成慘烈之黨禍，實爲殘忍的愚舉，而自上民族自殺之路也。青年學生之入黨，實出於國民黨之獎掖也，此一枝生力軍，誠爲黨國出力不少，而其結果，造成無數的革命走卒，同時卻爲學術的低能兒。推而至極，必使全國國民變爲熱狂的破壞者，求一建設人材而不可得。其爲損失，何待贅言？馴至黨略一變，昔之忠勇同志，無一非可殺之暴徒。在軍閥政權下所葬送之青年學生，可勿論矣，若二年以來，粵桂湘鄂江浙各省，因反共而殺戮之青年學生，何止千萬，在黨言之，將何以自解？雖然，死者均有取死之道，而種其惡因者則爲黨。最近討桂之聲浪響遍全國，桂之被討，背叛中央，自爲重要罪狀，而所謂「假借清黨反共而殺戮忠實同志」者，亦爲其罪狀之一，此見諸中央之文字者。以是可知以往被刑戮之青年，即在黨的是非言，亦不少不明不白者。當年之該殺的叛徒，無意中變成屈死的同志。以是言之，則今日之負屈的同志，焉知其非此後之該殺的叛徒。「愛則加諸膝，惡則墜諸淵」，翻雲覆雨，或爲黨人之特長，其如國家前途之生機何？其如民族前途之生機何？概括言之，害已若此，至若共產黨之以青年學生爲原料

而製造殺人放火之暴徒者，更屬殘賊人道矣。學生黨爭之風，自軍事告一段落後，似已稍殺，然事實上之鬥爭，仍俯拾即是。北平學潮之波瀾重疊，及各種複雜現象，任何人皆不能斷定其無黨派的背景。放着書不讀，而惹風弄草，無論如何，當難得健全社會之同情。而黨的暗潮潛流於學生社會中，其非好的現象，即使吾人冒反動之嫌，亦必如此論斷。在玆革命政權之下，學術思想，早在無形戒嚴之中，其當否姑且不論，而在求學期中之學生，不禁其入黨，頗爲憾事。在近代立憲國家，多行軍人不黨制，所以防軍人供黨爭也。然此非一黨專政之事，尚不必據此以論中國問題，而學生不黨，則爲萬分切要之事。願各黨各派認淸民族生存之前提，共成此美德，尤望學生諸君自加覺悟，勿以歧途自誤，自害且害國也。（十八年四月三日天津商報社論）

學生參加黨派之爭，我是深知其況味的。我是過來人，我有許多朋友爲黨派流血了，尤可痛心的是多數青年人供黨派做撒豆成兵的資料，錯過讀書的光陰，變成學術的低能兒，這對於我們民族國家的損失太大了。當十五六年革命高潮時，我曾親眼看見一個初中學生，整年的不上課，而給黨充當傳書遞柬的「交通」。這樣的革命走卒，將來當然是文化的低能兒。這種情形，我認爲黨對於牠的青年「同志」太殘忍了。

「讀書與救國」的問題，人們對於牠的答覆好像雞生蛋或蛋生雞那樣費躊躇，我的答覆很簡單，便是「讀書第一」。讀書是學生的本分，政治運動則是偶然的觸發。我不反對學生參加政治運動，但要純真。像五四和一二九，在國家當前的大問題爆發的時候，青年學生起來做衛護祖國的吶喊，純潔真摯，那是萬分應該的。但一流於形式化，經常的做黨派鬥爭，那便墮入魔道了。像今年紀念五四時，北平新舊學聯竟大動其武，無論如何，是使人萬分傷心的。據報載，當時會場中有人高唱「馬德里保衛曲」，如實有其事，那就太費解了。請問親愛的同學們，你們願意我們的國家做西班牙第二嗎？這是我不敢也不忍，相信的。

二十六年五月十八日於上海。

（附錄）與王芸生先生談青年政治思想

于剛

芸生先生：

在國聞週報上先後讀過你五封寄北方青年的信，我感到十分的興奮和感動，青年思想苦悶達於極點的今日，我們很少得到一些先進們誠摯的批評和具體的指示，然而在你的信裏，我僥倖發現了你關懷國家民族的赤心和愛護青年鼓勵青年的善意，細讀這五封信，同時體味自己平日對於中國政治的意見，我發現了許多可貴的箴言，同時也不免引起一些疑問，因此把我的意見寫出請你加以指示。

我要提出的第一個要點是「抗日人民聯合戰綫」和「抗日的民族統一陣綫」的問題。二者都是現代政治上的一種術語或名詞，但二者是不同的，後者當然是指一個民族的全體，也卽是說包含了同一民族的各階層各黨派在內，但前者卻含有階級的意義，和歐洲「人民陣綫」的涵義一樣，所以二者不同。我覺得在中國目前，前一個名詞不適用，後一個卻應當成爲政治上的基本原則。因爲日本帝國主義者對于中國的侵略和進攻，其所加于中國的痛苦和損失，是遍及各階級各黨派的，所以中國的任

何階級任何黨派都應該合力抗日以解除本身的束縛，才能談到某一階級或某一黨派的利益。這個很簡單的道理，就成了「抗日的民族統一陣綫」的基礎。至於「抗日的民族統一陣線」一詞，換句普通話來說，就是「集合中華民族全部的力量來抗日」，我覺得四萬萬五千萬個中國人，除非他甘心作漢奸和亡國奴，是決不會對這句話加以否定的。因此我主張我們要站在國民的立場來擁護這個最高原則，只要我們大多數國民覺得它是對的，那麼就不用特別把它編成一個難懂的術語或名詞，也不用問它是從那一黨派所提出，更不必去顧慮它是騙己騙人的標語口號或衷心的主張。這是我的一個基本概念，對不對請先生批評。

其次談到「抗日」和「建國」的問題，你在第二封信裏，認爲「抗日」二字的本身是消極的，而我們積極的目的是「建國」，「建國的基礎在于政治上統一和經濟上的自給自存。」我覺得這種說法有再爲引伸的必要，第一：我認爲「建國」固然是我們的目的，但「抗日」却是達到這目的的先決條件，忽視了或取消了這先決條件，就不能謀得政治上的統一和經濟上的自給自存，因而也不能完成建國的基礎。關于政治上的統一，你曾特別提出華北和西北的特殊情形引起大家的注意，我想華北和西北的現狀，正說明了「抗日」是完成政治上統一的先決條件。以往由於政府的不抗日丟掉了東北

閩省，且不必提，「九一八」以後，政府如果有了「抗日」的決心，立志在不喪權不辱國的原則下積極完成對外抗戰的準備工作，那麼，也不至於用一紙塘沽協定造成了華北名存實亡的情形；政府如果能開誠佈公地接受共產黨六年前提出的國共合作的要求，停止自相殘殺的內戰，一致抗日，那麼，六年來因剿共而犧牲的生命財產，儘可以儲為抗日的力量，而三中全會以後的西北形勢，更不必等到發生過西安事變才形成。這些事實明白地告訴我們：要謀國內政治上的統一，必須以「抗日」為前提；反之，如果固守「先安內而後攘外」的政策，結果必使內不能安而外患日急。這是六年來血的教訓。至于經濟上的自給自存，當然應該如你所說的：「由國防工業的建設以推進民族工業」，但是要建國防工業和推進民族工業，也斷不能忽略了「抗日」的前提。佐藤外交所強調的中日經濟提攜，無疑問是進一步掌握中國經濟命脈的毒計。中國關稅不能徹底自主，走私偷運的惡浪，一天天緊張，國民經濟的藩籬已被拆毀得七零八落，如果國家整個的對外政策，不根本地走上「抗日」的道路，經濟上的自給自存也將成為夢想，所以我覺得要完成建國的基礎，必須以「抗日」為前提，不徹底加強抗日決心，則一切都談不到。其次：你在第三封信裏談到建國的意見：「以國民黨為中心，共產黨和大多數無黨無派的國民，共同督促並培植這個中心走向民主建國的大路，」在第五封信裏，你更說明「始終相信民主政治是

我們的建國通路」是的，我平日也始終相信，要使今日中國的政治走上軌道，就必須要實施民主政治。

我對於你所解釋的民主政治，却不能沒有疑問。我覺得民主政治的意思，顧名思義，應當以國民爲主體，而不應當以一個政黨做主體，世界上許多民主國家都是由人民選舉代表組成議會和內閣，至於有政黨立場的代表是要看他所屬政黨的綱領和主張是否合乎大多數國民的要求，然後才能決定他們競選的勝利或失敗，這樣的方式，將國民作國家的主體，將所有政黨置於平等的地位，才是眞正的民主政治。如果把公正而無成見的大多數國民擱在附屬的地位，而使一個政黨成爲全國政治的中心，這樣很可能的因爲一個政黨路線的錯誤或一個政黨領袖而斷送了整個國家的命運。國民黨有很長的光榮歷史，有雄厚的實力，在中國政治上始終的保有極大優勢的，我們國民希望這個有力的政黨，能够積極地負起領導「抗日」和「建國」的重責，我們國民應當時刻督促培植它，但正和先生批評馬華君對於共產黨的觀念一樣，我們也不必視國民黨是「天聖生哲，無往而不正確，」我們覺得國民黨過去有它的錯誤，將來也不能担保它永久不發生錯誤，因此我們要站在主人翁的立場，鞭策它勉勵它，不應當盲目的信賴，把我們國民自己應有的中心地位讓給它。因此，我覺得先生以國民黨爲中心的建國主張，與你對於民主政治的信念不大協調。基於這一點，很容易使人覺得你對於民主的要求不澈底，譬如

你在第五封信裏談到國民大會公民宣誓的問題，你對宣誓信仰三民主義發生躊躇。不錯，如果你所說的以國民黨爲建國中心，在黨治下的國家是「三民主義共和國」，黨治下的人民就應該是三民主義的信徒，不然就沒有公民的資格和權利，這問題該怎樣解決呢？是否如你在第二封信裏向國民黨和國民政府要求：「……確定召開國民大會的日期，並將以前的選舉法再考慮得進步一些，經過這個階梯，我們的政治可以更民主化一些……」，就能解決這個問題呢？你在第五封信裏雖然這樣鄭重聲明：「一黨專政不是最理想的辦法，當然我也不贊成由兩黨來包辦，雖然實際上國共兩黨之外，我們還很少其他有力量的政黨，但大多數無黨無派的國民是不容擱在政治圈外的。」但我總有點懷疑，以國民黨爲建國中心，其他政黨和無黨派的國民都來共同督促和培植這中心勢力，這種方法到底是「走上民主化的大路呢」？還是走上「一黨專政」的大路呢？建國是我們共同的目標，民主是建國的基本鐵則，在眞正的民主政治下，不僅不容把國民擱在政治圈外，而且應當讓國民成爲政治圈內的中心，不僅要培養一個健全的政黨，而且應當培養更多的政黨，國家愈民主，國民的意見愈被重視，同時政黨也愈多，要建立一個現代化的新中國，我認爲是不能忽略這些意見的，不知先生以爲怎樣？

復次我想談談中國共產黨的問題，你在前三封信裏，對於共產黨，始終抱着懷疑和諷刺的態度，這

當然是因爲寫在西安事變前後，事變的眞像無從考察，一種愛護國家的積憤和遷怒才形成這種態度的，但在第四封信裏，你却表現了十分的樂觀，認爲共產黨從這時候開始轉變了，第五封信裏，你更說明這種樂觀氣氛，「是爲了共產黨的轉變，尤其是爲了在這個轉變中所出現的思想上的國家路線。」但據現在一般人都已經知道了的事實，在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以後，共產黨就已經發表過一次宣言，要求停止內戰，訂立對內和平對外抗戰的協定，一九三五年八月一日，又發表過一篇組織抗日聯軍國防政府的宣言，同年十二月又發表了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綫的共產黨決議案和具體綱領。一九三六年八月又發表一封寄國民黨的長信，提出民主共和國和普選國會的要求。這些事實，雖然因爲國民黨不相信共產黨的話是否兌現已繼續施行了五次圍剿的政策以至沒有進一步表現在國民眼前，然而我們至少可以這樣說，共產黨對於國民黨政策轉變的開始，還遠在六年以前，這轉變的動機是予日本帝國主義者猛烈的侵略和中華民族危機的加深，而這一轉變所以能發生，斷不能缺乏一種愛國觀念的因素的。然而六年來的內戰，給予中國對日抗戰前途以莫大的傷害，我們冷靜地追究這內戰延續的原因，國民黨「安內而後攘外」的政策之錯誤，是無可諱言的事實。本來兩個政治主張不同的政黨，要在某一點上消解他們的對立而同走一條路，這是一件需要折衝的事，國共兩黨的再度合作，所以延緩

到今日才能逐步地實現，當然也有許多內在的複雜原因。然而在過去這個長的時期裏，人爲的力量，掩飾了共產黨對國民黨政策的轉變，隱藏了他們在思想上的愛國觀念的因素。一般人在平日的政治勢力和宣傳工作的影響下，突然聽到三中全會以後的事實，怎能不驚嘆爲一個奇蹟？我深信先生在第五封信裏所申述的自己的立場，你是「一個無黨無派的國民，大體上表同情于國民黨，」然而我總覺得你在前後五封信裏一貫的態度，對國民黨過分的辯護，對共產黨過分的苛求，我以爲我們同情一個政黨，就應該很理智地去批判它督促它，我們不要姑息它而失却自己純國民的態度。即如西安事變中共產黨的態度，根據天津大公報記者長江君的敍述，當然適乎與先生所想像的不同，再將三中全會以後共產黨的措置和二月十日共產黨給國民黨的電報裏所提各點對照一下，如蘇維埃政府改爲特區政府，紅軍改編受軍委會指揮，停止推翻國民政府的方針，改變對地主富農的土地政策等等，都表現出國共兩黨合作前途的光明。然而我們反不能忽略，在西安事變當中，「友邦」曾竭力策動國民黨內的親日份子積極進攻西安，以謀造成亡國的內戰，三中全會前後，「友邦」更勾結親日份子力謀破壞國內團結的形成，並挾制國人作激底淸共的呼籲，以謀延長中國的分裂，打破國共合作的局面。這些事實，到的確是「抗日」「建國」前途的暗礁，而需要我們國民用明快的眼光和有力的行動去擊破的。先生

同情于國民黨，對于國民黨的期望甚殷，對于怎樣促成國內澈底的團結，怎樣防止走向親日和分化的道路去，怎樣打擊一些親日份子和野心家的自殺政策，是更需要作一番有力的指導的。

前面所談的幾個問題，當然成爲今日北方青年甚至全中國青年政治思想衝突的集點，由于這些思想上的衝突，形成許多悲慘的分裂，直到今日還在鬧得不可開交。實在，北方青年現在迫切地需要展開一個新運動，而且這新運動已經醞釀了一個相當的時期，但是它的前途仍舊充塞着荊棘，到底誰擺佈下這些荊棘？客觀的事實，我想另寫一封信向你報告，今天我可以告訴你的是北方青年的政治思想，的確需要許多愛護青年的人們給以善意的指示，他們在艱苦的環境裏實地掙扎了一個長的時期，他們是都感到知識的饑荒和經驗的不够，然而他們從生活的教養裏的確是變得堅强了，他們並不如旁人所說的那樣「消沈」和「浮動」。一切愛護青年的人們，讓我們合力用眞理的火燄，去燒毀前途的荊棘！此祝筆健。

（廿六年五月九日北平晨報）

我們所望於北方青年者

凱 丰

北方青年們：

要寫「我們所望於北方青年者」的原因，不外下列三點：第一，北方是中國國防的前綫，北方是中國民族危機的焦點，北方的人民尤其是青年最直接的受到亡國的威脅和痛苦，日本的鐵蹄與漢奸的猙獰，交叉的踏在北方人民尤其是青年的背上；第二，北方青年的革命的傳統，成爲每次民族運動的發動者，由五四運動以後，一直到現在還保持他的發動者的地位；第三，不能不是因王芸生先生在今年的國聞週報上所發表的寄北方青年的信所引起的，而在這封信之後，又引起許多北方同學的反響，提出許多問題，因此不能不趁此機會，就王芸生先生和北方同學們所提出的問題而發表一點意見，並願與北方同學們趁此機會來討論今後在抗日救國問題上的任務。

雖然，所寫的只限於北方青年，並欲以此志願，同樣所望於全國青年者亦然。

北方青年民族解放運動發展的途徑

一

產生北方青年革命思想的原因，除了歷史上的革命傳統與北平向來是操中國文化的牛耳，這些不說外，我想最近這一次民族運動的發動，尤其是從一九三五年「一二九」以來，不能不是因爲日本侵入華北，給了北方青年掀起民族運動高潮的直接的客觀的原因。因爲國內一般的革命運動和國際的和平陣綫又更加刺激着和影響着北方青年思想的前進。北方青年中不少的中華民族的優秀份子和前進的教授熱心救國，更加堅定了北方青年在百折不回的堅苦中奮鬥，使北方青年的思想和行動，北方青年的民族解放運動，成爲中華民族解放運動中一個雄偉的先驅及支流。

從「一二九」後到西安事件以前，北方青年的民族解放運動，可以說一般的是在統一的一致的行動下進行着，經歷過「一二九」，「一二一六」的大示威，宣傳團到民間去的堅苦奮鬥，向華北軍警的耐心工作，對外的軍事演習等等，在這一時期中北方青年創造了許多寶貴的經驗和模範的工作方法。大體上這一時期是在全國前進思想界的影響和前進政黨的口號之下進行的。而在這一時期中的中心問題，則是「停止一切內戰一致抗日」。

但這並不是說在這一時期中，北方青年內部沒有鬥爭，北方青年本身沒有煩悶與矛盾。不是的，當然不是的。那時北方青年內部還有極少數的份子，雖然他們本人還是要「抗日」要「救國」的，可是站在錯誤的立場上，正如王永興先生所指出的：

「他們愛護政府是對的，但是他們常常是盲目的信賴，無批評不理智的崇拜與愛護，却是不對了。」

「他們對於北平市學生救國聯合會以及各校學生會無理智的攻擊，他們常常把共產黨三字加到一個熱情救國的頭上，他們在西安事件中持着武力討伐甚至剿滅西北各部隊的見解，他們對於政府許多錯誤的設施盲目的辯護，他們對於政府的領袖常常是神化的崇拜，他們也同樣的輕視不理甚至壓迫一般民衆一般青年公正的意志，他們總是辨不清事實，眼光太短，氣魄太小。」（國聞週報十四卷七期十四頁）

但是在那時他們的力量很小，不但不能制勝北方青年前進的思想，反而被前進思想所鉗制，北方青年運動是在與這種保守觀念的鬥爭中而勝利的發展起來的，使當時的青年運動不至分裂，而保持統一的一致的行動。

那時北方青年本身的煩悶與矛盾，即是由於當時政府方面對日的繼續退讓，對學生運動的壓迫中而發生的，因此有些青年覺得無出路，表示一時的消沉，這正如石琳先生的信中所寫的：

「在今日這種情況之下，現狀又不能改善，處處予人以失望，甚且變本加厲，青年忍無可忍，自然要果決的擔負起改造社會的使命了。這不僅是一個救亡的問題，而是拿救亡來做出發點，以期舊社會的迅速死滅，新世界的加速誕生。」「然而社會給我們的呢？除掉威脅壓迫，陰謀搗亂，從沒有過正當的指示，還說我們浮動，說我們怕讀書，說我們被人利用，我們還有什麼好說。有誰知道許多有為的青年，就在這種社會劊子手下，而失望，而消極，而頹廢，慘酷的被埋沒了呢？」

那時的北方青年運動正是反抗外來的壓迫，同時反對內部的煩悶消沉，在這種矛盾的解決中而使北方青年運動，在這一時期內螺旋式的向前進展。一直還是保持着它的統一的一致的行動。

從西安事件發生以後，北方的青年運動就開始了一個破綻！這個破綻是於北方的青年運動不利，也是於中華民族的解放事業不利的。即有所謂極「左派」與極右派的互相攻擊，互相排斥，正如王永興先生所指出的他們「在青年中是少數，」大多數青年「他們的態度及心理是一致的。」極「左派」堅持不主張釋放蔣介石先生，極右派則堅持主張武力討伐，這種破綻的發生，不應當責備一方面，而

應當責備雙方面，因為他們任何一方面的主張的勝利都是中華民族的損失，而是使日本「漁人得利」。極「左派」既不能代表共產黨的主張，因為共產黨在西安事件中堅持主張和平解決；我想極右派也不能完全代表國民黨整個立場，因為國民黨在西安事變中的大多數，尤其是開明的人士都主張和平解決。這只能是說明他們雙方的幼稚行動，正是表示青年的暴燥，而缺少閱歷世故，如果雙方面真是都以國家民族與人民的利益為重，則這種因幼稚行動而引起的誤會，自當容易化除，而使北方青年運動重歸於統一的一致的行動，我想他們之間也沒有理由不能不來化除這種誤會，因為今天國內和平統一已告初步成功，國內更大的政黨都能開始攜手合作，難道他們之間的誤會就不能化除嗎？如果他們還承認自己是一個青年的政治家，難道他們就沒有政治家的風度嗎？而且客觀的環境也非合作不可，難道華北的危機減輕了一點嗎？用光程先生在「最近學生界嚴重問題」的一文章說到「互相破壞，互相傾軋，互相毆打，」王永興先生的文章內說到甚至互相謾罵，你說他拿盧布，他說你拿法幣，這當然已經失去了政治家的風度，而變成了陰謀家和王婆罵街。政治家應當講道理，誰的道理對，誰就是對的，誰的道理不對，誰就是不對的，如果雙方的道理都不對，那末雙方都是不對的。據說又有新舊學聯的組織，互相對立，這種情形恰好只能拆散中國人民的團結，而於日本有利，或給某些下流的政客作為利用

的工具。應當在全國人民團結的基礎上，在國家民族與人民的利益上，而使北方青年運動在統一的一致的行動之下進行。

我想負有對於青年指導責任的人們，不應抹殺這種事實，也不應誇大這種事實，更不應挑起這種事實。王芸生先生在寄北方青年的信中，站在指導青年的地位，想引導北方青年走向團結，可是王先生在指導北方青年「團結禦侮」的方法上，還有許多欠妥的地位，值得商量的地方。王芸生先生鼓勵北方青年前進，說「我們現在只有覺得更奮發的，自然不該消沉；我們現在只有更積極的，自然不該失望。」（寄北方青年）這是很好的，正當的，必需的。但是必須指出怎樣去奮發，怎樣去積極的途徑。王先生想把北方青年運動內部發生的破綻，而單純的歸咎於共產黨的「標語口號所遺留下來的作用，」似乎「最初他是爲騙人的，結果必首先騙了自己。」我想共產黨是不怕自我批評的，不但黨內的自我批評，而且也歡迎人民對於共產黨的批評，只要這種批評不是詈罵，不管批評的本身有多少眞理，共產黨都是願意傾聽，考慮與接受的。共產黨在西安事件中堅持和平解決的方針，正是與北方青年中大多數的意見一致的，王先生也在「四寄北方青年」中徵引了長江先生「動盪西北大局」一文，我想王先生應當看到長江先生的全文，而且也應當看到長江先生「西北剪影」關於西安事變的敘述，長江先

生是西安事變後中國各大報記者第一個先到西安的，在他的論文中已有公正的批評，這是全國人士共知共曉的，而且事實也已明證是這樣。至於王先生徵引中共上海中央局的一張傳單（三寄北方青年）為證據，這又缺乏客觀的分析，上海的共產黨對西安事件從未有過任何文字的表示，而中共現在就根本無所謂「上海中央局。」也許有這種傳單為某方所偽造，因為共產黨到現在還不是合法的黨，對於這種偽造是無法負責，譬如最近天津日本特務機關所散發的冒牌共產黨的傳單，這是衆所週知，如果有不明事實者，以此而責罵共產黨，那又到何處去伸冤呢？

吳絳楓先生給王先生的信中（三寄北方青年）也已把共產黨對西安事件的事實說得很明白。吳先生的態度完全是客觀的，他的這封信的內容我是讚同的。我想王先生應當更客觀的來讀吳先生的信。

我要說這些話，並不是想抹殺在共產黨員中還有少數的個別的黨員還保有「左的」狹隘的宗派主義，這種傾向我們的黨傾其全力去克服，但我也毫無理由來把北方青年中極「左派」的份子來武斷說他們是共產黨或者是「受了騙。」以同樣的原因，我也毫無理由來把那些極右的份子，主張討伐的份子，說他們是受了日本的挑撥或者是受了日本的收買。我只能說他們雙方都是幼稚，正因為他

們是青年，而缺乏世故閱歷，而多於情感冲動。只有這樣才能把他們引導到「團結禦侮」的路上來，否則將使一方面跑到更遠的極端，或者使雙方面都向兩極端跑。這於北方的青年運動不利，這也是於中華民族不利。我完全同意王永興先生對大多數無成見的青年所提的號召：

「在北方青年混亂局面中，你們是挽狂瀾於既倒的中流砥柱，左派右派胡鬧固然錯了，你們看着事情壞了而不管是更錯了，你們的意見常是公正的，而你們又是多數，你們應該奮起，應該負責任，北方青年能否團結，關鍵就在你們。」

「兄弟鬩於牆，外禦共侮！北方青年哪！我們是中華民族的萬里長城，我們該自愛惜，該自珍重。」（北方青年的回響）

這是眞正的北方青年的回響，我們預祝這種回響成功！更望極「左的」青年，回頭與大多數站在一起前進！極右的青年則用力趕上去，北方青年運動在全國大的團結的之下，團結北方青年的自身！這就是北方青年運動發展的途徑。

二　在抗日救國的基礎上來團結

我們要北方青年自身的團結，而反對分裂，並不是沒有原則，也不是沒有目的。要是一個團結沒有原則沒有目的是辦不到的。北方青年的團結原則和目的就是爲着抗日救國。抗日救國是目前最積極的任務和工作，抗日救國是中國目前政治生活的中心問題，每個中國人民尤其是青年心目中最關切的問題。

北方青年團結的基礎就是抗日救國，這裏說到政府應當怎樣幫助青年團結和挽救青年的分裂，我完全同意用光程先生所提出的三點：第一，積極的衛國抗敵；第二，外交公開；第三，學生組織集會結社言論出版自由。（國聞週報十四卷四期十三頁）

但是王芸生先生對於北方青年的指導，却把青年最關切的抗日問題，作了不妥當的回答。當石琳先生在給王先生的信中着重的提出抗日問題時，王先生給抗日問題以如下的回答：

「抗日這個口號與對日不抵抗是相對的。抵抗是動物的本能，凡是動物對於橫暴的侵襲沒有不抵抗的。我以爲「抗日」這兩個字，它的本身的意義就是消極的，而且是有限制的，不能成爲一種政策，更不能成爲一種主義，我們根本問題是建國問題——建設一個獨立自由的現代的國家的問題。」（再寄北方青年）

王先生雖然在回答石琳的信中說到「這封信可代表一個青年觀念的典型，它有痛切的煩悶，純眞的情感，在憤懣中未曾失掉自信，」但是王先生却把青年最關切的「抗日問題」認爲是消極的，把目前最中心的抗日問題「認爲是枝葉的。」因爲王先生不能給青年最關切的問題給以妥當的解答，這樣不能不使青年發生失望，而使王先生的指導也難發生效力。

至於說到「抗日」與「建國」的關係，我們毫無理由來同意王先生的意見。「團結建國」的口號是王先生首先提出的，但是王先生把建國的程序顚倒了。因爲中國今天還是一個半殖民地的國家，首先受着日本侵略者滅亡中國的危機，要建國則必須先救國，如不進行抗日救國，則中國無法建國。王先生把對外的中心問題，轉移爲對內的建國問題，這是不適當的。田光程先生在論「如何建國」的文章內，有許多和平統一的卓見是可取的，但也沒有說明建國的先決條件在救國，中心的問題在抗日。大公報社論（二月二十五日）「今後的建國精神」一文內，對於國內和平統一的許多意見，也是可取的，但是說到「中國建國的新精神，應爲建國而非爲對外，」這同樣是忽略了中國所處的客觀的地位。這種見解不但與全國人民全國青年的意見相反，而且也與國民黨和南京政府的「團結禦侮」的國策相反。王先生把「團結禦侮」降低到「團結建國，」把全國人民最關切的問題降低到消極的地位，

把中心問題降低到枝葉的地位，把對外的問題轉化爲對內的問題。因此我們認爲目前的中心問題仍爲「團結禦侮」而非「團結建國」。

中國的建國問題，基本的是在求中國的獨立自由解放，如果沒有這一點，則任何「建國」都是沒有意義的。侵略者首先日本決不會讓我們來和平的「建國」因此，只有握着中心的根本的抗日問題，解決中國民族獨立自由解放的問題，這就是建國，才能建國！只要心無成見的人，我想這種問題都可以明白的。

如果看清了目前的中心問題根本問題是抗日救國，那麼北方青年的團結問題，就迎刃而解了，即是一切不顧當亡國奴的人們，都應該在抗日救國的基礎上團結起來。

團結的鞏固要在不斷的批評內部的動搖，妥協與投降的趨向，並排斥眞正的漢奸和日本的密探，但不能把漢奸的名義輕易的加到青年的頭上去，應極力的說服每一個卽使就是一時走入漢奸圈套的份子，我們的青年應當是以理勝人，而不是以氣勝人，以理勝人者則常勝，以氣勝人者則必敗，眞正的漢奸在中國人民內只是佔絕對的少數，可以說是萬分之一，甚至於是十萬分之一，他們是孤立，是惡臭的，因此他們也不敢公開的活動，有時也還帶着「抗日」的面具來破壞抗日，雖然他們是孤立的，可是

他們還沒有完全失去力量，正因爲他們有日本的援助，還在支持殘局掙扎，以圖獲得某些中立階層者的同盟，只有在青年內部樹立確當的關係，才不致給敵人以有機可乘。

願北方青年以抗日爲重！在抗日救國的基礎上團結起來！

三　在民主的基礎上來團結

北方青年團結的方法，應當以民主爲原則，一切的意見，應當聽取多數人的意見爲意見，一切的爭執，應當聽取多數人的意見來解決，一切的組織，應由多數人的選擧。過去無論那一方面把多數人意見置之不理，凡有加以壓制者，這是不對的。統一的一致的行動，只有統一的一致的意見才能達到，而統一的一致的意見又只有取決於民主才能獲得。要獲得統一的青年運動，只有民主的發展才有可能，任何單方面的包辦，都是違反民主的原則，而必然會引起內部的分裂，青年的組織，學生的組織，實際上是一種統一戰綫的組織，因爲它包括各階層各黨派與非黨派的青年和學生，要是這種組織內面沒有足够的民主，是不能發展的，是不能存在的。

北方青年前面的任務，應當將各種不同的青年的學生的組織聯合起來，在民主的基礎上結成聯

合戰綫，這是進到北方青年團結統一的方法。王芸生先生在這個問題上，提出否定的意見，反對聯合，反對聯合戰綫，提出抽象的統一，這當然不能幫助指導北方青年的團結，適足以拆散他們的團結，

北方青年不但本身要發展民主，而且要爲着全國人民的民主權力奮鬥，青年內部的民主是與全國人民的民主權力的獲得不能分離的，當國內和平統一初告成功之時，國內中心之點，即在實現人民的民主權和國內政治民主的改革，我們所要求的民主正是與抗日不能分開的，國內有些輿論把民主提到第一、而把抗日放到次要地位，這是不適當的，我們爭取民主是爲着抗日，而抗日又必須實現民主。

國民黨三中全會已決定修改國民大會的選舉法和組織法，北方青年應關切的注意這個問題，討論這個問題，應積極的提出修改的意見，並應引起全國輿論界來注意這個問題，並依照孫中山先生演詞「學生須贊助國民會議」的遺教，而爭取青年學生團體有選舉國民大會代表的權利。現在存在的新舊學聯的對立，應在民主的基礎上，共同商量，訂立談判，而歸於聯合。這種商量和談判的條件，首先雙方應當取消互相攻擊，取消互相毀謗，站在團結抗日救國的基礎上，依據民主的方法，而使北方的青年運動達到統一。

四 北方青年的責任與態度

北方青年站在國防的前綫，所担負的責任自然更加重大，他的中心的任務自然不言而喻的是「抗日救國」但抗日救國並不是一個空的口號而是包含着再豐富的工作內容。王芸生先生認爲「抗日這兩個字，」「是有限制的，」「更不能概括我們的工作，」這也是值得商量的。處在今天，做一個中國人，而且是做一個覺悟的中國人，我想最低限度的要求應當懂得中國是被日本正在滅亡着，挽救這種滅亡就是「抗日。」「抗日」雖不能概括一切工作，但我們的一切工作必須是爲着抗日。譬如拿教育和讀書來說，我們必須是爲着抗日，因此全國教育界都主張「國防教育。」又如拿經濟建設來說，我們也是爲着抗日，因此王先生自己也主張「應該先建設國防工業」這是很對的，我們目前經濟建設，應當是「國防經濟建設。」諸如此類，我們的一切工作必須是爲着抗日。

因此北方青年在抗日救國之下的責任是許多的，是重大的，舉其大者，則有（一）團結青年一致抗日；（二）宣傳組織民衆到抗日的運動內來；（三）加緊自身的國防教育（政治的，軍事的，技術的。）

要做到這些工作，青年的方式與態度是很重要的。青年的特性是熱情的，合羣的，勇敢的，直率的，急

燥的，因此也容易發展到他的壞的一方面去，就是衝突的，煩悶的，驕傲的，直覺的而缺理性的，一時的而缺忍耐的。對於青年的特性，我們應當從多方面的來估計，「舍其所短而取其所長」，卽是發揮他們的積極的好的一方面，而砥礪他們的偏向的壞的一方面。

因此，我們對左傾的青年願意貢獻我們的期望，左傾的青年他們的思想是前進的，他們的行動是積極的，而且我們希望這些更加前進，更加積極，他們是青年運動中的火車頭，他們是民族解放的先鋒者，但決不能以此自傲自大目空一切，而更應當虛心的，誠實的，對於一切不明瞭者，思想遲鈍者，以及反對者，耐心的說服，與他們在一處，時常保持與他們的聯系，以便把他們提到自己的水平。火車頭只有䭾上成百累千的車箱時，牠才有意義，前進的青年只有率領成千累萬的青年時，他才有意義」

我們不主張「青年老成」，但是我們也反對「青年妄爲」，青年應當用理性來駕御熱情，這就是說青年做事，應當思索，根據客觀的現實去思索，青年應當用忍耐去駕御勇敢，這就是說做事應當愼重，已經考慮周到的事情應當勇敢的去做！

對於右的青年，我們的勸告是：去掉保守性，這恰好是壞的成年中劣性在青年中的影響，青年是富於進取的，「迎頭趕上去！」這是孫中山先生的名言，他們也應該檢查自己的思想，檢查自己的態度，固

持自己的成見是不好的。社會常是進步的！

許多人士常駡青年不應參加政治，對於這些人我們也得勸告，不應奪青年這種生活，孫中山先生常說：「學生應當做大事，不應做大官，」你們自己做大官，反不讓青年做大事，青年應做大事！

所望於北方青年，在國難當前的今天，在國防前綫的陣地應當百倍努力，團結北方青年，鞏固和平統一，準備對日抗戰，爭取民主權利，以期迅速的達到中華民族的獨立自由解放。

四月十五日（轉載解放第二期）

憶黃膺白先生并略論國民黨與日本之關係

人們是生存在時代中的，時代常使人獲得幸運，也常使人做牠的犧牲。造時勢的英雄，古今中外，能有幾個？歷史上儘有露頭角建功業的人物，若逐細檢點一下，恐其中許多是遭逢時會的幸運兒。至於犧牲於某一個時代的人物，在個人是失敗了，而這個失敗却往往是時代的必需。我們對時代人物的評價，對於遭逢時會的成功者不必便予揄揚，而對於明知其不可爲而不忍不爲的犧牲者，却應寄與無限的同情。最値得我們同情的，是一個人的犧牲在時代上有絕對的需要，却不必便能獲得人們的諒解。這是我在懷念黃膺白先生時所不容已於懷的一種感慨。

二十世紀的世界是一個大局面，近十年來的中日關係，尤其是一個變局。日本在東亞大陸上的野心，民四條約（即所謂二十一條）未能盡其百一，戰後勢異，華盛頓一席會議，中國未費一兵一矢，收回山東半島，造成遠東的和平均勢。日本人認爲那是一種屈辱，中國却誤會自己的領土與安全已有了鐵的保障。這一點誤會，便使我們食到九一八的後果。這種誤會，我們不暇去怪北洋政府，而以建國自任並

領導國民革命的國民黨，也陷入這個誤會的深淵，那便不可原諒了。孫中山先生的革命事業，是曾與日本發生過密切關係的，他的外交政策是常把日本置於第一位的，不料他的黨徒却忽略了這一點。國民革命軍北伐，是近代中國的政治主流。當武漢政府收回漢潯租界時，國民黨的外交局面，眞如麗日中天，誰知道一點小小的勝利，背後沒有眞識實力的支撑，高張著虛憍之氣，鬧出了南京事件，下關的砲擊便戳穿國民黨外交的紙老虎。田中義一看準了這個弱點，肆敢悍然發動濟南兇案。濟南事變是一個重大的歷史事件，牠的涵義並不簡單。那一個事件的意義，淺近說，是北伐外交的粗疏，往深遠看，則是日本與國民黨之間關係的開始爆發。我們試一回溯國民黨的歷史，在她的發育初期曾與日本發生過深切的關係，即辛亥革命成功之後，在倒袁運動中，中山先生尙與日本有不少關係。這些關係，無論日本的動機如何，對於國民黨總是友誼的。國民黨與日本的關係，在現存的老輩國民黨員中當有不少能記憶其詳細經過者，但恐亦只能追述自同盟會至民四二十一條交涉時代。自民四的下半年一直到民十七的五月，國民黨與日本的交情是漸疏漸遠以至於無了。國民黨與日本間有這十幾年的空隙，直到十七年國民黨已掌握新中國的政權，國民革命軍進展到黃河流域，國民黨還沒有佈置對日外交的打算。「五三」之血一流，國民黨與日本的關係爆發了。

濟南事件是日本與國民黨由友到敵的一個記挨，十幾年空隙的爆發。黃先生這時候是國民政府的外交部長，他正碰到這個爆發點上，他是失敗了，他個人所應負的責任卻是很小的。

在濟南事變中，田中義一已明白告訴國民黨：「你們不要忘掉日本。」誰知國民黨仍未能接受這一個歷史教訓，仍在空疏誇大的閉着眼睛喊「打倒帝國主義。」我們的一位「條約」部長，在九一八事變的前夕，還把關於日本的情報鎖在抽屜裏，夢想着收回領事裁判權的得意文章。我們中國人眞要成爲打在身上不知道疼的怪物了。

濟南事變若是九一八的預報，則塘沽協定便是九一八的段落。這兩件事，黃先生都是當衝者，濟南事變是他不幸碰上的，塘沽協定卻是他心甘情願的去跳火坑。

湯玉麟不名譽的放棄了熱河，長城抗戰到了筋疲力盡的時候，這時固不免有人作焦土抗戰的主張，事實上我們的國家在那時卻需要喘一口氣。塘沽協定的醜惡字句，曾使我難過得睡不着覺，但在良心上我不能否認牠在當時的作用。黃先生是一個聰明人，他自然想像得到事後的悠悠之口，他是明知其不可爲而爲的。這一點精神，只有用仁人志士的心情纔能了解。

現在我們的國家尙在存亡絕續的大關頭上，我們的政治家和國民還需要剛勁，更需要沈勇。假使

我們覺得現在我們國家的前途比較三年前已有一綫光明，那便是我們在忍耐下加緊準備的成績。我們要在這個基點上繼續前進，同時也不應該吝惜寄與爲國家做忍耐工夫的人以同情。

我雖多年執役於北方新聞界，與黃先生却是素昧生平。我認識黃先生，是廿三年夏間在牯嶺時。那時是塘沽協定的翌年，外交無策，北局擱淺，大家希望黃先生回北平的時候。關於我所認識的黃先生，我在當時寫的一篇「贛行雜記」中曾有以下一段記載：

『黃先生在牯嶺住在特區一三一號，與段合肥比鄰，我第一次見他，是在八月十三日上午十點半鐘，因爲他所處境遇的困難，及其談話的沈痛，使我得到一個很深刻的印象。我說北方人士多盼望先生早去，冀以減少「戰區」民衆的痛苦。黃氏很感慨的答道：『恐怕無補於大局啊！』接着說：『這一年的經過，在明瞭國家情況的人，當然能够諒解，一般人則以爲我黃某天生賤骨頭，甘心做賣國賊。對外未曾做了什麽事，對內却須時時做解釋功夫，眞是痛苦萬分。一年以來，對內對外，儘做矮人，我並非不知道伸伸腰，只是伸腰之後有什麽善後辦法，爲國家設想，不能那樣冒險。我現在好像打tennis的ball，日本人說，『黃先生你若是沒有辦法，還不如請你趁早躱開，免得礙我們的事。』一球拍把我拍到南方來，到了南方，逢人便問，『膺白，你什麽時候回去』，又一球拍把我拍回

北方去。但一談到辦法，便好像我向中央討債。夾在這兩種心理中間，能辦出什麼成績來，對方的量是小的，力是大的，而慾無窮；國人則眼光是短的，調子是高的，肩頭不負責任，我的困難可知。且掛着北平政整會的招牌，辦理對日本關東軍的外交，北方各省的事情，無論什麼都可以找到頭上來，但結果是什麼事都管不了。』黃氏的談話，感慨甚深，尤深憾於國人的不諒解。我引陸奧宗光接受三國干涉和小村壽太郞簽訂樸資茅斯條約的故事，兩人都曾爲國人罵爲賣國奴，但現在大家都知道他們是爲了國家的利益，而不計個人毀譽的。有這種犧牲精神，才有他們的功業。我常說：『外交家在勝利中求收穫易，在失敗中而不僨事難。』外交家尤須具有政治家的風度。黃氏說『王先生的安慰話，我很感激。爲我個人設想，絕無再回北方的理由，但國家旣需要我唱這齣戲，只得犧牲個人以爲之。我年已五十五，大小的官都曾做過，尙復何求？顏駿人先生說，中國外交有三條路好走，實則仍須自己有本錢。我以爲國家的出路有三句要訣：一，放大眼光；二，咬定牙關；三，勒緊肚帶。大家能本此三點奮鬥下去，國家前途才有希望。』從這一段談話裏，很可看出他那種悲憤而仍願犧牲的精神。第二次談話是在八月廿四日下午五點多鐘，這次談話的印象，覺得黃氏的態度比較上次稍極多了。他關頭就說：『我在廬山住了許久，覺得這裏確是熱誠努力的幹。這或者是中國前途的一

線曙光。』這話我很同感。二十三日晚上在楊暢卿先生的召宴席上，黃先生開我的玩笑說：『我每次見新聞記者好像犯人見法官似的被種種盤問，今天我要掉轉頭來盤問盤問新聞記者。請問王先生在廬山住了多日，你的感想如何，』我的答復是：『很有朝氣。』黃先生以爲華北的最大危機，係在心理方面，一般人在心理上先將華北放棄，認爲已無可救藥，一切皆趨消極，故欲挽救華北，首應革除這種心理，盡心盡力去做，而歸結於中央與地方應該共同努力。黃氏此次到莫干山消夏，原是一種消極的表示。其近友亦覺得以黃氏的資望才力，儘可以爲國家做些其他的事，何必坐在北平去敷衍日本關東軍。但是國家需要這樣一個人在北平，黃氏遂亦犧牲一切，這一點是應該值得我們同情的。』

在那幾次晤談中，黃先生曾一再提及我的「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一書，並且很誠懇的對我說，願意把關於塘沽協定的全部檔案交給我作研究的資料。其後黃先生回到北方，人事栗六，雖平津咫尺，而未再見。去年九月我來上海，黃先生正在此間養痾，屢欲詣病榻一探，輒以恐擾其神而止。誰知黃先生竟以有爲之年，棄其國家而去，而吾亦卒不能再聆其憂國之論矣。悲哉！

廿六，三，廿八，上海。

「中日關係條約彙釋」序

中日兩國的關係，複雜綜錯，爬梳過去，調整現在，建設未來，都不是容易的事。中日兩國在文化上有兩千多年的關係，在近代的外交關係上，也有六七十年的歷史。在這個久遠而複雜的關係上，從任何角度上去看，都可以成爲一部有系統的大歷史。現代的中日關係，已結成一個總結。我們要打算解開這個歷史的總結，第一須要瞭解這個總結的性質，尤其要洞悉牠結成的經過。我們若從外交的角度上去看中日的關係，可以很扼要的獲得一個要領；從外交觀點上去看中日的總結，也可以很清楚的尋出一條脈絡。一部周備詳明的外交史，還需要歷史學者的眞實的努力，這一個艱亙的工作在目前還沒有實現或完成。在這個工作未曾完全實現以前，好好的編輯一部中日條約集，實有萬分的需要。如同日本東亞同文會所編輯的「東亞關係特種條約彙纂」，有附件，有解釋，便是很合實用的一部書。不過那本書是用日文寫的，而且年齡也太老了，日俄戰爭以後的文書便沒有了。在我們中國方面，我的朋友尹壽松先生曾編輯了一部「中日條約彙纂」，已經給予研究中日外交史的人們很大的便利；現在又看見劉百

閔先生主編的這部「中日關係條約彙釋」無疑的，牠的貢獻必將更大。這個集子的體裁很像東亞同文會的「東亞關係特種條約彙纂」有解釋，有附錄，在一部分能釋明一個段落，在全體上，能貫穿一個系統。這自然是值得向讀者推薦的一部書。

雖然，當這一個條約集子擺在我們面前的時候，我揣想，讀者或會興起一種深切的慨歎——這是一部有傷我們中華民族的尊榮的不平等條約啊！我們早已有「取消不平等條約」的吶喊，而不平等條約還是儼然的存在着。我們若要再一搜檢這個集子，假使細心些，便會發現我們與日本的條約關係，是由平等而逆轉到不平等的。同治十年的「中日修好條規」是中日間的第一個條約，也是中外間的第一個平等條約。這個平等條約存在了二十年，甲午戰後，馬關條約把牠代替了，從此以後，中日間產生了無數的條約，一直到現在，還沒有第二個平等條約出世。（民十九的中日關稅協定，也不是平等條約。從這一點看，不平等條約的存在，是我們的恥辱；有了平等條約而不能保持，尤其是我們的恥辱。這個恥辱，由甲午戰爭一直保留到現在，我們還不想湔雪嗎？努力吧，中國人！我們應該努力爲這部中日條約集創造一個新的平等條約！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四月十日王芸生序於上海大公報社。

幾點諍言

語言是表達思想的，但語言未必全能從嘴裏說出。這種說不出的話，一因語言拙劣，不足表達複雜深邃的思想，有時却是由於顧慮環境的阻礙。這種能說而不敢說的話，假使是僅僅關於一己的私利私益的，則不說也罷；假使是關係國家大業的，則不說豈非一種損失？這種損失的挽救，最要緊的是大家要有說眞話的勇氣，同時更要緊的是大家要具有兼聽橫議的雅量。君有諍臣，不失其天下；士有諍友，不離其令名；則國豈可無諍民？竊願自儕國之諍民之列，對國家貢獻幾點諍言。但願言者無罪，聽者或有益歟？

× × ×

現代的政府，要使它的國家能治能安，不僅是政治軍事外交要措置得宜，尤其要在思想上能做領導。國民黨有三民主義及孫中山先生的遺教做思想的基礎，它的憑藉是很厚的。國事演進到今天，國民黨已實際握得政治的領導權，應該更進一步做思想的領導者，並把思想建設到實際的政治上。要使思想建設到實際政治上面，先須在思想上做一番爬梳整理的功夫，並須有忠勇的實際政治家去執行。在

這一方面，蔣先生很够一位實際政治家的資格。例如十九年約法之爭，胡展堂先生主張「總理的全部遺教便是約法」，蔣先生則堅主實際政治上必須另有全國共守的約法。中山先生是一位思想家，同時也是一位政治家，從事革命四十餘年，他的思想言論博大精深，浩如烟海，歷史事蹟千頭萬緒。關於他的事蹟，到現在還沒有一部像樣的「孫中山傳記」出世，他的思想言論也還是一堆原料，未曾經人澈底整理過。他的言論思想是逐漸演進以至於大成的，早年的言論便與晚年的不盡相同，我們要奉孫先生的遺教爲約法，將何所適從呢？在過去的黨爭中，不是常常發生各取孫先生理論的一枝一節以爲號召的事嗎？三民主義，現在已成全國人民的經典。迴溯三民主義的創造過程，是在孫先生倫敦蒙難之後留歐期間完成的，直至十三年國民黨改組時孫先生在廣州系統的演講三民主義時，三民主義纔有了具體的解釋。現在一般人對三民主義的觀念，都是讀了孫中山的兩大本三民主義演講得來的。孫先生的三民主義演講是很淵博精深的，人們讀演講時，幾乎讀到每一句話都要點頭感歎，但要叫他把三民主義的簡單定義說出來，便很少有人能做得到了。根據這兩點，我以爲國民黨（第一）應該把孫先生的全部遺教，先做無遺漏的搜集，再做條理的爬梳，精嚴的整理，分門類，劃時代，把過程和結論表列出來。使人對孫先生的遺教能有系統的明瞭的認識，而不致誤會或曲解。（第二）給三民主義下個簡單的具

體的定義。一般人對於三民主義，不全是信仰不信仰的問題，我以爲還有一大部分是如何認識與了解的問題。我們若拿着兩巨册三民主義問某一個人「你信仰不?」他或許躊躇不知所答；但若簡單說明三民主義的定義，他的諾否的答覆一定是很爽快堅定的。我以爲要給三民主義下定義，愈簡明愈好，最忌累贅。在孫先生的著作裏，有兩處曾經提及三民主義的定義：——

一 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

（一）民族主義　國民黨之民族主義，有兩方面之意義，一則中國民族自求解放，二則中國民境內各民族一律平等。

（二）民權主義　國民黨之民權主義，於間接民權之外，復行直接民權。

（三）民生主義　國民黨之民生主義，其最要之原則不外二者：一曰平均地權，一曰節制資本。

二 建國大綱：

建設之首要在民生，故對於全國人民之食衣住行四大需要，政府當與人民協力，共謀農業之發展，以足民食；共謀織造之發展，以裕民衣；建築大計劃之各式屋舍，以樂民居；修治道路運河，以利民行。

其次爲民權，故對於人民之政治知識能力，政府當訓導之，以行使其選擧權，行使其罷官權，行使其

創制權，行使其複決權。

其三爲民族。故對於國內之弱小民族，政府當扶植之，使之能自決自治；對於國外之侵略強權，政府當抵禦之，並同時修改各國條約，以恢復我國際平等，國家獨立。

上引兩節，第一次全代會宣言的最簡要，可做三民主義的定義，建國大綱的較具體，可做三民主義的政策。政府若不涉及廣泛的遺教，而只簡要的提出一全代會宣言中的三民主義的定義，說這就是三民主義，別無其他解釋，你們是否信仰？我想全體國民均將毫不遲疑的舉手贊成。若提出建國大綱中民生民權民族三點，做爲三民主義的實施政策，我想反對的人也必不多。

譬如行將召開的國民大會，是國家的一件大事，政治的大關鍵，若不做出一個像樣的局面，在思想領導上，政治建設上，政府均將損失它的威信。國民大會在組織上有兩個障礙，一是公民宣誓實行三民主義，二是代表宣誓接受孫先生遺教。（這點障礙的理由，我在「五寄北方青年」中，陳之邁先生在「從國民大會的選舉談到中國政治的前途」中，均曾論到，不加複述。）關於這一層，汪主席上月廿四日在中央紀念週演說「國民大會的三個基礎」時，曾有一番很懇切的解釋。汪先生說：「至於有一部分人，對於三民主義的信仰容不免有不同的態度，就各尊所聞各行所知來說，似乎不能強之使歸於一致。

然而仔細想來，民族主義是要使吾民族在國際取得自由平等，而互相提攜，以進於大同；民權主義是要確定了民爲邦本，而同時防止現行的民主制度之各種流弊；民生主義是要使國家的生存人民的生活得到進步與發展，而同時防止現行經濟制度相傾軋相凌轢之各種流弊。在根本上原沒有什麼參差的地方。……」汪先生的話是很誠懇的，並無意中給三民主義下了一次定義。我以爲三民主義的原則應爲全國人所同情，是沒有問題的，最有效的辦法，應給三民主義下一個簡單具體的定義。假使公民宣誓的誓詞中「實行三民主義」句下，注上一全代會宣言中的三民主義定義，我第一個便來宣誓，絕不躊躇。同樣的，若在國民大會代表宣誓的誓詞中「接受創立中華民國之孫先生之遺教」句下，表列出孫先生遺教整理後的結論，我想一定也可以給舉手人一個親切的考慮機會。這步工作，相當繁重，今年十一月十二以前如做不到，最好把這一點加以修改。

國民黨的內部問題，我向不輕談，現在也願妄居諍友，在簡單的原則上，冒昧一談。

我以爲國民黨人第一應該痛切認識的，國民黨現在是握全國政權領導建國運動的一個政黨，而本人是這樣一個政黨中的一個黨員。個人及黨的動作必須與這嚴肅的使命相吻合，至少態度，不能相

矛盾。國民黨是由革命的在野黨鬬爭出來的，現在雖已掌握政權多年，在黨的組織內及黨員的行動上，還保留着在野黨的色彩及習慣，這種情形，未始不是一個特點，但在客觀的影響上却與黨的當前使命相矛盾了，我談這個問題，只限於原則，故不舉事實的例證。但請黨的工作者省察一下，在黨的一般工作及民衆運動上，是否是在給本黨的政府添麻煩，惹是非。記得某次黨大會曾頒布六項黨員工作綱領，如推行地方自治，掃除文盲等，都是含有建設精神的。一個在朝黨的行動，必須是建設的，切忌破壞的。因爲你要做破壞工作，實際上就是破壞你自己的政權。尤其是在目前國民黨已實際握得建國的領導權的時候，在工作方式上，更應該淸算一下。前幾天和一位老朋友談起這個問題來，他說國民黨應該「擴大政治，緊縮組織」，我認爲這位朋友的話很有道理。

猶記得當西安事變蔣先生脫險回京之後，我在一位國民黨老朋友座上說過幾句痛切的話，我說：「國民黨又得到一次成功，但要知道蔣先生威望的增高，也就是國民黨的責任加重。全國人民都愛護蔣先生，國民黨人更應該愛護他的領袖。國民黨人今後應該恢宏襟度與全國人攜手，切莫有意無意的給領袖製造敵人，增加國家的困難。」當時我那位朋友對於我的話頗爲動容，我現在願意再把這段話貢獻給一般的國民黨人。

我們的國家，現在循和平統一之路前進，孫中山先生在彌留時把「和平奮鬪救中國」七個字告訴國人，現在我們應該實際瞭解「和平奮鬪」是如何的重要了。西安事變是一個大霹靂，假使那個事變不是用和平手段解決的，請想國家現在將成一個什麼局面？現在在地方上儘管還存着殘餘的封建勢力，但它的前途一定是日即於澌滅，和平統一的大路在那裏坦列着，除非中央自己不願走這條路，任何人也不能把它堵塞起來。在這條路上，東北軍已從事整理，劉湘接受了中央的川康整軍方案，楊虎城已離開陝西，陝北方面也近於實際的解決。此外縱使還有隱而未現的問題，也都是不足以破壞國家的統一大局的。這些事表面上的性質是政治軍事，實質還包含着思想問題。中央要領導這個包含政治軍事及思想的和平局面，我以爲有八個字可做秘訣，便是「對內開明，對外堅定。」對內開明，可以解消內部的摩擦，加强統一的運行；對外堅定，可以齊一國內的心志，減少不滿於政府者的藉口。

本此見地，我以爲在此軍事善後之餘，還需要一個文事善後。

何謂文事善後？蓋在西安事變之後，不僅在政治軍事上起了變遷，在思想上也有極大的變化。隨着共產黨的轉變，在過去成爲問題的，現在則已變了性質。黨及政府應該乘這個稀有的機會，清理積獄，溥

採衆議，善導思想，換言之就是實行思想的開放。

在這個觀點上，我主張解消國民大會選舉法中種種不自然的限制，同情蔣汪召集廬山談話，希望趕快結束沈鈞儒等一案及其他思想獄。

其次，便是青年的思想問題。我覺得現代的中國青年，大體上都是純潔的。他們日夕憤念着祖國的苦難，他們自己有着青年人自己的問題而得不到解決，他們日夜憂慮與苦悶，他們抱着救國救人救己的志願，而有所思考，有所動作。無論他們的思想及動作是正確或是錯誤，在動機上都是可愛可憐的。近來還偶爾聽到關於思想問題的悲劇，若果實有其事，却是現在所不應該再有的現象。我以為黨及政府對青年的思想，最賢明有效的辦法是以啓發善導代替干涉壓迫。思想警察是應付思想問題拙劣的方法，這個無形的東西絕不是警察可以看守得住的。思想如水，導之則暢流，塞之則橫決；又如空氣，開之則清新，閉之則腐惡。在今日的國家政局之下，政府更有領導青年思想的資格與可能。一個政府及政黨之取得人民的信仰，決不在於鎮壓人們的反對，而在於以事實表現出確能保衛國家擁護人民。在這一方面有使人民信賴的成績，人民自然會擁護，即使政見有些不同，也不妨礙這種擁護的可能的。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便是這種邏輯下的一個歷史奇蹟。西安事變以來，全中國已經展開了一個嶄新的氣象與

機運，這個氣象與機運，可以創造一個全新的政治局面，同時也可以演成一個整肅的思想陣容。如何創造這個局面及演成這個陣容，我願複述一下前面所提及的那八個字——「對內開明，對外堅定」我切望國民政府及國民黨多在這八個字上用些功夫，國家的前途一定是光明的。

廿六年六月十五日於上海。

國家的煩悶與青年的煩悶

現在壓在我們國家頭上的一個極大的煩悶，便是日本問題。我們將怎樣解消日本的威脅，而與這個強鄰相安並存，實是一個極大的問題。

這幾年的東方歷史，是由日本導演着；但這齣全本連台的歷史劇畢竟演成什麼樣子，我們中國的做法實是一個有力的決定因素。過去我們太不成個樣子了，專扮乏角色，所以給日本大大出了風頭。今後我們不應該再那樣沒出息了。在這齣戲裏中國與日本既然同是主角，我們便也應該負擔起決定這齣戲的結果的一半責任。

在日本的大陸政策裏，中國是不存在的。我們甘心讓這個五千年聲名文物之邦消逝在強鄰的野心之下嗎？當然不如此。

我們國家的煩悶有內外兩面：外面是日本問題，裏面是建國問題。問題雖是兩面，而實一體。我們只有在建國的途徑上纔能抵抗日本的侵略。

我們如何認識這內外煩悶的要領並設法解消它，我有兩句話便是——東方大勢的關鍵在中國，國內大局的關鍵在中央。

何謂東方大勢的關鍵在中國？第一，日本對華政策的根幹是固定的，只有急進緩進之別，而萬變不離其宗，問題只在中國如何去應付。第二，關於東方的大勢，我在「如何建立太平洋的新秩序」一文中，曾有一些分析，在太平洋的國際新均勢之下的東方大勢是比較於中國有利的，但中國本身如不爭氣，這個有利的形勢必然落空。第三，就日本的最近政情看。林內閣的倒台與近衛內閣的出現，足以顯示日本的政治已演進到更深刻的階段。這在中日關係上包含一種危機，其決定關鍵也在中國。

近衛文麿出身貴族，最爲元老西園寺公望所賞識，認爲是傳他衣缽的人物。近衛本人又是一個頭腦複雜方面衆多的人物，他雖然過去沒正式上過政治舞台，而朝野各方左右各派都對他懷有好感。林銑十郎失脚之後，西園寺把他推薦出來，可算是最後的一個險着了。假使這個負內外重望的首相再失敗了，日本政治的前途將怎樣收拾呢？從近衛組閣以來的經過情形看也顯然不能令人輕易樂觀。近衛內閣的標榜，是要解消國內各種勢力的對立及摩擦，目前的形勢顯然與此標榜距離甚遠，或且相左。五一五事件以後的歷屆內閣皆不得財閥的支持，而林內閣却是軍閥與財閥合作的。在這種合作下纔成

立了三十億大預算。但近衛內閣，前藏相結城豐太郎以軍部不滿而未蟬聯，兒玉謙次不肯入閣，結果是馬場鍈一任內相，而以其舊屬賀屋興宣升任藏相。這是說財閥不肯與近衛內閣合作，馬場財政宣告復活。馬場是統制主義派，儼然是軍需工業資本家的代表，與軍部一鼻孔出氣，主張統制經濟，與金融資本家的利益是衝突的。日本的大預算，也就是六年軍事計劃，若在軍閥財閥合作之下，或可勉强推行，若財閥撒隊，這個大計劃將能推行到如何的程度，實是一個問題。日本內部最大的問題是財政，看現在的趨勢仍是很嚴重。近衛內閣最近通過了一個日「滿」一體的經濟方案，這是推進「高度國防」的一個方式。「滿洲」的資源富得很，但先要投下很大的資本。林內閣是給政黨擠倒的，近衛想解消政黨的摩擦，但他却無恢復憲政常軌的勇氣。新閣內雖有兩位黨員入閣，但在資格上並不是政民兩黨的代表。近衛很想組織一個新黨，近已聲明放棄這個理想。近衛既無恢復憲政常軌的決心，對政黨只取一種不關痛癢的敷衍態度，當然也不會取得政黨的積極支援。近衛內閣既無財閥密切合作，又無政黨積極支援，事實上却受着軍部的濃厚支配，在這種情形下，近衛內閣恐怕又是一個軟體內閣。

日本的對華外交政策，曾經一度發生動搖現象，佐藤登台時是這種動搖現象的最高潮，最近顯然轉趨穩定，且有漸近積極的趨勢。「對華新認識」原是必要的，他們近來却感覺這種呼聲將助長中國

的「驕傲」佐藤的外交演說會受軍部的干涉。這次廣田重任外相，在最初一次談話裏，認爲「以前對華三原則，乃對當時中日關係之抽象辭令，苟於今日仍舊採用，則不適當」。（六月五日「都新聞」之紀事）是廣田本人已覺所謂三原則的不適用，而思放棄。旋據二十日中央社東京電報告，謂「近衛內閣所予駐華大使川越訓令之性質，廣田三原則仍爲對華政策之起點」。這種動搖矛盾的現象，顯然又有軍部的陰影。川越於二十五日離日返任，他所發表的談話，特別述及僞國與華北的關係，他說：「余曾認爲吾輩應再認識中國，此語不意引起各種誤會。據余之意，新認識應時時給予正在增强與發展途中之國家，俾免發生處置錯誤之危險。日本現已對華給予新認識，余將請求現應爲中國再認識日本，如日本所爲之時矣。所謂認識日本云者，即是認淸日本生存與發展之權利，以及『滿洲國』之生存與華北間之必然的聯繫。」這不曾說，「滿洲國」是日本的生命線，而華北則是「滿洲國」的生命線。對於華北問題，則仍持二重外交政策，以關東軍及駐屯軍爲主體，以冀察當局爲交涉對手。據日本的態度，我們可以大概察知日本對華外交的較近的做法。她一面繼續壓迫恫嚇冀察當局，以期攫得更多的實際權利；同時對中央不急於開大規模的談判，從觀念上宣傳「日滿不可分」及「滿洲國」與華北的關聯，選擇較小的問題與國民政府開交涉，如福岡航空之類。至於所謂「經濟提攜」，則任她在華北自

由進行。這一個觀察，就是說日本要中國斷念東北四省，不必調整華北，讓日本繼續往下幹，並在各種大大小小的實際問題上，再給日本些權利。這是日本給中國開闢一條外交狹路，請問走得通嗎？

現狀如能往下拖延，也未始不是一個苟安的局面，實際上則恐不能。九一八事變的背景，我們若作一番分析，當不外以下三種原因：（一）世界經濟恐慌削弱了國際均勢；（二）日本本身的困難，想向外衝；（三）中國統一局面的刺激。在那時東三省換了青天白日旗，中國在表面上出現了一個統一的局面。張學良也很想做些事，葫蘆島開港，並擬完成東北鐵路網，聯絡成南滿鐵路的併行線。日本覺得不下手將有遲誤之悔，於是選擇了那個時機發動了。現在呢？中國再現統一之局，民衆的國家意識增高，中央政府的權威擴張，整個的國家向復興之路掙扎。相反的，日本國內的情形則矛盾愈多，困難愈深。中國的向上可給日本以刺激，日本的困難更可逼着她倒行逆施。我們常吃日本「攘外安內」的虧，歷史上的例子舉不勝舉。現在的情形很與九一八的前夕相像，日本會不會選擇這個時機再來一個「九一八」呢？我以爲很有這種可能。這是中國的威脅，也是東方大局的危機。我願指出這個危機請國人注意；但不是說，日本不顧我們好，我們便須壞，日本要什麼，我們便送上去，在羊羔身上抹蜜去喂老虎，絕不是個辦法。

日本給我們開闢的外交路是很狹的，要想在外交路上解決中日問題，起碼在最近是走不通的。外交之路既不甚通，而危機的威脅又儼然存在，我們將如何做呢？我以為我們沒有第二條路，只有努力建國工作，加緊自衛準備。外交上的路我們要儘可能的走，強鄰的武力來了，我們便以武力迎上。日本所要導演的局面，我們是完全明白的；但我們如果爭氣，擋住這種導演力，則東方的局面便不會如日本之願而出現。所以我說東方大勢的關鍵在中國。

何謂國內大勢在中央？我也願加以解釋。

月前一位朋友自日本回來，他對我說：「我在東京到處聽見中國進步的報告，這次回國來，曾到京滬平津各地考察一下，覺得並不像以前所聽見的那麼熱鬧，有些地方或且不免令人失望。」我說：「當然的，偌大的中國怎能在短時期內完全改觀，你把一些事物看深刻了，自然要發現不滿意的材料。但我對於國事的看法，倘不悲觀。我覺得我們國家在大體的輪廓上，一天天的在進步，所感覺不足的在於內層。譬如國家的統一局面，儘管還隱藏着內在的矛盾，但誰也不敢明目張膽的來加以破壞。東北軍的內調及整理，楊虎城的離陝，以及劉湘的接受川康整軍方案，都是好例。循着這個趨勢下去，則矛盾將日益消滅，統一將日益鞏固。問題只看中央如何去領導這個局面。中央如果一秉至公必誠必信的向前做，一

切小小摩擦，複雜現象，均將消滅於無形。我以為中央領導目前建國局面，有八個字最要緊，便是「對內開明，對外堅定」。對外堅定，就是我上面所說的，我們要努力做一個東方大勢的決定者，絕不可在羊羔身上抹糞去嚇老虎，一切聽人家的導演。對內開明，則有表裏兩面。中央首須做一番自我檢討，從觀念到行動，都澈底健全和振作一下。由此出發，對全國展開一個包括政治及思想的開明的局面，則振綱攜領，整個國家的推進是毫無疑問的。這個關鍵現在就握在中央手上。

× × × × ×

其次，談到青年的煩悶。青年的煩悶大體不外兩種：一是思想的煩悶，一是職業的煩悶。

思想的煩悶是與實際政治有聯帶關係的。在黑暗而紛亂的政治環境下，青年的思想是不會安頓的。現在國內政治情形的進步，已予青年思想以好的影響，中央若再從開明做法上加以善導，則青年思想更可入於正軌。關於這個問題，我們除了希望政府在內外措施上給青年改善思想的環境，各種政團勿作蠱惑的煽動外，青年自身更應有一番新的覺悟。要認清國家的當前危機，了解國家的真正需要，一切思想及行動都要在這個觀點上適應國家的需要。國家需要統一，我們絕不分裂；國家需要自強，我們絕不自損；到最後國家需要自衛了，我們便去流血。但流血的機會不一定是人人能夠得到的。我們要有

這種決心，但未必人人能够得到這種幸運。最要緊的，我們要在日常生活中，一言一動都不要違背國家的利益，並積極的對國家有所貢獻。

職業的煩悶是一個社會問題。現當暑假時期，各大學都要送出一批畢業生到社會上去，正是青年的職業煩悶時期。這問題也是兩方面，青年的沒有出路，一方面固是社會凋敝，另一方面也還看青年的本身能力如何。我們看見許多青年找不到職業，同時也看到許多事業找不到人材。近幾年，在建國途中，各種事業都在開展，各處都在需要新人材，有能力的青年大體上是不愁沒出路的。在這一方面，我希望今年畢業而正在尋找職業的青年，先要檢察一下自己是否有够給國家社會做事的學問能力。假使有的，你們必可在需要你們那種學問能力的一部門中找到工作；假使無的，你們應該趕快設法補充學問能力，莫在那裏想獲得一個僥倖，以自誤誤人。尚未畢業而仍須繼續求學的青年們，更要抓住這寶貴的稀有光陰，努力從事實際的學問，養練真實的能力，準備給國家做些貢獻。你們能够在這時準備好真實的學問與能力，則國家將得到你們的貢獻，而你們本身的職業問題也自然解決了。

（附註）這篇文章的大意本月十四日曾在光華大學演講過一次，現在補充些最近的事實，寫成本文。

二十六年六月二十七日於上海。

北方的烽火

北方燃起了烽火，預告東亞的大時代將要到來。

事情是這樣：本月七日之夜，日本在豐台的駐軍到盧溝橋郊外演習，在演習之後，自稱失迷一人，擬進宛平城內搜查，守軍以在深夜，無法查找，未允其入城，日軍遂開砲。時在十一時四十分。該地係二十九軍濤治安部駐守，駐軍以日軍無理挑釁，不得已予以抵抗。日軍圍攻宛平城，炸毀盧溝橋梁，我軍損失頗重。衝突延至翌晨九時許暫停，十一時復戰，時斷時續，至九日晨二時後停戰。係天津方面中日兩方議妥和平解決辦法，雙方軍隊各自盧溝橋一帶後撤，而以石友三部之保安隊接防宛平。我方已先全照辦，石部保安隊亦於九日午後四時接防宛平縣城。不料日軍卻佯爲撤退，遺留部隊二百餘名於盧溝橋東北之五里店，繼則調動大部軍隊千餘人集結於盧溝橋東北三里許之大瓦窰，於十日下午六時起，連續向我盧溝橋駐軍猛烈進攻，同時並調關東軍進山海關，絡繹向平津進發，事態復趨嚴重，我軍不得不予抵抗，這個衝突，由十日晚綿亘到十一日午。日本旋放出不願事態擴大的空氣，北平方面復進行和平談

判，日方並發表我軍已完全接受其停戰條件，並傳日軍業已開始後退。乃至夜間十時後衝突復起，且更激烈，十一時豐台迤南黃土坡方面亦發生衝突，迄本文屬草時（十二日午後）所得北方電訊，謂停戰條件已簽字，東京方面則擺硬臉，仍是和戰夾雜形勢閃爍，而日本方面則活潑運兵，顯然是要利用閃爍的空氣，以爲緩兵之計，待大軍雲集之後，再行大舉。

我近來很爲東亞大局擔憂，看近兩月來的形勢，我覺得近衛內閣或將給東方帶來危險。我在上月爲的一篇「國家的煩悶與青年的煩悶」文章裏，對於中日問題的分析，曾說：『現在的情形很與九一八的前夕相像，日本會不會選擇這個時機再來一個「九一八」呢？我以爲很有這種可能。』我何以會有這種感覺呢？則是歷史經驗及目前局勢告訴我的。歷史的經驗，日本到了一種困難本身不能解決的時候，便向中國衝；目前的局勢，國際多事日本有可乘之機，日本本身的困難，及中國統一圖强的局面，這都是可以構成第二個九一八的條件。在那篇文章發表之後，日本與蘇俄爲爭黑龍江中的兩個小島起了衝突，蘇俄的砲艦被擊沈，結果蘇俄縮頭忍耐，撤兵而去。這件事過後，我感覺華北恐怕要出事情了。黑龍江事件是日本對蘇俄的一個試探，探她選擇蘇俄紅軍正興大獄的時候去試探，這一試探她成功了。蘇俄的縮頭，使她知道一些虛實，當她移其鋒於中國時，在某一限度內，蘇俄是不會出來管閒事的。

黑龍江事件如果是日本對蘇俄的試探則盧溝橋事件便是日本對中國的試探她這個試探有兩層作用：第一層試探國民政府的決心，看國民政府的態度是否堅決，近幾年的軍事準備是否就敢拿出來用。如果國民政府態度堅決，各路動員援救河北，則她或者也下一個相對的決心，乘中國國防未大完成的時候，拚一下，給中國一個打擊。其次，如果國民政府態度不堅決，還是走所謂「何梅協定」及僞自治運動時的軟弱老路，則日本可以不把國民政府打在算盤以內，單純的壓迫二十九軍及冀察當局撿些實際的便宜，使所謂「華北特殊化」較比所謂「何梅協定」及僞自治運動時更進一步。

日本這次發動盧溝橋事件的用意，我們看得很清楚。在這種情勢之下，我們應該怎樣應付呢？我以爲第一中央的態度應該堅決，採取堅決而迅速的行動，從豫魯晉綏四路動員去援救河北。同時冀察當局及二十九軍應該澈底覺悟一點，卽漢奸的路絕對走不通。宋哲元如果做了殷汝耕，以後將有吃不盡的日本氣，受不盡的日本罪，最後必至身敗名裂，毀了自己，毀了二十九軍。現在惟有堅決的在政治及軍事上與中央聯繫在一起，把個人及軍隊的生命溶化入國家民族的生命裏。武力來的，便和他武力拚；口舌來的，絕不聽他的誘惑及離間。我們不怕敵人的武力，最可怕的是奸人的說詞。我想奸人現在還可以對二十九軍進說詞，他可以說：「你們別太傻了，上南京的當。他們說抵抗，是預備犧牲二十九軍的。」這

種奸詞最可怕。這兩天在砲火聲中，還不斷有和平談判甚至二十九軍已全接受日方條件的空氣，我很擔心是奸人的讕詞，給日本做緩兵計。故作閃鑠的形勢，以弛緩中國的軍心，等到關東軍一切準備好了，再來做大規模的軍事壓迫。

有人或許對日本的決心大小估計不定，她是想局部試探呢？還是大舉的幹？我的看法，日本的決心可大可小，但我們不必多用心思在那種無把握的估計上，我們惟有以大的決心，做大的準備，不辭往大處幹。這樣，如果日本沒有大的決心，則我們愈堅決，事情愈好辦。惟有大幹纔可以小了。如果日本真有大的決心，則是以大決心碰大決心，在軍機上我們可以不吃虧。假使日本已有大的決心，我們還隨着閃鑠的形勢動搖，不積極做軍事的準備，而惟希冀萬分之一的和平，那我們便要吃大虧了。甲午戰爭時，日本自始至終以極大的決心製造戰爭，李鴻章則因循動搖，不在軍事上積極準備，而惟希冀國際調停的收效，頂到日本準備好了，一砲擊燬高陞輪，整個戰爭隨之爆發，中國則步步落後，以致於慘敗。一着棋後，全局皆輸。這個歷史教訓，我們不要忘記了。

總之我不是不願和平，我是說，惟有以應戰的決心纔能獲得和平。我寫至此處，耳邊還聽到和平的聲浪，眼中還看見日本方面傳來的和平解決的電報。我敢說，縱使這次盧溝橋事件僥倖和平解決了，我們如

果不在軍事上做大的準備，不久北方必還出事，且必更大。

北方的烽火燃起來了，預告東亞的大時代就要到來。我們若沒有充足的水，休幻想這烽火的自然熄滅。這烽火是我們的一個警告，我們應該趕快用血去澆滅它；否則，任它延燒起來，它會毀滅了我們的國家。

中華民族是酷愛和平的民族，中國國民都是酷愛和平的國民，現在却到了以戰爭決心去保衛和平的時候了！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七月十二日於上海。

人道的嚴正抗議

這幾天日本軍人又燃起了兇暴的狂焰，在平津戰役中，對無辜市民大舉殺戮，天津的情形尤慘，自二十九日以迄於今，日軍在天津市區內恣意燒殺，飛機轟炸，砲火肆虐，和平民衆陳屍塞途，文化機關慘被摧毀。日本飛機對無辜之逃難市民追踪掃射，轟燬南開大學之後，又復至南開中學放火。迄昨我軍已退出市郊，而日軍的殺戮焚燒如故，全市爲烟燄所包，城廂一帶遍陳血屍。這種殘暴行爲，既背棄人道，尤不容於公法。即使天津已成佔領地，日軍也不應隨意戕害佔領地的無辜民衆，對於這種殘暴行爲，我們特提出人道的嚴正抗議。

我們時時接到由天津拍來的血淚電報，我們在這裏遙弔天津的灰燼，同時想起中日歷史上的幾次殘暴殺戮。甲午戰爭時旅順陷落之後，日軍在旅順市內殺戮四日，非戰鬥的婦女幼童也均不免，全市華人僅有三十六人倖免。這三十六個人的倖免，是爲埋葬他們的同胞死屍而被殘留的。這件事還轟動於當時的歐美報章，美報批評日軍的暴行，說：『日本是蒙文明皮膚具野蠻筋骨的怪獸。』又說：『日本人

現在脫掉文明的假面具，顯露野蠻的本體了。』這是一件事。民國十二年東京大地震時，日人乘機大殺中國僑民。在那次事件中，第一高等學校畢業生王希天的被害，已爲世人所共知，同時還有多數華工被虐殺。據中國外交部給日本公使芳澤的照會說：『大島町自一丁目至八丁目，有華工約二千餘人，九月三日震災後，有日本自警團，間有警察及軍人在內，至各日人家嚴囑閉門，不許出外，旋誘追一部分華工將所有金錢一概交出，並追至八丁目附近曠土聚集，用刀棍等兇器概行慘斃。旋將屍體用煤油焚燬，以滅其跡。』這又是一件事。第三次便是民國二十一年九月撫順平頂山的屠殺。那時是九一八的翌年，撫順一帶毫無軍事，日軍聚無辜村民，上自七八十歲的老太婆，下至懷抱嘴乳的小兒，共二千七百餘人，一律以機關槍射殺。這幾次慘史還存在中國人的記憶裏，現在又來了天津的大殺戮。日本近年高唱『東亞門羅主義』，按她這種殘殺行逕，她的門羅主義是不是要關起東亞的大門來殘殺同洲同種的人民？日本要自詡是『東亞安定力』，這個安定力的本質是不是便是在東亞執行野蠻的殺戮？日本古代沐浴中國文化，現在何以一變至此？日本國民不少富於理智之士，要知道軍人們這種殺戮和平民衆摧毀文化機關的行爲，是暴露日本的罪惡於全世界，是與中國四萬萬人結子孫萬世之仇！

（廿六年八月一日上海大公報社評）

沈痛的自譴

盧溝橋的烽火業已燒掉平津，這無情的烽火正在那裏燃燒，我們不能坐待它整個燒掉我們的國家。

盧溝橋事件發生已將近一月，人家在亦戰亦和的手法下，完成了緩兵計，執行了野蠻屠殺；我們卻始終遲留在不戰不和的局面之下。北平已成漢奸世界，天津幾成一片焦土，我的家鄉是給這火燄燒掉了，我所關切的親族朋友沒有存亡的消息。國破家亡的景象和況味已整個的擺在我的面前和心頭。這是一個大時代的開頭，政府將如何決策我們雖然著急，卻不便過問；但在這幾天的思潮起落中，觸發我無限的沈痛的自譴。

我們有志於文章報國的人，這幾年在萬鈞的國難下，雖不斷的在自勵勵人，但仔細檢討一下，究竟自勵幾許？勵人幾何？這是我們應該沈痛自譴的第一點。

我們的目光集中於國難，我們不斷把鄰人的虛實及環境的動向向國人吶喊，把報國做人的觀點

向國人絮聒，老實說，對於國內政治的裏層卻未盡多少批評的責任。

這幾年，尤其是最近兩年，我們打落了牙齒和血吞，一切對內的話都不忍說，爲的是什麼？無非是要擁護政府，要擁護這個中心勢力，惟恐損及它的尊嚴，喪失它的信心。我們只在督促它的決心，培植它的力量，希望在艱難的建國路上，做些準備工作，增強內在的力量，打開外來的魔難。我在這個態度下，曾和許多好朋友犯顏相爭，並曾苦口勸誡愛國的青年。一直到現在，我相信我的態度並沒有錯，不過卻覺悟到我在另一面缺少了批評功夫。沒有嚴正批評的愛護，結果變成了姑息。這是我們應該沈痛自體的第二點。

蔣委員長說：「我們是弱國，對自己國家力量要有忠實估計。」蔣先生是掌全國船舵的人，對於我們國家的力量必有正確的認識。這幾天全國人心都隨着平津的淪陷而煩躁不安，我也迫切希望掌全國船舵的人速決大計。

九一八以來，我們屈辱忍耐了六年，爲的是什麼？無疑問的是爲了準備我們的力量。盧溝橋事件爆發之後，當局立即調兵北上，佈置應戰的局面，在這個決心之下，自然是對於自己的力量已有相當的估計，可是北平已變顏色，天津已成焦土，敵人的飛機軍艦四出威脅，還未見應戰力量的發動。只見狂敵燒殺，我們的陣營卻陰森森的籠罩在黯淡的雲霧之中。這種現象的解釋，自然是我們的準備還有問題。

提起準備來自然會使我們想起我們的內政問題。這幾年政府在建國工作上的努力及準備，是不可否認的，在這種努力及準備上給國家換得若干進步，也是不可否認的事實。但在這種努力上我們不能否認它有浪費的地方，同時準備的效果也難免有問題。政府的組織冗雜疊架，貪污的黴菌佈滿上下機構，不僅浪費，且必影響效果。李鴻章是有志復興中國的一個人，他做了不少的富國强兵的工作，但他一未能堅定自己的心志，二未能肅清左右的貪污，以致數十年的苦心經營失敗於一旦。甲午戰爭之際，他自己先既未能下定和戰的決心，及至不得不戰之時，準備的不可靠遂完全暴露了。北洋的軍備差不多是聚全國的財力經營的，但是打起仗來，軍艦上的大砲放不響，甚至發現砲彈裏裝的是沙土。觀照與不戰而棄旗艦，我們以億萬金錢經營的軍港要塞，成績上是準備，結果卻是資寇兵齎盜糧。日本人兵不血刃的得了旗艦，把無辜的中國人民殺得雞犬不留。李鴻章負的是一部分責任，爲禍之烈，業已如此；推及全局，更不堪問。貪污及怯懦，它會整個斷送我們民族國家的生命的。

我們現在的國防準備是否還在這舊螺旋上兜圈子，我不敢確定，但也聽見不少使我難過的消息。一個在電器界服務的朋友告訴我兩年前中央就買了一大批飛機上用的無綫電，到現在猶未交齊，東西也未曾拿走或試驗過，經手人的回扣却早得到了。這在政府的帳簿上自然是準備了，但當我們的飛

機飛上天時，仍不免要一聲一歎。又一個在遠遠省分的朋友來函告訴我，政府在那裏儲藏的數十萬加侖汽油最近被焚。我想這件事原因不外兩個，漢奸或貪污。我很懷疑是後者。猶記得三年前一個飛機場失火時，那種有紀律的燒法，很明顯是在毀滅犯罪的事實。他們寧負失愼之咎，不敢擔當貪污之罪。飛機的帳簿不敢見人，汽油不燒掉也許會成了冷水。這僅是可舉的兩個小例，推而至極，貪污不去，可使國防變成空殼。不僅如此，一個政府它若蒙上貪污及偏蔽，更會影響全國的人心。上海紗布交易所的風潮不是一件小事，已到國人皆曰可殺的程度，政府爲什麼不能做行政的處斷，偏偏在舉國人心憂憤的時候這個案子却得到國家法律的「保護」。這是一件事。盧溝橋事件發生以來，在各方面我們都可尋到國家進步的現象，惟獨財政金融方面表現的情形太叫人不樂觀了。公債停拍，物價高漲，資本逃避，不借打開近一月來外國銀行的帳簿看看，恐怕買外匯的便不少接近政權的達官闊人。這樣的財政金融如何應付大時代？

我一貫的愛護中央，愛護政府，近兩年我更以一貫的態度言論來勉勵和督責一般國人，現在我也不惜指出我們的政府還有它的腐爛面。我一面愛助中央，擁護政府，領導我們爲民族國家的永生奮鬥；同時要求政府迅速施行手術，割去腐爛面，以免糜爛蝕蛀我們民族國家的生命血液。國家的局面已到

尖銳的階段，我們的大策無論如何決定，我們再不能因循於散漫浪費的路上。我要求中央迅速嚴密政府組織，肅清貪污腐爛份子，吸收新鮮血液，在組織上單純強固起來，在這個精神原則之下，出現一個廉潔有能的「戰時政府。」在這個「戰時政府」之下，無疑的將更振奮全國的人心，增强準備的效果及奮鬥的能力。

我近年堅固的相信蔣先生是我們國家的領袖，在他的領導奮鬥之下，可能渡過我們民族國家的難關。但是，我們也要知道一個領袖的聰明能力都有他的極限，須要組織及人材的輔助，經不起左右的包圍蒙蔽。我們堅決的要求蔣先生一面領導全國對外奮鬥，一面對內肅清貪污，造成一個廉潔有能的「戰時政府。」我相信惟有刷新自己的陣營，纔能確保對外的勝利。

中華民國廿六年八月二日于上海。

（附註）（一）本文有許多地方因行文便利寫作「我們」的，從狹義解釋，只是一個「我」字。

（二）此文初稿未曾發表，現在把它收入集子裏，還刪去許多所應該說的話，這也是我應該沉痛自譴的一點。

滬戰引言

一

自虹橋機場事件發生後，我方首對此不幸表示遺憾；並切實與日方共同調查事實眞相，循外交途徑解決。詎料日方一面應允由外交途徑和平解決，一面大舉增兵調艦，連日調集淞滬之軍艦達二十餘艘之多，海軍陸戰隊及陸軍萬餘人之衆，並有二三千人實行登陸。我方原與兪市長和平相安之旨，已將保安隊自動稍稍後撤，嗣見日方劍拔弩張之勢，知上海之和平終將不免被人破壞，我政府乃不得不派軍來滬，以衞土保民。惟我軍之任務完全在於防守，絕不自動出擊，故滬市自前日起雖已入戰時狀態，市內交通一部斷絕，中外市民均惴惴於戰禍之迫於眉睫，以我軍絕不挑釁之故，前日之夜竟於戰時的緊張情緒下而和平度過。然嗜好弄火者絕不甘耐寂寞，昨晨九時一刻日軍竟出動向我北區寶山路及八字橋等地進攻，我軍乃還擊，此世界大市場之上海的和平遂被日軍破壞。昨晨之接觸，歷二十餘分鐘，日軍被我驅退。經數小時之沉默，至下午三時餘日軍復進攻，四時餘並開砲轟擊，我軍被迫應戰。隆隆砲聲，

震動全滬。入晚自租界北望，熊熊火光，染紅天際。昨下午砲戰之結果，八字橋青雲橋一帶日軍已被驅走，天通庵日軍司令部中砲，閘平涼路公大紗廠第一分廠被我佔領，傳北四川路日本小學亦被占。日艦曾在吳淞開砲，無甚損害，吳淞碼頭我自動焚燬，以杜日軍登陸。晚八時頃砲聲停止，夜間無甚戰事，惟北區一帶仍有陸續槍聲。今晨兩點十分砲聲復作，雜以劇烈之機關槍聲，至三點十五分停止，火光續起。英法美三國領事昨下午曾訪我俞市長，致希望和平之意，旋復訪日領岡本，致同一希望。昨日東京閣議，決定調派重兵來滬，日既決心侵滬，故預計日內必將有重大決戰，昨日之戰特序幕耳。大時代既已到來，凡我軍民惟有沉着應付，勿懈勿餒！

（廿六年八月十四日上海大公報）

二

昨日為滬戰揭開之第二日，在濃雲勁風中展開中國之第一次空軍戰。晨十時許我飛機多架自西冉冉東飛，旋有巨聲爆發，係我空軍擲彈轟炸停泊黃浦江中之日本出雲艦，日艦以高射砲應戰。濃烟巨響，飄於空際，在軋軋機聲訇訇砲響之中，全滬人心均為緊張。午後四時空戰復作，我空軍在敵機圍繞高射砲聚攻中，沈勇作戰，至堪嘉慰。惟在此度作戰之際，有流彈落於南京路外灘及大世界兩處，致傷亡無

辜多人，最為不幸。我飛機有一架受傷，七時許空軍又有一度戰事，旋卽停止。至陸戰全日繼續未停，我軍頗有進展，日軍防地逐漸縮小。惟彼以租界為根據地，我軍投鼠忌器，進攻較感困難。此點最應為各友邦所注意，應使日軍退出租界，日艦駛離黃浦江，以免危及各租界之安全。昨因市戰，流彈四飛，租界戒嚴，特別加嚴，全市之電車及公共汽車七時後卽行停駛。晚八時許，記者步行於法大馬路時，市容慘淡，馬路兩側，橫躺豎臥俱是無家可歸之難民。眼前照耀着浦東火光，耳邊震盪着閘北砲聲，愁雲滿天，疾風襲人，其情其景深感個人運命已交織入國家的大時代中。自晚迄夜，砲聲不停，約每分鐘卽發一巨響，同時在狂風怒吼中，閘北天空燃燒着濃赤之火光，自係日艦自江中發砲轟擊閘北一帶。夜十二時左右，風仍勁疾，更降冷雨，但砲聲仍隆隆不已，火光熊熊燃燒，直迄今晨四時，砲聲火光仍相與震顫於淒風苦雨之中也。

（廿六年八月十五日上海大公報）

在大時代中翻身！

昨天是滬戰的第四日，連朝風雨，午轉晴朗，在叢叢濃雲中露出陽光。這陽光照耀着天空的飛機，照耀着地上的血跡。大時代中的大上海，一面展開熱烈的民族戰爭，一面描繪凄涼的都會慘景：在機影砲聲之下，人們緊張焦急，心頭眼裏，都似有重大的期待。偌大市場，家家商店緊閉着大門；摩天樓下轉蓬着無告的流民，夜的馬路，比死還靜，慘亮的路燈，照不見一個人影；一道閃電，一個轟雷是砲聲追逐着火線。

中國的兒女！敵人已把我們拖入大時代，我們便應該勇敢堅決的使我們的民族國家在大時代中翻身！

（廿六年八月廿七日上海大公報短評）

第一次全國對外戰爭

盧溝橋的烽火焚燬了我們的平津，現在又延燒到上海。無疑問的，這一把烽火還要繼續並擴大燃燒；在這個大火焰中照耀出中國的第一次全國對外戰爭。

中國的兒女！我們應該慶幸，更應該驕傲，生長在這個大時代裏！

中華民族立國五千年，一向孤立在東亞大陸上，未曾遇見過條件俱備的敵手，更沒有產生過全國的對外戰爭。宋明兩代的蒙古滿洲並不是條件俱備的敵手，我們雖曾兩度亡國，那是逐漸衰敗，並未經過全國的對外戰爭。近代中國的對外戰爭，從尼布楚戰爭到九一八事變一共有八次，但都不是全國的對外戰爭。第一次康熙二十四年（一六八五）的尼布楚之戰，只是東三省的兵與俄國兩。第二次道光十九年至二十二年（一八三九至四二）的鴉片戰爭，軍事範圍只限於沿海粵閩浙蘇數省，英人只在沿海襲攻，清廷動員也只有沿海數省。第三次咸豐六年至十年（一八五六至六〇）英法聯軍之役，由廣州打至北京，主要軍事只在粵冀兩省，軍事徵調也只限於沿海一線。第四次光緒十，一年（一八八四

，五）的中法戰爭，事只限於西南一隅，規模尤小。第五次是光緒二十，一年（一八九四，五）的甲午戰爭，那是中日兩國的正式戰爭，戰場只限於奉吉兩省及渤海沿岸，是以北洋數省對日本全國，偌大一個戰爭，在中國方面，李鴻章以外的內外大吏幾乎皆是壁上觀火的人。第六次是光緒二十六年（一九〇〇）的庚子事變，那次事情簡直是一個亡國局面，亂子卻只鬧在直隸一省。第七次是民國十八年（一九二九）中俄在北滿的衝突，那只是一幕滑稽劇，算不得戰爭。第八次便是民國二十年（一九三一）以來的中日局面。這一個局面，到現在拖延了六年，我們最初不抵抗失了遼吉黑三省，假抵抗送了熱河一省，半抵抗丟了河北半省，打了一個塞噤又去了察哈爾的一半。這些次對外事端，老實說，都算不得戰爭；尤其近五六年來的情形，失地四五省，對內對外都不成一個局面！

現在不同了！我們經過五六年的鞭撻，忍受無數次的屈辱，中國人的意志堅毅了，中國人的骨頭強硬了。我們真應該謝謝日本帝國主義給予我們的教訓與磨鍊！在這無情的教訓及磨鍊之下，中華民族的靈魂復活了，中國政府的力量長大了。現在的中國，無內爭，無歧見，四萬萬人惟一心，全國的人民，軍隊及官吏，都在同一的情緒下聽候同一的號令，政府能用她的機能集中調遣全國的人力物力，對外鬥爭。這一切一切，在中國歷史上是空前的，今後則將永遠如此，以迄戰勝她的強敵，給世界樹立一個真正的

(2) 存文生去

「東亞安定力」——

現在我們看見平綏平漢津浦三線的大戰，淞滬健兒與敵人的肉搏，這幾條火線將聯成全面的戰爭。統帥的號令已普遍動員全國各省的軍隊，邊遠如雲貴四川，硃隔如桂粵，懸絕如陝北共軍，現在都泯除一切意見，在一個號令下，行將奔赴前線，去盡保衛祖國的神聖使命了。這是中國歷史上所未之前見的。

看！南口抗戰羅芳珪部全團殉國以待援軍的壯烈，淞滬空戰降落敵軍陣地不肯做俘虜隻槍奮戰而卒死於敵人亂彈之下的空軍健兒的志氣，眞可以動天地泣鬼神！惟有這樣的壯烈這樣的志氣纔可以復活中國民族的靈魂，摧毀日本帝國主義的堅壘！

中國的兒女！我們應該慶幸，更應該驕傲生長這個大時代裏！我們祖宗所未見到的全國對外戰爭，我們見到了而且參加了，這是何等的光榮！何等的幸運！

（廿六年八月十九日上海大公報社評）

我們上海人

上海變了樣子了，在敵人的飛機大砲下變了樣子了，昏睡在這個大都會裏的人們也該要變變樣子了。

中國的財富集於東南，東南的財富集於上海。住在上海的有許多是有錢的人，更有許多許多是跟有錢人學樣的小布爾喬亞。這羣人平常過的都是舒適的或準舒適的生活，個人的志氣及國家的觀念都給舒適的洪流汨沒了。終日所追逐的只是個人的享受，毫未曾想到國家的榮辱與安危。近數十年來中國的命運隨時顛盪於逆風急浪之中，一般人都希冀在姑息苟安中討生活，我們東南人，尤其上海人，更加姑息苟安。不要說宋明兩代最後都亡於東南，就從近代外患的歷史來看，也可以看出我們東南人的姑息苟安。甲午之戰是中日兩國的第一次戰爭，足食足兵的東南不動，只看北洋一隅與日本全國拚，焉得不敗？庚子事變時國破民辱到那樣，張之洞劉坤一的乏文章——東南五省自保，居然爲朝廷稱讚，民衆謳歌。這種姑息苟安的歷史惰性恐怕現在還留存在許多東南人尤其上海人的生活裏。看自從盧

溝橋事件發生以來的情形，我們國家在各方面的表現都有顯著的進步，惟獨上海金融市場所表現的情形令人悲憤到萬分。公債跌到停拍不說，而外國銀行每天有中國人買的鉅數的外匯流出去。這種有錢人的行爲，已超過沒出息的程度，簡直等於漢奸！開封一個八歲的女孩子，她會爲了國家的急難，把自己的小金戒指並勸募到母親的銀鐲銀幣獻給國家。把這兩種情形對照一下，上海的有錢人會不會打寒戰，冒冷汗！我希望許多東南人，尤其我們上海人要認清，現在不比從前了。這一次戰爭是全面的戰爭，必然越打越大，一直打到敵人躺下我們還能立着的時候爲止。個人的運命已與國家的安危交織在一起，國家安個人亦安，國家危個人亦危，絲毫沒有僥倖。我們應該把個人運命與國家運命熔成一片，國存與存，國亡與亡！

誰不相信？鐵一樣的現實降落到你的身邊。戰事纔剛剛開頭，全上海三百五十萬人口至少已有一百多萬人失了業。沒有鹽現的職業全部停止，正當職業也大部不能活動。這是現實，中國人誰曾過過眞的戰爭生活？現在却有鐵一樣的現實逼住你非過不可。小布爾喬亞們的悲哀的日子到了，從此我們要勒緊肚帶過活，硬着頭皮做人；看你還能歌台徵曲舞場選作不？大時代就要掃蕩了小布爾喬亞的懶惰與奢靡！

我們上海人眞應該變變樣子了。大家請想想，我們平常過的是什麼日子？有幾個不是失魂落魄的鬼混！現在我們應該知道過去是在罪惡中過生活，我們的生活有許多地方是給社會增多腐爛，給國家減少力量。上海的大市場假使是專門供給腐爛生活的，那我們就把它整個毀掉了又有什麼顧惜？我們都是中國的好兒女，在國家的大危難中，我們應該改變以往的生活方式，去掉奢華，刻苦耐勞，有機會給國家盡些力，做些事。男子們應該剗除頭腦中的一切雜念，濾淨腸胃中積存的油膩，少享受，多用力；女人們應該伸直了頸後的髻髮，洗去了臉上的脂粉，脫掉了脚上的高跟鞋；大家返璞歸眞，各自硬綳綳的做一個大時代中的中國人！我們現在要過戰時的生活，將來平時也要過戰時的生活；有這樣的意志和勇氣，纔可以經常的把個人的力量貢獻給國家。看看前線流血的衛國戰士，街頭露宿的無家難民，我們現在卽使餓餓肚子，還不應該嗎？

看！天空鐵鳥在飛；聽！耳旁大砲在響；敵人硬拖着我們走上大時代的戰場。我們不要膽怕，也不要氣餒，在國家社會的大變局中，正是我們重新做人的機會！

上海變了樣子了，在敵人的飛機大砲下變了樣子了，昏睡在這個大都會裏的人們也該要變變樣子了！

（廿六年八月廿一日上海大公報社評）

東亞大時代

東亞大時代降臨了，我們應該用十足的勇氣去迎接它。

中華民族在東亞大陸上峙立了五千年，從西北角上發脚，東出海表，西入朔漠，南臨粵澳，開疆一千一百一十七萬餘平方公里，人口蕃衍四億五千萬衆。這個大族，在五千年的壽命歷程上，披荆斬棘，提攜落後的民族，給人類創造一片文化的產業。就中日兩民族的關係說，已有兩千年的文化因緣。自秦漢以降，中歷晉魏六朝，代有往還，至唐而往來益密。凡東瀛的典章文物，政治學術，宗教禮俗，以至人生日用之資，幾乎無一不取法於中國。自宋迄明，關係雖已不如唐代的密切；然明亡之後，尙有朱舜水先生講學東邦，給日本樹立下近三百年來的文化根基。在這兩千年來的悠長歷史中，中國對於日本總算盡了一個文化宗邦應盡的義務；在種族上也有深厚的血緣，在現代日本人中，恐怕就有不少中國祖先的裔孫。中國對於日本放了這許多債，她是怎樣的報答我們呢？！好還的不說，單就近六年來的情形看，佔我們四省多土地，奴我們三千多萬的同胞，最近又藉端毀滅我們文化故都的北平及商業重鎭的天津。狂燒虐殺，

滅絕人性，更殘酷毒辣的摧毀我們的文化機關。中國人要知道！日本就是這樣的報答手段又光顧到上海。在八一三滬戰爆發的前兩天，日方海軍發表聲明，謂將『採取獨自的行動，以啓中國之蒙』。哈哈！這話眞有味，我們這個以禮義立國的老中國眞該入一入嶄新的强盜學塾了！謝謝你！我們已念懂這最初的也是最基本的一課了，便是——强盜來打我們的時候，我們也打强盜，且必須把他打疼！

在近代史上，中國在世界的大局面中，不斷的被迫對外作戰，但從尼布楚之戰算起到九一八事變，一共八次對外作戰，並無一次是全國的對外戰爭。（參閱拙著『第一次全國對外戰爭』本月十九日大公報社評）就兩千年來的中日關係史上看，這兩個民族也從未發生過全面戰爭。秦漢時代，日本對於中國也只是綏化中國文化的夷狄之一種，根本不成敵體；其後漢學浸遍東瀛，根本用不着刀兵；元朝忽必烈東征，打到日本國內，那是蒙古人的事；明朝倭寇之亂，只是流寇性質；豐臣秀吉征朝鮮，明雖動兵，也只是一隅之事；降及淸季，日本吞琉球，擾台灣，均未演成大事，直至甲午朝鮮之爭，纔爆發了中日兩國的第一次戰爭。那次事，中國方面參戰的只有北洋一隅，算不得全國對外戰爭。其後，庚子事變日本軍隊到了中國的首都，甲辰之役日本在我們的東三省同帝俄開戰，歐戰期間日本攻掠山東，都是枝節片斷，

根本不成爲戰爭。九一八的事情，估計上奴民就外來的條件講，已充分可以構成戰爭了，但是我們忍耐屈辱以至於今。不抵抗，假抵抗，半抵抗，一面抵抗一面交涉，——在這五六年的經過中，就未曾有過一個戰爭的局面。現在情形不同了。我們在六年的忍耐中，在精神上人們增厚了國家意識，國家成功了一個統一的局面，在物質上也多少儲蓄了一些力量；隣人如必不許我們走和平建國的路，用强盜的故技，妄想割斷我們的生命，那我們便只有整個的拚了！在這條路上，必然的是中日的全面戰爭。

我不是絕對主戰的人，對於兩國政治家把中日現局導演到現在地步的歷史功罪，也不願作過早的批評。但是，舉目北望，我的家鄉已給强盜的火焰燒掉，我所關切的親族朋友沒有存亡的消息；現在這把强盜的火焰又燒到我的身邊。當我握筆寫這篇文章的時候，機影砲聲和烟焰便交織在我的眼前耳旁。我現在的心情，對於愚蠢敵人惟有憐憫，因爲他們是被魔鬼驅策着來中國送死的；對於我們的英勇戰士痛切感謝，因爲他們是在給中華民族盡着殺敵保種的大使命；對於自己深覺榮幸，這樣一個無拳無勇的人居然有機會作大時代火焰的燃料！

昨天的東京路透電說，『日政府今後將視中日的衝突爲中日偶發事件。』日本政府的狡獪令人可笑可氣，我們要認定這是戰爭，絕不是什麼『衝突』或『偶發事件。』現在我們應該把駐東京的使

節撤回了；我們不能一面對敵人拚命一面讓我們的國家代表受敵人的嘲弄。大時代既已降臨，我們便應該勇敢的迎上去，不可閃躲！

猶記得去年冬我與一位日本外交界的人物談起中日問題，我鄭重對他說：

『在過去數十年中，中國與日本的關係，眞壞過，也眞好過；但無論好或壞，都是整個的日本對付部分的中國。如甲午之戰，那是壞的時候。名義上雖是中日戰爭，實際却是日本和李鴻章一個人打仗。從地域上說，也只是日本對北洋開戰；中日兩國雖正式宣戰，北洋以外的中國實際並未參加，北洋以外的負責者，內如內閣軍機，外至封疆大吏，事實上差不多都在看李鴻章一個人的笑話。又如民國六七年的段內閣，和日本辦了許多旁人所未辦過的事，那可算是好的時候。但段政府所做的事，也只能代表段政府一系的勢力，與國民全體簡直的不相干。現在的情形不同了。中國國民已眞正認識國家統一對於民族獨立生存的需要，而努力向統一程途前進。這種努力，現在已有相當的成績表現了。希望日本人士注意，中國這種努力將直接影響今後的中日關係。今後的中日關係，不是整個的好，便是整個的壞。以前那種好壞皆不澈底的情形將要過去了。以後的中日歷史一定是另外一個寫法了。』

現在就到了整個壞的時候了。邦交壞到極點惟有打仗，打倒了日本軍閥，打倒了日本帝國主義，我們纔可以和日本國民握手，恢復兩千年來的深厚舊交，出現一個中日兩大民族整個好的局面。

大時代來了，中國要努力做這大時代的主人。這將是東亞歷史的空前一章。現在是東亞大時代的起點，爲了我們祖宗的光榮，爲了我們子孫的幸福，凡是中國的兒女，都要獻身給這個大時代，都要朝着這個大時代的火焰前進，我們甘願做這火焰的燃料，以延續我們中華民族的光榮！東亞大時代降臨了，我們應該用十足的勇氣去迎接它！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八月二十一日於上海砲聲中。

獻金！

中國的兒女們！現在國家大危難中，我們不能坐看前方將士流血殺敵，也應該挺起腰來爲國家做些事情。

我們要給國家做事有兩條路，一是獻身，二是輸財。投効服役是獻身，毀家獻金是輸財。服兵役，上前線，平時要有戰時的訓練，在國家的統一組織及命令之下活動，纔有效，不是只憑一時感情衝動便要求槓槍上前線所可濟事的。後方民衆最容易做的是量力輸財，尤其有效的是獻金，把你的藏金藏銀拿出來，獻給國家。

現代的戰爭是消耗戰，持久戰；誰能持久的消耗不竭，勝利便屬於誰。現代的戰爭，與其說是軍器的戰爭，毋寧說是經濟的戰爭；誰的經濟能力能支持到最後，勝利便屬於誰。在現代國家中，政府賬簿上的國富（就是說政府可以拿來對外打仗的國富）是有一定限度的；國民如果把他們所私藏的現金現銀以及金銀首飾獻給國家，馬上便能增加國富，增加抗敵的力量。

我們爲什麼這樣注重獻金，我願意稍加解釋。記得月前記者參加廬山談話會時，因爲大家很熱烈的討論研究戰時的後方工作，我就說：戰事爆發後，後方民衆一定要起來做事，投効，服役和捐欵等等。前兩種要有事前的訓練，更要有守紀律聽命令的習慣及肯犧牲的最高道德，纔有效；否則，毫無準備訓練及組織的動，事實上非徒無益而又害之。以捐欵說，也應該選最有效的做。說到捐欵，我們用的錢是法幣，我們若是捐法幣，事實上只等於法幣搬家，並不能增加國富和國力。因爲法幣準備金早已集中在國家銀行裏，流通的法幣是政府信用的籌碼，只代表國內的購買力，對外的購買力必須是硬的金銀。法幣儘管揣在我們的荷包裏，在國家的大關頭中，政府儘可以動用法幣準備金，從國外購軍火，買糧食。當時我這話頗引起少數人的誤會，以爲我是澆冷水。其實我是要大家做最有效的事。我也不根本反對用法幣捐欵，因爲就對內購買力的意義說，這種捐欵對救護傷兵，慰勞將士，救濟難民等等，還是絕對有效的。

我們的物資有限，如何開闢對外的購買力，對於戰爭的前途關係非常重大。關於戰費的計算及籌措，據專家估計，根據歐洲大戰各國動員數目及軍費用額計算，我們對日戰爭，每天的戰費約需三百萬元。戰費的來源最可靠而且最現成的是法幣準備金。我們貯蓄在國家銀行裏的法幣準備金數約十萬萬元，按每天戰費三百萬計，這筆欵子便可同敵人打一年。法幣準備金是政府賬簿上的國富，在戰時，政

府可以用這筆款子買軍火，購糧食，調撥外匯上的差額。但是，民間的藏金藏銀是在政府賬簿以外的。法幣實施以來，流散在民間的銀元並沒有全部集中，內地的人民多有把銀元熔成銀塊埋藏在地窖中的，收藏現金的也不少，再加上金銀首飾及金銀器皿，其數目一定很可觀，少說有數萬萬元，多說竟許也有十萬萬。假設這個數目有十萬萬，若把它集中起來，馬上增加一大塊國力，原來可以支持一年的，這樣一來便可以同敵人打兩年了。這是最有效的一個辦法。這事可從兩面做起，一面由人民自動獻金，一面由政府徵發。政府可以用法幣，救國公債及關金債券等掉換民間的藏金藏銀，這樣對於不願意無條件犧牲的人也可以叫他們把現金現銀貢獻給國家。

我們久想發起一個獻金運動；我們還沒有做，人們已在自動的做了。最初有一對新訂婚的男女，把他們的訂婚戒指捐到本報，叫我們轉送給政府，我們當時就很興奮。其後開封一個八歲的女孩子，把自己的小金戒指並勸募到母親的銀鐲銀幣寄到本報，轉獻給國家，這女孩子的純眞更使我們爲國家的前途喜慰。昨天又看到蘇雪林女士把她的歷年教俸及著述所入積存價値國幣六千多元的黃金送到本報，叫我們把她的十年心血獻給國家，我們感動極了。這纔是中國好兒女的純眞的行爲！

我以爲這幾個人的行爲，在目前國家的大危難中，至少有以下三種意義：一增加國家的抗敵力量；

二求得個人良心上的慰安；三擴大社會教育的影響。這是一種活教育，它的影響一定是很痛切而深刻的。中國的兒女們！我們對於這幾個人的行爲，都應該含着感激的熱淚，也把自己的藏金藏銀拿出來，獻給國家！

（二十六年八月二十四日上海大公報社評）

戰時外交

現在是戰時，我們應該有戰時外交。戰時外交的最高原則是：覓取一切朋友的力量，以打擊當前的敵人。

根據這個原則，由政府到國民都應該具備一個堅確的認識，就是：我們的敵人只是一個日本帝國主義，此外世界各國皆是我們的朋友。為了貫澈這個認識及發動戰時外交的力量，我們政府及人民在行為的各方面都要小心謹慎，消極的不挑動國際的惡感，使世界的同情常在我們這方面；積極的要取得友邦的援助，以打擊我們的敵人。

這兩點都很重要，積極的消極的都該進行。凡與我們有損的，我們都應避免；凡與日本帝國主義不利的，我們都要進行。汪主席曾說：「我們要有拔刀相助的朋友，不希望在我們倒下之後，大家來送花圈。」就是說，我們不僅希望同情，更需要援助。說到同情，自九一八事變以來，國際的同情一向在於中國，國聯調查團的一大本報告書，國際聯盟一串串的決議，還不够說明國際的同情嗎？但這種同情並不能阻

礙日本的野心與暴行。但是實力的援助繫於利害，尤須出發於同情，故我們的戰時外交，第一不要失掉國際的同情，更進一步取得朋友的助力。

如何發揮戰時外交消極積極兩方的效能，舉例來說，可得以下三條原則：

第一，凡關各國共同利害的萬萬不可挑動。取消一切不平等條約及打倒一切帝國主義的口號，要絕對的收拾起來，不可再以空言樹敵。不久以前，撤銷領事裁判權的呼聲忽然盛極一時，當時我們就覺得是一種分力樹敵的不合時宜運動，曾著文提醒大家說：『現在吾等之大目標為建國，對外之死活問題在日本。吾等在最近五年十年之內，應集中一切精力於此點。吾等能於此兩點之上立定腳跟，領事裁判權之撤廢，將如吹灰之易矣。』現當戰時，這一點認識尤其要緊，不錯，領判權及租界妨害我們的主權，但非急症，我們非但不可去碰它，且對租界當局替我們維持界內的戰時治安，收容我們的戰時難民，應表示感謝之意。我們要認準一個敵人用力，不另外樹敵。我們非但不自發的去樹敵，並且對於其他各友邦人士的偶而不檢或小誤會，要加以可能的容忍及友誼處理。不使與他國稍生糾紛，縱有糾紛，要迅速的加以解決。

第二，對於各國的善意不忽視。在戰爭進程中，凡是各國的建議或勸告，無論其出發點如何，只要是

善意的，我們都應加以善意的考慮。譬如美國國務卿赫爾的和平呼籲，我們要表示絕對的同情。又如英國政府關於上海中立區的建議，因為這建議是善意的，我們也表示感謝他們的好意。日本的拒絕，正是暴露它的醜惡。這是目前可舉的幾個例，此後一切隨時發生的問題，我們都可用同一的態度去處理。但，同時更積極的對日作戰，勿因友邦的善意而發生和平的幻想。

第三，積極的覓取朋友的援助。近年來的國際情勢，日本是在全世界樹敵，我們自然要在全世界求友。我們求友的途徑，應該切實的個別進行，不可依靠空洞的共同機關。前傳我國政府將向國際聯盟提出申訴，便大可不必。我們已飽嘗國聯的空心湯圓，現在再去請教它，結果必將重演那一套，且將就誤了各國的單獨外交行動。我們現在不惜高利借款，高價購械；凡是可能的物質援助，不惜任何代價，都把它抓了來；在長期苦戰中，以待國際利害的發展。我們若能在戰時外交中不斷取得友邦的物質援助，堅強的奮戰，這個國際共同利害的局面，自然可以加速的到來。

以上三條原則，不但政府應該注意，更適用於一般國民，國民的行為更可以反映到國家外交上去。

我們國民，對於一般的友邦人士應該概取善意，對於敵國的非戰鬥人民也不敵視。日本人褊狹，我們務要正大；日本人殘暴，我們務要仁俠。日俄戰爭時，美國對日本幫了許多忙，而樸資茅斯條的剛剛簽

字，東京的『燒打事件』大打美國僑民，那是以怨報德。東京大地震時，日人乘機屠殺中國僑民，那是趁火還兇。現在淞滬戰爭時，日本飛機無端擊傷奔走和平的英國大使許閣森爵士，這又怎麼講呢？我們中國人，是東方文明的傳道士，我們要撐持東方文明的危局，一反日本人的暴行而行。我們對於武裝敵人要給予無情的打擊，對於他們的俘虜及難民卻加以存恤。友邦的人士若在戰爭中遭遇損害及危難，我們應該儘可能的去援救。敵人襲擊我們友邦的使節，我們的公私社團及一般國民都應該送鮮花，寫慰問狀，去慰問許閣森大使，並虔誠祝禱他早復健康。至於僑居國外的人民，不啻國家的國民外交使節，更應該端身慎行，以個人的美德，換取友邦人士對於我們國家的重視，儘可能的傳達國家的意旨，獲得國際的友情。

（廿六年八月廿八日上海大公報社評）

中蘇不侵犯條約公布

中蘇不侵犯條約，本月二十一日在南京簽字，於昨夜公布。當此時會，這個條約的公布，自極引起中外人士的注意，我們願一述對於此事的簡單認識。

第一，中國一向願與世界各國維持和平友好的關係，絕不想侵害他國的領土，以破壞和平，因此也衷心希望他國不來侵害中國的領土，長維和平友好的關係。我們根據這點願望，凡是以保持和平為目的的國際信約及機構，中國都願參加並信守不渝，如國聯盟約，九國公約及非戰公約，中國都曾參加並始終信守。蘇聯近數年來與世界各國分別簽訂的互不侵犯條約，其文字與精神均在維持國際間的和平友好的關係；今以同樣的文字與精神，與中國締結互不侵犯條約，與中國的意願完全脗合，故欣然簽訂此條約，並信守不渝，以長維中蘇兩國和平友好的關係。本此精神，我們願對這個中蘇不侵犯條約表示誠摯的歡迎。

第二，這個條約的性質一如其文字，根本為消極的。簽約國的義務，只在消極的不侵，而無積極的互

助。根本精神在於互不相侵，而非脇以謀人。日本近年常常懷疑中國親俄，其實是不對的。說到「親」字，自然應作「親善」解釋。那麼，中國不但親俄，而且親日，並親一切國家。我們願與一切國家親，但在事實上却發生了「是否可親」與「能否相親」的問題。譬如我們願與某一國親，但她是否有可親的條件，及她是否讓我們與之相親，都成很大的問題。日本同用漢字，但對字義的解釋往往另有豐富的意思。譬如她要中國親日，這個「親」字簡直當作「投降」解；她說中國親俄，這個「親」字便可解成「聯俄攻日。」這是不對的。「親」就是「親，」絕不該有異時異地的其他解釋。日本人常說，他們侵略華北是為對俄，要中國諒解。不錯，日本近年來的做法，不惜與世界爲敵，尤其積極準備對俄。但是，我們絕未誤會日本的意思，我們深切的知道日本對俄是手段，對華是目的。日本爲什麼不惜與世界爲敵？爲什麼積極準備對俄？很簡單，其目的只有一個，爲的是征服中國。日本脅迫我們與她訂立共同防共協定，其根本用意，是要中國先幫她打倒蘇俄，然後再任她整個統治中國。這樣的「親日，」我們是不敢領教的。我們願與日親，但不能這樣的親。反之，對於蘇俄，她若對於我們沒有領土的野心，並願長維和平友好的關係，我們自然與之相親。但這只是親善，並非如日本所猜疑的脇以謀人。

第三，中蘇不侵犯條約，其精神與文字一致，它是世界和平的一環，和平機構的一種。我們本着和平

的意願，願同世界任何國締結同樣的條約；現在的中日關係雖極惡劣，日本如果放棄了侵略中國領土的野心，願走和平友好的路，我們也願毫不躊躇的與日本締結同樣的條約。這一點希望日本反省覺醒，用不着張脈僨興的忌嫉中蘇友好關係的增進。

（二十六年八月三十日上海大公報社評）

慰平津流亡同學

——八月三十日爲上海平津流亡同學會講——

諸位同學：我們今天在這裏見面，我不知道用什麼話纔可以安慰你們，現在我心頭所感覺到的只是難過與喜歡。難過的是我們都已破國亡家，你們並且丟失了讀書的學校；喜歡的是我們生在這個大時代裏，做這個大時代的中國人。你們自北方的火窟跑出來，現在又走到南方的火窟來。這不是逃亡，乃是走出一道火綫，又走上一道火綫。從這一點上看，敵人已把一個絕大的現實，我們民族存亡絕續的現實，壓到全體中國人的頭上，使你無處可跑，無處可逃，非與這個現實相拚不可。

諸位皆是讀書的學生，過去皆曾做過救亡的工作，現當國家大危難之時，更應該加緊鍛鍊，加緊工作。現在擺在諸位面前的問題有三點：一是個人的生活；二是做什麼工作；三是如何做工作。關於這些問題，諸位在江南多數皆有家庭親友着落，生活問題尙小。至於工作問題，我以爲第一應該與政府教育機關及地方社團發生一種聯繫的關係，在這種關係下，找學校讀書，找工作做。上海不是可以久留的地方，

一部在這裏沒有着落的同學，應該趕快設法到內地去。這次中日戰爭絕不是局部的，我們應把抗戰的力量播種到各地，以從事長期的戰爭。諸位應該各自找到一個固定的地方，加緊鍛鍊，刻苦讀書。我不是引導諸位去讀死書，是要諸位知道在這大時代中青年更有求知的急需，用心的去讀這本國難大書。在長期抗戰中，前方戰鬥員的補充需人，後方的救護及建設需人。這些事需要人做，却需要經過訓練與組織的人去做。諸位先要經過一番堅苦的訓練，然後纔能把個人有效的貢獻給國家。

說到我們國家的前途，我絕不悲觀。我們客觀的看敵人，主觀的看自己，都不悲觀。自盧溝橋事件以來的日本瘋狂行動，是敵人又在吃毒藥。這一劑毒藥可以毒死他自己同時也可以毒死我們。我們中國若還是六七十年來的舊樣子，無疑的，我們還要失敗。可是這五六年來我們不斷的受日本人的鞭撻鍛鍊，我們的國家在精神及組織上已形成空前的統一，國民在意識及利害上已與國家契合為一，這兩點是建國制敵的主要條件，我們都已具備了。我們不要因為平津失陷後少數人的漢奸現象而悲觀，而動搖民族自信心。這些人當中眞正毫無心肝的是少數，多數是迫於一時的利害及環境而暫時苟泥的。看綏東察北偽軍的先後反正，孫殿英石友三的終為國家奮戰，到了一個尖銳時期，這些人仍將回到祖國的懷抱裏來。凡是中國的兒女，他們的血是中國的，他們的心最終必然也屬於中國。除了極少數冥頑不

靈眞正喪失靈魂而殘毁國家民族生命的不肖子孫應給予嚴正的制裁，外對於多數失掉國家保障而暫時苟混的人，我們應不吝給予原諒及期待。兄弟是河北人，我一向對於河北人的國民氣質就很懷疑。因爲河北這地方，自從五胡亂華以迄滿淸之亡，曾斷斷續續受過近千年的異族統治，在異族統治下做順民的氣質，說不定還保留在河北人的身上。東北四省失陷了六年，義勇軍的活動奮鬥，使僞滿的統治常在不安，河北省失陷了之後是否也將有這些無名英雄起來活動奮鬥呢？我從前很懷疑，現在我却肯定的恢復河北人的自信心了。看通州保安隊的反正苦戰，及平津失陷時官民互助的精神，都是可歌可泣的。我相信河北人再不要服服帖帖的做異族的順民了，他們將會給國家繼續創造壯烈的歷史。

近年來的平津文化敎育界，我一向視爲北方的一道精神國防。平津失陷之後，隨着諸位同學的流亡，這一道精神國防好像業已崩潰，其實是它業已達到了它的神聖任務。自一二九運動以來，諸位同學的努力，至少業已做到以下三點：（一）普遍喚起一般國民的國家意識；（二）保全了二十九軍；（三）保全了平津。當二十四年冬天，一二九運動爆發的前夜，在所謂華北五省自治運動的高潮中，二十九軍高級將領的國家意識及民族自信心多已動搖，那時平津河北可以馬馬虎虎的送掉，使日本不費一槍一彈的取得這塊領土。可是諸位同學的怒吼喝定了他們的驚魂，穩下了他們的動搖，未曾使大漢奸

的深淵，最終仍做了流血抗敵的民族英雄。這是你們保全了二十九軍。何謂保全了平津呢？我們若在兩年前用漢奸的方式把平津送掉，則是喪盡了民族正氣，不僅平津無再光復之日，同時或許連這兩年來的國家進步都給堵塞了。現在是在赤血焦土之下失去平津，其意義便大不同了。在失土上灑上民族的熱血，我們的民族生命便在那地方生了根。我們流血失了平津，一定還能流血把它收回！

諸位皆是中國的青年兒女，我們民族的菁英，現當國家大危難中，都要長志氣，肯做人，求知學技，鍛鍊體魄，隨時隨地給國家盡忠做事。儲蓄下豐富的智識技能，準備下最高的情緒，聽候國家的徵發。國家要我們的財產，我們便連最後一個小錢也不留；國家要我們的生命，我們便扛起槍來上前綫去流血。凡是中國的兒女，人人都有這樣的志氣，人人都有這樣的英勇，國家民族的復興一定不遠，一定很近！

斥人道的劊子手！

眞令人難過，眞令人羞慚，在世界的東方竟出現了人道的劊子手！

自從盧溝橋事件以來日本軍人發了狂，打仗原是要死人的，最不可恕的是他們對非戰鬥員的和平民衆的殘殺。在平津戰役中，無辜市民備遭屠戮，中國軍隊業已退走，日軍還在天津市區內肆意燒殺，和平民衆陳屍塞途，文化機關慘被摧毀。淞滬戰事發生以來，日本軍人的野蠻，更暴露在全世界人的眼睛裏。這羣野蠻人正對着無拳無勇的和平民衆執行殘酷的屠殺。這種慘劇每天都有發現，舉不勝舉，最彰著的如上月二十二日歐美人親眼看見日本陸戰隊用刺刀刺死無辜民衆，投屍浦中。二十八日日機在南車站向候車的難民投彈轟炸，致死傷七百餘人。這一幕慘劇也是各國人士所共睹的。又在楊行鎮汽車站投彈，致站內難民二百多人全數罹難。虹口楊樹浦區內的日軍，不斷殘殺中國平民，且有分區屠殺之舉。黃浦江中時時發現浮屍，兩手反縛，身被刺傷，婦人小孩或僅餘身體一段，漂流江中。又如日機襲擊英大使汽車的事，更是看出日軍對於和平人士的生命是怎樣的非法蹂躪。日本軍人這種野蠻殘酷

的行爲，一背人道，二違公法，三毀武士的精神。東方文明尙仁俠，武士的精神要勇敢。日本軍人這種屠殺和平民衆的行爲，絕非勇敢，乃是怯懦的充分表現。日本軍人腰間揣上「千人針」，胸前佩上「觀音像，」然後全副武裝的走上戰場，他們的戰鬥成績自然是向強敵屈膝，對弱者逞兇。這是人類最卑鄙最怯懦的行爲，想不到竟是我們東鄰武士的看家本領！

日本應該是東方文明的產兒，但是在近代史上他們逐漸墮落了。對於自己的同胞：如同有名的大杉榮事件那是怎樣的殘酷，怎樣的怯懦！「武士道」的勇士黑夜闖進人家，殺死全家數口，婦人小孩也都在睡夢中一刀兩段了！又如五一五及二二六事件，大隊的海陸軍人，用國家的武器，襲殺耆耋高齡的首相重臣，也不是什麼名譽的事吧！對於外賓：如馬關議和時日人刺殺中國大使李鴻章，日俄戰爭時東京的燒打事件大打美國僑民，並打走當時的東京貴賓美國鐵路大王哈利滿；最近日本飛機又無端的擊傷駐華英國大使許閣森爵士。這是怎樣的兇頑，怎樣的野蠻！對於中國民衆：如同甲午戰爭時的旅順大屠殺，全市只剩三十六個人；東京地震時的殘殺中國僑民；九一八以來一串串的殘暴殺戮，眞是舉不勝舉。日本軍人現在淞滬一帶正幹着野獸懦夫的殘忍卑鄙的暴行，他們的首相近衛文麿還在東京一再發表聲明，說「日本絕不與中國民衆爲敵。」這人道的劊子手！無恥的騙子！你們的人性還有復活的

天沒有？

中華民族與日本交通了兩千年，在我們這方面，歷史上絕少如同日人所施予我們的例子，這是我們中國人值得向日本人驕傲的一點。在以往的悠長歷史中，在文化道德各方面，中國對於日本只有貸與，絕無負債；現在眼看我們所提攜起來的這個民族，是這樣的墮落，這樣的野蠻，這樣的報答我們！我們真是又羞慚，又憤怒。我們對於這個人道的劊子手，東方文明的毀滅者，應該一面予以膺懲，一面給予啓迪，使東方人的魂靈在他們的軀殼裏復活起來！

真令人難過，真令人羞慚，在世界的東方竟出現了人道的劊子手！

（二十六年九月二日上海大公報社評）

戰時政府戰時人民

現在是戰時。我們的一切都需要戰時化，從政府的組織到人民的生活都需要戰時化。

講到戰時，我們的國家早已進入戰時，起碼自從九一八的晚上已入戰時。從那一天起，日本就開始高喊「非常時」，軍閥一面鞭撻政府，一面強姦人民，連推帶挽把整個的日本國家推進戰時。準戰時的經濟體制，準戰時的軍備組織，先後出現。一面厚徵苛斂，擴充戰備；一面造謠惑衆，鼓煽人民的敵愾心。無風生浪的侵略者，尚且像大難臨頭似的鼓着勁兒幹；我們這個被侵略被壓迫被逼到生死存亡關頭的國家應該怎樣呢？我們不否認這六年來人民意識的進步，政府工作的努力；但還不够。這種不够便由於政府及人民都未曾及早認識國家早已進入戰時。

從人民的生活講：大家儘管憤慨日本軍閥的蠻橫，憂愁國家的危難；但這種憤慨與憂愁絕對未曾反映到大多數人民的生活上。大多數人的生活方式，仍是鬆弛，懶惰，奢靡；很少人在過着緊張，奮發，刻苦的國難生活，戰時生活。現在南北都陷入砲火中，正好是訓練人們過戰時生活的時候，但在這組織散漫

感情鬆弛的社會裏，更會使你到處看出無戰時訓練的國家中的戰時悲哀。街市上流離着無告的難民，戰場上喘息着待救的傷兵，舞場一復業，居然有人又擁上火山去跳舞。假使同胞的熱血都燙不活我們的同情心，敵人的砲火也燒不緊張我們的生活，這種國民簡直已是國家的腐肉，絲毫不能起正常的細胞作用了。

再說政府的組織：這幾年政府在建國工作上的努力及準備，是不可否認的，在這種努力及準備上給國家掙得若干進步，也是不可否認的事實。但在這種努力上我們也不能否認它有浪費的地方。政府的組織冗雜疊架，貪污的毒菌佈滿上下機構，不僅浪費，且必影響效率。一個中央黨部職員過千，汽車逾百，不是浪費也是浪費；一個少年身兼數十要職，不是偏私也是偏私。這類現象在平時已然減低政府的效率，影響政府的威信，何論戰時？

現在已是戰時，我們的一切都需要戰時化，從政府的組織到人民的生活都需要戰時化。為了適應戰時，我們要求政府的組織趕快公開的做到簡化，潔化。不但要裁去一切疊床架屋的機關，裁去一切無所事事及掛名兼職的冗員，並且要切實的肅清一切貪污份子，造成一個真正簡單清潔的戰時政府。這個戰時政府，不僅有權，而且有能，有守。惟的簡化潔化的政府，纔能擔負國家的戰時任務。

同時我們願向一般國人呼籲：我們的國家是一個弱國，我們的同胞是一羣窮人，這個窮人弱國正被強敵逼上生死決鬥的戰場。我們再不能過鬼混的日子了，從人生觀念到生活方式，人人都應該澈底檢討一番。我們的人生觀念要堅定，要硬朗；我們的生活方式要簡化，要潔化。生活簡了纔能多做事，生活潔了纔能不奢靡。我們這羣弱國的窮人，要立志，要奮勇，在生死決鬥的大戰場上翻身！

（二十六年九月四日上海大公報社評）

寄日本國民

日本國民諸君：中日關係演進到今天的局面，眞是不幸。我想這個不幸局面的演成，絕不是我們中國國民的意思，也絕不是你們日本國民的意思，這責任應該由糊塗的政治家及野心的軍閥來負。我們現在願以中國國民的立場來同日本國民諸君掬赤誠，毫無隔閡的，討論討論我們東亞兩大民族的百年禍福。

× × ×

中日兩大民族，有共同的文化，密接的血緣，在過去兩千年中，曾有過相助相成的美績，曾造成有聲有色的歷史。貴國人所常說的「同文同種」「共存共榮」那是事實，也是眞理。但爲什麼近年來的事情常是違反這種事實的利益，背絕這種眞理的精義，一貫的扮演同種相殘共滅共瘁的悲劇呢？我們根究其最大的原因，實由於一種錯誤的認識及錯誤的心理所演成。你們在認識上，常以爲日本地小民貧，非向中國侵略不足以生存；你們在心理上，常以爲中國是排日的，非與中國相爭不可。這種經濟理由及

心理惡感，貴國的野心家及軍閥這樣的宣傳，你們便也這樣的信，其實是錯誤的。這種錯誤的認識及心理，不僅造成近年來東亞兩大民族相殘的悲劇，更將導日本於萬刧不復的深淵。

先從經濟方面講。日本擁有六十七萬餘平方公里的土地（包括本部琉球朝鮮台灣樺太）六七千萬勤儉有爲的國民，儘有和平發展的餘地。若謂日本地小人稠，以中日兩國人口密度的分配比較實相伯仲。日本人口的密度是每方公里一百四十五人（據一九三五年日本國勢調查）中國本部十八省人口的平均密度則是每方公里一百二十六人强（據一九三六年申報年鑑人口統計推算）。中國是一個純農業的國家，土地與人口的關係最爲痛切。若說地少人稠，中國實較日本爲甚。日本是農工並重的國家，其所感到地少人稠的痛苦，應較中國爲少。因爲一個工業國家只要能從海外採購原料，推銷商品，便能周轉。從這個觀點上說，日本非但不應向中國武力侵略，且應在和平友好的關係下，以有無相通。中國有豐富的原料可供日本工業製造，更有鉅大的消費力以消納日本的商品。這種交互的利益，惟有在和平的路上纔能發榮滋長，若必欲以武力攫奪，那簡直是殺雞求卵的愚舉，損人而不利己。

日本經濟上的病源，不在地小物瘠，人稠，而在組織的矛盾及手段的錯誤。日本在外形上已是一個資本帝國主義的國家，她的內容尚未完全進化到這個階段；尤其在農村，還是前期的小生產制度。所以

日本農業的生產雖然商品化了，可是它的一般還不是資本主義的經營。農村生產者的生活，一方面要跟着世界貿易顛簸，同時還受着天災人事種種威脅。近幾年，日本城市雖已略感通貨膨脹及軍需工業的景氣，許多農村地方仍是日甚一日的衰落。平時農作物豐收了則穀賤傷農，歉收了則農民們為窮困所逼擁擠在豈主的門前去乞售他們的米。日本城市的繁榮，一向靠農村賦課補助，日本商人更把生產大衆的收穫，做為廉價的商品，向世界傾銷。日本工業家近年索性把工業製造的可分的部門移到農村，用低廉的工資，吸收農閑及一般農村婦孺的勞動力。日本商品潮水般的湧到世界市場，使世界人瞠目結舌，相與震驚，誰知牠的原動力却是忍飢耐勞的日本農村大衆！這是日本經濟組織上的矛盾。至於手段上的錯誤，那便是日本軍閥的侵略狂。日本軍閥不知日本經濟的病源，以為惟有對華侵略纔能解決經濟的困難，同時更為功名心驅策着，遂對中國進行蠻橫無匹的侵奪。日本軍閥說滿洲是日本的生命綫，九一八事變以來占領了我們的東北四省，這六年來的經驗你們應已痛苦備嘗了。你們估得比本國還大的土地，解決了你們的經濟問題沒有？事實結果是適得其反。對於這塊偌大地方，經營開發需要錢，布置防守及進攻的軍備更需要錢。日本軍閥的算盤要防中國，防蘇俄，防太平洋沿岸的每個國家。日本軍閥的「國防安全感」非到它的軍備能够征服中國，征服蘇俄，征服太平洋沿岸的每個國家的程度，

纔能達到。請問這是日本國民所能負擔的嗎？今年度的三十萬萬大預算，已經到了悉索敝賦的程度，現在一個所謂「北支事件」又增臨時預算二十萬萬。這樣下去，如何得了？日本軍人儘力發狂，軍費儘力膨脹，預算儘力增加，赤字公債儘力增發，賦稅儘力增高，結果農村窮了，生產的大衆瘦了，最後勢必至於民窮財盡，國家經濟整個破產。這是日本經濟的病源，它的問題在內而不在外。日本要解決她的經濟問題，也必須從內部着手纔能收效。第一要解消組織的矛盾，糾正以城市剝削農村的方式，工商農各方面的機構都要注重生產大衆的利益。其次，也是最重要的，便是停止對華侵奪，恢復國際間的和平常軌，軍費一減，自然賦輕民蘇了。

這裏所說的還是平時，現在中日戰爭爆發了，不僅需要大批的軍費，且打斷了對華貿易，摧毀了在華財產。青島的日本紗廠完全停動了，上海三個多星期的戰事，虹口楊樹浦一帶晝夜不熄的大火，焚燬了日本的多少產業？請問這是不是自救？

再從心理方面講。日本軍閥宣傳中國排日，那是倒果爲因。中國從無自發的排日，不僅以往歷史上如此，一直到現在也是如此。日本軍閥不斷的把鐵掌打到中國人的身上，把我們逼到生死存亡的關頭，現在擺在我們面前的問題是如何求生存，並不是什麼排日不排日的問題。

這一個心理上的問題，我們可以從悠遠的歷史解釋到現在，都可以證明這種心理在我們這方面並不存在。中國聖哲的人生哲學，重忠恕，講仁愛；日本人的根本文化也接受了中國的孔墨精神。這一文化上的共同精神，在中國歷史上一貫的充沛着寬和溫厚的泱泱之風，在日本歷史上也不斷的陶鑄出忠勇寬厚的志士仁人，在兩國關係史上更有許多可為誇耀的佳話。天平八年（唐開元廿四年，西元七三六年）日使中臣名代艱難到唐，明皇帝敕書溫慰，有「艱虞備至，性命僅存，……言念災患，所不忍聞，……存撫發遣，永用救懷」之句。其憫念遠人之情，溢於言表。又阿部仲麻呂奉唐命東歸時曾賦詩云：「銜命將辭國，非才忝侍臣；天中戀明主，海外憶慈親。」其依戀中朝思慕故鄉之懷，更足見中日兩民族的深厚舊交。降及明代，倭寇迭擾中國海疆，日本對於中國仍不斷有請糧乞錢之事，朝廷概給予之。其後中日關係雖波瀾漸多，而中國人士對於日本人士急難相助之事，仍是代不絕書。日俄戰爭時，中國不念甲午的舊仇，幫助日本打倒我們有同盟關係的帝俄；大正十二年（一九二三）東京大地震時，日人乘火殺戮中國僑民，而中國人民仍有大批捐款匯到東京，去賑救鄰邦人士的災難。這種憫恕仁愛的精神，在擁有孔墨道德的中國隨時隨地可以發見。中華民族最能愛，也最能恕。惟其能愛，所以親仁善鄰；惟其能恕，所以不念舊惡。中國人能施愛，也能受愛；不記怨，也不修怨。這種美德在中日關係史上幾於俯拾即是，

絕找不出自發的排日仇日的例子。但是，你們也要明白，我們絕不是可以忍受一切橫逆的沒出息的民族。你們若必拿我們當馴順的羔羊，宰割烹噬而後甘心，我們自然也要奮起民族的威力，以禦敵，以求生。現在中日兩國的關係便是如此。日本軍閥口口聲聲要「根絕排日」，其實是要整個的取銷中國的生存權。他們更會用栽誣的手段去作强盜式的擄刼。九一八之夜在柳條溝埋上一個炸彈，便佔了我們的東北四省；說丟了一匹馬，便搶去我們的豐台；又說失了一個兵，便舉起盧溝橋的烽火，燒平津，打淞滬，生逼得我們中國不得不起來從事神聖的民族自衞戰爭。我們是自衞，是求生。假使說這就是「排日」，我們是不惜承認的。但希望你們當遭逢外患三島動搖的時候，甘受外敵摧抑，莫起「排×」之念。請問一個有自尊心的民族她能有這種雅量嗎？

× × ×

最後再就中日兩大民族的一般精神一言。近年來我們受日本軍閥的摧抑欺凌，他們的醜惡性使我們憎恨，他們的暴壓力使我們不得不起來抵抗。但是我們所憎恨所抵抗的只是日本軍閥，絕非日本國民的全體。我們對於日本國民的勤儉刻苦，愛潔有禮，知恥好勇，向表敬愛。我們對於日本歷史上的志士仁人，尤其崇敬。例如藤田東湖忠憤塡膺捨身救母的氣概，梁川星巖之妻紅蘭氏危不辱夫的義節，每

讀日本史至此，輒爲擊節讚歎，以爲惟有我們東方的兒女纔能有這種凛然的風範。在中國，這種氣節凛然的志士仁人也是史不絕書。例如伯夷叔齊的餓死，田橫五百人的同殉，是真知恥，真有勇，也惟有在我們東方文化中纔能產生這種有光有熱有血有肉的人物。中日兩大民族有共同的文化，所以也同樣有璀璨的歷史。比較的說，中華民族年長了些，日本民族還很年青。年長的在一般特性中比較寬仁，年青的自然要勇敢些。因爲日本民族的年青勇敢，所以在近代史上有着勇敢的進步。中華民族在近百年來不斷遭受外患的侵襲，但這塊百鍊鋼，在本質上飽蓄着光熱，有它的最後存在點，必將與宇宙同其不朽。就拿這次中日戰役來說，中國男兒又發揮了他們的報國志氣。在上海，一個空軍戰士，他在墜機落地之時，不做俘虜，隻槍奮戰，而卒死於敵人的亂彈之下。在南口，全團將士同殉防地，以待援軍。直至南口撤防的時候，還有一個青年兵，最後一個人守在山頭上，放地雷，與敵人的前鋒一同粉身碎骨於戰場之上。返觀日本兵士，却很少見當年攻旅順港時肉彈勇士的氣概了。請莫誤會我不是在誇耀中國兵士勇敢，批評日本兵士怯懦。其實這種現象乃是正義的當然。從素質上看，毋寧是中國兵較弱，日本兵較強。但是中國男兒業已破國亡家，被人逼得無路可走，非爲國家拚死不可了。他們懷着滿腹的悲，自然會有渾身是勇。日本兵士呢？他們有強的國，愛的家，一、未受人欺，二、不愁無飯吃，雖然持槍負彈走上戰場，根本就未感覺

到打仗的必要。東京驛頭一行行的出征兵，繁華市上一羣羣的送別人，我們不用看飛揚的軍旗，不用聽顛邊的征歌，想像一下那情景，便令人黯然神傷。這許多好男兒，他們為什麼要背井離鄉，棄妻兒，別父母，遠到異國去拼死？有什麼必要？有什麼意義？他們就是這樣毫無必要毫無意義的被軍閥壓迫驅逐着走上生死決鬥的戰場。所以我們中日兩國民，對於日本軍閥應該一致憎恨，對於日本兵士應該一致憐憫。我們認日本軍閥是中國的生死敵人，必然打倒它，必然奮戰到底；但對於日本國民仍然敬愛；對於日本兵士尤表同情。所以我們雖在生死決鬥之際，對於日本僑民絕不侵犯，對於俘虜的日本兵士概加優待。這是我們東方人所應該保持的一點友情，一點正義！

日本國民諸君！中日兩大民族，有共同的文化，有相通的利益，有並存的前途，無不解的仇恨，尤無相殘相殺以至同歸於盡的必要。你們為什麼聽信政客的愚弄，甘受軍閥的驅策？人是有理智的，豈可長久沉浸於迷惘的深淵！

日本國民諸君！我們都是東方人，每個人都有一顆東方人的心。我們同具有人類愛，同具有正義感。我們要燃起人類的愛焰，抽出正義的利劍，焚燬了無恥政客的罪惡，斬斷了驕橫軍閥的暴行。目前的中日戰爭，是中日兩大民族的拼殺起點，同時也是中日兩大民族的禍福關鍵，只要你們能夠認清政客的

欺騙，拒絕軍閥的驅策，東亞幸福就在眼前。中日兩大國民應爲這一前途努力，切莫永結子孫萬世之仇！

情長紙短，不盡欲言，望各爲民族國家的前途珍重！

（二十六年九月八日上海大公報社評）

勗中國男兒

我們中華民族活了五千年，我們的祖宗在過去的悠長歷史中，胝手胼足。茹苦含辛，闢草萊，征夷狄，拚性命，流血汗，給我們創造了這一個偉大的國家，掙下了這一份無窮的產業；不想傳到我們手裏，竟已破國亡家，祖業也要蕩然。中國的兒女們！難道我們就看着民族的悠長壽命國家的光榮歷史都斷送在我們手裏嗎？

近百年來，我們國家的命運一向在困苦顛連之中。自從鴉片戰爭以來，一條條的國恥刀痕都劃在我們的臉上，刺在我們的背上，我們早該知道羞恥，早該知道發奮了。我們目前的最大敵人（日本）她由受我們的提攜，逐漸的對我們輕侮，欺凌，以至於宰割，也不是一朝一日的事了。遠的不說，就從甲午算起，到現在也已經四十多年。在這四十多年中，朝鮮台灣變成了她的領土，旅順大連也成了她的口中肉。這是甲午一戰的結果。自此以後，她對於我們日刻月削，形成一貫的長足侵略。拿去的不算，打在身上的應該知道疼了吧。甲午，庚子，甲辰，她三次在我們的領土內動武；民國四年佔我們的山東，在膠濟路沿綫

殺死我們無數的同胞，十七年又在濟南兇殺一場。這一貫的兇殺，這一貫的流血，難道我們都不生氣，都不覺疼？直到二十年的九一八，我們竟不抵抗而丟掉東三省，使三千萬同胞作日本的奴隸。自此以往，熱河逃跑，長城灑血，又送了一省半。冀察兩省的主權日漸模糊，我們還得在政府的命令下「睦鄰。」這一貫的磨難與恥辱，我們受夠了，也忍夠了；但是敵人的氣燄愈高，欲望愈奢，終於燃起北方的烽火，由平津燃燒到淞滬以及沿海各省。

這四十多年的歷史，爲什麼寫成這樣？日本的兇暴固是一種理由，而眞正的原因却是因爲我們太沒出息。在近百年中，中日兩國同樣的是在外患壓迫中走革新建國的路；可是人家已舉富國强兵之實，我們却困頓沉陷在貧愚弱的三字悲運之中。自己不掙氣，自然招來人家的輕侮；自己不要好，自然造成自己的悲運。我們的祖宗是好祖宗，可惜他們的子孫太沒出息了。誰是我們祖宗的沒出息的子孫？就是現在活着的中國人！我們不用怨天，不用尤人，這彌天大孽都是我們作的。要補過，要贖罪，現在就正是時候！

在最近六年中，我們受着日本的鞭撻，忍着日本的凌辱，已逐漸覺醒，逐漸努力，想在努力自强的路上，渡過國家的急難。但是，敵人不肯給我們這種逐漸努力逐漸自强的機會。她現在已舉起兇刃，想斬斷

我們的自强機會，想斬斷我們的國家生命。現在敵人已把一個絕大的現實擺在我們面前，就是——前進或生，後退必死。中國的男兒們！現在我們後顧皆是死黑，只有前進的一綫光明了！

不錯，我們中華民族是愛好和平的，但決不愛羔羊受刃式的和平；不錯，我們中華民族是崇尙忍恕的，但不能忍恕到無恥的程度。中國的男兒們！祖宗的血液煮沸了我們的心，羞恥的紅暈灸熱了我們的臉，中國男兒正在奮起民族的威力，以殺强敵，以衛國家。在敵人的意料，滿以爲不戰而下南口三小時便佔領淞滬。結果湯恩伯兩師人同他們打出動天地泣鬼神的壯烈戰績，淞滬健兒血戰一月，使敵人冒絕大的犧牲，付絕大的代價，而仍侷促於黃浦江邊。杉山說要中國知道日本的不可抗，近衛說要中國很快的屈膝；但是現在杉山已不得不考慮「長期戰爭」，近衛也說「對華戰事非本年可了」了。强暴驕誇的敵人已在我們中國男兒的面前跌價了！

中國男兒的英勇，中國男兒的志氣，在這次戰役中開始表現了。寶山縣一個孤城，沒有長官的退却令，他們便死守不退，直到城圮土焦，全營官兵一致殉國；軍工路一條弱綫，在敵人的排砲聚攻轟機轟炸之下，他們只有伏死，絕不起逃，直到地翻土赤，敵兵跟進之時，他們又都躍深壕奮白刃以殲敵殺賊了！這英勇，這志氣，寒了敵膽，活了國魂！

平津爲什麼失守的？是因爲二十九軍的統帥沒有決心：到敵人業已白刃加頸的時候，還在遲疑瞻顧。平綏綫爲什麼崩潰的？是因爲劉汝明的怯懦自私：最初阻攔中央軍入察，致延南口之防；繼又遲攻張北，致誤軍機；最後又不戰而棄張家口，使南口守師變成絕軍，可憐湯恩伯一軍數萬人，於血染山谷之後竟不得不揮淚痛哭而棄雄關。平津之失，還可說是大勢判斷的錯誤，劉汝明之棄張垣，則殺之亦不足蔽其辜。這兩件痛心事有最可寶貴的教訓，就是：强敵當前，須下決心，不許遲疑；生死決鬥，只有向前，不能退後。中國的男兒們！我們要一致接受這沉痛的教訓，循着敵人的砲火，殺上前去！

在火綫上的中國男兒們！現在你們正握着爲國効死的光榮幸運，前進吧前進！死於國事的男兒，政府及國人絕不辜負你們。救死扶傷，是後方正在做着的工作；撫養遺族，是政府的責任。你們的父母就是我們的父母，你們的妻兒就是我們的嫂姪。你們更不必憂慮後繼無人，須知現在有成羣成隊的同胞在焦躁，在着急，盼望政府把他們武裝起來，開上前綫去。你們現在手中拿着殺敵的武器，身體立在殺敵的前綫，這正是許多焦躁着急的同胞們所求之未得的幸運啊！你們要握住這個幸運，打擊敵人，拯救國家。

我們都是中華民族的孽子孽孫，我們都應該以孤臣孽子的悲悔，奮顛沛流離的忠勇，續祖宗的光榮，贖己身的罪過，造子孫的幸福。奮勇吧！前進吧！目前就是我們血洗河山重光祖業的時候。進！進！進！打！打！

打！進到我們的失土！打倒我們的敵人！直到打倒日本軍閥之後，我們四萬五千萬中國兒女，再釋槍解刃大家抱頭痛哭一場。這一哭，要哭盡我們的悲悔，哭盡我們的辛酸。先哭敵人，是我們的沒出息害了他們；再哭自己，是我們不長進，醉生夢死了四十多年，纔欠下這樣一筆血債！債償清了，淚抹乾了，中國的兒女啊！從此我們要長志氣，好做人，給祖宗續光榮，給人類造幸福！

（二十六年九月十三日上海大公報社評）

學生界的責任

中日關係演化到現在的局面，並不是一朝一夕之事；今後的推演，尤其關係我們民族國家千百年的榮辱。我們把歷史回看一下，覺得學生界未曾盡了責任；再把局面遠看一些，更覺得學生界負有絕大的責任。

國家的強弱，不僅繫於兵精械利，國家力量的大小，乃在文化的總和。中國與日本，在近百年史中，最初的遭際完全相同。同是以較老的東方文化，與較新的西洋文化相遇而失敗的。同是感覺東方文化的不足，而想吸收西洋文化，以圖富國強兵的。結果是一個相當成功，一個却失敗了。這可說是兩個國家的現代化賽跑，日本跑到前面，而中國落伍了。這是近百年來中日消長的真因，也是中國受日本欺凌的病源。

鴉片戰爭是中國與西洋文化正式相見，打破傳統的鎖國主義，開始講洋務，派留學生。事隔十餘年，日本也被美國砲船打開門戶，訂立神奈川條約，開國通商，也開始講洋務，派留學生。這兩件事的意義完

全一樣，同是在外患壓迫之下去走現代化的路。在時間上，中國還早了十幾年。結果日本留學生學得西方文化的本領，結成明治維新的花蕾；中國講洋務的成績，甲午一戰就洩了底。此後中日兩國還在繼續接受西方文化，中國留學生的數量尤較日本為多。尤其近年以美國退還庚款的關係，每年有大批博士碩士回國。這些渡萬里重洋花民族血債的留學生，其中自然不少賢者，但也有許多是鍍鍍金，捐資格，用麪包西裝「虎」人的。留學生回國來大半為人師表，他們的空虛自然便風靡了全國教育界。我們要承認國力是文化的總和，日本近六七十年來的富强是以接受西洋文化為其動力。這種以文化增進國力的工作，其推動關鍵完全握在智識界手中。我們不用逐個檢討中日兩國智識界的人物，只看兩國的力量，一個消耗，一個累積，便可知道中國學生是學會了西洋的享用，日本學生則學到了西洋的致用。蹲抽水馬桶，睏西蒙士床，與開工廠，造大砲，雖同是西洋文明，你若只知享受舒適的，不知創造艱難的，那結果自然是罪該萬死！真真不幸，中日兩國近百年來的現代化，就是這樣一個對照！

近數十年來，中國一直在日本的鐵腕下討生活，到現在更須同她的飛機大砲拼命。我們把問題看得根本些，不能不說是前兩代學生界未曾好好盡了他們的責任，給國家造了大孽。現在我們便是用肉來塡這個漏洞，用血來洗這筆罪孽！

現在我們是用血肉與日本相拚了；但中日問題是否一拚可了呢?問題並不如此簡單。我們不妨做一個假設：假設我們這次戰爭把日本戰敗了，把日本打倒了；我們若仍是只學享用，不學致用，只知用外國機器開工廠，買外國飛機大砲辦國防，則仍如碟中花，沙上塔，是不能扎根不經風吹的。那就是說，我們若在流血拚命之後，不挺身前進，而仍睏睡在現代化的跑道上，則日本縱使倒下，她仍會爬起來向前飛跑，結果仍是人家領先，我們落伍。中日問題的根本解決，中國必須在長程的近代化賽跑中追上且超過了日本。這必須發動文化，以充實國力。這是我們復興民族再造國家的既坦且直的道路，這責任便落在學生界肩頭上。前兩代學生界已造下滔天大孽，現在及以後的學生界萬萬不可再陷入這條覆轍！

現在的學生界，要知道你們能夠受完全教育以至出洋留學，在全國同年齡的青年羣中，你們已是絕對的幸運者。若再不好好讀書學真本領，而惟襲皮毛，求享受，或且結羣鬥氣，互相爭訌，那不僅對不起你們的父母，且將永爲國家的孽民。

現在敵人的砲火之下，許多青年起來要求做救亡的工作，這是萬分應該的。但我們更要知道，目前的工作究竟是臨時的，有志氣的青年更應該深切認識自己的責任，努力根本的文化建設。過去的學生界因爲未曾做好這根本工作，以致發生目前的臨時的危難；現在的青年一邊要做挽救臨時危難的工

作，同時更要以絕大的熱誠，堅強的努力，去求眞知，致實用。現在的青年，無知無識的可以不講，一般智識青年，在臨時工作中，還有爭位置鬥意氣以致浪費時間精神而毫無所成的現象。記者最近曾親眼看見這種現象，眞是令人傷心，令人悲哀。我現在掬赤誠，灑血淚，以諍諫於全國智識青年之前：你們要立志氣，者做人，認淸自己的責任，在根本的工作上，開拓國家的生命。你們若仍是循前人的覆轍，甚至更不長進，在砲聲震耳之時，猶猥爭一室，鬧門閥氣，那簡直是一切幻滅，無論這次對日戰爭的結果如何，國家的將來，一定還要陷於長期的悲運之中！

（廿六年九月十六日上海大公報社評）

六年了！

今天是九一八的第六周年，也就是我們國難日曆上的第七個「九一八」。九一八事變是我們民族史上的一件空前大事。這件事演化到現在已整整六年，在這六年的光陰中，我們失掉四五省土地，被人奴隸了數千萬人民，這是眼睛看得見的損失。此外我們還有一件眼睛看不見的損失，便是失去了「沒有國防也可以立國」的懶惰心理。在懶惰的心理上，這個損失太大了，它可以使我們的民族國家在迷惘中毀滅，也可以使我們的民族國家在振奮中復興；但無論如何，中國人以後是沒有醉生夢死偷惰苟安的舒服日子可過了。

從對外關係說：自從鴉片戰爭以來，這百年來，一貫的受着外患的侵壓，只知外力的不可抗，整個失去民族自信力。到庚子事變以後，我們的「恐外病」差不多已侵入民族的血液裏，甚至提起「毛子」二字小兒不敢夜啼。我們就在這種危疑震撼的心理情緒下過了幾十年生活，居然闖過歐洲大戰的難關，天空掉下幾道護身符（國聯盟約及九國公約），我們的領土主權有人代爲保全，一旦遇到强敵侵

凌，世界各國都可以在國聯盟約第十六條之下替我們去制裁。這恰好投合上我們的懶惰心理，從此不辦國防也可以獨立存在於東亞大陸之上了。我們最初害了「恐外病」，後來又加上「信外病」，便在這種毫無自信力而又徼倖懶惰的狀態下，過了華盛頓會議以後的十年糊塗生活。九一八的砲聲並未能震掉我們這種糊塗病，因為我們一邊恐懼日本的武力，一邊迷信國際的援助，便產生了人類史上最沒出息的不抵抗主義！不抵抗主義的理由是什麼？便是避開日本的武力（偷惰）、等待國際的援助（徼倖）。我們真該謝謝日本，使我們不斷的吃偷惰的耳光；我們更該謝謝國聯，使我們嘗到徼倖的悲哀。否則，若當真偷惰能安，徼倖能生，我們這個民族國家就要變成一個無筋無骨寡廉鮮恥的東西了！

我們所希望的（國際的制裁）既然始終不來，我們所恐懼的（日本的拳頭）却不斷的打到身上。日復一日，年復一年，自然會於失望中消逝了迷信，於挨打中迸發了羞恥。這可說是我們的損失，但却是我們民族國家的起死回生之路。有，張學良一槍不發送掉瀋陽，因為馬占山在嫩江打了一下，所以王以哲撤退錦州時不得不先在盤山一帶幌兩幌；接着便迸發了十九路軍的淞滬抗戰。但是十九路軍的抗戰並未能斬絕不抵抗主義的生命，所以張學良宋子文儘管根據抗戰意識發表聯名的大氣通電，湯玉麟還是搭掉熱河，溜之大吉。日本軍閥又收穫了湯玉麟不抵抗的美果，追奔逐北，直到喜峯口遇見宋

哲元纔遭遇抵抗。接着發生長城各口的大戰，這一戰的結果產生了一個塘沽協定。塘沽協定是一個屈辱的文件，但究竟是流血後的產物，還可以給我們留下些恥辱下的勇氣。塘沽協定的成立，在我們這方面有一種必要的理由，同時也有一種要不得的意識。這理由是我們要喘一口氣，準備一些力量；那要不得的心理便是希望苟安下去。塘沽協定到現在已有四年多的壽命，在四年多的光陰中，政府的確在忍辱含垢之下做了些準備工作，但也不能不指出還有些苟安的心理。因爲這點心理的存在，所以使對外的準備不緊張不堅實，在內政上還有貪污浪費及點綴昇平之事。再謝謝日本！她絕不讓我們抱着塘沽協定睡着了，還不斷的刺我們的神經，打我們的脊梁。二十三年四一七的天羽聲明，告訴中國人日本之志是在吞霸整個的中國。這個野心豈是通車通郵等小賄賂所能滿足的？所以轉年一月就來攻打察東，大灘會議送了些小禮自然不够，五六月間便發生了所謂河北事件及察北事件。所謂「何梅協定」使河北省的主權模糊了，秦土協定又送了察北六縣。這次事證明我們的「恐日病」還很深，酒井及土肥原的成功也太容易了，因此更啓發了日本軍閥不戰而勝的野心。所以它不會讓我們過幾個月的清淨日子，這年冬天便又來了華北五省的自治運動。在這個僞自治運動中，被殷汝耕拐跑了冀東二十二縣，同時產生了一個矛盾而軟體的組織——冀察政委會。這個軟體組織，當二十四年年底成立的時候，便

已注定了它的命運，斷混了一年半多，結果還算差强人意，是在流血抵抗之後樣收場的。就在冀察斷混之際，中日間出現了一個外交局面，廣田提出了所謂三原則，駐華大使連換了三個人（有吉，有田，川越，）張川越談判了半年多，毫無成就，結果日本軍閥不耐煩了，挑起綏東匪僞的亂事。綏東的勝利給我們增加了不少的自信力，同時日本方面因西南問題的和平解決及綏東之役的結果，對於中國也增加了重視。在「對華新認識」的呼聲中，日本的對華政策起了動搖以至於轉變的波浪。但是日本軍閥是不願吃太平糧的，它爲鎭壓國內的和平氣運，並打擊西安事變後的中國新局面，便選定今年七月七日的日期，盧溝橋這個地點，發動了新的「九一八」。從日本方面說，盧溝橋事變只是新的「九一八」，但不是中日全面戰爭的起點。因爲「九一八」是不戰勝人，以小博大的。她却未想到她的拳頭已打出中國人的羞恥，她的鋒刃已斬斷中國人的懶惰。這六年光陰，中國想睡，日本前來翻床；中國儘退，日本儘逼，逼得無路可走。最後中國沒有辦法，只好丟掉懶惰的心理，拿出知恥的勇氣，來與强敵拚命了。我們眞該謝謝日本！謝你六年的鞭打，打掉了我們的懶惰；謝你六年的拳擊，擊出了我們的勇氣。在這個大民族的身上去掉了傳統的懶惰，迸發了新生的勇氣，無疑的，她將摧毀了敵人，復興了國家！

從對內關係說：這懶惰性的失去，知恥心的復活，關係更大了。自從辛亥革命民國成立以來，中國對

外未曾發生過一等大事，對內却打了無數次的內戰。尤其在華盛頓會議以後到九一八事變的前夜的十年光陰中，對外風平浪靜，完全不知國防為何物，養兵購械，只打內戰。我常說，假使沒有九一八以來的一貫國難，像民國十九年河南大戰一樣的內戰起碼還要打三次。河南一戰打死三十萬壯丁，損失巨萬的物力財力。依此推算，這六年時間，日本起碼替我們全活了一百萬壯丁，儲蓄了數萬萬財力。我們現在正好用這百萬壯丁億萬財力，同日本一拚。即使完全拚掉，在我們的算盤上可說是毫無損失。但是，這一出一入，一反一正，它的意義却大大的不同了。這絕非怪話，而是有完分證據的。譬如二十一年九月韓（復榘）劉（珍年）在膠東接觸，未成大事；二十二年馮玉祥在察東建制，懸崖勒馬；十九路軍在福建鬧了內戰紀錄，不久即歸平息；二十五年的西南問題既和平解決，西安事變也化險為夷。這是有形的，無形的還不知消滅了多少。即就有形的說，這些事都不是小問題，都會兵連禍結，牽動數省，死上幾十萬壯丁；但皆居然未成大亂子，而西安事變的大霹靂，轉促成國共的復合，給國家呈現一個空前統一局面。這能說不是受日本之賜嗎？國難的鞭子打出中國人的羞恥，我們的拳頭再不能落到自己背上，日本的槍砲轟走中國人的懶惰，我們便用敵人替我們儲蓄下的國力，同敵人相拚吧！

六年了！這六年過得好快！在這六年當中，我們所失掉的土地與人民，一定要收回！在這六年當中，我

們所失掉的懶惰心理，不要了，不要了，一定不要了！

六年了！這六年過得好快！今天是九一八，我們先下一個初步的決心，我們要從今年的九一八同敵人打到明年的九一八；打到日本軍閥倒了，我們的失土收回了，我們的同胞抬頭了，再罷手！

（廿六年九一八上海大公報社評）

誡日本軍閥

近代的日本，眞是天之驕子。她在封建的政體中，脫掉軍閥的宰制，內充國力，外揚國威，一躍而上近代文明的舞台；尤其在歐戰後的十年中，於和平發展裏成爲西太平洋上獨一無二的霸權者。

這一個強盛的日本之產生，自然是她的六七千萬純樸自好的國民及多數優越卓絕的政治家的成果，而軍人的功績尤不可沒。在明治初期，日本軍人能够打破千餘年弄權僭政的積習，將大政奉還王室，贊定明治維新的始基，展開近六七十年來的燦爛國運，在日本史上可算得最光輝的一段了。日本軍人在明治大正兩朝，充分發揮了忠君愛國的美德，到近年，顯然已有逆轉之勢，轉回幕府時代去。

日本軍人以忠君愛國著稱於世，其實這只是明治大正兩朝的事，在此以前日本軍人慣於犯上作亂，禍國殃民；自此以後，勢之所趨，其犯上作亂禍國殃民或更超越前人。這是日本國家的禍福關鍵，同時也是東亞大局的安危所繫，我們中國人不僅爲日本代抱杞憂，且以鄰誼關係，更深危懼。

在明治維新以前，自聖武天皇藤原氏始盛時起（西元七二四），至明治維新王政復古時止（一

八六八），這一千一百多年間，一直是軍閥政治，弄權僭政，禍國殃民，簡直是無惡不作。舉例說，如藤原基經廢陽成天皇，另立光孝天皇（八八五），開臣子廢立皇帝的始例。平治之亂（一一五九），藤原信賴源義朝舉兵造反，將後白河上皇及二條天皇都幽囚起來。平清盛剷平平治之亂後，繼起攝政，幽囚後白羽法皇，逼死六條天皇，及平氏兵敗，甚且挾安德天皇共投於海（一一八三）。源義仲亦於此時兵刼後鳥羽天皇。源氏既衰，北條氏繼起，陪臣柄國，舉兵犯闕，放廢四帝，兵連禍結，兇燄更熾。北條氏滅，降將足利尊氏繼起（一三一九），其禍更烈，逐走後醍醐天皇，弒皇子，自立光明天皇，建立北朝，自是南北朝分立六十餘年。政崩綱解，國已不國，而軍閥的驕滿專恣，尤其無以復加。足利義滿築殿僭服，自擬如皇帝，公卿進朝，皆先下階跪拜於其殿前（時在一三七五）。降及德川氏，幕府政治綿延而下，仍是大權旁落，太阿倒持，幕府就是政府，天皇不過守府而已。直至進入十九世紀，歐美各國的鐵艦大砲不斷打來，幕府既擋不住外患的侵襲，基礎始漸動搖，尊王攘夷之說大起，纔打開討幕廢藩的機運。回看這一千多年的日本軍閥史，說日本軍人忠君，何嘗忠君？說日本軍人愛國，何嘗愛國？日本軍人忠君愛國的美譽，完全是明治大正兩朝的軍人掙得的，他們的先輩不能掠美，他們的後代也不能竊譽。我們仔細一讀日本史，幾乎就是一部軍閥專政史。我們若不否認歷史是有因襲性的，則日本歷史上的軍閥毒菌仍不免要遺留在現

在日本軍人的血液中，甚至經過多年的培養，而更繁殖活潑起來。即在明治初葉討幕廢藩後的西南之役，西鄉隆盛負全國盛譽，竟因征韓論的一言不合，便舉兵作亂，以至兵敗身死。那還不是軍閥作亂的重演？賢者尚且如此，不肖者更可不論了。近年來日本軍閥的動靜，便很令人替日本國家擔心。他們蹂躪憲法，毀棄明治以來的議會政治，一再發動武力政變，刼持皇室眞意，公然殺害元老重臣，假忠君愛國之名，行欺君竊國之實，以鐵腕橫亘於廟堂之上，使皇室憂瘁，朝野箝口；以利爪飛揚於國家內外，使萬民憔悴，世界側目。明治五年（一八七二）明治天皇下改革兵制之詔說：「朕賴天地祖宗之靈，行吾邦二千餘年未有之變革，封建之制，復爲郡縣，海陸兵制亦不可不因時而制宜。往者太阿倒持，兵權歸於將門，迨乎季世，將驕卒惰，國亦隨弱。朕心痛之！」請看現在日本的情形，是不是「太保倒持，兵權歸於將門」？是不是「將驕卒惰，國亦將弱」呢？是不是明治大帝的憂慮又見於今日呢？日本軍閥的陰謀，已在各種文獻及行動上洩露出來，他們的所謂法西斯政治如完全實現，那不僅是軍閥還原，幕府復活，且更過之。他們將在幕府的驕滿專恣之外，更加上他們所擅長的陰險詭譎。因爲幕府的僭上專擅，大衆皆知，直捷明朗，其罪惡皆自承之。現在的軍閥則陰險曖昧，罔上欺下，將把整個的日本國家裝入軍閥的革囊內而後投入不可測的深淵。這是日本國家的大危險，同時且將遺東亞和平世界大局以極大的威脅與不安。我們

願以幫人的資格，向日本軍閥提醒一聲：你們現在所走的路線，完全是軍閥還原，個人的罪惡及國家的禍害，皆將超過於舊時的幕府。日本歷史上一千多年的軍閥罪惡，好容易被明治維新的諸傑斬斷，看看又要被你們接續起來。爲了保持明治維新以來日本軍人的光榮歷史，你們絕對不應該再倒行逆施下去。這是我們爲日本軍人的本身歷史計，所告誡於日本軍閥的第一點。

其次，就日本國家的本身利益看，日本軍閥尤其應該覺悟。要知道國運的開拓，有時需要武力，而國運的發揚光大却絕對需要和平。這理由便可用日本本身的歷史來解釋。例如甲午（中日）甲辰（日俄）兩役，日本用武力開拓了國運；而眞正的發揚光大則在歐戰以後的十年光陰。在華盛頓會議時，日本與各國簽訂了五國海軍協定遠東九國公約，在表面上好像受了屈抑，其實却是得到極大的收穫。自一九二二年華盛頓會議閉幕直至一九三一年九一八的前夜，日本在國際諒解的十年和平之中，建成强大的海軍，工商業突飛猛進，國力展强，成爲西太平洋上獨一無二的霸權者。在這時期中日本以不動之威，形成東亞的一根柱石。不僅中國並不妄想與日本爭霸，凡是關於東方的問題，世界列强也必須把日本的利益儘先考慮；日本的意思不僅是東方問題的決定素，且有左右世界大勢的潛在力。日本這一個霸權的地位，都是在十年和平之中以不動之威取得的。但是，魯莽偏淺的日本軍閥並不懂得這不動

之威的重要，以爲力量够了，可以搗亂了，遂發動了九一八事變。九一八事變好像日本佔了便宜，但是這個不動之威既然動了，便不免要起變化。九一八以來的日本氣燄，不僅逼得中國硬着頭皮走苦鬥圖強的路，並使太平洋沿岸的一切國家都起來作軍備競爭，以日本做假想敵，紛紛從事國防的充實。這一個軍備圈，最後一定要套在日本頭上，壓到日本本身上。這還是比較遠大的，往近處小處說，日本是不把中國的力量擺在心上的，但是這次中日戰事，日本傾全國之兵，竭全國之財，打了一個多月，在淞滬一線竟無尺寸的進展，且將固有的產業毀掉了。所謂「不可抗」的武力，其功效不過如此。且在淞滬戰事中，日本海陸空並進，以優越的兵力，攻打裝備不全的中國陸軍，竟不能取勝，使中國及世界人皆認識了日本力量的限度。這不僅喚起中國失去已久的自信力，必更間接使世界各國對日本起輕侮之念。這一點很重要，中國自信力的恢復及世界輕日念的啓開，不僅要使日本霸權跌落，且將導日本於不測之境。再深入一層看，日本軍閥的窮兵黷武，一面頹隳士氣，敗壞軍紀，一面更給國民增加無限負擔。歐戰之後，國際大勢給日本造成一個和平發展的幸福環境。日本絕對受不着別國的武力威脅，在和平建設工商發展中，國富民贍，日本國民天天過着幸福的日子；乃以軍閥野心之故，擴軍增稅，壓緊國民的生活，現在更妄動干戈，驅國民送死於戰場。這樣倒行逆施下去，必然外啓輕侮之端，內召崩潰之禍。這是我們爲日本國

家的本身利益計，所願告誡於日本軍閥的第二點。

第三，就世界大局的和平利益看，也絕對需要一個和平強盛的日本。近年來世界和平的危機，都是的日本軍閥闖出來的。日本願和平，世界即和平；日本能和平，世界也隨之和平。即在世界大局杌隉不安的今日，其形勢仍是如此。只要日本軍閥摘掉鐵甲手套，同世界和平握手，世界和平馬上放光明。日本的強盛是世界均勢的一個角隅，日本能與中國共走和平強盛之路，東方必能長治久安。日本軍閥若必迷信其傳統的大陸政策，繼續倒行逆施下去，無疑的，不僅東方兵連禍結，且將牽動世界的和平大局。這樣，世界人類均將蒙受日本軍閥的禍殃，而最先毀滅的必定是日本。這是我們為世界大局的和平利益計，所願告誡於日本軍閥的第三點。

日本軍閥！假使你們甘願做國家的亂臣賊子，甘願做世界的公敵罪人，就請你們繼續倒行逆施下去，你們的國家及人類的世界都會給你們以公道的徵罰。假使你們還有一點理智，還有一點責感，就請你們為了先眾軍人的歷史，為了國家人民的利益，為了世界人類的幸福，一齊跪倒明治神宮的香案前，痛切懺悔你們的罪孽吧！

（廿六年九月廿一日上海大公報社評）

中日戰爭的烏瞰

——九月二十一日在交通部國際電台播音——

諸位同胞兄弟：今天在這裏講「中日戰爭的烏瞰」，這個題目，心裏含有無限的難過和歡喜。難過的是我們舉國上下，以前不知道努力，以致被敵人侵略壓迫，到了今天非起來拚命不可的地步；歡喜的是我們一向受敵人的欺侮，現在却再也不能忍受了，要立起身來，挺起腰來，同他們拚命。我們民族國家的復興與强盛，就孕育在這一次偉大的抗戰的裏面。

這次中日戰爭，從七月七日的盧溝橋事件開端，演進到平津的陷落，以至於平綏，平漢，津浦的三線大戰，最後乃至於淞滬戰事的爆發。自八一三抗戰發動以來，也已經一個多月了。這個戰爭，自然還要繼續下去，發展成爲中日的全面戰爭。我們要是回頭看一看這個局面的演成，實在有其歷史的必然性。因爲日本是企圖造成一個新的「九一八」，這在她原有二層理由：第一是由於國內的矛盾的深化，例如經濟的凋落，民生的痛苦，黨派的對立，因此他想用對外尋釁的手段，以解決內部的困難。這種方式原是

她使用慣了的，而且每次都是日本佔便宜，中國吃虧。這是她對內的理由。其次，在對外方面，中國自九一八以來的六年中，忍了無限的屈辱，受了無限的打擊，以致使她不能不奮發圖存。近一二年來，我們的國家，一天一天的踏上復興的道路，政治上已形成了一個統一的局面，建設上也擁有相當可觀的成績。照這樣邁進下去，結果必定是中華民族的復興和東亞局面的改造。然而這正是日本軍閥所不甘心的。他們爲要阻礙中國的復興，不惜趁我們正在埋頭苦幹的中途，國防建設尚未完成的時候，給我們一個打擊。這是她對外的理由。換言之，日本一方面爲了解決國內的困難，另一方面爲了打擊中國的復興，於是發動了一個新的「九一八」。可是從根本上觀察，日本實在沒有眞正同中國作全面戰爭的決心。她還是想走九一八的老路，以最小的力量，獲得最大的效果，以零宰碎割的手段，逐漸達到將中國整個征服的目的。所以盧溝橋事件的爆發，在日本看來，並不是中日正式戰爭的起點。然而中國因爲經過了六年的屈辱，國防的力量雖尚未準備充足，但在敵人的鐵拳揮到面前白刃加到頸上的今日，再不能不起來奮鬥了。以日本的挑釁，碰上中國的決心，結果就迸發了中日的全面戰爭。

以上所說的是中日戰爭之歷史的必然性。在這個意義下，中日戰爭將循着怎樣的方式發展呢？在日本方面，她企圖用很大的兵力，在極迅速的時期中，將我們克服。就如近衛所說的要中國很快的在日

本的武力之下「屈膝」或如杉山所說的要使中國知道「日本武力的不可抗。」然而日本最初的期待無疑的是失敗了。在北方，日本雖然佔了不少的便宜，可是戰局還在繼續發展下去，眼前的局面，不足以判明他們的勝利。而他們在北方三大戰線所動員的兵力，大約已在三十萬人以上。至於淞滬一隅，至少也動員了十五萬人。在過去一月中，我們雖然流了不少的血，但日本方面犧牲的重大，並不下於我們。他們在四十天的淞滬戰事中，耗費了無數彈藥，犧牲了萬千的生命，所換得的收穫，不過是江岸上幾十方里的土地，以及日僑在戰區各項財產的毀滅。至於中國方面，我們明知道日本的兵器比我們優良，財力比我們豐厚，但是到了今天，我們一定要用大的局面，長的時間，跟日本拚下去。目前我們的抗戰，不是陣地的爭奪戰，而是經濟與武力的消耗戰。我們要把戰事打得大，時間延得久，便能取得最後的勝利。我們應該不計較一時的小敗小挫，以「屢敗屢戰」的毅力，把敵人戰到他們的經濟及武力不能支持的一天。目前日本是在花大錢打小仗，而我們却要花小錢打大仗。這是怎樣說法呢？從兵力上說，日本實行徵兵制，我們是傭兵制，這固然是我們的缺陷，然而從目前戰爭的經濟觀點來說，却成了我們的強點。日本的常備兵只有二十幾萬，現在爲應付對華的戰爭，已出動了五十幾萬人，將來自然還要增加。還許多額外的國民兵的給養和裝備，完全是平空增添的開支。返顧我們，什麼都是現成的，只須支出些動員費，

就可以立即開始抗戰了。日本爲了應付最近的局面，臨時軍費已增加了二十餘萬萬，以後還得繼續增加，而我們的軍費卻與他們的成爲一個大小懸殊的比例。據專家的估計，我們只要十萬萬元的軍費，就能和日本打一年仗。換言之，就是日本在一兩月內所花掉的二十萬萬元，足敷我們支持一年以上的對日戰爭了。現在日本已開始封鎖我們的全部海岸，除第三艦隊擔任執行這個任務外，第二艦隊也已來協同執行。日本全國只有三個艦隊，現在他們用全國三分之二的海軍力，來封鎖我們的海岸線。她的目的是要封鎖我們的海外經濟及軍火來源。但是結果非但於我們無所損害，反使我們蒙受很大的實益。因爲我們中國是一個入超的國家，我們爲了購買舶來品，每年要流出大量的黃金，也就是要流出大量的血液。現在港口封鎖了，舶來品的輸入自然就大量的減少。日本花了很大的軍費，卻替我們解決了一個嚴重的入超問題。從另一方面說，也就是日本用全國三分之二的海軍力，卻替我們增加了抗戰的力量。也許有人要發生疑問：舶來品不進口，我們能不能維持下去呢？我的回答是肯定的。我們過去的生活，本來太奢靡了，現在正好在自然的限制下，把奢靡的積習剷除一下。有許多的摩登的太太小姐們，平常非用巴黎的香水不往臉上洒，非用好萊塢口紅不往唇上抹，如果這些奢侈品都不能進口，她們就只得把面孔洗洗乾淨，做一個樸素的女子了。這豈不好嗎？以此類推，我們沒有了西洋嗶嘰和印度綢緞，就

會想着用土布去剪裁衣服了。這節省下來的靡費，無疑的，是增加了我們的抗敵力量。我們中華民族的生存，本來是從堅苦困難中搏鬥下來的。我們的祖宗胝手胼足，茹苦含辛，替我們打江山，創基業。我們現在所過的生活，即使再艱苦些，距離我們祖宗的艱難的程度還差的遠。我們應該勉力學習祖宗的艱難榜樣，以打開今後的國運。這是就經濟方面說，至於軍火方面，因為我們的國防還不能自立，還必須購買外國的飛機大砲，所以海口遭受封鎖，確實成為一個問題。然而到現在為止，敵人雖用很大的海軍力，北起秦皇島，南至廣州北海，封鎖了我們的全部海岸線，但是我們無論在海上陸上均還有路可通。我想諸位都已明白我所指的是那幾條路，不待我來說明。總之，在目前，敵人的封鎖我們的海岸線除了限制了我們的奢侈的享受，助長了我們抗戰的力量外，與我們是沒有什麼損害的。

再就目前的戰局來觀察，上海方面，我們打得很好，這是大家知道的。不過我們要明白，目前的淞滬戰事，實際還只是一個前哨戰，距離我們理想中和敵人決鬥的正式陣地還很遠。即就目前我們所配置的第一道防線講，已够敵人打幾個月的了。至於北方的戰局，目前的情形確很黯淡，尤其平綏線的崩潰，是使大多數人灰心的。但實際上大可不必悲觀，因為這次我們在平綏線上的失敗是政治，不全是軍事。我們知道，北方的政治還殘存着腐舊的渣滓。這些腐舊的渣滓掃除了，自然會有新生的力量迸發出來。

壞的軍隊逃了散了，剩下在戰壕裏的及補充到前線上的，自然便是好的鬥士了。就現狀觀察，敵軍若用全力在平綏線上進攻，也許我們還有繼續失利的可能，說不定平綏全線都會喪失在敵人手裏，甚至把山西也逼出問題來。但這一切都不值得悲觀。北方政治上的矛盾很多，爲了這個緣故，我們在黃河以北，幾乎沒有什麼準備可言。等到舊的假的都風捲殘雲似的失敗了，新的眞的必然滋長起來。就是說在舊的政治失敗之後，自會有一個新的軍事決鬥。惟有好的軍隊和好的政治纔能和敵人拚命，把握住最後的勝利。明白了這一點，則目前北方戰局的失利是毫不足奇的；我們不妨說，這是在催逼着我們新的力量的誕生。

我們不能忽視日本之所以不顧同中國從事整個的戰爭的原因。她的野心很大，她要整個的征服中國。但要整個的征服中國，在國際關係上，她必須具有戰勝蘇俄及太平洋沿岸各國的力量纔能達到。日本的軍備，這是自日俄戰爭時積累下來的，而世界列强的軍備則是歐戰以後新建設起來的現代的軍備，必須是新的纔有力量，日本這三十年來積累下來的新舊採雜的軍備，是不大適宜於現代戰爭的。日本軍閥自己明白這一點，知道要實現它的野心，必須澈底改革軍備，因此他們在去年擬定了一個六年軍事計劃，爲了推行這個計劃，纔產生了一個空前的大預算，根據他們的計劃在一九四二年以前，是

不能發動世界大戰的。在他的新軍事計劃完成以前，對於中國最好是零碎割，用小本錢做大生意。她尤其不願意被她向所看不起的中國把她的大計劃拖倒了。誰知道中國居然拖着一雙泥脚同她大打起來了。說一句無賴的話，我們中國是一個窮人，窮人不怕火燒，現在我們就把這個瘋狂的暴發戶拖到泥潭裏廝滾，叫她吃到比我們加倍大的苦頭，受到比我們加倍多的損失。等到日本被我們打得筋疲力盡的時候，我們的朋友自然來了，日本的敵人自然到了。到那時候，東亞的局面一定整個改觀，世界的和平，人類的幸福，均將獲得新的生命。所以我們目前的不得已的自衛戰，是爲了保存我們的國族，也是爲了改造東亞的局面，同時更是爲了維護世界的和平。

諸位同胞！我們都是中國人，這一個神聖的責任現就正落在我們每一個中國人的肩膀上。爲了國家的生存，爲了世界的和平，爲了人類的幸福，努力！努力！

（李培林速記）

勉北方軍人

在平綏線崩潰滄保失陷之後，東京在那裏舉行提燈會，舉國若狂的慶祝他們的勝利。凡是中國國民，聽了這個消息，心頭都要湧起無限的悲憤，尤其北方軍人，他們會感到莫大的羞辱。這一段戰況，自然是我們的失利；但要著眼於戰爭的前途，我們一點也不應該悲觀，尤其不應該氣餒。因爲目前的對日抗戰是我們被逼無路可走的自衛戰，求生戰，我們要在強敵手中取得勝利，必須經過長期的苦鬥。在長期的苦鬥中這戰爭剛剛開始時小勝小敗，是無關於遠大的全局的。在這次爭取民族生存國家解放的偉大戰爭中，無疑的，北方軍人是立在第一線上。爲了將來的勝利，爲了國族的光榮，我們願以數言敬勉於我親愛同命的北方軍人。

第一，一般的說，我們應該勝勿驕，敗勿餒。在這次戰爭中，敵人是侵略，我們是自衛；敵人期在必勝，我們卻是決死鬥。在道義上我們是直的，在情緒上我們是哀的。師直爲壯，哀兵必勝；但要維持軍陣的壯，必須保持心頭的哀。我們的將士人人把「哀」字擺在心頭，知道我們是在拚死，是在求生，自然堅毅，自然

沈勇。堅毅者不折不撓，不以目前的得失亂其心志；沈勇者奮鬥以至於最後。我們要爲挫敗而奮勇，更要爲勝利而懍懼。勝勿驕之義非常重要。阿比西尼亞是一個弱國，因爲一八九六年在阿多瓦打了一個有名的勝仗，遂以義大利爲不足畏，而不從事於國防的講求；及義大利再起，乃至於亡國。阿前皇曼納里克二世在一八九六年種下驕滿的因，遂使他的後人賽拉西在一九三六年食到亡國的果。這是勝而驕的教訓。敗勿餒之義尤其重要。土耳其在一九二〇至二二的幾年間，連打敗仗，全國三分之一的土地被希臘軍佔領了；但是基瑪爾並不氣餒，薩卡利亞河一戰，收復了所有的失土，使強敵低首，奠定土耳其復興的基礎。這是敗勿餒的榜樣，我們應該懍然於阿比西尼亞的教訓，學習土耳其的榜樣，勝勿驕，敗勿餒！

第二，就北方將帥說，都應該懺悔既往，警惕將來，加緊努力於現在。閻百川先生，服務桑梓並任封疆之寄者近三十年，祖宗廬墓，個人功業，皆在山西，當此危難之時，爲國爲家，閻先生均較一般人爲責重憂深，其必努力艱撐，是義不容辭責無旁貸的。山右健兒的沈勇及閻先生的忠貞，均是毫無可疑的；縱有少數將領的失職，絕不足爲三晉健兒全體羞，惟閻先生爲典軍治政的直屬長官，必痛感己身的責任。如李服膺無端棄防，必應予以嚴懲，以明恥，以教戰。現在平綏敵鋒已逼至平地泉，綏包孤懸塞上，敵復移鋒南指，攻略代北，以動搖山西的根本。就局部言，雁門平型一線是保全山西的生死必爭之地；就大局言，我們

尤其不能失掉山西。我們知道河北是北中國的心臟，山西則是河北的根本。宋太祖不取河北，使宋朝天下無根。太宗繼起，征北漢，定太原，原已給規復河北樹立一個根幹，乃神奸巨慝的潘美竟將楊業陷害，楊家將覆敗之後，三晉遂為契丹所有，終南北兩宋之世再不能越黃河而北上一步了。現在河北已淪陷殆盡，綏包也危若孤懸，我們若再失掉山西，北方大局休矣！最近平型關之線，我軍已給輕功躁進之敵一個重大打擊，我們應該把握住這個勝利點挽回西戰場的頹勢。最要緊的，我們要堅決的保住山西，則綏遠可以脫險，河北也有規復的根本。這一個任務非常重大，願閻先生及所部健兒共勉之！

敵人所夢寐不忘的所謂「華北」，是晉冀魯察綏五省。現冀察既覆，綏已半侵，晉亦起火，敵人復挾佔領滄州的聲勢，看看侵入魯境。山東是我們的古聖故鄉，文化高峯，在地勢上綰轂南北，尤其是江河流域的樞紐。我們說山西不保，將使北中國的形勢全非；而山東如有差失，則南中國也將隨之動搖了。韓向方先生是西北軍的宿將，典軍山左，亦已七年，守土報國，責無旁貸。山東這塊土，日本自民國四年強占膠東，十七年濟南屠殺以來，一向視為口中之肉。現在敵人的飛機既已開始向濟南轟炸，津浦線上的敵鋒復南向而侵魯北。在敵人的企圖上，它必想圓「華北五省」的美夢；在我們的決心上，尤其要保持住這個南北的樞紐。我們必須用自己的決心，打破敵人的美夢，山東邊境的大決戰已是必然的要求。這是我

們國家生存的要求，也是我們子孫萬世的要求，這個要求便落在韓先生及冀魯健兒的肩頭上。現在北戰場上大部是從前西北軍的勇士；宋明軒先生是揭開這次大戰的主要人物，現在馮治安主席還率領着數萬健兒苦戰於津浦線上。支撐平漢線的是孫連仲部，龐炳勳的部隊也配備在津浦平漢兩線之間。這都是西北軍的宿將，而正輾轉奮戰於北戰場上。我們相信韓先生必能以西北軍堅苦卓絕的精神，與諸同儕將軍共同奮戰，殲強敵，保大局。

日本軍閥的技倆，不僅這些，還施詭詐。冀察局面同它廝混了兩年，到頭來還是砲火與血肉相見。這是最明顯的一個眼前例證。它對於山東，說不定還在那裏散佈政治的妖言，來分化我們的凝結，動搖我們的決心。日本在山東有多年的經營及億萬的財產，她最理想的辦法是兵不血刃的拿，以免砲火震碎了她的財產。青島的和平退出是爲此，現在她又在夢想「自治」運動的拿手好戲。據聞張自忠於北平失腳後，即由日人保護，潛入濟南，遊說「華北五省自治」，並傳土肥原現又飛到魯垣，作同樣的煽惑。這是敵人最毒辣的一着，在中日鬥爭的一貫歷史上，有舉不盡的這種慘痛而恥辱的例子。現在已到我們民族國家生死鬥爭的關頭，我們再不能墮入它的詭計了。尤其是負國家重寄的韓先生，更要謹慎戒懼，以免墮入敵人奸計，毀掉個人歷史，斷送國家生命。

在北方軍人的名將中便有堅貞不移的典型。段芝泉先生當日不受日軍閥的劫持，輕車南下，以民國耆勳老死於滬上，那是北方軍人的光輝最近北平淪陷之後，江朝宗遊說吳子玉先生，謂願擁戴他做北方的領袖，經吳先生予以斷然拒絕。這種凜然的節操，纔不愧是北方軍人的典型。願北方軍人都仰慕段吳兩先生的風範，給國家保持浩然正氣；萬不要學寡廉鮮恥的殷汝耕及自作聰明的張自忠！

第三，總括起來說，我們以積弱之國與強敵相拚，即使敗於力，但萬萬不可輸掉氣。古今中外，亡國滅族之事甚多；但敗於力的尚可復興，輸掉氣的則不可再活。在目前的對日抗戰中，我們有最後勝利的自信，目前的小勝小敗是不足計的。我們不怕軍事的挫敗，最怕不名譽的洩氣。像南口的苦戰，雖敗而能予全國將士以更大的勇氣；淞滬線的撤退，雖退而不難再進。惟有劉汝明的急走，李服膺的忙逃，纔洩中國軍人之氣，長敵人之燄。成功與成仁是一件事，軍人當國家危難之時，不成功便當成仁，此外再無第三條路。盛唐當時，有殺身成仁的張睢陽，繼之而起的便是重整山河的郭子儀。現當對外族拚生死之時，國家的人格，民族的正氣，只靠衛國保族的軍人爲之保存，爲之發揚。中國的軍人們！我們要抱定不成功便成仁的決心，與敵人戰到底，日本軍閥的迷夢一定粉碎，我們國家的生命一定永存！

（廿六年九月廿八日上海大公報社評）

日本的國際信義！

現在日本軍閥正對中國進行着大規模的無理的侵略，野蠻的進攻，同時派遣石井，松方，伍堂，大倉，高石等人赴歐美各國遊說。野蠻的強盜它原可以對旁人作無理的侵略與進攻，大可不必講什麼理由。現在日本軍閥於執行其野蠻的強盜的工作之時，更派遣舌人做無恥的騙子，那未免太可憐了。日本這一批舌人，既不挾帶軍閥的槍砲以俱行，那末當他們鼓其如簧之舌時，當然要說一些道理，以證明日本還懂得國際信義。說也可憐，日本固然有得是蠻力，却最缺乏國際信義。我們隨便舉兩個例子，便可以證明日本是怎樣一個缺乏國際信義的國家！

當日俄戰爭時，日本的兵力財力都已用到盡頭，她一方面要從海外取得財力的援助，同時要在一個比較勝利的局面下趕快結束戰爭。因此她在一九〇五年對美國施行了一個大騙局。這個騙局使她獲得美國的大批資金及樸資茅斯會議的美果。日本以南滿鐵路為香餌，去釣美國的大魚。她示意給美國，謂戰勝俄國之後，她必繼承俄國在南滿的權利，她願將南滿鐵路賣給美國。因此引起美國資本家的

雄心，大量購買日本的債票羅斯福總統並努力於日俄和局的調停。美國鐵路大王哈利滿（E.H. Harriman）買了許多日本戰事公債並代表美國銀行團親自訪問日本。哈氏到日之後，大受歡迎。日首相桂太郎與哈利滿簽訂一個草合同，訂明將來日本將南滿鐵路售與美國銀行團。哈氏以大功告成，旋即搭輪返美。誰知船到舊金山時，日本領事轉到東京的電報說「桂哈草合同」作爲無效！因爲這時日本已不再需要美國的財政援助，同時樸資茅斯條約已在羅斯福總統調停之下簽了字，不必担心俄軍的繼續進攻了。桂太郎是日本的第一流軍人政治家，他就是這樣的欺玩美國！

一九一五年的二十一條要求，是日本在歐洲大戰中的乘火打刼，同時她還欺騙世界。日置益把二十一條要求交給袁世凱總統時，並要保守絕對秘密。及消息既經洩漏，各國紛紛質詢之時，日本政府信誓旦旦的否認其事，不嗇以國家榮譽担保其絕無以武力壓迫中國，已是日本的慣技而公然扯謊，欺騙世界，簡直是不要國家的人格。迨眞相全明，日本更於大戰中途（一九一七），要脅英法俄義四國給予保障，將來在媾和會議時，援助她割讓山東及赤道以北南洋各島嶼的領土權利。同年的「藍辛石井協定，」日本要美國承認她在中國有「特殊利益，」也是同樣的要脅。乘火打刼，藉危要脅，厚顏欺騙，恃力寡信，日本便是這樣的一個國家！

現在日本軍閥正在進行着野蠻的屠殺，同時也在扮演着無恥的欺騙。日本在對英大使許閣森爵士被飛機襲擊一事的照會中，保證日機不再傷害非戰鬥員，同時長谷川却恫嚇各國使領僑民退出南京，日本飛機便有系統而無目的的四出轟炸，屠殺無辜的和平民衆。旣野蠻而復欺騙！

國聯大會方通過一個譴責日本暴行的議案，他們的外交家却穿上大禮服，在世界的「青眼」之下，到歐美各國，替他們的野蠻軍閥當說客，做騙子。假使這些人還有一些人類的羞惡心，也應該會有一剎那的心跳與臉紅吧！

好像美國欠了石井菊次郎一筆債，每逢有事時日本政府便派石井去發太平洋的東岸。一九一七年的「藍辛石井協定」是他從美國拿回的，一九三三年他又去美國作「九一八」以後的宣傳，現在又奉派赴美做說客了。他上次赴美時，在紐約廣播演說，對於中國及蘇聯大肆醜詆，他罵中國說：「該國境內，紀綱蕩廢，以枉法爲法，以亂政爲政，日本與此等國家爲鄰，不幸殊甚。」哎呀天呵！中國何幸而有日本這樣一個好鄰居，又何幸而有石井這樣一個鄰邦政治家！日本所賜給我們的好處，業已數不盡算不清了，石井的手段似乎也不算不辣。石井做日本外相時，煽動宗社黨及蒙匪作亂，擁護善耆倒袁復清，因而演成鄭家屯事件的屠殺兇劇。其手段的毒辣及爛汚，即使擺在今日，也不減色多少。現在這個老頭子

又拚老骨頭給軍閥當代言人了，看他再說些什麼？

日本的蠻力是舉世皆知的，日本的信義却絲毫無有。這種恃力寡信的國家，只認識武力，只有正義的武力纔能打倒它的兇燄，復活它的良知。這野蠻的強盜！無恥的騙子！你們給暴力殉葬好了，何必再談什麼國際信義！

（廿六年九月三十日上海大公報社評）

謝人類正義

在世界的東方，開了人類相殘的記錄。因爲日本無底止的侵略和無極限的殺戮，已激起中國的壯烈抗戰及全世界的憤怒。中國的抵抗是自衛，是求生；世界的憤怒則是人類同情心的共鳴。自衛求生是動物的本能，惟有同情心的共鳴，纔是人類所以能够永存於宇宙之間的一個要素。

日本軍閥現在進行人道的劊子手的工作，無別擇的轟炸中國的和平城市，極殘忍的殺戮中國的和平民衆。這狂暴的行爲，既違反人類的正義，復妨害各國的利益。英法美蘇各國已先後對日本提出抗議，國聯大會已正式譴責日本的暴行，全世界的輿論都燃起憤怒的火燄，對東方强盜作無保留的責斥了。各友邦政府的抗議及國聯大會的譴責，是當然的，因爲他們負有維持世界和平的義務；而世界輿論的發動及一般社會的憤怒，尤其值得我們的感謝，因爲他們的行動，並非基於本身的利害，純粹是正義感的發揮，同情心的共鳴。如同上月英國海員的怠工，不願給日本運軍火；八月杪美國反對戰爭及反對法西斯主義同盟對日本大使齋藤發表宣言，抗議侵略中國，並集衆示威，揭「日本侵略危及美國和平」

之旗；同時美國海員六萬餘人在芝加哥開會，要求對日施行經濟封鎖；九月二十三夜倫敦市民數百人至日本使館前示威，要求日本撤退侵華之軍隊；最近英法美蘇各國報紙皆主張對日實施經濟制裁；英國人民自動發起抵制日貨運動，並已見諸實際行動；英國各屬地，如印度，紐西蘭等地均已紛起排貨，並要求加拿大亦共同行動；此外如捐款救濟我傷兵及難民的，幾遍及全世界。我們對各國的公論正義，敬表深切的感謝，並望由各國民間自動的抵制日貨，進而實現國際的對日經濟制裁，則兇燄早戢，世界和平也可得到新的保障。即就目前所已表現的國際正義言，都值得大書特書，尤應永銘於中國全體國民的心版之上！這是人類最榮耀的正義，最寶貴的同情。在人類普遍的正義與同情之下，日本强盜一定毀滅，中華民族一定永生！

人類的同情心是與生俱來的。譬如我們突然看見一個人的手指爲門所掩，我們的神經立刻感到刺疼。這便是同情的交流。人類的正義感也是根於性情的，譬如我們在路旁看見一個壯漢攀擊一個病弱的老人，我們的神經立刻感到憤怒。這便是正義的發動。日本軍閥的瘋狂，人類的同情心及正義感皆已自他們的本能中的消逝，現在所活動在他們的軀殼中的，只有殘忍，怯懦和無恥。這種消失了理性的單純的動物，還能逃掉人類正義利劍的誅滅嗎？在日本軍閥殘忍無恥的狂燄之下，人類最榮耀的正義

感迸發了，人類最寶貴的同情心交流了。我們感謝，我們奮勇，我們要在人類普遍廣大的正義與同情之下，打倒日本强盜，取得中華民族的永生！

（廿六年十月二日上海大公報社評）

闢日本謬見

本月五日美國羅斯福總統在芝加哥的演說，使世界正義爲之振奮，人類强盜爲之沮喪；愛好和平維護正義的國家均表歡迎，惟有日本最感不快。日本外務省情報局長河相達夫於六日以發言人的資格，對外國記者團發表談話，聲述兩點：一對紐約泰唔士報評論遏戰的責任在於日本，加以詭辯；二對羅斯福總統的演說，作强盜式的聲明。他這篇談話包含一種詭辯及一套謬見，不可無辭以闢之。

先闢他的謬見。河相說：「世界乃爲人類而造，凡正直勤勉之國民，在任何地方皆有幸福生存享受生活之資格。但若有怠惰而賴過去蓄積度其幸福生活者，正直勤勉國民而被拒生存者，其不公平，孰過於此？不平則鳴，故政治要諦在弭不平。無論其爲國內或國際者，日本五十年間，人口倍加，欲於狹小島外求發展，悉被拒絕。現今世界有資源國家與無資源國家相爭資源原料分配，不公平聲甚囂，若不糾正，而有資源國對無資源國拒絕對既得權利讓步，則捨戰爭外，尙有解決途徑乎？但日本國民不以此爲權利而要求，惟要求勤勉正直之日本國民，國爲人類所造，在世界上有享受幸福生活之充分資格。美總統演

縱若以中國事變爲念，則對東洋所發生目前問題自可適用。以上所言者，日本對大陸求和平發展，對華謀平和提攜，但中國以武力拒絕，致生今日事變」云云。這是日本黷武主義者的一貫謬見及理由。它以地小人衆資源缺乏爲理由，卽公然對外武力侵略，野蠻掠奪，其實它的理由是強詞，公然做國際強盜，則是皎皎的事實。

日本的經濟理由，不足作爲對華侵略的根據；而它目前所有政治經濟各方面的困難，卻是它對外侵略慾所造成的。關於這兩層，我們在「寄日本國民」一文中（九月八日本報社評）曾深切說明。日本領土內的人口密度，與中國本部的情形相伯仲，中國是一個純農業國家，人口與土地的關係問題實較日本爲痛切。日本不能以此理由侵奪中國的土地。日本經濟上的病源，不在地小，物瘠，人稠，而在組織的矛盾及手段的錯誤。日本有耕田得不到米吃的農民，同時都市中則有不勞而獲擁資無數的財閥。這是組織的矛盾。日本軍閥爲要征服中國並準備世界大戰，結果佔地愈多，軍備愈感其少，野心愈大，武力愈感其小。於是儘量擴軍，儘量加稅，亂子鬧得愈兇，人民也就愈窮。這是手段的錯誤。以日本的土地人口及資源說，尚大有和平發展的餘地，中國及世界各國也均與日本有無相通，以共走和平繁榮之路；但日本軍閥一定要堵塞了和平繁榮之路，斂財徵役，以苦國民，以擾鄰邦。這是日本的病源，它的問題卻在內

而不在外。日本國民應該在國內團聚經濟組織的矛盾，糾正軍閥手段的錯誤。中國自然準備與日本國民和平握手，但是對於日本軍閥的強盜暴行，我們必然抗擊到底。三年前天羽英二曾公然宣布東亞門羅主義，現在河相達夫又發表了以武力行掠的強盜宣言。

日本人中不少抱有這種謬誤觀念的。今年日本大使川越茂氏返任時即說要中國「認清日本生存與發展之權利，」就是這種意味。日本的一位經濟學者高橋龜吉兩年前曾對記者說，「近年來英美等國厲行經濟國家主義，彼等已有經濟領土，故行之無礙，日本被逼卻不得不於鄰近尋覓經濟領土。」這自然是日本軍閥的舌人的話。但所謂經濟國家主義，乃是近年來的產物，在英美等國未實行經濟國家主義以前，日本何以割台灣併朝鮮呢？他說，「那是緊急避難。譬如一隻船在海中沉沒，乘客各抱一片船板掙扎，一個壯漢赤手空拳，將身旁一個弱者手中的船板奪過以求生，那叫緊急避難，在羅馬法中是無罪的。」這種說法簡直就是「伊索寓言」中「狼與羊」的故事。假使日本把中日關係就當作「狼與羊」的故事，那乾脆不要講理，不用費話，就幹你們野蠻的勾當好了。但要知道，中國絕不是羊；我們將運用一切的人的力量，打死你這隻貪很兇殘的野蠻狼！

再說他對避戰責任的詭辯。河相說：中國方面有精密的計劃，欲將居住上海的日本人完全消滅。並

謂華方於開戰前曾密告外人及華人於八月十三日退出蘇州河以東（？）。這些話都是「莫須有」的狡詞，根本問題在於日本的用心如何。北方與上海都是中國的領土，這兩地方的戰爭是一體的，絕不能劃爲截然的兩橛。中國的認識是如此，日本的戰略也是如此。試看盧溝橋事件於七月七日發生，十一日近衛內閣就決定自國內派兵，並開始徵發預備役，難道不是預備對華大舉嗎？日本軍閥對中國的侵略向來是零零碎割，它本想先集中兵力解決華北，後來看見中國政府決心抗戰，已非一隅之事，遂發動上海的戰事，以牽制中國多數的精銳軍隊於南方，一面再以重兵解決北方。請問日本的戰略不是如此嗎？虹橋機場事件原出於日本水兵的挑釁，中國當局已表示了歉意，並約定共同調查眞相，由外交途徑解決。在這時日本竟在沿江一帶閉鎖領館，撤退僑民，把數十艘軍艦集中於上海。請問爲的什麼？日本在這樣的戰略這樣的準備之下，發動了淞滬戰事，到頭來還血口噴人，說中國計劃完全消滅居住在上海的日本人；除了自欺之外，能騙得住世界上任何人嗎？

兇蠻而狡獪的日本，你在中國的英勇抗戰之下顫慄吧！在世界的正義威力之前屈膝吧！此外不必再費話！

（廿六年十月九日上海大公報社評）

今年的國慶！

今天是中華民國二十六年的國慶日。每年此日，我們對於這個艱難締造的國家，都有一番感慨，一番慶祝。今年此日，我們更應該沉痛的感慨，熱烈的慶祝。感慨的是這二十六年來，我們作國民的對於這一個偉大的國家未曾好好愛護，害得她時常在困苦顛連的命運中；慶祝的是我們國家已真正到了存亡絕續的關頭，她的四萬萬人民已無閃躲的餘地而爲國家拚命奮鬥了。

中華民國的誕生，是世界史上的一件大事，尤其是中華民族史上的一件大事。這一件事是中國脫離數千年帝王專制渡到平民政治的革命，這在政治史上是有劃時代的意義的。這一件事又是中華民族推翻異族統治的革命，所以在民族史上尤具有痛切的意義。中華民族有兩度敗亡的歷史，一度在南宋，一度在明末。南宋亡國之後，不到百年，朱元璋便起來打倒蒙古，復興祖業；明末亡國之後，經過二百多年，孫中山纔起來逐走滿清，創造民國。朱元璋孫中山都是復興國家的民族英雄，但是孫中山的事業却比朱元璋的艱難多了。十四世紀的吳王稱帝，只須遵照祖宗遺法，便可繼續統治天下；二十世紀的辛亥

革命，卻不那樣簡單了。這時代的中國，要清算固有的文化，由國家政治到一般社會，都須澈底改造，以適應現代的生存競爭。這一個工作已然極其艱巨，而在民族關係上尤有未完成的工作。辛亥革命推翻了二百多年的滿清統治，那只是成功的一面；同時中國還有八十年來的現代外患等待解除。自鴉片戰爭開始以至辛亥革命的前夜，這八十年來，中國被海外文化壓得喘不出氣來，被海外武力打得遍體鱗傷。滿清之亡，一小半亡於革命黨人的民族意識，一大半則亡於海外的壓力。滿清滅亡之後，國內異族的腐敗統治雖告崩潰，而海外的壓力仍緊緊的壓在中華民族的身上。辛亥革命的諸先烈，拼頭顱，灑熱血，給我們驅走滿清的統治，同時卻留下許多工作待我們去完成——便是要我們努力充實文化的內容，澈底改造國家政治及一般社會，克服一切外患，以完成一個內無[illegible]外少憑陵的現代國家。

辛亥革命所遺留給我們的工作，確實是太重大了，太艱難了。但無論如何重大，無論如何艱難，只要我們努力去做，不浪費時間，不虛耗力量的做這二十多年的工夫，總該有些成績了。日本在對外的遭際上完全與我們相同，對內沒有嶄新的變革，只憑討幕廢藩的一點動力，在「一君萬民」的名義下，便接受了近代文化，造成一個強盛的國家；我們為甚麼不能承襲辛亥革命的動力，進而澈底改造國家呢？在國家的現狀之下，我想凡是中華民國的國民，只要這麼反問一下，便應該惶悚流汗，慚愧雪涕吧！

國家到了現在的地步，不是毫無原因的。就對外關係說，以民國比清末，處的比較是順境。清末的鴉片戰爭，英法聯軍，中法戰爭，甲午戰爭，庚子事變，日俄戰爭，都是驚濤駭浪可以亡國的大事情。入民國後，只有民國三四年日本攻青島提二十一條是一件大事，十七年濟南事變是一件次大事，此外簡直是風平浪靜，甚至還有華盛頓會議後絕對無憂無慮的十年國際和平。故就對外的環境言，自民元以迄二十年九一八的前夜，這二十年光陰，是我們充實文化，修明內政，改造社會，增強國力的大好機會。但省察一下國內的記錄，我們雖不能否認國家在各方面也有些許進步，而大部精力卻在昏睡與亂鬥中浪費虛擲了。我們日常生活的昏睡懶惰，茲難條分縷舉，請看一下我們的內戰記錄，便可看出我們的罪惡之一端了。二年的二次革命；五年的討袁之役；六年的督軍團之亂，張勳復辟，護法之戰，以至綿亘數年的南北之戰；九年的直皖之戰，粵軍倒岑之戰；十年的湘鄂之戰；十一年的直奉之戰，廣東陳炯明之亂；十二年的湖南護憲之戰；十三年的蘇浙之戰，直奉再戰；十四年的奉軍南下之戰，西北軍與奉直魯聯軍之戰，還演變至十五年誓師的國民黨的北伐大戰；十六年的國民黨破裂，國共分家，因而有連綿不絕的戰爭，直到二十五年末的西安事變，總算告了段落。看這二十多年的內戰記錄，固然也有幾次有意義的戰爭，而大多是無意義的亂鬥。自直皖之戰至奉軍渡江，這六年的戰事，簡直可以說是「春秋無義戰，」只是軍

閥的醜鬥變爭。十五年爲始的北伐戰，有意義了，可痛的是夾雜着國民黨的分裂戰爭，幾乎恢復軍閥爭鬥的舊觀。十九年河南一戰，犧牲之大，損失之多，開民國以來內戰的新紀錄。自十六年八一暴動開始的國共十年戰爭，更消耗了多少國力？對外有自强機會，對內却自殘軀體，我們如何能够完成辛亥革命所遺留下來的工作？我們的國家更如何能够抬頭見人？

「人必自侮，而後人侮之；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在這樣的背景之下，自然會有「九一八」的横逆，及這六年來的嚴重國難。現在敵人已把我們逼到存亡絕續的關頭，我們全國國民再不能不爲國家拚命奮鬥了。日本的鞭子驅走了我們懶惰，日本的拳頭打出我們的羞恥。我們在淚眼中，看見英勇男兒的壯烈搏鬥，同時也看見腐舊齷齪的臨陣敗逃。壯烈搏鬥的是中國新生的跳躍，臨陣敗逃的正是我們多年罪惡的遺形。我們曾種下多年的惡因，自然該受目前的苦痛；我們要忍痛接受罪惡的責罰，同時更要忍痛取得新生的長成。我們有積年的懶惰，敵人有積年的雄心，以它的雄心來打擊我們的懶惰，這苦痛是應該嘗受的，現在的問題則是如何在痛苦中戰勝强敵，再進而完成辛亥革命所遺留下來的工作。

我們只要認識敵人的雄心是要征服全中國，只要認識現在的敵人決非元清之比，便可知道我們沒有妥協屈服的路，目前的妥協屈服必然換得最後的亡國。亡國於日本，再圖復興，將比朱元璋採中山

的事業艱難多了，甚至成爲不可能。我們認淸了這一串的道理，中華民國的前途，只有在死中求生，決不能在徼倖中苟存。在這個覺悟之下，政府及國民應共同下一個必死的決心。政府應該痛切承認過去的未盡職，現在要掃蕩一切的懶惰徼倖的心理，肅淸一切貪汚無用的分子，澈底改造政治機構，以適應戰時的機能，儘量集中一切軍事力量，以與敵人作殊死的決戰。一般國民更應該痛切覺悟己身的罪孽，由意識到行爲，都澈底淸算一下，準備最高的情緒，維持最低的生活，把個人的生命財產都貢獻給國家。我們不願預言失敗的悲慘，但願大家爭取勝利的光榮！

今當國慶良辰，看破碎河山，聽猛烈砲火，中國的兒女們！我們應該澈底覺悟這目前的活教訓，是我們過去的失敗的收穫；今後的新生命也惟有在最近的勝利中取得！我們悲悔吧！我們奮勇吧！我們要悲悔過去的糊塗；我們要爭取將來的勝利。我們確信日本不能亡掉中國，最可怕的是我們自己的糊塗。現在我們再不能繼續糊塗下去了，鐵一樣的現實，逼着我們淸醒，迫着我們努力，這一點就儘夠我們感慨，儘夠我們慶祝的了。中國的兒女們！我們且忍住兩眶辛酸淚，痛飲一杯國慶酒，打倒我們國家的敵人，完成辛亥革命所未完成的工作！

（廿六年十月十日上海大公報社評）

一個嚴重問題

我們的國家早入戰時，至少自六年前的九一八事變以來已入戰時，但是我們的政府，人民，社會，以及一切，無論在心理及行為上皆未戰時化。現在抗戰方開始，我們的缺憾已自各方面暴露出來了。我們將如何彌補這些缺憾，以適應抗戰的需要，由政府機構到社會一切，皆需要逐一檢討，逐一解決，非此短文所能具論。我們且先提出一個目前最急切最嚴重的問題，軍隊與民衆的聯繫問題，促請大家注意。我們最近接到一位前綫戰士的來函，充分揭出這一個問題的嚴重性，特為引錄如下：

主筆先生：報紙上每天都在喊叫着組織民衆，然而事實上民衆一天天更加渙散，尤其是在前方，火綫兩三里內沒有民衆，其情可原；甚而遠離開火綫十里至二十里都無民衆——就是有也都是些老頭與小孩。這種情形使在前方作戰的我們不知遭遇了許多不應遭遇的困難。

某次我們奉令出擊某處，在圖上看來不過五六華里，其間有兩條河，第一條我們曾去偵察過，可以徒涉；第二條因在敵人後方，無法偵察，派人去找當地民衆，尋遍村子沒有半個男人，無法只得

按圖行事，結果終於攻擊步隊爲此河所阻。像這樣情形，如果有健全的民衆組織，那裏能使我們遭遇如此障礙？

還有漢奸的活動，幾乎使人「談奸色變」。在前方對砲彈與飛機並不感到威脅，只有漢奸眞使人煩惱，就是週圍都有駐軍，你單身走路也要時存戒心。後方行人被暗殺是時有所聞的。這樣情形幾乎使人難以置信。

有一次我親眼看見一股信號烟由棉田裏冒出，立卽派人去抓，竟未抓住。弄得沒辦法，我後來自告奮勇向主官要求讓我組織附民衆，他允許了，我把老嫗組織成婦女隊，小孩組成兒童團，把他們派到田裏，另一面自己帶着人埋伏，三天內由他們的告密，使我毫不費事的抓了兩個漢奸。從此我每移一村，只要有三人以上，不問老幼就組織他們，村子旁邊放信號槍的就絕跡了。這究竟是局部的，多數的漢奸仍在廣汎地猖獗着。

再有前方輸送情形也遭遇到沒有民衆組織的困難，時常傷兵因無人抬擡而致命。本國軍隊在自己國境內作戰而遭遇這不應有的困難，實是我們組織上的恥辱！

許多先生們每天都在喊着組織民衆，而實際工作者竟無一人，誠爲憾事！

夜深矣，禍急矣，往者不諫，來日可追，趕快請熱心的先生們把戰區裏外的人民有韌性的組織起來。

組織時（一）不要徒具昔日形式，（二）儘量採用以前共區民運的組織方式，（三）使民衆自己知道是組織上的成員，（四）要加緊對民衆宣傳抗戰的意義，使他們從心坎裏樂於來幫助軍隊，做到軍退民退，軍進民進的程度。這樣我們抗戰前途才能有勝利的保證。

先生：你是輿論界的權威，只要你把這問題提出，一定能收有效的反響。現在不是說的問題了，是做的問題，是快做的問題，請你注意這一點。敬祝撰安！

邵奇萍於上海軍次，十月三日。

這封信寫得太痛切了，它所提出的問題太嚴重了。我們這次對敵人作戰，是我們民族國家生死存亡的關頭，大家都知道這次戰爭應該是全民抗戰，但實際的情形竟成了「無民抗戰」！本國的軍隊在本國領土內與外敵作戰，竟如荒島行軍，看不見民衆。有了民衆的行動，卻是敵人的奸細這樣情形，如何可以保證我們抗戰的最後勝利？

因此使我們想起以下幾個問題：

第一，軍隊的政治組織問題。回想國民革命軍出師北伐時的情形，民衆對於軍隊不僅做到「簞食壺漿」，並做到戰鬥行動的一致。雖說民衆的情緒都厭惡北洋軍閥，故能熱烈幫助軍隊；但是現在我們是同國家的生死敵人作戰，難道民衆對於日本的憎惡不更十百倍於本國的軍閥嗎？這是不成問題的。但結果竟大相懸殊。其原因當然很多，而軍隊缺乏政治組織，也是原因之一。北伐時，軍隊中有黨代表制度及政治部的組織，替軍隊解決了許多複雜問題，尤其到處能與民衆發生聯繫。現在的軍隊則已沒有這種組織，單靠參謀人員的活動，自然勞多效少。我們未必即主張恢復黨代表制度及政治部組織，但無論如何，軍隊中政治組織及工作的不够，現已充分顯露出來，應該設法加以補救。

第二，黨部的工作問題。黨部的主要工作是民衆運動。領導民衆及組織民衆的工作，向一操於黨部之手。現在真正到了要民衆的時候了，尤其是到了要民衆組織與抗戰軍事配合聯繫起來的時候，何以民衆竟無影無踪？因此可以使我們感覺到過去黨的工作方式及工作成績，都不免發生了問題。我們是黨外人，對於黨的內部各問題深愧隔膜，望黨內人對這問題加以深刻的檢討。將如何展開民衆運動，並如何加強民衆組織，似乎應該重定方針並改換方式了吧。

第三，一般問題。民衆的消沉，除了上述兩種原因外，還包含有很廣泛的複雜問題。政治的腐敗，經濟

的關係以及軍隊的紀律，一切一切皆可反映到這個問題上來。總之我們本身有不得毛病；本身若有毛病，到了緊急關頭，它便會暴露出來。這不是一個小問題，我們應該因此觸發一串覺悟，標本並進，從各方面着手去安排補救。我們如能把軍隊與民衆的聯繫的問題得到合理的解決，國家的許多問題也均將隨之而進步了。

（廿六年十月十一日上海大公報社評）

我們的外交方針

中日戰爭發展到今天，還來談我們的外交方針，像似背時，其實還很必要。我們要具體討論這個問題，有從國際分野，日本路綫及我們的動向加以考察的必要。

第一國際的外交分野。現在的國際外交分野，在歐洲對立着法蘇、德義兩大集團，在東方顯列着中蘇日三角陣形。法蘇，德義的對立，在歐洲已尖銳到無以復加，兩方面競拉與國，激盪推演，使世界各國均有不彼則此之概。法蘇極力拉攏英美，是對抗德義的一個主要手段。東方的形勢因爲蘇聯本身就是歐洲聯鎖的重要一環，日本與蘇聯的關係已經到了不能妥協的決定程度，中國立在東方的三角陣形中，她的舉措，不僅可以左右東方的形勢，並且可以反映到歐洲的形勢。大家皆知道英美的一致合作，可以決定世界局面的大勢，還須知道中國的堅定方針也能決定東方局面的大勢。

第二日本的外交路綫。日本大陸政策的對像，第一個是中國，第二個便是蘇聯。中國弱，她以爲不難征服；蘇聯強，一礙她的侵華的進路，二是她大陸政策的最後阻礙，所以恨之最甚，嫉之最深。她對於中國

的辦法有種種，最理想的辦法是中國投降，做她事實上的保護國，在精神及利害上皆跟着她走；不然便用武力逼壓。她對於蘇聯沒有第二個辦法，只有把力量充實後而訴諸一戰。日本在這條進路上第一個便遇見了討厭的軟體中國。九一八事變到現在六年多，她一面用武力逼壓，一面用外交引誘，但中國儘管在武力前屈讓，在實質上永未投降。因此這六年多日本用盡武力侵奪外交伎倆，在國際上形成可恥的孤立，到現在還須同中國武力對拚，這可以說是日本最不合算的「不得已」了。在這種現狀下，日本將一天天感到中國的討厭，蘇聯的可怕；因此她必然的要在國際上找與國，以牽掣蘇聯，並迅速的戰敗中國。日本要在國際上找與國，很自然的是加入德義集團。日德防共協定以後的日德關係，已是世人皆知；最近義大利的種種表現，差不多就是日本的同盟國。日本走這條外交路綫，在西地中海上牽掣英法，在東歐大陸上牽掣蘇聯，以便專力對付中國。在日本這條外交路綫上，無疑的，中蘇的利害業已完全一致。日本如成功，結果是中國亡國，蘇聯不了。所以目前中國的抗戰，是保衛自己；也是掩護蘇聯；蘇聯在這時有所行動，是助華，實是助己。

第三我們的外交方針。我們的對日外交有三條路：（一）與日本簽訂防共協定，就是投降日本，一切聽她支配，跟着她走。（二）不死不活的往下拖，如同九一八以來的路綫。（三）鮮明的與反日勢力

攜手，決心死戰。第一條路我們不肯走，因為我們不願意投降日本並危害蘇聯。現在値得我們考慮決定的，是第二第三兩條路。從大勢看，日本業已騎上虎背，她在國際上已有鮮明的做法，對中國必要求得軍事上的結果。在她這種決心及辣腕之下，我們要想不死不活的往下拖，事實上已不可能；除非是接受她的妥協條件，屈服投降。這條路是黯淡難通的；但是我們的表現，顯然還有些逡巡，未曾完全踏上第三條路。

當然，蔣委員長在國慶前夕的演辭，已充分表示出政府及領袖的決心；為了配合這種決心，我們的外交方針還需要更鮮明的決定。第一，我們對日本已打得頭破血出，在國際法上還不承認是一個戰爭。我們一未絕交，二未宣戰，在砲火連天之中，佈滿敵人的合法間諜，甚且自由通商，我們的大使也還在東京受罪。這樣我們本身是進行着一個不純粹的戰爭，在世界視聽上則以為我們的決心不够，對日本還拖着一個尾巴，自然要影響到與國的取得。第二，我們認定日本是我們的唯一敵人，此外對任何國概避衅端；我們要在世界友邦中接受道義的同情並取得實力的援助，但絕不可做國際的「鄉愿」。我們對英美法各國的同情要深切的感謝；但對於鮮明的不友意，也不能完全置之不理。義大利的態度，便是一個問題。她大量派兵來上海，平均四十個兵保護一個僑民，無端槍殺我們的貧苦工人。本月六日義大利

人民報上又發出義相墨索里尼一篇文章，公然贊助日本，謂對日本「完全諒解」，且認爲有「充分理由」，並對日本飛機轟炸和平民衆事加以正面的辯護。這種露骨的不友意的表示，我們應該有所表示，不能以「鄉愿」的態度處之，以失掉國際的敬重。第三，我們要有一個自主的方針，無論如何，要先決定自己所要做到的限度，然後一切努力纔有所歸趨。最要不得是國家已在生死存亡的關頭上拚命，在步驟上還沒有一定的趨向。綜合以上三點，我以爲我們應該在外交上有進一步的表示，以示不投降不屈服的決心。拿這種決心，推動蘇聯，推動國際，在東方與蘇聯緊密握手，在世界結成中英美法蘇的聯合，以鎭壓反世界和平的狂燄。大家皆知英美的態度比較游移，但是中國三個月壯烈抗戰的結果，已使英美輿論昂奮，進而考慮實際的步驟；中國若再有堅定而鮮明的表現，中英美法蘇聯合陣勢的結成，不是不可能的。英美等國發動的辦法，是要經過國聯大會及九國公約會議，再從事經濟的制裁。這形勢雖與我們有利，在步驟上是相當迂遠的。日本現在的做法，就是要在英美辦法尚未實行，蘇聯尚未動作之前，猛力對華作戰，攫得勝利，以武力的既成事實給世界人看。目前就是這一個階段，國際正義的聲勢愈高，日本進攻的力量也愈猛。在這個階段中，正需要更沉勇的抗戰，更堅定的決心，更鮮明的方針，推動蘇聯，推動英美法，共同立在一個鮮明的陣綫上來，我們的勝利纔有絕對的把握。

以上所說的是我們的堅定鮮明的外交方針可能的外交影響，至於它在內政上的影響，也是同樣重大的。

（廿六年十月十四日上海大公報社評）

「西線風雲」序

中華民族發源長成於北方，我們的祖宗在北方闢草萊，征異族，爲我們創造了一個偉大的國家。我們民族國家的根基在北方，其後我們民族史上幾次天翻地覆的大事情也都發生在北方。我們的外患常在北方，由漢到明二千多年的歷史都是如此，南宋明末並曾兩度亡國。宋朝的君臣沒出息，放棄河北，使國家沒有根基；明末政昏民亂，思宗失掉北京，他的後人也不能在江南偏安。時代進了十九世紀，西洋的勢力移到東方，外患不斷由南方侵入，好像似掉轉了方向，其實眞正的問題還是在北方。近代的外交始於尼布楚之役，那次戰爭是在北方。壓得我們喘不出氣來的日本問題，它的根源也在北方。中日最初的接觸點在朝鮮，以後逐漸內移，而南滿，而東蒙，而整個的東北，而整個的內蒙與華北。日本在這條進路上，同我們糾纏了六七十年。甲午前二十年，她同我們在朝鮮糾纏；甲午之後，她同我們在南滿東蒙糾纏；九一八以來，她又同我們在整個的東北及整個的內蒙與華北糾纏。本年七月七日的盧溝橋事變展開了中日局面，在中國男兒的英勇抗戰之下，迸發了平綏、平漢、津浦、淞滬四線大戰。我們若把這四線戰事

分做南北兩個戰場，則南戰場是賓，北戰場是主；在北戰場的三條線上，平綏線（晉察綏）則是主中之主。日本攫得平津之後，她在平漢津浦兩線的進攻，已是防禦戰的性質；平綏線上的攻奪，纔是她遂行大陸政策的重要戰略。明白了這個形勢，我們可以瞭然中日間歷史糾紛的根源在北方，當前的戰爭焦點尤其在北方。

這次中日戰爭纔開始三個月，將來的發展如何，雖不必作過早的懸測；但要使這次對日抗戰成爲中華民族的解放戰爭，並達成其任務，最低限度，我們必須有在北戰場決死戰的決心纔行。

我是中國人，尤其是中國的北方人，近一年來，人在南方，常是繫心北方的國難。最近在對日抗戰中，眼看着我軍在淞滬線上的勝利，心中常感到異常的安慰與感激；同時耳聽着北方的敗報，家鄉化灰燼，親族成奴隸，心中尤感到異常的悲憤與不安。我這點悲憤與不安，不全是鄉土感，是由於國家憂。我們民族國家的根本在北方，我們的弱點偏偏在北方；中日問題的焦點在北方，我們的失敗偏偏也在北方。這是使我對於我們國家的前途最感覺危險的一點。

在北戰場上，我們看見敵人由平漢津浦兩線逐漸南侵，平綏線上的變化，尤其令人驚痛。南口的苦守，張家口的撤隊，天鎮大同的逃跑，平型關的苦戰未能阻住敵人的鋒銳，雁門之險一破，晉北形勢陡變，

太原亦近動搖。當我讀這篇短序時，綏遠業已陷落，晉北的形勢則以生力軍的反攻而轉趨穩定。平漢線上正定石家莊雖已失陷，娘子關方面則有重兵死守。只要娘子關的天險不被突破，晉北方面再有一個有利的發展，北方大局還是很有希望的。我們是報人，在這個大時代中勉盡着言論報導的責任。大公報的天津版已隨着國家的主權而中斷，滬漢兩版正在艱難的人力物力下支撐着。我們對於國家的大危難，事前未曾有周密的籌維，現在也只是抱殘守缺的記載戰績，發表拙見。這本「西線風雲」是晉察綏戰場上的戰時通信，是同事長江兄等的活動成績。他們幾位出生入死的在戰地內跑，隨着國軍的腳跡，冒着敵人的砲火，記錄下這些可歌可泣可悲可慨的事蹟。這些文字曾輸送給讀者不少的悲歌感歎，雖不敢說對於國家有了什麼貢獻，在新聞記者的本分上，他們總算盡了職了。我願國人於讀這本書時，不必多掛念這幾個報人的艱難，務要切記着這一個地帶在我們國家命運上的重要！

各線大戰在繼續進行着，敵軍在淞滬已至有氣無力的程度，希望北方健兒更奮力予敵人以打擊。北方是我們國家的根本，同時也是一條國際通路。淞滬之戰已打出英美的聲援，北方戰爭，尤其是晉察綏這一線，連繫着外蒙和蘇聯。我們必須有在北方的堅決戰爭，纔能打開北方大陸上的國際局面。這一個局面的取得，是我們達成民族解放戰爭的一個重要因素。

我們萬不要妄想暫時丟掉北方，還能在南方維持一個妥協的局面，以徐圖復興。東晉六朝，南宋晚明，凡是圖在江南偏安的，哪一個能安？哪一個不是日蹙月削，以至於澈底失敗？歷史的教訓太清楚了，我們到現在還能重蹈歷史的覆轍嗎？我們要記着！北方是我們中華民族的家鄉，我們絕不放棄！我們要在深深埋着我們祖宗的骨殖的地方，擊碎我們的敵人，並進而收復所有的失土！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十月十七日王芸生序於上海大公報社。

告全國青年

國家近入了大時代，有志氣的青年便應該放眼於較大的將來，加緊磨鍊，加緊努力，以期對國家的大時代有所貢獻。

國家對外已展開血的搏鬥，許多青年還在徨徬苦悶。近來我們不斷聽到青年們訴說種種的苦悶，一個青年曾對我說：「我們過去呼喊抗日，現在眞抗日了，大家反到徨徬起來。」這便是口號與事實的距離。大家過去只知呼口號，毫無心理上的準備，須到口號兌現了，大家反爲事實所震盪而迷離徬徨了。青年爲什麼苦悶？是因爲對當前的人事糾紛打不開，丟不下。青年爲什麼徬徨？是因爲對較遠的國家前途缺少認識。戰爭爆發之後，個人的生活及讀書的環境皆起了劇變，熱情的青年誰不想起來做些工作，把個人的力量貢獻給國家？但要做工作，第一道難關便是人事的糾纏。我曾親眼看見一個學生團體，當誕生時吵散了，其後接洽了一兩個月，仍是不得要領。假使抗戰救亡的工作眞等齊這個學生團體去做的話，那纔不知道要誤國利敵到什麼程度呢。我願正告全國有志氣的青年，你們不要太關心這一類的

人事糾纏，無謂意氣；應該在目前儘可能的做一些自己所能做到的工作，對將來儘可能的做一些較遠較大的準備。我們要知道，在大時代的火焰中，那些灰色的感情，虛詭的人事，一定被焚燬，燬成微風卽可吹散的輕灰；最經得起磨鍊熔鑄的是我們的國家，一個嶄新的中國，必然在這大時代的火焰中磨鍊熔鑄成功了。

戰爭是逼着我們進步的。抗戰纔三個月，我們的缺點已自各方面暴露出來；除非我們甘心放棄了國家的前途，對於這些缺點便不能不設法努力去補救。在逐漸暴露繼續補救之中，國家必然進步了。

對日抗戰的前途，大概不外以下三個結果：（一）勝利，（二）失敗，（三）不死不活的妥協。這三個結果，勝利或失敗都有前途，惟有不死不活的妥協最可怕。我們不妨閉目一思，假使我們的抗戰沒有結果，新的失土增加了一大片，竟接受了屈服妥協的條件，請問我們的國家將成一個什麼樣子？這條路是黯淡難通的，假使政府不幸竟走了這條路，我們的國家必然要產生一個黯淡而紛擾的局面。假使勝利了，（這勝利當然還需要許多主觀的努力及客觀的適應纔能取得）在政治社會各方面一定呈現一個開展的局面。到那時，我們由意識到行爲，由政府機構到社會組織，都需要有新的適應。這是毫無疑問的。假使失敗了，我們的國家自然要進入一個艱難慘淡的境地。但這艱難慘淡是單純的，而且是富有

新生命的、因爲在失敗的過程中，一切脆弱的，腐爛的，骯髒的，皆已死掉了；到那時還能呼吸的，還能支撐的，還能掙扎的，一定皆是堅實的，嶄新的，完善的了。新的中國便隨着這些人的呼吸，支撐，掙扎，而孕育以至於長成了。我們認清了這些前途，除了不死不活的妥協外，無論勝利或失敗，國家社會皆將一新。如何小心應付勝利後的開展局面？如何大膽支撐失敗後的艱難國運？有志氣的靑年們，現在就得從智識技能意識體魄各方面開始作準備。縱使不幸竟出現一個不死不活的妥協局面，那黯淡難通的途徑更需要有志氣的人們去打開，去挽轉。有志氣的靑年們！你們應該從較遠較大的國家前途作準備，目前的小小人事問題眞是不值一顧的了。

你們要放開眼光，立定志氣，努力補充自己的知識，加緊鍛鍊自己的體魄，在目前儘力做些有利於抗戰的工作，爲將來則把開拓新中國命運的責任擺在自己的肩頭上。今日的靑年，若無此志氣，無此準備，則現在苦悶，將來更要苦悶，現在徬徨，將來更要徬徨。

在抗戰的暴風雨中，天然改造了靑年的教育環境，這血的教材，淚的課本，還不夠新中國的兒女們研讀的嗎？我在「學生界的責任」一文中（九月十六日本報社評）曾指出中日問題的根絲在文化競爭上。我們在現代化的程途上落伍了，自然招來凌辱。中日問題的眞正解決，不僅在於這次戰爭的結

果，實繫於今後的文化建設。前兩代人在這一點上溺了職，結果造成國家的一貫悲運，今後的青年卻不能再那樣糊塗了。今後我們的國家是繼續衰落，或漸逐復興，那完全要看我們的青年是繼續糊塗，或逐漸覺悟。

親愛的全國青年！國家進入了大時代，有志氣的青年便應該放眼於較大的將來，加緊磨鍊，加緊努力，以期對國家的大時代有所貢獻！

（廿六年十月十八日上海大公報社評）

購救國公債！

這次對日抗戰，大家皆相信最後的勝利必然屬於我們。但這勝利的取得，有一個必要的條件，就是必須我們能够持久作戰。如何持久作戰？一靠人力的奮鬥，二靠財力的支撑；在近代的戰爭中，經濟財政的能力尤其是主要的因素。

在對日長期抗戰中，必然遇到的兩個重要問題，一是兵員的補充，二是軍費的籌措。要籌軍費，有一個最簡便的辦法，便是印發鈔票。這雖是一個最簡便的方法，同時也是一個最危險的方法。因為通貨膨脹的結果，相伴而至的必然是物價昂騰，財政紊亂。我們的政府不採取那個最簡便而危險的方法，而發行救國公債，瘏口嘵音的向國民勸募。很明顯的，政府是避開通貨的惡性膨脹，要國民把剩餘的消費力暫時借給國家。這一個費力而穩健的財政辦法，是我們國民應該首先對政府表示敬意的。

募集救國公債的方法有種種，如限制國民消費及銀行存款提成等等，都是最有效的辦法。若認眞實行起來，這五萬萬元之數是不難立就的。但這些比較近於強迫的辦法政府都未採用，現在的辦法只

在訴諸國民的愛國心。這一個費力而客氣的募債辦法，也是我們國民應該對政府表示敬意的。

救國公債發行以來，政府用很大的力量來勸募，推銷的組織遍佈於社會各階層；這五萬萬的債額，在將近兩月的光陰中，認購之額纔過半數，繳到的數額更少。返觀日本方面的「國防獻金」沒有政府的正式策動，只是人民自動的捐輸，在這幾個月當中，已有相當可觀的數目。他們是侵略國家，我們是生死決鬥，我們的愛國應該比他們來得痛切而積極。假使說救國公債及「國防獻金」是人民愛國心的測驗器，我們的情形便未免太寒傖了！在這個對照上，我們國民應該特別努力；否則軍事未失敗，國民的愛國心先失敗了。

我想救國公債募銷不甚踴躍的原因，除了國民經濟衰弱的一個理由之外，還有一個極大的障礙，便是國民胸頭的心理疙瘩。這個疙瘩，起於國民對於官吏的不信任。民國四年，袁世凱因二十一條的大壓迫，募集救國儲金，以發奮圖強，結果那筆錢竟用到洪憲大典上去。當然現在的問題比當年大了多少倍，政府信用也比當年好了多少倍，不能相提並論。但是，我們不能否認政府機構內還有貪污分子的存在，國民心裏難免有些不放心。儘看見社會上紛紛勸募，卻少見擁資鉅萬衆目所注的人們認購巨數，這於國民心理就有影響。我以爲凡有剩餘消費力的國民都應該儘量購債，而受國家社會恩惠最多的達

官豪富尤其應該首先巨額購買。這班人們購買救國公債的當然不少，不過大家知道的還不多。此中儲有盡了義務而不願宣布的，這種隱善不彰的心理，當然是一種美德，不過現時卻可不必。因爲購買救國公債的事，不僅是國民個人的義務，同時還是一種社會教育，這個人可以影響那人的。當前有多少達官豪富，國民心裏都有相當的估計，用不着裝窮，公開宣布一個購債數目，在社會上只有好影響，而且是制掉國民的心理疙瘩一個最有效的手段。達官豪富們！要知道你們平日受國家社會的恩惠最多，現當國家危難關頭，你們也應該愛國最力。你們最有購買救國公債的力量，也最不影響你們的生活。你們可以把外國銀行裏的存摺酌量拿出一兩個來，買救國公債等於把私財存到國庫裏，既救了國家，同時並不減少（並且增加）你們的財富。你們若一定把這些錢買了外匯，那是削弱國家的力量，同時就是幫助敵人。你們當眞預備解除了中華民國國民的頭銜，去到海外作亡國寓公嗎？

一般國民，凡是有生活能力的，現在都應該盡力減少不必要的消費，把剩餘的消費力換購救國公債。這可做個人的榮譽儲蓄，子女的教育預備費，而在目前最收急效的是盡國民義務，助國家抗敵。我們是中華民國的國民，現當國家大危難之時，我們有獻身的義務，更有輸財的義務。捨身殺敵的事業既然尚未輪到我們的頭上，量力輸財則是萬萬不能逃避的國民責任。當父母病痛不肯出醫藥費的必是逆

子，當國家危難不肯購救國公債的便是莠民。逆子當誅，莠民尤其要不得！

（廿六年十月二十日上海大公報社評）

精神饑饉的天津孩子

我最近接到天津家鄉一個孩子的來信。她這封信雖寄自被惡獸嚙噬過的地方，其中却沒有硝烟，沒有血腥，很平常的文字中表現出一個很不平常的問題——在失掉國家保護的地方孩子們的精神上的饑饉。

她的信，是這樣寫着：

× × × × ×

××：幾次提筆，均為慚愧所阻。其實，眞是慚愧！在校中時，只是熙熙攘攘的不肯安心讀書；有時偶然發一次奮，安心念兩天書，也不過如雲烟過眼般的過去，並沒有留下一點痕跡。現在，可眞苦了！學，是上不成了，——其實是囊中無錢，租界上的小姐少爺們一樣的可以掛着上學的幌子走進走出的，我可不成。——那麽，只好自修。在起始兩天還可以，因為是嘗試，一切都是新的，而且也還有材料來自修。現在就有點不好辦了：書都藏起，不能溫習舊日的書，只剩幾本文藝作品和古文釋義，唐詩三百首等尙擺在案頭，

倍伴着孤寂的缺乏精神食糧的孩子。文藝作品是早就看完了，——並且不止一遍——於是便念起古文及唐詩來。起初我把素所欽佩的詩文背誦完，心中很高興，又選新的念。啊！難題來了：選擇的能力不够，不知那一篇好，那一篇精彩，念時便發生困難，情隨事遷，興致也因之消滅，且根本觀念也發生動搖。××！我不知道念古文古詩有沒有用？是不是把全力用在古老的國文中是對的？希望您撥冗賜與我一個解答！

我現在惑於兩種態度中，不能自決：一種是「讀書爲應付環境」；一種是「爲讀書而讀書，就是不存一切慾望，只爲興趣所集聚而讀書」。××！這兩種見解何者爲對？尚望您指示這迷途的孩子。

近日看「曾文正公全集」，很欽佩曾國藩的爲人及爲學的態度，因此，學了不少的皮毛，例如：看書做劄記，每天練字，記日記等。可是根本的問題不解決，一切仍是無辦法。看書除了看「曾文正公全集」外，別無可看，當然也談不到記劄記了。寫字，只有隨着自己胡抹，沒有一點門徑。記日記更是笑話：每天不出門，外面的事一點不知，坐在屋中又沒有什麼書可看，當然也沒有「心得」可記。於是翻開日記本沒有旁的，只有早霞可愛，眉月解人，連自己都看煩，記得煩了，還有什麼話說？我常笑自己如一個四川災戶、沒有眞正的食糧，只好吃些「觀音土」權且充饑。

前些日練習做詩歌，適時的景物都爲我寫畫：秋月，秋雨，秋夜，秋風，中秋，等等。無聊時，提起筆來稍[illegible]有話說了，想了想，只好又頹然放下。

不說了，訴些苦，您也不能設法拯救，餘話訴與淸明的星月及冷落的庭草吧！

××謹啓，國慶前夜。

× × × × ×

這眞是一封平常的信，在這封平常的信裏，充滿了寂寞，充滿了煩悶，充滿了饑渴；但是我却不能替她解決這些像似很小的問題，同時也想不出什麼話去安慰她。在敵人的砲火中，失掉了讀書的學校，課本成了禁書。她好像頗抱憾家中沒有充足的錢，使她同租界上的小姐少爺們一樣的掛上上學的幌子；其實，那種亡國奴的教育不受也罷。修改了的課本，歪曲了歷史，顚倒了事實，那種教育對於孩子們不是更有毒嗎？

古文釋義，唐詩三百首，曾文正公全集，一類書眞是現代孩子的「觀音土，」這些東西會使精神的胃腸遭受慢性的腫脹，但總比漢奸課本的麻醉毒藥好些吧！

在大時代中，隨處可以遇到不平常的問題。我讀到這封信時，很爲失掉國家保護的孩子難過，同時

也爲她慶幸。一個初中學生，她對於讀書問題能够感覺這樣的痛切，思索這樣的深邃，已經不是平常人所能想像的了。淪陷在賊鋒下的孩子們！你們還愁沒書讀嗎？這本無字的國難大書很够你們讀的了。你們能够讀懂並讀熟這本書，國家的新生命便在你們的身上迸發出來了！

尙在國家保護之下的青年們！你們對於這個孩子的寂寞，煩悶，饑渴，感想如何？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十月廿三日於上海。

再勉北方軍人

北方是我們中華民族的故鄉，也是我們國家的根本。我們的祖宗在這裏胼手胼足的創基業，造國家；我們做子孫的便必須在這裏灑血流汗的守祖業衛國土。

我們國家的根本在北方，歷史上許多驚天動地的大事情也都發生在北方。歷史上幾千年的外患都在北方，我們的祖宗在北方替我們征服了許多的異族，在這裏我們還有兩度亡國的苦痛。歷史的經驗告訴我們：我們能在北方立足時，便民族繁衍，國家強盛；我們在北方失敗時，便民族衰弱，甚至亡國。這部歷史，我們可以由秦漢讀到明清，教訓纍纍，無不如此。在近百年史上，西方勢力東漸，自鴉片戰爭以來，外患不斷自南方襲來，這好像掉轉了方向，其實眞正問題仍在北方。在近代外患史上，我們在北方失土最多，受創最深。東北海上蹲踞着兇貪的日本，西北陸上連接着雄大的俄羅斯，這兩個鄰國都需要我們小心應付，一毫大意不得。單以日本而論，一個朝鮮問題糾纏了二十年，甲午一戰的結果，問題又深移到南滿東蒙。日本在這個據點上經營了幾十年，蔓延到現在，問題已擴大到整個的內蒙與整個的北方。日

本大陸政策的據點在華北，中日關係的根本問題也在北方，中日間的一貫糾紛在北方，這次戰爭的爆發點也在北方。這戰爭的局面，到現在已自北方的晉綏延長到南方的淞滬以至極南的粵海，而戰爭的核心則在北方，我們要決勝也必須在北方。北方的勝利，纔是抗日戰爭的眞正勝利。

認淸了這一點，我們會感覺到北方將士任務的重大。這個重大的任務，不止是驅逐強虜，光復祖業；而且要根本解決中日問題，重奠中華民族的基業，發揚中華子孫的光榮。三個多月抗戰的結果，是南方的淞滬始終保持光榮的勝利，北方則丟冀察，棄綏遠，山西瀕危，山東被侵。這形勢，無疑問的是我們的不利。要轉移這不利的形勢，必須我們的北方將士拚命保住山西，並自冀魯作有力的反攻，給敵人的主力以致命的打擊。我們試想：假使我們再在晉魯兩線失敗了，使敵人掌握西北大陸的要領，並扼住南北交通的樞紐，則大勢已定，卽使我們能在淞滬戰場上撐持，還有多少意義？我們萬萬丟不得北方，必須保持北方，從北方將士個人說：你們丟掉了北方，有何面目來見江東的父老？就國家全局說：沒有了北方，就休想還能在南方偏安苟存！東晉六朝，南宋晚明，凡是想在南方偏安的小朝廷，那個不是食到失敗以至亡國的後果？這顯然的歷史教訓，難道我們都忘記了嗎？

北方抗戰了三個月，在地圖上看我們失利了，從戰績上說我們還有強點。我們的士兵，個個是好的，

人人是勇敢的；只是有些負指揮責任的高級將官不能盡職。南口的血戰，察北的進攻，都是好戰績，而竟歸失敗者，是因爲一兩個將官拆了爛汚。津浦線上節節戰退，不能算是失敗。平漢線上數十萬勁旅，那個士兵不是國家的精銳？然而由琉璃河崩潰到漳河，這一個長程的失敗，完全由於高級將官的指揮乖方。據外國軍事家觀察北戰場歸來者談：從高級指揮的能力說，失敗將更大；現在北方戰局所以尚能撐持者，完全由於士兵的好。據這位觀察家說：依照高級指揮的結果，不僅無勝利，連失敗都不成樣子。爲什麼一定沿鐵路線打？且敗退時不將鐵路施以重大破壞，結果鐵路交通都充分被敵人利用了。這雖是外人之言，是很可作我們參考的。現在的關鍵：是百萬士兵更加奮勇，千百將官勉力盡職，北方戰局是不難改觀的。

李服膺的一段長跑，使晉綏大局變色，郝夢齡軍長的一番死戰，挽轉山西的危機。這兩人同是軍長，同是一死，一個死在國法下，一個死在戰場上，鴻毛泰山，輕重懸殊。北方軍人們！你們人人都要作郝夢齡，切莫學李服膺！

（廿六年十月二十六日上海大公報社評）

附錄：遊記

贛行雜記

我當了八九年新聞記者，大概都是坐在屋裏抹桌子，出門訪新聞，還是破題兒第一遭。這次奉命到江西旅行，由八月八日出發，至九月九日歸來，共用三十三天的時間，在牯嶺住了二十四天，其餘的時間大都消耗在火車輪船上了。這次旅行經過河北，山東，江蘇，安徽，江西，湖北，河南七省，見過不少的朝野要人。汪蔣林段是國家先後四位元首，這次都見到了。餘如各部部長，各省主席，政治家，外交家，軍事家，各地學者，就是我們同業也會見了幾位。旅行的見聞，除了簡單的函電，已陸續在大公報發表外，現在想試將旅行經過做一個較有系統的報告。只是途中沒有詳細的日記，多半靠事後的追憶，述寫當時的事情，自然疏漏不免。茲謹鄭重聲明，假使我這篇雜記記述有誤，當由我個人負責。

由天津到牯嶺

八月八日下午六點二十分平滬通車在微雨中自天津車站開行。這時的天氣本還很熱，因在陰雨

中，所以未曾感到炎威的壓迫。車過德州時，雨下得很大，車中大有冷意，睡時須加重被始溫。中國旅行社滬社襄理胡時淵君與我同車，胡君新從關外歸來，談起在偽國的所見所聞，彼此都有無窮的感慨。據胡君言，在關外完全是日本人的天下，偽國的官吏連鷹犬爪牙的資格都夠不上。最痛心的是一班甘心做漢奸的人欺凌同胞，更加酷苛慘虐。山海關是所謂國境；日本駐屯軍關東軍以及偽國的國境警察，佈滿要津，而我們的實力只有二十枝步槍，還有些是不適用的，簡直不成比例。胡君拿出偽國的兩種錢幣給我看，一種銅質的當一分，一種銀質的當一角。承以相贈，據說偽國只有這兩種錢幣，一元以上便是鈔票了。東北的幣制向來是複雜的，現在日本統制之下居然統一了。我這次在內地數省旅行，南北鈔票不相通融，冀魯鄂用兩枚銅元，蘇皖贛用單枚銅元，河南用當五十大銅元，除單枚銅元外，又皆不相通融，既感不便，尤受損失。我小心在意的結果，篋中還賸下不少的廢錢。只就這一端想來，便已令人悚然滋懼。車到泰山時，正清晨五時，夜雨新霽，遙望泰山，彩雲絢爛，山色天光，蔚為奇觀。這時大概正是泰山觀日出的時候，此景雖未親歷，現在從火車中看日出時的泰山，已覺得是空前的眼福了。車行魯皖蘇三省，沿途青葱，高粱穗已紅，有的已在忙於收穫，可見今年的旱災是以長江為界的。下午八時半車抵浦口，天已大黑，渡江後，覓妥旅社，即乘車入城訪友。我本打算在南京略事勾留，到紫金山上去訪問訪問愛國狼。進城後，知

遁汪院長已於昨日赴贛，黃膺白委員長亦於今日過京西上，我在職務上不容久停。且聽說自從藏本事件發生後，紫金山上的狼不斷傷人，牠對自家人既不很客氣，也未免有些膽寒。所以我雖夜入國門，仍忽忽而別。十日的早晨即登太古公司的吳淞輪西行，十一日下午四時到九江。因為天氣很熱，夜間不能入睡。我在下關旅館已經一夜不睡，現在實實不能支持，我雖比較矜持，也不得不赤臂裸足躺在客廳中電扇底下去找睡神了。在九江登岸後，坐長途汽車至蓮花洞，這是二十二里的半山路，在此換籐轎登山，至牯嶺尚有十八里。我因為受入山登記處的特別招待，乘轎登山時已在下午六時餘，是那天登山的最末一個人。走過好漢坡天氣即已黝黑，到達牯嶺，已是將近十點鐘的時候。我既是夜登匡廬，且正當月晦，所以那一山從人面起，雲傍馬頭生」的奇景，簡直未曾領略到，只覺沿途迎面青壁，下臨深壑而已。

黃委員長的兩次談話

一月來的廬山所以被人注意，大半是因為北平政整會委員長黃膺白先生在那裏的原故。我在牯嶺上與黃先生見面過五六次，比較具體的談話有兩次。這兩次談話的內容都曾簡單在大公報發表，這裏只做些補充。黃先生在牯嶺住在特區二三一號，與段合肥比鄰，我第一次見他，是在十三日上午十點

半鐘，因為他所處境遇的困難，及其談話的沈痛，使我得到一個很深刻的印象。我說北方人士多盼望先生早去，藉以減少「戰區」民衆的痛苦。黃氏很感慨的答道：『恐怕無補於大局呵！』接着說：『這一年來的經過，在明瞭國家情況的人，當然能夠諒解，一般人則以為我黃某天生賤骨頭，甘心做賣國賊。對外未曾做了什麼事，却須時時對內做解釋工夫，眞是痛苦萬分。一年以來對內對外，盡做矮人，我並非不知道伸伸腰，只是伸腰之後有什麼善後辦法？為國家設想，不能那樣冒險。我現在好像打 tennis的ball，日本人說，「黃先生你若是沒有辦法，還不如請你趁早躲開，免得礙我們的事。」一球拍把我拍到南方來，到了南方，逢人便問，「膺白，你什麼時候回去？」又一球拍把我拍回北方去。但一談到辦法便好像我是向中央討價，夾在這兩種心理的中間，能辦出什麼成績來？對方的量是小的，力是大的，而慾無窮；國人則眼光是短的，調子是高的，肩頭不負責任。我的困難可知！且掛着北平政整會的招牌，辦理對日本關東軍的外交，北方各省的事情，無論什麼都可以找到頭上來（甚至整理直隸省鈔的事也來同你吵）但結果是什麼事都管不了。』黃氏的談話，感慨甚深，尤深慨於國人的不諒解。我引陸奧宗光接受三國干涉和小村壽太郎簽訂樸資茅斯條約的故事，兩人都曾為國人罵為賣國奴，但現在大家都知道他們是為了國家的利益，而不計個人毀譽的。有這種犧牲精神，才有他們的功業。我常說『外交家在勝利中求收

犧易，在失敗中而不億事難。』外交家尤須具有政治家的風度。黃氏說：『王先生的安慰，話我很感激為我個人設想，絕無再回北方的理由，但國家既需要我唱這齣戲，只得犧牲個人以為之。我年已五十五，大小的官都曾做過，尚復何求？頗駿人先生說，中國外交有三條路可走，實則仍須自己有本錢。我以為國家的出路有三個要訣，（一）放大眼光，（二）咬定牙關，（三）勒緊肚帶。大家能本此三點奮鬥下去，國家前途才有希望。』從這一段談話裏，很可看出他那種悲憤而仍願犧牲的精神。第二次談話是在八月二十四日下午五點多鐘，這次談話的印象，覺得黃氏的態度比較上次積極多了。他開頭就說：『我在廬山住了許久，覺得這裏確是在熱誠努力的幹，這或者是中國前途的一線曙光。』這話我很有同感。二十三日晚上在楊暢卿先生的召宴席上。黃先生開我的玩笑，說：『我每次見到新聞記者，好像犯人見法官似的被種種盤問，今天我要掉轉頭來盤問盤問新聞記者。請問王先生在廬山住了多日，你的感想如何？』我的答復是：『很有朝氣。』黃先生以為華北的最大危機，係在心理方面，一般人在心理上先將華北放棄，認為已無可救藥，一切皆趨消極。故欲挽救華北，首應革除這種心理，盡心盡力去做，而歸結於中央與地方應該共同努力。黃氏此次到莫干山歇夏，原是一種消極的表示。其近友也覺得以黃氏的資望才力，儘可以為國家做些其他的事，何必坐在北平去敷衍日本關東軍。但是國家需要這樣一個人在北平，

黃氏遂亦犧牲一切，這一點是應該値得我們同情的。黃氏現已下山，不日北來，我們並不奢望他施展新猷，但使北方少些國際糾紛，減些民衆痛苦，說來雖似平常，實是不朽功業！

熊宅會談中的汪院長

汪院長是十四日早晨下山，十三日晚七點約我到熊宅去談話，我到熊宅的時候，汪正同黃膺白、殷桐聲諸氏談話，先由熊天翼主席出見，略談贛省政況。大概對剿匪很樂觀，對於匪區收復後的整理，匪區逃出人民的撫輯，都在盡力的做，但限於財力，難期周到。贛省的財政本不能自立，今年又遭旱災，其窘更甚。我在廬山共見熊氏兩次，另一次是在科學社年會席上聽他演說。我的印象覺得他是一個新軍人，具有政治頭腦，言語沉著，態度誠懇，當是一位幹練有爲的軍人政治家。旋汪院長出見，態度極和易，談話時頻頻翕目搖手，使人發生一種親切之感。汪先生此次到廬山，係對一期軍官訓練團訓話，順便與蔣委員長一談中央政務，並促黃膺白氏早日北行。因汪蔣聚首，中央各部長又多集於此處，外間遂以爲廬山上有重大會議。實際上蔣因事繁中暑，汪亦冒風疾，大家爲免勞其精神起見，皆未多談。汪在山五日，與蔣僅匆匆兩三面，並未深談。記者與汪院長的談話，僅三十分鐘，多關外交問題。大體中央對目前的外交局

面，均極注意，至於如何應付，則視環境的推移而定。談次，孔黃朱曾各部長，張劉兩主席，楊暢卿秘書長等相繼至，均係應汪之約而來，因知是晚有一度會商，遂告辭。汪先生在送別時尙對我說，此後編書如需要部中檔案做研究材料，必予便利。虛衷盛情，殊爲可感。

合肥座上論人才

今年江南酷暑，段芝泉先生亦在匡廬避暑，此一代重鎭，豈可不一瞻丰采？十四日午前十一點乘輿往訪，段宅在特區二三〇號，其地爲牯嶺高峯的半山，較之牯嶺正街高出數百尺。是日天氣晴朗，而雲氣甚濃，乘輿登山，白雲行與轎底，這是我第一次領略到廬山的佳勝。先至二〇八號訪梁衆異先生，請爲紹介」十一點半，與梁先生偕往謁段，首見段氏之姪公子宏綱，芝泉先生時正晨寐，在閒談中，得知段在上海時曾患很劇烈的胃出血症，現雖漸愈，而體質仍弱。段在山上，每日晨興，先作禪課，然後略進茶點，午前須睡眠片時，午飯後則著棋看書以爲消遣。稍頃段醒，梁先生將記者的名片傳入，即行出見。段氏着藍綢長衫，面容瘦削，精神仍甚矍鑠；耳略重聽，應答毫無鈍滯。略道起居之後，記者即請詢對國事的感想，段答：「吾覺得治國之道很簡單，「維持人民，提倡商業」八個字足以盡之。看現在的政令，那一件不是剝削人

民的？商業情形，入超年年加增，平津一帶的商店，多少家關門，不關門的也多賠累不堪，這樣下去，國那能好？所以在蔣先生給我第二封信的時候，我寄給他一首詩，是：『愛樂與好惡，願盡與民同。三章法定漢民足國不窮。興邦用順守，偃兵竟全功。提倡與百業，四海揚仁風。』其大旨便是吾方才所說八個字的意思。爲政不在多言，顧力行如何耳。我覺得現在的政府是議論多而效果少。』段氏又道：『現在中國無第一等人才，二等人才也很少，蔣先生是站在二等邊上的。就治軍論，蔣先生當然是個人才。但歷時數年，將兵數十萬，還未能將江西的匪肅清，則中國事之難爲可知，』談次，侍者遞進一張三個字的名片，說：『蔣委員長送來一籃奉化桃。』段霽然色喜，說：『好，拿來大家嘗嘗。』記者分得一枚。此桃體質雖較北方產者略小，而水多味美，的是名品。記者尙未飲蔣邸之茶，先於合肥嫁上啖奉化之桃，可謂奇遇。食畢，段氏續道：『中國事，壞在一般人的我見太深，所以汪先生到上海去看吾的時候，吾對他說，「現在不是講吾的時候了！」』復顧記者笑道：『現在不講「吾」的，除了吾還有誰？』又道：『治國如防水，大堤一決，就難再防堵了。吾在民國九年打曹錕的時候，就覺得中央的紀綱失墜，以後將難收拾。吾追和徐友梅（東海之弟，已故）自挽詩的末二句，是：「庚申大防決，十載海揚波。」即指此事而言。自民九到現在，豈止十載，而仍擾攘不寧！』段言至此，似深感慨。談及記者所編的「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謂：『已看過，很好。』因

深感於中日關係局面的闊大，富有世界性，而非中日間局部的事。記者因謂：『參戰一役爲中國外交一大轉機，此後在華盛頓會議的收穫，完全種因於此』段道：『外交貴坦白，不尙詭詐。在吾們將與德國絕交的時候，德國公使特別來看吾，問：「中國將與德國絕交是否有此事？」吾便說，「是的。在中德兩國的關係上，吾們不應該絕交，就吾兩人的私交言也不應該絕交。但中國是個弱國，如果不與德國絕交，國家便將不能存在。」吾這樣坦白對他說了，他毫無話說，很諒解的和吾握握手便下旗回國了。』曾文正與李文忠論外交之道，謂『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段氏這節話便是這個意思了。最後記者問道：『據芝老看來，中日關係將推演至何種地步？』答道：『這話很難說。中國本無亡國之理，而目前的情形，却向亡國之途以趨。中國吃虧在「大」字上，日本却得力於「小」與「窮」。中國惟其大，故一切不在乎；日本惟其小與窮，故拚命苦幹。日人的妄念太重，當然有碰釘子的那一天。不過中國人若長此泄沓，前途實難樂觀。』至此談話時間已經三十分鐘，恐老人過勞，因握手請辭，段氏退入內室，在記者與梁先生段公子閑談之際，侍者忽持『馬占山』三字的名片入告，謂『馬將軍來。』見一著軍服而身形瘦小的人進來，知道他就是在嫩江抗日的馬將軍，因與握手，互道姓名，並約後會。段氏復至客廳見客，當記者辭出之際，馬將軍正向段氏行三鞠躬敬禮。及歸至旅舍，回顧段廬，已爲雲封，古人詠山居詩有『遙望塞

山石徑斜，白雲深處有人家』之句，今於匡廬見之。

一位治河專家

此次在牯嶺上無意中邂逅一位佳士，爲此行一大快事。斯人卽湖南漢壽游允白先生（洪範）。先生湖南世家，文采瞻富，向服務於外交部。十七年濟南五三事件時，先生正任北京外交部總務司第一科科長，當時曾根據正式情報著了一部「濟案備覽」，可當這幕兇劇的信史。書成後，並未付梓，至今置之篋中。此次相逢，承允借閱，並許作摘輯第八卷之史料，雅人高義，謹當永誌不忘。先生現任訓練總監部秘書長，因朱部長之約，來牯議事，與我同住一個旅館，居處僅隔一室，朝夕過談，盤桓數日，儼然故交。承以所著『省園類稿』一冊見贈，誦讀一遍，文章造詣極深，可當瑰麗典雅四字而無愧。

十六日午前，承游先生紹介得識黃河水利委員會副委員長王桑庭先生（應楡）。王氏粵人，東江之役任師長，與蔣共事頗久，廣西無烟火砲廠係其手創，善工程，尤精於治河，曾遍歷歐美各國，視察各名河工程。此次到廬山，請謁蔣委員長，有一治河意見書呈蔣。談起黃河問題，王氏以爲黃河本身不足爲患，人事不臧，乃更推波助瀾。午後答訪，承以呈蔣委員長的治河意見書見示，茲節錄如次，以告關心黃河問

題者：

查黃河之患，原因爲沙泥太多，河口淤塞，河槽不定，森林稀少，水無節流。其大規治理計劃，昔年奉派視察，曾將意見貢陳察核。自去歲河決，地方損失至鉅，而中央支出亦數百萬。其致力於加高培厚，苟安一時，終則增憂於異日。應檢不揣冒昧，謹將現時救治辦法敬陳如下。

一　關於人事，現時治河機關重床疊架，制均合議，不特經費繁多，道旁築室，其力悉相消失，過則推諉，責則彙負，似不如以現支之經費選簡眞實之人才，集中設計，而以實地責成分工負責，層層督促，敷納以言，明試以功，以事績爲效成，以效能計功過，則智愚勤惰，貪廉學識，不難察而知矣。

二　關於事業之費，無米作炊，固所不可，然有欵用之失當，其害更烈。故於治河工欵，不宜畀工程機關單自管理，宜另組織委員會司其事。既免國人視河工爲優差，致啓紛擾，復免從事者陷罪戾，而人材損失。

三　關於工程，大規實施，以現時財力，固屬困難，而實心實作尤屬不易。然若以單簡方法，減少沙泥來源，疏通河口，分年造林，開闢新道，用之得宜，則事亦易而功倍也。

甲、減少沙泥　查沙之來源，以河套爲最大，蓋黃河流經河套沙漠凡二千餘里，每遇洪漲，則捲

沙而下，至河南沖刷邙山之土，水行平地，於是河床增高，河槽改變。若於寧夏石嘴附近築一攔河之壩，引水灌沙，沙漠內多乾低之湖，可以容納多水，沙漠經水，可變草原，進爲林地農地，不特黃河下流免害，而陝北之沙源中止，亦受其益。其築壩工料費約一百萬元，另運費約二十萬元。

其邙山護岸，由孟津至古柏嘴，土石東隄者，約一百五十萬元。

乙、河口疏進　河口無隄束水，蘆葦叢生，沙泥淤積，冀魯豫水患多由於茲，誠宜速築隄坊，束水入海，免除水患，而闢大宗農田。其土壩工程雖估計工料需一百五十萬元，但當去歲河決，由東韓主席表示可徵調民兵工作，津貼伙食及購料三十萬元，可再加石壩約多一百萬元。查河口淤積地面有五百萬畝，除二百萬畝爲沮洳蘆葦地外，餘三百萬畝可供農田。其地產魚鹽，有下窩海口，北至天津五百里，東至烟台七百里，可行吃水七尺輪船，與滄州陸距一百一十里，將來滄石路可由此出海。如於此地水道，建設公路電話，其單簡工程費約一百五十萬元，三共二百八十萬元，其利益每畝每年徵收五角計，則年得一百五十萬元，其他尚未計入。

丙、造林　西北氣候土壤宜楊松椿柳等，本年西北農林專校植樹成本，每萬不過一百元，每年

植五千萬株，計五十萬元，十年之樹，每株以三元計，則年得一萬五千萬元。

丁、河槽固定　利用舊河槽築隄束水，取土爲難，底沙不固，不如由鄭州鐵橋起至壽張止，作一舉理新河槽，以濬水墻與舊河相接，俾大部澄清之水入之，以小部之水由舊河而下，以爲灌漑水源之用。其利益，河底降低，減少危險，一也。利用舊河底以爲南面護堤，洪水漲溢，江淮可保，二也。舊河寬而新河狹，可得餘地爲田，三也。高其北岸，以之避防北決，並利用爲鐵道路基，四也。河槽緊束水深便利航運，五也。此項工程預算，傭工約一千萬元，使用徵工可省一半，分十年完成，每年五十萬元。

以上各項工程預算：

一、引水入沙，一年完成，約一百二十萬元。

二、邙山護岸束隄，分兩年完成，第一年七十五萬元，次年如之。

三、河口第一年築土隄，第二三年護石及經營計支出，初年三十萬元，次年一百二十五萬元，三年同之。

四、造林每年五十萬元。

五新河槽每年五十萬元。

則是第一年須款三百二十萬元，第二年三百萬元，第三年二百二十五萬元，以後每年一百萬元。

其功效（一）免沙泥，（二）免泛溢，（三）便航運，（四）得河口田賦每年一百五十萬元及魚鹽之利，（五）得河南新舊河槽比餘之田約七十萬畝，（六）十年之後每年得成材之樹五千萬株。

越數日，黃河決口的消息到牯嶺。再見王氏，深歎黃河出事之快，尤深致慨於加高增厚的舊法之不足恃也。

旅舍佇觀雲變雨

我在牯嶺，住清涼飯店。這個旅館沿山築屋，高下錯落，因爲地位較高，所以在我的住室廊中便可觀見長長的一條長江及小小的一個九江市。廬山在國內名山中並不算高，但規模頗大，北臨揚子江，東接鄱陽湖，重嶺疊壑，氣象萬千。廬山以雲勝，水亦著名。山上很少無雲的時候，東坡詩謂「不識廬山眞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其實不僅山中如此，即在山下看廬山也一樣的不得要領。我來時看廬山的東面，是

雲山迷茫，去時看廬山的西面，因爲是在雨後，簡直一片黑雲，與天不分。廬山上有一奇觀，便是「雲海」。大概每日午前出現。雲海橫在半山，層層白雲，如疊疊棉絮。天空是晴朗的，雲層全在足底。在旅舍中北望，滾滾白雲，一望無際，長江和九江市全被雲海遮蓋，不見一些踪影。今年江南大旱，廬山的雲和水，也相當減色。我初到廬山時，聞已多日少雨，牯嶺一帶聚居三四萬人，吃水將成問題，多須挑夫到半山去汲取。十二日午前我在牯嶺上散步，沿河溝幾乎斷了水流，幸而以後接連幾天有雨，各處流泉便淙淙有聲了。

十五日午後四時許，與游尤白先生佇立在旅舍廊中閒談，提起官場中的淸苦情形。游先生在訓練總監部是按少將銜給俸月三百元，但自國難後，不發全薪，先七折，又加八扣，於是七折八扣的結果，三百變成一百六。其他機關尚有欠薪的，訓監部雖不欠薪，而歷年宦游南北的積蓄已貼補不少。津中有「七折八扣攔腰砍」之諺，不圖於此得其注脚。談次見一片雲氣自山下襲來，節節前進，所到之處，一切皆爲掩蔽。在雲氣進展的過程中，一個個山頭，一幢幢房舍，逐漸失踪。漸逼漸近，直至眼前的花木也不見了，濕冷冷的雲風霧氣撲面拂襟而至。在雲氣前推後擁中，雨脚挾風斜飛，旋卽瀟瀟有聲。這雲變雨的奇觀，尚是我生平第一次遇見。這場雨直下了兩小時，至六點鐘後方止。山經雨洗，新翠欲滴，涼風颯疾，暑體欲瞭。於此時誦『空山新雨後，天氣晚來秋』之句，纔能體會到古人用字的精妙。

張主席與王部長

張岳軍先生在各省主席中是比較能幹的，王雪艇先生在中央各部長中亦錚錚有聲，我在一天中見到這兩個人，可謂景氣。

張氏繼何雪竹氏之後任湖北省主席，鄂人以張文襄相許，張氏勇於任事，亦以此自勉。十六日晨十時，訪晤張氏，談起鄂省政况，張謂一切皆有前進辦法，本可按照計劃一步步向前做去，今年忽遭空前大災，水旱兩災均極嚴重。湖北省的財政本來不敷，現在受此打擊，不但前進工作不能繼續，且不得不走回頭路，掉轉頭來做救濟功夫。言下雖極感慨，而詞意之間仍不減積極之氣。人能堅毅不餒，結果必不平凡，我對張氏，頗願這樣期許。

近兩年來的中國教育，已走上整頓的路。這種氣象，在王雪艇氏長教部以來已很顯著。中國教育界的積弊，眞是『冰凍三尺，並非一日之寒』，起衰振頹，自然亦需要相當時期。據聞某當局在一次集會中，對於教育界曾有一段很沈痛的談話，謂政府對於教育一向尊重幾位老先生，交給他們去辦，結果如此，政府只得認眞整理一番。凡是教育名義上的錢，此後必須眞正用在教育上，絲毫不得假借云云。言時聲

色俱厲有明察的當局，然後教部纔能放手作事，王雪艇氏能發作些事，固然是他能作能爲，實際上也不是偶然的。王部長於十六日晨十時到牯嶺，午後五時我去訪問他，所談皆是教育問題。王談，在此國難緊急之際，大家皆感覺非從教育上根本着手不可。這兩年對大學教育雖略加整頓，但中小學的基礎太差，大學教育難望充實，故改進中等教育尤其重要。今年起實行中學會考，就是要取締不良的學校，兼所提高一般的程度。近年的中等教育是在畸形狀態中，普通中學太多，職業學校太少。普通中學是預備升學的，這類學校辦不好，教育出來的學生，升學則大學教育受其拖累，不升學又無實際生活技能。現在教育部的方針，是要使普通中學逐漸減少，而使職業教育逐漸擴充。職業學校實比普通中學難辦，尤其缺乏師資。這都是多年畸形發展的結果，現在要扭轉這種趨勢，自然須假以相當時日，不能立即收功云云。在我們談話當中忽然雷雨大作，無形中把談話時間拖長，及雨稍停，始辭出。

深木叢菁中一位元首

當瀋本事件發生的時候，首都天氣正熱，林主席特來匡廬避暑。林宅在蘆林黃龍寺後，深木叢菁，其地最爲幽勝。記者得楊暢卿秘書長先容，於十七日晨前往請謁。由牯嶺到蘆林，約八里，境爲廬山林場，廣

萬畝，沿途松篁夾道，至爲清幽。牯嶺旣頗囂，樹木也少，兩相比較，俗雅立判。游人多在大竹上刻字，誌某年月日某人曾來此。佳景當前，不知游賞，而孳孳焉以鐫名雕姓，好名之念，飄人如此！及抵林宅，黃膺白委員長及殷桐聲局長已先在，旋張岳軍主席亦來，記者候於室外。林廬壁上鐫『鹿野山房』四字，小樓一所，構造頗爲簡單，門前疊石爲平場，置木椅石凳。廬山上的房子，都是沿山建築，皆有坡度，這所房屋因爲門前有疊石作臺（也可以說是院子），所以頗饒平闊之氣。候至十一點鐘，黃殷張三氏始出，林送客至室外，張岳軍先生爲記者紹介，經延入室內，對坐而談。林主席是日著藍布衫青布鞋，赭顏霜鬢，鬚眉半白，仙風道骨，儼然深山中的一位隱士，絕看不出這咫尺之間，便是我們四億民衆的元首。林主席談話，對大公報多過獎語，直使記者難於置答。又謂：『輿論要監督政治及指導政治雙管齊下。』談及目前國家情況，謂：『自國難以來，政府時時在困心衡慮的努力應付。國民對政府的責備，我們皆願接受，但國民必須與政府同心協力纔行，否則力量分散，對內對外，更無辦法。』談約二十分鐘，中委丁超五偕閩人李霞至，記者遂興辭，林主席親送至門外階下，堅阻不獲。這時適有一個轎夫臥在院內草地上睡覺，林主席向他呼道：『喂！別在那兒睡覺，這是我們新種的草地。』這位元首的平易近人，有如此者。

出林宅後，到林場買了幾罐雲霧茶，作此行紀念。歸途游黃龍寺。黃龍是廬山名剎，殿僅一椽，湫隘不

可駐足。客堂頗整潔，四壁遍懸字畫，皆黨國要人的手筆，一僧人坐睡其中。我素有睡癖，至此始知須讓寺僧一籌。寺前有大樹兩株，傳係晉人所植。樸枒參天，甚爲古茂。偕轎夫導尋黃龍潭，觀瀑布沿龍潭路而下，至黃龍潭，時正午十二時，叢樹蔽天，炎威不及，看瀑布自懸崖而下，水聲入耳，令人興超塵之感。今年雨少泉瘦，懸瀑水僅一股。我步石至潭邊，以手探水，頗涼，但不至冷的程度。此時若有浴具，頗願洗一洗這滿染塵垢的身體。見潭前大石上刻着『痛飲黃龍』四個大字，此典出於南宋，至今意義尚新。這四個字既常常適用於中國，自岳武穆以來，竟無一人克遂其志，思之不禁泫然欲涕。歸途的龍潭路，須步步上登，驕陽蒸灼，山路艱難，數十步之後便汗流浹背，適纔一縷淸涼之意，頓時驅逐淨盡。復至寺前古樹，見樹下石上刻有會擴情君的題詩，頗可誦，以腹饑思歸，未及抄錄，即登輿行。

海會道上一片朝氣

海會寺是廬山五大叢林之一，現在是軍官訓練團的所在地，非有通行證不能前往。我取得通行證後，於十八日淸晨五點半鐘自牯嶺起身。由牯嶺到海會計程三十五里，新闢一條中正路，較舊路約近五六里，遂循新路前往。海會在半山，氣候較牯嶺約差八九度。我預料那裏必熱，故著夏布長衫。因爲起身的

時間很早，出了旅舍，即覺有些涼意，一入中正路，便見前面山嶺上湧動着一片灰白色的雲氣。行至中正路的極顛，完全進入雲氣的氛圍之中。雲濃風勁，草帽幾乎被風吹落，氣候之冷，直若深冬。我在籐轎上打着寒噤，包圍在濕而冷的雲霧中，數尺之外，即不辨物。身上的長衫加了重量，濕瀧瀧的緊貼在身上。我這時在這種偉大的自然氣象中深感到個人的渺小，同時又似有所悟的想起了所謂『朝氣』。我們常常對於某人某事謂其有朝氣，這目前所見到的纔是眞正的朝氣。我任轎夫抬着前進，沿途不見一人，也不見一個人家。雲氣雖還很重，日出漸高，較近的景物已可看見。在轎子迤邐前進之際，迎面忽有一片插天的瓦山出現。一路的山皆是碧油油的，這片山却於青草翠菁中顯露着蒼老的威稜。嵯峨勁拔，別有奇氣。詢之轎夫，說：『這就是五老峯。』我這時感到一種莫名的興奮。及至五老峯下，自前轉出一片浩渺的大澤。急問轎夫，說；『那就是鄱陽湖。』我這時又感到一種莫名的喜慰。此地是五老漢陽兩峯的交點，在兩峯對峙中露出湖的一面。這時日出已高，湖光雲氣，交相輝映。看萬頃碧波，點綴着幾點舟帆，如浮白鴨，咫尺名山，迎面大川，我這時眞覺得是身在畫圖中。再前行，山勢益險，這一段中正路是沿着五老峯下開闢的。上面是插天的削壁，很矯勁的向下壓迫，下面是萬丈絕壑，望之膽戰，在這當中一條羊腸小路走到極陡峻處，有鐵欄爲限。在這時候，受這種偉大氣象的壓迫，簡直使人喘不過氣來，眞是『提心在口』時刻

有一夫失足瓦人藕粉之罐。行至復興亭，輿夫息肩，購稀粥早餐，我也覺得腹饑，喝了一碗藕粉。附近一帶，山花燦爛，馨香撲鼻。我採了幾朵花，一種紫藍色的小花，據轎夫說是桔梗花。另一種較大的，六瓣七鬚，白色的花瓣，疏落落的有些絳紫色的星點，蕊及鬚全係絳紫色，鮮艷雅潔，極爲可喜。詢其名，轎夫說是「五爪龍。」此花六瓣，何謂五爪？且龍何物，豈能名此佳卉？竊擬名爲「絳玉盞」，亦覺不甚愜當。將花插於轎頭，登輿復行；有此好花作伴，此游頗不寂寞了。下復興亭，即是獅子口，這是一線由上而下的小道，夾在兩山中間，煞是險峻，轎行其中，時時有傾倒而下的危險。此處是懸巖，也是深澗，若有湧泉，必定能成功一個很大的瀑布。經過獅子口，路較平坦，至一小廟，名木瓜古寺太極觀。觀前一片綠竹，附近樹木亦多，吾家右軍所謂「此地有崇山峻嶺，茂林修竹，」眞堪爲此地寫照。轎夫雖在此息肩，我只在綠竹叢上一覽鄱陽之勝，並未入廟參觀。我曾有幾次經驗，深知游廟不如看景。走過白石岸，行不片時，轎夫遙指古木叢中的一所廟宇道「前面便是海會寺。」這時已將近九點鐘了。

午後兩點鐘，我離開海會，找着轎子，回歸牯嶺，單單不見了轎頭的那些花，我問轎夫，答說：「已被陽光曬壞，故而扔掉了。」滿擬簪花而歸，以驕牯人，轎夫偏不作美，掃興之至。重過獅子口，這歸程是上山路，兩峯緊逼，仰攀猴徑，眞如在巨獅的齒縫中行走。石乳流水涓涓作響，懸崖插天，遮日無光。在仰登程中，轎

夫會數度息肩，輪流攀飲石乳以解渴。及出獅子口，再登復興亭，轎夫在此進午膳，我佇立以俟。走出五老峯，途中也有多處可以望見鄱陽湖，晨間來時，在此等處竟未能望見湖影者，是因爲雲氣太濃的緣故。歸到牯嶺時，鐘過六點，業已滿街燈火了。

兩個科學集會

游尤白先生幾次對我說，廬山上有一位名士，不可不一識其人，即陳三立先生之長公子彥和先生（隆恪）。陳氏爲主張中國變法之最早者，其祖寶箴曾以主張變法免官，三立先生亦戊戌案中之魁首。三立先生年逾古稀，已是今日的魯靈光，現在北平養痾。陳氏寓牯嶺河南路，廬名松門別墅，十七日午後往訪，未値。十五日午後彥和先生來訪，溫文大雅，的是世家學者。承告以靜生生物調查所與江西省農業院合辦的廬山森林植物園，將於明日開幕，希望我去參加，並謂該園園務出靜生生物調查所植物標本室主任秦子農君（仁昌）主持，係胡步曾（先驌）的高足，對植物甚有研究，可算得一個權威。園址在含鄱口。二十日午後三點鐘，我特往參觀這個科學集會。秦君招待甚殷，並詳爲解釋該園發起動機及籌備經過。園址面積萬畝，正在含鄱口內，土壤氣候，均極適宜。經費由生物調查所與農業院各年出六千元，

秦氏本人不支薪。在籌備期中，范旭東氏很有助力。該園目的不在造林，而在從學理上研究各種植物，俾以其結果，改良全國的農圃。四時許，舉行開幕典禮，胡步曾氏主席，行營代表王君，熊主席代表某君，及盧作孚，范旭東，任叔永，董時進諸氏相繼演說，大致均對該園致甚高希望，且預料三五年後必有重大貢獻。會後全體攝影，我覺得這個燕北俗夫無留面目於匡盧的必要，乃謝別，步登含鄱口，眺望鄱陽湖，而歸。

中國科學社今年（十九屆）的年會定在廬山舉行，全國科學界代表全集此處，益增盛況。二十二日晨九時在蓮谷青年會行開幕式，我與中央社記者馮有眞先生同往參觀。本屆到會社員較衆，論文也比往年多。這天的開幕式，差不多就是一個演說會。主席是該社江西分會會長龔叔綱氏，首先報告。這次年會是與中國地理學會，中國植物學會，中國動物學會聯合開會，所以科學社社長任叔永及三會會長翁詠霓（竺可楨代），錢崇澍，秉農山諸氏繼作各別報告，蔣委員長代表陳布雷，省主席熊天翼，中委陳立夫，教長王雪艇諸氏相繼演說。諸人演說以秉農山先生最幽默，惹得大家哄堂而笑。蓮谷地方，以四週峯巒突出，狀如蓮花，故名。站在青年會的禮堂前，縱目東望，可以看見鄱陽湖，頗饒形勝。會後與馮先生步行而歸，午後烈日，曬得我大汗淋身。

四 訪馬將軍

我自從十四日在合肥宅中遇見馬占山將軍，就想專誠的訪問他一次。他住在大林路三十三號，距大林寺甚近。十五日晨十時往訪，他住的房屋，建築在很高的一個山頭上，頗有巍巍然的氣象。自山下至峯巔的石階，不下百級，轎夫迤邐攀登，其難也不下於走好漢坡。不湊巧，馬將軍不在家，只好留下一張名片而別。歸途順道游大林寺：內容殊無足取，此寺甚古，與中國佛教最有淵源，燬於太平天國之役，民國十一年始規復。殿一椽，係木板蓋成。殿內香烟繚繞，佛號喃喃，二十餘僧人坐在殿的四週，盤膝合目，口宣佛號，仔細諦聽，迴環朗誦者只是『南無阿彌陀佛』六個字而已。信步入側院，菜圃茅舍，糞土之氣撲鼻，倘饒野趣。十七日晨八時半，再往訪馬，又不值。前日來此，原約今晨再來，而竟不遇。南行至白香山詠桃花處，花徑茅亭，自是平民詩人留連之所。午後我因爲到松門別墅訪陳彥和先生，穿過醫生窪，再至大林峯訪馬，仍不遇。歸途路過大林寺的放生池，木牌上寫着『游泳諸君請走此門』，知有游泳池，步入參觀，幾個男女幼童游在一池渾水之中，頗覺生趣盎然。

我三次訪馬，而皆不遇，自謂此行與馬氏只段宅中一面之緣而止。二十四日晨，我到吳廬去看前溪

先生，提起此事，前溪先生慫恿我，說：『何妨再去一趟試試。』吳廬與馬宅只百數十步之隔，因鼓勇再往。此時馬氏剛起牀，排闥直入，竟獲接見。馬將軍說：『中國人不是不能跟小鬼拚，壞在私心太重，不能團結。中國人當真一致團結起來，兩個拚他一個，就是十個拚一個，也拚過他了。中國這樣大國，怎麼會亡？我們不能團結，日本人能團結，他們無論甚麼時候，對外總是一致的幹。日本侵略中國，好比老鼠吃牛，像似很難的；但是這個牛若老是像死的一樣不動彈，早晚也有被老鼠吃完了的一天。』此外又談了些山居近況，遂興辭。

張副司令與顧公使

四川劉湘因信任劉老師（從雲），致爲共魁徐向前所乘，他是二十四日由成都回到重慶，二十六日我在商啓予總指揮午飯席上便聽到了這個消息。那時傳得很甚，以後新聞比較公開了，大家反倒覺得安定些。四川問題是一種慢性病，治療上難求速效。川中軍人不能團結，政治又太壞，這兩種病根不去，難望霍然痊愈。現在贛閩剿共軍事，正在加緊進行，中央軍隊不能抽調入川；即使可以調兵入川，川中軍人的門戶之見是深的，恐怕一入夔門，自己先吵起來。所以暫時的辦法，只有促川軍團結，共同禦共。至於

一勞永逸之策，須俟川漢，川陝，川黔各路（鐵路或公路）修好了纔能談得到。不過各地的共是聲氣相通的，四川一隅得勢，其他各處不免聞風興奮。張漢卿副司令於二十七日自漢口來到牯嶺謁蔣，想來當是商量防範鄂西零匪的辦法。張氏是正午一時到牯嶺，我於午後四時往廬林去訪問他。這時張氏正預備偕同張岳軍主席到熊宅去，所以我們雖然見着面，未及談話，約定明晨九時再談。轉天早晨我正預備前往，黎天才處長趕到旅舍來告訴我『張副司令被約到蔣公館談話去了。』只好改日再談。三十日晨張先生約早茶，同座有賀衷寒黎天才兩先生。張氏自病後出國以來，健康大復，較之兩年前適然兩人。他對我談了些四川事情，又說了些當年在河南打仗時的笑話。活潑爽快，充分表現富於春秋的精神。

是午顏顧兩使到牯嶺。這是現在中國外交界的兩顆大星，來此當然有所商量。午後我到仙巖客寓去訪問他們，侍者說：『他們正在睡覺，不見客。』轉天（三十一日）早晨我冒雨再往，剛剛碰到顧少川公使，是正要出門的神氣，於是怱怱的談了十幾分鐘。我說：『在此外交緊急的時候，一般國人多覺得顧先生和顏先生不宜久在國內勾留。』顧先生聽了這話不甚謂然，顯以爲中國人沒有知識，駐外公使不一定要坐在國外。旋又掉轉話頭道：『我們也有苦衷，我們在外邊辦事，等於是留聲機的喇叭，若無唱片，根本無話可說。且外交也是一種戰爭，大本營如不決定戰略，一任前綫各自爲戰，其害更甚於不戰。我道

次歸國，一爲向政府請示方針，同時順便到各地視察，藉以明瞭國內的情形。」我看顧先生很忙，遂約後會而別。據我想來，顧氏是現時外交界中的第一流人才，正當國際聯盟開大會改選非常任理事的時候，以顧氏與國聯的歷史的關係，且是駐法公使巴黎與日內瓦相距甚近，天然的是出席國聯大會的首席代表，而這次政府卻任命郭泰祺羅忠詒金問泗三氏爲代表，顧氏竟不與其選，這其中當然有不得不然的苦衷。現在國聯大會業已開幕，改選理事我國亦已落選，預料顧氏返任之期當不在遠了。

北山半日游

我自到牯嶺以來，常是無事忙，未曾正式遊山。九月二日下午，有事當作無事，決定用半日的工夫去游山，以免辜負此行。黃天行先生給我計劃了一個游程，我便於下午二時半由旅舍出發，作北山半日游。經蘆林，至金竹坪，路左有恭乾法師墓，臥碑一塊，刻大字甚勁。路右是予佛寺，入游一週，栽瓜種豆，類似一個樸野的山莊。探視殿內，則陰森森的。出寺前行，經牧馬廠苗圃，行數里，至鐵船峯。峯在衆山之中，橫伸如船，故名。此峯遙對大天池，俯觀石門澗的懸瀑，的是大觀。步至鐵船峯頭，見有傅沅叔先生所題硃字，許爲俊秀雄奇。知此老曾於月前遊此。我伏在鐵船峯頭，俯瞰石門澗，只見那條大瀑布急流而下，形同白練，疾

洩如飛，如刮風，如奔馬，聲震山谷，可聞數里。這個瀑布，當是廬山名泉之一，在這裏遙觀，只能看見一部分，下部被巖石遮住，然就所能看見的其長度當已不下數百尺。轉身登靜觀亭，處境愈高，愈見石門之險。置身極峯，騁目奇景，留連而不忍去。我的游程，是離此游大天池，大天池與此處相對，相距甚近，但無徑可通，須循原道而返，十餘里始達。因復經牧馬廠，走赴黃龍寺的大路，行至一小草屋處，其左有一條荒僻小徑，直趨而下。這條小路，夾在樹叢中，蜂飛蝶舞，陽光稀疏，轎頂觸樹，花落滿襟。出小徑，一橋當前，河中流瀑，湍急有聲，是黃龍潭與神龍宮的分道處。河內大小石塊，圓潤潔白，有如美玉。川流不息，日夜琢洗，雖粗劣頑石，久亦變成柔和而巳。人受環境磨洗，久之稜角全失，其理當亦相同。順河流西行，至神龍宮故址，立石橋上，看流瀑奔逐，徘徊不忍卽去。前行里許，卽至大天池，入天池寺，院內有池一方，中架一石橋，池水黝黑，恐已腐臭，就是所謂『天池。』大殿黑暗，不知所祀何神，未入觀。文殊台下有一室，懸洪武畫像。小玻璃缸中養有龍魚，潭中的所謂龍魚，作金黃色，四足長尾，實卽守宮類動物（俗稱蝎虎，）乃故神其說以欺人。登文殊台，台作半月形，係唐生智重修，自台上望石門澗，如在井底，遠望鐵船峯，亦甚卑小。在這裏看不見那條大瀑布，惟有流水的聲音雄勁入耳而已。下台至黎山老母亭，亭小神也小，亭前盈丈之地，卽是捨身崖，拔地千仞，下臨絕壑，我膽子很小，未敢逼覷。出寺至廟後龍魚潭，鐵門加鎖，不得入，隔欄望水，看不見所謂

龍魚，遂罷。上清涼巖，有王陽明的石刻，字尚完好，林主席特修一亭以護之。亭旁有天心臺，亦林主席修。其東爲天池塔，原塔早毀，唐生智重建之。更東行有唐生智新修的圓佛殿，導游的轎夫，力促進殿參觀，不聽而行。下巖登輿，過龍角石，眺望樓，至息肩亭下轎。過佛手巖，遊仙人洞，洞中供呂祖像，兩傍尚有許多不知名的神像，滿壁刻字，是極清靜地，反弄得極火熾，俗氣逼人。洞底有石乳點滴，曰：一滴泉。憶去年春游西湖棲霞山紫雲洞，洞底也有滴泉。危石倒傾，積水下滲，此兩處情形當是一樣道理。出洞登山看御碑亭，亭內有碑，刻明太祖的周顛仙人傳，是皇帝先生欺世愚民的神話。惟亭址高朗，揚子江與南潯路皆在望中，頗擅形勝。下佛手巖，出息肩亭，轉入大林路，至吳廬晚飯。半日之游乃終。

兩謁蔣委員長

我在牯嶺曾經兩度謁見蔣委員長，一次是在八月二十三日上午十一點半至正午十二點，另一次是九月三日上午十點半至十一點半。兩次共談一點半鐘。我對於蔣先生的印象，覺得可用『虛懷，熱誠，苦幹』六個字概括之。他身居高位，日理萬幾，求知識的心還很盛，欿然若有不足，可稱虛懷。自從國難以來，我們很少聽到他的議論。黨國要人向來是善於宣傳的，蔣先生的靜默，我認爲是他痛感責任的重大，

對國事增加了熱誠。他每天的工作時間在十小時以上，吃飯的時候也約人談話。他這次的偶感不適，很明顯的是由於過於辛勞所致。張漢卿副司令同我談起蔣先生的生活近狀來，便說：『他太苦了，整天的在嚴肅的態度下見人治事，毫無舒展個人興趣的餘地。虧得他，換個人誰也受不了。』這雖是一段閑談，却很可以使我們瞭解蔣先生的日常生活，是如何的緊張。蔣自奉很簡約，許多人在赴他的召宴的時候，須預先吃些東西纔去，因爲經驗告訴人們，蔣宅的飯向例只是簡單的幾樣菜，既不美而且不豐。蔣在牯嶺的住宅，規模很小。若不是門前有兩名衛士，幾乎無從知道是要人的居所。蔣宅的規模，較比孔庸之部長的住宅不逮十之一二。孔住特區五十一號院內係一極大之松林，我有一天去拜訪他，進門後經三個護衛兵的交相傳達，纔到了內院的門前。我跟在傳達兵的後面，走坡度很高的長路，孔先生的秘書出來問訊時，我已汗流氣喘答不上話來。及至蔣宅，很容易的便升堂入室了。蔣先生提倡新生活運動，他自己便是一個身體力行者。他對於政務很關心，的是一個以天下爲己任的領袖。黨政軍各方面的事，他都注意，而且不分鉅細，事必躬親。他這種做法，很有人顧慮他的精力，並懷疑他的效果，但他那孳孳苦幹的精神，確有很大的感召力。張岳軍主席這次到牯嶺，原預備向中央要求款項，救濟鄂省的財政，但見蔣之後，竟未出諸口。退後對人表示：『何必拿這些事去麻煩他，還是儘自己的力量做去吧！』黃膺白委員長受

內外環境的窘迫，牢騷滿腹，原預備向蔣發洩，乃見面多次，他覺不忍出口，反鼓起勇氣而北歸，不計個人毀譽，以犧牲精神爲國家任事。張漢卿副司令到牯嶺數日之後，我問他謁蔣會談何事，他便說：『許多都是倒霉的事情，實在不願意全拿出來麻煩他。』又如吾師陳銘士先生，拋棄了月入六百元舒適的教書生活，離開生活習慣了的北平，到荒漠的鄉間去開墾。惟恐自己吃不了苦，預先便於夜間睡在冰冷的地上，日裏食粗糲的飯，以鍛鍊身體。陳先生已是將近六十歲的人，還這樣拚着老精神，我聽了非常感動。這是我所知道的，此外相類的事當然還很多。只就這幾個例子說，我認爲都不是偶然的，其背後實有一種很大的精神感召力。這種力量，小之可以正己格人，大之可以興邦建國。我們的國家，現在確已走到非常艱難嚴重的歷史前面，復興呢？滅亡呢？問題的答復，在不遠的將來，便須用事實來說明。誰能打開民族國家的滅亡的危機，走上復興的道路？我們相信這個萬鈞重擔，不能單純的希望於某一個領袖，要大家都悲壯緊張起來，加緊的做事，加緊的奮鬥，民族國家的前途或者還有幾微的希望！

牯嶺的印象

我在牯嶺雖然住了二十多天，未曾有過系統的注意，地方雖是第一次到，而一切情形差不多皆是

習慣了的，所以也就不會有深刻的印象。這裏所要寫的，只是幾點平常而又不常的事物而已。

我初到牯嶺街上，簡直不覺得是山居，商店櫛比，路人如鯽，熙來攘往，儼然是一個二三等的城市。若不是街上偶然有上下的石階，坡陡的道路，游人坐着籐轎，根本會忘記是身在山上。牯嶺給我的第一個新印象便是警察。廬山的警察，類皆二三十歲的青年，穿着白色制服，戴着白色帽子，顯得特別有精神，而且特別和順，我每次向警察問事，他們都是循循有禮的答覆一切。我因此聯想起天津租界裏的巡捕，滿嘴胡罵亂捲，以及無情責打人力車夫的神氣，相形之下，眞有天淵之隔。我爲訪問一位朋友，遍尋不得，最後到警察署去問，警署職員很迅速的給我查出這位朋友的地址。我想別地的公安局，其森嚴不下於閻羅殿，不用說不理會這種瑣碎事情，根本就不會讓你走進大門。廬山有女警察多名，大概都做內勤工作，不出門站崗，我曾見着過，也同樣的穿着白色制服，豐肢窄腰，寬寬的束上一條黑色皮帶，別饒一種英武之氣。我以爲廬山的警察，可爲全國模範。有人說廬山警察紀律不甚好，比較偏僻的地方，值崗警察會坐在石凳上睡覺。這是得諸傳聞，我並未親眼看見。

廬山是新生活運動的策源地，烟酒賭娼，都相當歛跡。應酬中雖大多還是烟酒待客，但無公開的賭，娼則絕無。警察負有糾察新生活的任務，故在路上行走很容易受到糾正。警察所注意的大概是下列三

點：（一）紐子扣好，帽子戴正；（二）不要吸烟；（三）行路靠左邊走。我自幼受的訓練，紐子必扣好，帽子必戴正，又天然的不會吸烟，所以（一）（二）兩項對我皆不發生問題，惟有行路靠左邊走，曾受過幾度干涉。這可見得我還不够一個新國民的資格。我也曾原諒過自己，以爲牯嶺街道寬僅盈丈，兩旁沒有便道，行人又多，很容易走錯；不過錯究竟是錯，不能因此便可不受人家的糾正呵。

凡到廬山的人，都說各機關人少而辦事多，工作很緊張。我差不多每天到電報局去幾趟，牯嶺電報局與郵政局『合署辦公』，收電員張序五君的工作時間很長，我有一天早晨十點鐘去發電，是張君在那裏，午後兩點鐘和晚上十點鐘再到電報局，張君皆在那裏工作，其勤勞可想。最令人感覺不便的，便是郵電檢查。廬山是政治重心所在地，郵電檢查自然特別嚴密，但有時不免流於苛細。我有一次發電報告顧公使的談話，檢查員竟把『余等僅爲留聲機之喇叭，若無唱片，根本無話可說』等字删去，不能不說是濫用職權。照檢查新聞的範圍說，只應限於軍事外交的秘密及領袖的行踪，請問檢查員：顧公使的留聲機的譬喻，究竟於國家大計有什麼關係？又有兩次電報已經牯嶺放行，漢口電報局給中途扣留了。及至我接到通知，去找當局交涉，經諭令牯局電告漢局放行，幾經周折，電報遞到天津，已經遲了三天。一個電報，先經發報地的檢扣，又經收報地的檢扣，中間還要經轉報地的路刦，眞是難如登天。假使檢查員眞

有見識，也還令人佩服，往往問題發生在情理和常識之外，眞使你哭笑不得。譬如漢口電報局扣留三天經大力交涉始予放行的，便是八月二十九日大公報登載的黃膺白先生的談話。那篇談話，獎勉政府，鼓勵人民，應該是有利政府的宣傳了，竟被無情路劫，還有什麼道理好講？我曾同陳芷町秘書談起檢查新聞的問題，我以爲政府對於一個問題的發生，不要儘是消極的叫報館不要登，應該積極的告訴報館怎樣登。政府要實行新聞統制，更非如此不可。外國通訊社及報紙遍布國內，本國報不登的事情，外報傳得更厲害。譬如四川軍事失利的事，最初不准報紙登載，外邊揣測紛紛，甚至以爲成都盡已不保，及至報紙能够相當揭載了，人心反倒安定下來。便是一例。陳先生也曾辦過報，對我這話很表同情。

廬山是避暑勝地，最近又成政治中心，只牯嶺一帶卽聚居三四萬人，轎夫多至四千餘人。中國人向來不大注重清潔，不守秩序，所以牯嶺愈熱鬧，便愈骯髒嘈雜。據久居廬山的人說，山上本無蠅子，近來則到處皆是。我住的旅館沒有紗窗，每天須替旅館老板拍蠅子。蠅子特別大，混身綠色，尤其在晚上點燈寫字的時候，受這種大綠蠅子的攪擾，簡直使你無法構思。吾想中國人的最大毛病，是隨地便溺，隨地傾倒垃圾。管理局的告示，煌煌寫着『不准在河流內洗滌』，而婦女們仍然沿河洗滌自若。這種浪漫，不守秩序，不重公益的習性，眞是我們中國人的最大缺點。這種習性不革除，怎能作二十世紀的獨立自治的國

民？

廬山上住了這許多人，大約可分爲兩類：一部分是來避暑的中外人士，另一部分是與政治軍事有關係的人。這兩種人都不是本地人。土著則大都是轎夫及營旅館業者。我在廬山上游賞佳景，曾發生一種癡想，以爲爲什麼我不生長在廬山上。但又轉念，假使我眞正生長在廬山，現在不也得給游山逛景的人們抬轎子嗎？匡廬是名山，他所嘉惠於附近人類者，便是胝手跰足的抬轎爬山供遠來人游目賞心。中國是世界佳壤，地大物博，外國人遠來搾取驅役地主，中國人却日益削瘦，且漸漸的並獨立人格而不能保。想到這裏，不禁憮然心痛！

由牯嶺到天津

我本打算事了之後，在廬山上作三日暢游，到九月三日，我的旅行任務大體已了，社中有函催促速歸，遂不得不變更計劃，決於四日下山。由九江開行的上水船照例是午下午開行，預備利用這上午的時間與陳鐸士先生約定同游三疊泉。不料陳先生臨時變更行程，須於四日晨下山搭車赴南昌，我也因爲一個人寂寞，三疊泉之游作罷。下午二時，我於雲氣雷聲中啓程下山，行至月弓塹落雨，冒雨下好漢坡，雨

愈大，轎夫息肩暫避，久不停，繼續冒雨行。我在轎中，因有雨簾遮住視線，只於簾隙窺見兩壁青幛一條混徑而已。我上山時，因在晦夜未能盡覽沿途山景，下山時又逢雨日，依然難窺其勝，匡廬於我可算得吝嗇了。行至蓮花洞換乘汽車，雨已停，離開蓮花洞不遠，即見土石乾燥，毫無濕意，因知適纔的傾盆大雨竟未及於山下。四時到九江。我定的船是太古的武昌輪，該輪脫班，明午始能到，遂不能不在九江留一夜。晚間無事，閒步九江市街，正街上往來的人頗多，市面並不怎樣繁榮，到處流露出一種冷落而且羅沓的氣象。骯髒而無秩序，是國人的通病，在純粹中國城市中最易看得出。到九江大戲院看戲，是一個大蓆棚，有漢調，電影，雜耍三種遊藝。電影雜耍，毫無足取，漢調我倘是第一次聽到，惟覺其與二黃相近調較高亢而已。贛省以產陶磁出名，五日晨到各磁店參觀，凡是較精細的產品，其底面皆寫着『康熙年造』，『乾隆年造』等字樣。我很奇怪的問磁店裏的人：『現在我們的江西，能夠造這樣的磁器，豈不是很體面的事嗎？爲什麼一定說是古人造的呢？』答復是：『買的人喜歡。』我便說：『我要這樣的磁器，但不要帶康熙乾隆等字樣的。』他們竟乾脆答說：『無有。』買者以僞求實，賣者以僞應，相與作僞而不自覺，可謂奇事。我無奈以一元錢買了一隻不甚好但無託古字樣的小瓶，事後有人告訴我那隻瓶實際不值五角錢。虛價如此之大，亦足驚人。午後一時餘上船，三時開行，回顧匡廬，包圍在一片黑雲之中，說不定這時山上正在淋

滿大雨呢。

六日午後一時半抵漢口，至分社稍息，與王佩之徐鑄成兩兄渡襄河游漢陽。漢陽烟囱林立，均張文襄遺規，現在全都不冒烟了。市街民舍，均極簡陋。街上不見多少商店，每隔三五家便有一家茶館。走過龜山背後，沿途皆是亂葬崗，層層疊疊的墳頭，一直爬上龜山的近巔。一條石路高出於田疇之間，三五農夫，汲水灌田，一片蓮塘田田綠葉枯立在乾地上，此地之旱可知。車子走入一條長巷，機聲嘈耳，見路旁人家的婦女們正在忙於織布。男耕女織的中國社會，不料今日仍能在漢陽見到。甫到歸元寺，便被一羣乞丐包圍起來。入寺門，院內一個大水池，裏面有大小烏龜不下萬千。老嫗多人以炒米丐錢，撒米池中，羣龜爭食，萬頭鑽動，確是大觀。游了大雄寶殿及羅漢堂，鬼氣森森，暗無天日，走在很長的甬道中，光線黝暗，空氣腐敗，幾個面無人色的和尚，坐待游人布施幾個銅板的香錢。佛教在中國曾經有過很長久的權威，至今只賸些無業的和尚，藉泥胎討飯吃，可算是中國佛教的末路了。這天平漢路沒有特別快車，欲搭普通快車，又已買不到臥舖，只得就擱一天。晚間到長樂大戲院聽漢調，吳天保唱「振海掃北」，不知是何故事，唱做頗佳。現在流行的二簧，當係脫胎於漢調，而漢調的高亢，起碼比二簧高兩個音階，頗不易唱。夜住陶陶旅社，姑娘麻將，亂吵吵的，徹夜不寐。七日午後與佩之鑄成兩兄渡江游武昌，登蛇山，凭欄望漢陽夏口，

三鎮形勝，豁然在目，龜山的樣子也比昨天看到的雄俊得多了。雖未登黃鶴樓，崔顥詩句『晴川歷歷漢陽樹，芳草萋萋鸚鵡洲』的神韻，已自然湧到心頭與口頭了。黃鶴樓已不是舊物，新建的一所直通通的樓，殊覺索然無味。黃鶴已去，樓亦無存，懷古幽情，減去不少。我們上了黃鶴樓，樓上只是一個茶館。幾張方桌與幾個木椅，皆是滿漬油垢，無秩序的羅列着，瓜子皮與茶水佈滿地。這樣的佳地，竟如此一塌糊塗，中國人的老大不在乎的神氣，眞值得佩服。樓上不少男女游人吃茶，數分鐘內便來了三個敲竹作響的修脚的，佩之兄便要實行裸足修脚，經我力勸而罷。黃鶴樓上修脚鳴，眞是一種不可想像的奇蹟！下樓游武昌城，街市整齊，空氣恬靜，深饒一種靜穆之氣。我對於武漢三鎮的印象，覺得漢口人多車多花樣多，是已現化代的一個繁華淺薄的鬧市；漢陽男耕女織窮而陋，是一個將近破產的中古農村社會；武昌不妖冶放浪，也不蓬頭垢面，頗像一個平正無疵的放足閨秀。晚十一時登平漢車北返。

我第一次乘平漢車，因爲一般人對平漢路政的口碑，我預先存着一種恐怖，及登車之後，覺得平漢車雖比不上津浦京滬，總還敷衍得過。不過夜間睡覺時，忽有一隻大老鼠從臉上跑過，把我嚇了一跳。同車徐君也說夜間脚上好像觸了電，經我說穿，纔知是被老鼠攝了一下。我因困憊，不分晝夜的躺在車上睡，沿途風景多未看見。八日晚十時餘，車過黃河鐵橋，憑窗以觀滔滔河水，滾滾東逝，車震橋聲與奔濤之

聲相間在這淒黑的夜色中別有一種氣象。車過百孔長橋，河水及於兩岸，憶去年早春南行過魯境黃河時，河乾見底，今則浩淼如此，黃河的難治可想。九日晚七時餘抵北平，即至東車站換乘平榆快車，夜十二時抵津。

二十三年九月二十七日寫畢於天津。

青島游記

一個新聞記者，有他的樂趣，同時也有他的苦痛。他能比一般讀者知道較多較早的新聞，便在這一點上，他比一般讀者得到較多的樂趣與較多的苦痛。我近月來爲一位同事代班，做過看電報守天亮的生活。恰在這時期中，發生了冀察事件：每天有許多新聞刺得你心痛腦脹，而能够報告給讀者的僅僅是很可憐的一點兒。甚至完全被扣留。北平近郊響砲的那一天，我們時刻受着新的刺激，爲我們所託命的國家擔心，同時想儘可能的盡點兒報告給讀者的責任。在文字上要忍痛的磨平，同時還要鼓着勇氣去同統制機關抗爭。此事還未全了，江河來了大水。整天做洪水噬人的紀錄，不能發現一點比較可以發抒感情的好新聞。在這種沈悶而寂寞的情緒下，一天天的塡篇幅，守天亮，無論在身體上或精神上，都感到異常的疲乏。最近有一個星期的休假，遂決定到青島走一趟，想藉着海的力量，給我增加些擔當這寂寞的勇氣。

這次旅行的目的既在休息，故毫未做職務上的活動，恣情的游覽山水，偶爾同一兩個人談談天。我

在青島住了七天，中間到嶗山去了一天，津青間往返用了兩天，一共曠了九天職，現在又回到編輯室，略記所游，爲個人留些清涼閒散的紀錄。

津濟途中

七月二十五日晚十時在微雨中登平浦通車南行，沿路陣陣急雨，夾雜着閣閣蛙鳴，微風習習入窗，吹成一夜好睡。一覺醒來，車已到了德州。暑天乘車理應吃苦，而竟清幽若此。去年一宿長江輪，此番一夜津浦車，使我深深感到旅行之樂。在車上遇到北平圖書館館長袁守和先生，彼此談了些互相關切的問題。袁先生這次南下，將取道粵梧到廣西去參加學術聯席會議。我對袁先生說：這次到廣西參加學術會議的各方人士，應該附帶做一些政治工作。把中央的眞相告訴兩粵當局，同時把兩粵擁護中央的誠意轉達與中央。使暗雲消逝，謠諑不起。現在我們國家需要統一，需要團結，較任何時爲急切，絕不許再生一點風波。袁先生頗以爲然。車近濟南時，我特懷一種緊張心理，一看黃河。我想像中的黃河，一定是氾濫無際，波濤洶湧；誰知我在路橋上看到的黃河，只是不很寬的一條，很平穩的向東流着。當時很覺詫異，想來却有道理。尾閭不暢，河纔會中途崩潰；魯西已成巨浸，這裏自然是昇平氣象了。

濟南半日

我在濟南有半日的勾留，決定不去拜見本地的官府，不騷擾一個朋友，所以雖只半日，却很從容的走了些地方。我以爲一個陌生人到濟南，最好是到城牆馬路上走走，在那裏可以眺望千佛山，俯瞰大明湖，眞所謂湖光山色一望收。若當眞一處處游賞起來，或許倒覺得無甚興味。我是二十六日早十點到濟南，把一件簡單的行李存放在車站上，即乘一輛人力車由濼源門附近上城。城牆馬路寬大平坦，汽車可以馳騁往來，每個垛口上栽種着花草，自然形成一道風景線，是濟南特有之勝。我立在城牆上，葱蘢的山色，瀲灔的湖光，都在目前。在碧油油的自然的景色中，錯落落地安排着街巷人家，不啻一幅錦繡畫圖。濟南之美，當無過於此了。留連憑眺，不忍即去。

入城至大明湖碼頭，在一條窄窄的湖汊中密匝匝地停着數十隻游船。我雇得一隻，作湖中游。湖的面積很大，因爲各處栽蓮種蒲，把湖身逼成窄窄的一條。駛行蒲葦叢中，儼如水滸傳中擺路劫人的蘆塘，竟無游湖之感。歷下亭一帶風景最好，小小亭院，適當湖中，與湖光山色相掩映，越顯得玲瓏透剔。這時天已近午，我雖然時在揩着頭上的汗，胸中却別饒一種清涼意味。立在歷下亭畔，聽鸝鴿在一株老樹上的

啼聲，我雖不會吟詩，「歷下亭畔鷗鷺聲」一七個字，也自然地湧上口頭。離亭登舟，繼續前行，沿途看裸童競浴，少女浣衣，這自然境界中的生命跳動，竟使我有年青十年之感。但願國家早復健康，個人無冗務牽累，日常在這荷風中讀書洗澡，豈非無上幸福。歸到李（文忠）公祠，祠內安插着魯西濟寗嘉祥各縣的災民。樓閣廊院，盡是衣服不完面蒙菜色的婦孺，言語嘈雜，濁氣撲鼻。我在橫男豎女屎尿盈庭的李公祠中巡行一過，把適纔一點奢望驅逐得烟消霧散。現實如此，那有象牙之塔任你逍遙？

鐵佛二公祠，無甚可觀，而鐵公的人格在現今卻是值得我們歌頌的。湖水本來很清澈，而敗蒲亂屑充塞其中，竟像一個汙池。名勝的大明湖日就荒涼了。北極閣是以死嚇人的。我在炎日燒灸之際，拾級登閣，殿中盡是泥塑的猙獰惡鬼，一個脚下踐踏着人，一個手裏拿着扯掉的人腿，極盡殘忍獰酷的形容。中國的神道設教，與傳統的政治一樣，不是威脅，便是利誘。媚神吧，牠把握着你的生命，同時還可以使你發財。在這種政教下的國民，自然多是貪生怕死愛錢之徒，岳飛文天祥之所以不世出，理有固然矣。

張（曜）公祠傍的曾子固祠，雖殘缺頹敗，池荷庭柳，小橋流水，在綠柳垂蔭下聽嘶嘶蟬鳴，清閒極了。大明湖的水由此出城，滔滔奔逝，不舍晝夜，在這幽寂的環境中也顯示着宇宙的活力。復至匯泉寺文昌閣上乘風，大明湖之游畢，

濟南的趵突泉，以「天下第一泉」著稱，今既到此，自宜一訪其勝。趵突泉已不是本來面目，那裏正在修造自來水廠，幾個奔騰上湧的泉，都是加過人工的。我在一家小飯館吃過午飯，到泉旁一個茶館吃茶，無意中做了一個豪舉。茶館頗寬大，吃茶的人多坐在靠泉的一面窗下。這時鼓書方在上場，一個幼小歌女在唱着山東鐵片大鼓。刷刷的泉聲，與人爲的弦歌交織成一種不自然的交響樂，安坐聽來，亦刺耳，亦和諧。她唱的是『托兆碰碑』。歌罷，台下另有兩個男子起來向聽衆斂錢，鄰座三個人給了一角錢，我給了兩角錢。台上換了兩個較大的歌女，唱了一段『鴻雁捎書』，又斂錢，鄰座三人又給了一角錢，我亦給與一角錢。又一對歌女上場，歌罷，我給了兩角錢，鄰坐三人也給了兩角錢便起立而去。我看還有兩個歌女待唱，不好即去，待兩人唱了一段「想二哥」，只有我給了三角錢，再無第二人捧場。幾個唱過了的歌女皆未散去，似將輪流再唱，我不忍再讓這多女孩子爲我一個人扯喉嚨了，遂付了茶資而別。弦歌已輟，檻外泉聲仍在刷刷地響着。我以八角錢的代價，作了七個女孩子的知音，同時壓倒四座，豈非豪舉？

膠濟路的下行車，須晚十時東開，這時太陽還很高，儘有時間，供我徘徊。我便毫無目的地在城內外躑躅。濟南城內的馬路大都湫隘，里巷尤其窄狹。許多里巷內汨汨流水，一般婦女即就門前水流浣衣，儼然山村風光。濟南泉水之盛，於此可見。我曾到省圖書館看出土的古物，在國貨陳列館看了半齣文明戲，

浴德池洗澡，膠濟飯店吃飯，挨至晚十點，膠濟車把我拖出這留連半日的濟南。

匯泉臺與小青島

青島是一個很可懷戀的地方，牠有着美麗的內容偉大的外形，牠本身是一個島，袒臥在海的懷抱裏。膠濟車於二十七日晨七點半鐘，把我送到這美麗的地方。柔和的陽光，輕勁的海風，使人感到異樣的舒適那蒼茫無際的海尤具有絕大的誘力。我覓定旅舍後，見了幾個必須見的朋友，下午便一個人溜到海濱。先到海濱公園，坐在海濱最前一塊大石上數浪頭。任波濤洶湧，把水星泡沫濺到襟頭飛上。到水族館看各種奇魚，到第一浴場看男女海浴，夜裏到海軍棧橋看小青島上的燈塔眨着媚眼。這些地方，幾乎成爲我每日必到之地，也可說是青島的最美麗的部分了。

匯泉臺上的德國砲台，凡是到青島的人必往憑弔一番。二十九日我於迎賓館午宴後去訪匯泉臺。匯泉角像一隻拇指尖尖的伸入海內，扼青島灣的要害砲壘便建築在這尖角上。五尊大砲，隨山勢的高下排列着。砲台的形式，『像隱藏在戰壕裏的兵，露出鋼盔伸出槍管』（用王余杞兄原語）這偉大的建築，現今雖已失去戰鬥力，猶足想見當日德人的遠略雄圖。中國擁有俊秀的山川，優勝的地形，雖曾作

過防禦的工作?此地三面臨海,擁天然之勝。這天晴日當空,而霧氣甚濃,萬頃蒼溟,因霧氣頁障,迷濛不測遠近。海是偉大的,牠能展開宇宙的偉相,牠能訴說自然的景界。我嘗對朋友們說笑話,『人不看海,永遠不得要領。』我第一次看海,是在民國十五年。那時我正過着流亡生活,坐着海輪,逃開天津,一與海見面,便開始認識宇宙的偉大,感覺個人的渺小。那時張褚正與馮軍作爭奪天津之戰,我也感到那擾攘的無聊。蝸角蠻鬪,擺在這茫茫大海中,那有你們的踪影。我今天在這個角尖上觀海,却覺得極其湫隘,甚至覺得喉間過人得透不過氣來。我站在這裏東望,覺得朝鮮小島障住我的視界,稍往北瞬,遼東半島便在眼底。打開地圖看看,黃海渤海不是湫隘如汙池嗎?這裏曾浴過異族的硝烟,曾濺過同胞的碧血,現在這迎目陰霾,入耳簫聲,便象徵着最近將來的遠東大局!據說這熱下有德人的兵房,還有一鍋未曾吃掉的牛肉,我都不忍去看。下山時,一個日本婦人兒擺照相,我一個中國百姓,在本國領土內的德國砲台上,請日女照相,其事不可想像,謝之而去。

我由匯泉動去游小青島。小青島緊對着棧橋,一個小小的島孤懸在海內,青島燈塔便建在這小島的頂上。這是真正的青島,而大的青島即是冒名的。從棧橋上搭舢板過島,舢板小得如同一個瓢兒,在綠色的大海中隨着大浪飄盪,真過癮。在海濱看海,因受地形的影響,往往不能得窺海的真面目,青島亦然。

乘火車來青島過大港四方等處時，海平衍不波，簡直與湖沼無異；在市內海濱看海，雖然浪濤大些，仍不能識窺其大；在小青島上看海，却大不同了。這島四面臨海，風浪無阻，視界較廣。小青島開放不久，佈得如一小公園。遍山植着小松樹，開着各色的花兒，天晴潮高，一個個浪頭與島石搏鬥，泡沫紛紛四濺，自成奇觀。薛家島蜿蜒於右，匯泉角蹲伏於左，我坐在一株雜樹之下，任清颸拂面，看波濤奔騰，直南而下也。島上開着一種極美麗的花，高榦無葉，六瓣吐蕊，嬌嫩的顏色如粉而不艷。我愛不忍釋，折了兩枝。歸途中同船的一位女太太，盛讚此花，她說此花佳處在於無葉，若一生葉，便成凡品了。我問船夫此花何名。船夫答是金針花。他說這花原是黃色的，近來纔變成這種顏色。好花每每不得其名，我去年曾擬將廬山的五爪龍改爲絳玉蓋，現在覺得此花也須得佳名，『醉妃』稍淫，『醉仙』二字或能得盡此花之身分。我不善養花，很想把這兩枝美麗的花轉贈給一個人，但有誰配作這花的主人呢？我以清水供諸瓷瓶，任我悅目，直至我離青島時，尚作將萎的笑態，若不勝依依之意。

兩度海水浴

見了水坑都害怕。這次居然洗了兩次海水澡。二十八日我在中山公園吃過午飯，便到匯泉浴場試

浴。我戰戰兢兢地從沙灘上步步下移。沙細如茵，觸足甚適。天氣很熱，而腿部着水，涼涼的，時間稍久，轉覺和煖適體。我膽怯，不敢深入。不敢說浴，只任一個個浪頭沖大腿而已。但當大浪衝來時高度仍可及於肩項。我牢立在海灘上，準備不讓浪頭打倒，但每當大浪襲來時便被推得倒退數步。浪頭發到海濱，很快地翻着白沫退回來，在浪退回時，腳下的細沙蘇蘇下陷，這種漩渦若擴大，人便不能支持了。但退浪也有減消進浪力量的可能。有一回見一個大浪撲面蓋頂而來，回奔不及，我想這回一定不行了；恰好一個浪頭退回，一進一退，把浪頭扯平了，竟得安然渡過。浴後到沙灘上曬太陽。如是三浴三曬，覺得甚爲舒適，誰知回到旅社後，連肩帶背以至兩臂，全部紅腫起來奇痒難耐。三十日午後再浴。這次帶上救生圈，想深入些。我也學人家的樣，見浪頭來時將身一躍。許多浪頭都這樣躍過了，不料兩個連環浪頭前擁後推而來，躍過了前一個，後一個突起一擊，把我打翻了。兩仰腳懸，眼鼻耳口皆已侵入鹹水，掙扎許久，纔站立起來。「謝上帝！今天幸而帶了救生圈，不然恐怕完了！……但無汽圈恐也不會如此大膽吧！」正轉念間，古龐又一個大浪把我打翻，浪退去，人卻擱淺在沙灘上。我的心在跳，跳得自己都聽得見。海眞偉大而難測：煖流撫摩溫柔如母親的懷抱；憤怒起來，一個大浪連打幾個觔斗，甚至將你吞噬！

與蔣百里先生長談

二十九日在市長沈成章先生招宴席上得識蔣百里先生。此公淹博貫通，的是一位軍人學者。三十日晨訪蔣先生於南海路四號小小洋房，緊靠海濱，披襟當風，憑窗望海，一席長談，不覺由晨逾午。這三點多鐘的長談，政治外交以至中西文化，均有涉及。蔣先生說：「你研究現代外交，我在整理宋朝外交。」檢出手稿一束，題為「宋之外交，」係蔣先生指導一位謝君所著，而內容大部經過蔣先生的修改，緒論與結論兩章幾乎全由先生手筆。結論中有極警闢的論斷，很可以供現在的參考，有一節說：「這種外交的所以產生，一言以蔽之，是由內心的苟安姑息，外表的慷慨激昂。惟其內心的苟安姑息也，故有整理內政之機會而不能為，惟其外表的慷慨激昂也，故一動即敗，不得已只有依賴他人以自張其目，沒出息到極點。」這些話已很足供我們警惕了，但最後的結論並不悲觀，說：「但是天下有不容易改變的心理，無不可救藥的國家。華族得了兩度的復興經驗，受了兩度的敗亡苦痛，只教將從前的失敗與成功不忘記，總久是不會失敗的。因為宇宙間有一個鐵則，孔子說得好「能為不可勝，不能使敵必可勝，不可勝在己，可勝在敵。」這是向強者方面說的；孟子道：「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這是向弱者方面說的。實在是一個

鐵則，名之曰「君子求諸己」；沒出息的宋朝外交，聯金滅遼，聯元滅金，結果把天下斷送了，這叫做「小人求諸人」。』『看中國歷代外交的成敗，竟翻不出這『求人』的窠臼，可爲浩歎。在第二章『宋之立國方針』中，更有警句曰：『在這種時代背景下，對外交涉的失敗，不僅不能刺激人心，反使政府人民更加懦怯偷惰，造成對外苟安對內宴逸的局面。』這固然指的南宋，我現在讀之，竟不禁毛骨悚然！

談到目前，固然少有辦法，但把眼光放遠些，也用不着過分悲觀。以遠東爲主體的世界暴風雨，遲早必然爆發，中國要努力把身體弄硬朗些，只要支撐過這場暴風雨，國家的前途是很光明的。這是我們這番長談的結論。

毛毛雨中遊嶗山

『東海一嶗，』久負盛名，我想用很經濟的時間去游覽一次，趙鑫兮君爲我計劃了一日游程，與余杞夫人結伴同游。二十一日晨八時自中國旅行社乘嶗山飯店的長途汽車出發，約一小時半達柳樹台。沈市長說他很注重鄉村建設，希望我去鄉村看看，我以休憩時短，未及考察，但在青嶗途中，已可使我見到沈先生的努力。感整個的青島市，已不啻一座美麗的大公園，而鄉村的整齊修潔，尤給人以很深的幽

美的印象。我們若把青島比作留過洋的摩登小姐，則青島鄉間便不啻明眸皓齒的洛陽女兒。汽車一出市街，便在綠樹夾道中穿行，天上有些陰雲，汽車迎面的玻璃上凝着一粒粒的水珠。大家都詫異說『下雨了，』嶗窗外望，却不見什麼動靜。這天李村正有集市，趕集的鄉民都戴着草帽往來忙碌着，雨意加濃了。車到九水村，經過洪述祖的別墅，小樓一所，掩映於蒼翠樹石橋流水之間。當年洪氏曾在此避罪，現在這別墅改成一家飯店，洪述祖的日本太太便是女店主。此處已是嶗麓，汽車循着山道盤旋而上，停下來時已走了六七十里路。

我們在柳樹台雇了兩乘山轎，直奔嶗頂，毛毛雨蘇蘇地灑着。我對於嶗山的印象，覺得她擁有餘而肥不足。沿途草木甚少，高僅及肩的矮松，點綴些金針桔梗之類的花草，實不夠富麗。但種種怪石，爭奇鬥勝。給嶗山形成一大特色。形形色色的石，眞是目不暇給。或蹲伏如獅，或坦臥如龜，或拱立如老僧，或猙獰如惡鬼，且有一塊矮石上，覆半圓形大石，宛若一棵大蘑菇。有些重疊的石頭，堆成種種形狀，一似天公用這些怪石堆七巧板。當轎子經過一個高聳纍疊之下時，我很擔心頂上的浮石滾下來。轎夫却很坦然的說：『不會的。』我曾試登一叢疊石，進行中身體搖搖，一似石頭在脚下活動，爬下時，手都不敢動彈，惟恐把石頭碰下去。其實我若能將那樣巨石推落，早已是一個萬人辟易的勇士了。沿途的霧，時落時停，手中

的傘隨着時張時落，雲霧風雨也隨着怪石的形狀變幻着。行至小嶙，我們曾登臨其上，據說在那裏可以觀海，但我們所見到的只是雲霧五尺以外的石頭都模糊莫辨。勁急的長風，掀動濕重的麻衫，冷冷的雨絲，洗着臉面。王太太說『晴天來好了。』我想這是我們的奇遇，在無雲無雨的嶗山上看無花無草的怪石，不太枯燥嗎？這時的嶗山，已不羨黃嶽二山的雲水專美，却比牠們多了些玲瓏錚獰的石頭。黃花頂的兩株巨石，矗立在雲表，霧顧一帶的奇峯峻嶺，在雲霧中籠着潔白的面紗，這一帶的風景，真是氣象萬千。

走近嶗頂時雨停了，雲霧仍很濃厚。嶗頂一名巨峯，是嶗山的最高峯，也是最險峻的地方。現在經過修整，平易多了，螺升的鳥道，現可拾階而登。我們登到最高一個石台上，轎夫說『這裏看海很好，』但我們被包圍在密匝匝的濕雲中，渾身浴着冷風，四周上下，一色灰白，什麼都不能看見。團團濕雲，隨着天風翻滾，當空閃出一道陽光告訴我們時在正午。在風走雲湧之中，眼底忽然顯露出一塊碧水，轎夫驚叫：『那不是海嗎？』我這時感到無名的喜慰，我對王太太說：『天公也許作美，等一等，風會把天吹晴了。』我們便坐在那裏喝汽水吃面包，以待天晴，飽矚東海。風愈大，雲走愈急，和煦的陽光又復隱藏起來。我們很失望，天公竟不作美。俗人呵，你在埋怨天公嗎？他已用極藝術的手腕，揭示宇宙的神秘給你了。你坐在輪船上可以看到蒼溟無際的海；立在孤島上可以看到水天一線的海；此際的海，如新嫁娘的臉龐，把面紗

揭開一角，很快的又落下了，觀海若此，不更藝術更偉大嗎？

我們由嶗頂下山，雲收霧斂，陽光四溢，沿路山口，隨處可以看到海。過黃花頂後，循小徑赴魚鱗口。這一路花木較多，亂石流水，淙淙有聲，頗極山水之勝。轎至哈喇山（轎夫口中之名），轉山勢開展，雨後流泉，奔急有聲。這是魚鱗口瀑布的水源，很與廬山神龍宮一帶風景相像，我不忍去，停轎觀賞，擬去屐襪，濯足於流瀑之中。水涼澈骨，胸悶鬱熱頓消。繼續下行，即達魚鱗口，轉過叢叢削壁，便看見瀑布了。這兒風景太美了，當是嶗山最佳勝的地方。三面千仞削壁，在一線缺口上，流下匹練的瀑布。瀑布上下兩股，長共不過三四丈，氣象却甚奇偉。方在雨後，泉水碩肥，瀑布急洩，聲如風浪，震動山谷，迎面壁上鐫「潮音瀑」三字，凝神領會，真若在青島旅舍中，深夜市聲寂滅之後，奔赴枕畔的海潮聲音。瀑布下一大方潭，水入潭中，其色澄碧如靛，此地一名靛缸灣，此景之寫實也。我再濯足於潮音瀑前，水愈清涼，不留神一隻鞋子落水，急洩而馳，倩茶館侍者追回。吾家右軍昔曾有曲水流觴的韻事，我今天却作激湍流舄之劇，窘逸巧拙判然矣。我在這裏攝一影，裸腿袒胸，以誌此游之樂。留連多時，鞋已半乾，恐天晚錯過車時，乃戀戀而行。途中詢轎夫生活狀况，據說市政府不收轎子捐，而籐轎及號衣也由市府無價供給，轎夫說「這個市長很好，」我亦謂然。沈先生不於小處擾民，且從而爲惠之，此所以爲好市長也。

魚鱗日以下，途中多千仞削壁，有兩塊削壁寬纔數丈，而高逾千仞，巍巍巍地矗立在嶺壑之間，眞是偉觀。我以爲這是嶗山的特點，其他名山所不及的。道經北九水，略事觀賞，復至柳樹台搭汽車而歸。

一點哀思

一星期的休假，算來須要透支兩天。這一星期的青島旅行，游山觀海，早睡早起，過着悠閒的正常生活，這在我們以晝作夜的新聞記者是很難得的幸福了。生活的巨手，却使我不能不離開這動人依戀的美麗地方，八月三日的晚上，在冷雨之後回到天津。

青島是我們的福地嗎？是我們的樂土嗎？假使是的，而我們所付的代價則未免太高了。我曾很感慨的對朋友們說：『青島關係近代中國的命運太大了。』大都被很輕鬆地點過了。一八九七年末，山東曹州死了兩名德國教士，德國海軍便藉口把青島占領了；繼之而來的，便是俄占旅大，英取威海衛，法租廣州灣，一八九八年的瓜分局面，便是以青島爲起點。『門戶開放』雖曾使這個局面緩和，歐戰一起，日本便繼續將青島占領。謝謝華盛頓會議，牠曾使我們從日本手裏收回這塊美麗地方，我們朝野上下却爲此所陶醉，在國際均勢下沈睡了十年。我在另一文章中說，我們收回了半個山東，流毒所及，竟使我們丟

掉整個的東北。這代價太高了吧，冀察事件後的華北局勢是危幕，也是沸鼎，這美麗角落的青島又豈能劃外！我們站在海濱上，看這波濤洶湧的黃海，是由誰統制着？我們坐在膠濟津浦車中，看葱蘢的田疇，膏腴的沃壤，都似籠罩在一種低氣壓中。我無意中想起駱賓王的名句；

請看今日之域中，

竟是誰家之天下！

二十四，八，七。

薊門內外

我是北方人，卻有着北方人所不應有的缺憾。長城黃河是北方的特徵，黃河我只見到豫魯境內的一段，長城還未曾會過面。長城距北平只有兩小時的路程，因爲覺得容易去，反倒一年年的拖延下來。去年夏天決心要到居庸關青龍橋一帶一遊，在徵求同伴時反被朋友勸住了。他們的意思，以爲若遊長城，必須順路一謁十三陵。一則天氣炎熱，再則青紗帳時，昌平一帶頗不平安，何必冒險，秋後再去吧。當時一躊躇不久冀察問題相繼而起，北方情形日益黯淡。我當時既悲國事的煎急，復悔未曾一登長城，深懼以後將無再去的機會。最近又得休假餘暇，遂決定獨自作短期旅行，於西南風雲北局徬徨中離開了天津。

走出薊門

七月五日下午五點，於一陣新雨之後，由正陽門站登平包通車。車到西直門時，天復落雨，清風透窗，細雨挹塵，胸中煩熱，爲之一掃。過清華園後，遠山近疇，迎目青葱，景色漸佳。過昌平，雨停，天壽山迎面撲來，

濃雲暮靄，籠罩山頭，十三陵散佈於岡巒之間，尙隱約可辨。七點到南口，加掛爬山機車。自此前行，車入羣山，削壁插天，古木凝翠，在在動人遐思。車近居庸關，遙望長城，蜿蜒一線，如巨蛇爬上蒼翠的高山。偉大氣象，的是奇觀。穿過山洞之後，八點到青龍橋。車停山凹中，長城分懸於左右兩峯之上，直足仰望，我的一顆寶心此時已怦怦飛上山巔。過此則暮色四合，不辨景物了。車循V字形路線，倒轉而下，穿過八達嶺山洞，九點到康莊。回顧八達嶺，濃雲深鎖，竟不能辨其輪廓。

旣出薊門（居庸關一名薊門），已是塞外，以現在的省界言，這一帶正是冀察之交。於此時而置身此地，不禁有無限的悵惘湧上心頭。夜色已深，登車就寢，竟不能成寐。每夜此時，正在燈下看新聞電稿，往往因一個消息的刺激，拍案歎息，繞室彷徨。現在前不着村，後不把店，一人躺在臥車中，正好休息，誰知竟大大不然。腦筋不肯一刻休歇，儘在焦念兩廣的消息不知如何了？北方局面正在一個微妙點上，不知又有了什麼波動？在輪軌交擊的轆轆聲中，思潮隨之兔起鶻落，精神殊不寧貼。當遇到站頭停車之際，窗外夜色，隔室酣聲，在這極端靜寂之時，這靜寂在我腦筋中逐漸膨脹，逐漸擴大，轉若無限的喧嘩，使我煩躁，以至不能忍受。如有命令司機的權力，我一定叫火車倒轉，一直開回天津。現在我才知道靜寂是會壓迫人的。

子夜半點鐘到張家口，披衣下車，殘雲飄空，月冷如水，遠眺站外，隱約一叢遠山。我現在所能見到的察哈爾首都只有這一點兒。

六日晨七點到了大同，這時晨曦已高，殘月尚掛在西天。

『你那兒來！』

『你那兒恭喜？』

在被站兵盤詰時，我開始聽到晉音。

雲岡與大同

到雲岡去，平綏路局有專人招待。大同距雲岡三十里，乘汽車前往，一小時可達。這天由北平來遊雲岡的只有我一個人，路局也爲之特開一部長途汽車。站上臨時有三個客人附車赴雲岡，連司機及招待員，共六人同車，也不算寂寞了。六點開車，匆匆穿過大同城。時在雨後，汽車路上，低窪之處，積潦如河。車行其中，水聲衝激，浪花四濺，此時車中，儼然船上。汽車路係平綏路局所新修，路面未固，經山水洗蕩，故甚坎坷。不隄防一個顛簸，人從車中躍起，頭與車頂相觸。謝謝上帝！幸而我登車後忘記脫掉草帽，雖爲它替我

搖了一陣，否則殆矣。繼續西進，武州由遙遙在望，沿途岡巒起伏，路愈坎坷，顛頓益甚。車溯武州河流而行，且有數處須橫涉河流而過。頑山濁流，自然塞外風光；而車過之處，村犬逐吠，裸童指看，也饒標趣。七點鐘到了雲岡。車停在雲岡別墅，暫為休息，便去瞻仰那想望已久的雲岡石佛。

雲岡佛窟已有一千五百年的歷史。當時北魏建都於大同，武帝佞佛，以政治的力量及宗教的信仰，產生了這一片彪炳人寰的偉大雕刻。雲岡石佛的雕刻，開始於魏興安二年（西曆四五三年），歷七帝，百餘年而成。據「續高僧傳」曇曜傳說：

> 曇曜……住恒安石窟通樂寺，卽魏帝所造也，去恒安西北三十里，武周山谷北面石崖，就而鐫之，建立佛寺，名曰靈巖。龕之大者，舉高二十餘丈，可受三千餘人。面別鐫像，窮諸巧麗；龕別異狀，駭動人神。櫛比相連，三十餘里。東頭僧寺，恒供千人。碑碣見存，未卒陳委。

想見當年規模宏大，現在的情形，卻大不相同了。

自雲岡別墅西行，便是「石佛古寺」，我由寺僧領導入寺參觀，這大概就是所謂中央諸窟。石窟中黑不辨物，幼僧燃火炬照之。一如來佛像，盤膝而坐，寬五丈，高六丈，最為巨觀，然遍身經彩塑，不見雕琢痕，頗失原來之美。轉入洞後，大佛之背及四壁，雕有無數小佛，刀法簡單，形像不一，最得藝術之美。洞中寒氣，

甚爲潮濕，石岸如沙，逐漸剝落。登樓觀覽，至第三層樓始與大佛之頭對面。樓之西檐，板木已朽，登臨其上，搖搖欲墜，我冒險探之，像皆泥塑，壁繪俗彩，一無足觀，遂告同行諸人勿往。下樓後，轉入「西來第一山」石像較小，而頂部雕刻甚美。再西爲「佛籟洞」，洞之前部，改爲磚房，洞中石佛皆毀，已無一像存留，惟洞頂部分尙完好，且最美。浮雕各種花紋，極俊美，佛像或飛或舞，不拘一格，均栩栩欲活。我以爲這當是現存的雲岡石刻最美的部分。再西爲「五佛洞」，佛像皆經泥塑粉飾，殊失本眞，無甚足觀。在中央第七窟中，壁之高處，有一碑誌，寺僧印有碑文，其文如下：

邑師　法宗　普明
　　　曇秀　道員

太和七年，歲在癸亥八月三十日，邑城信士女等五十四人，自惟往因不積，生在末代，甘寢昏境，靡由自覺，微善所鍾，遭値聖主，道敎天下，紹隆三寶，慈被十方，澤流無外，乃使長夜改昏，久寢斯悟。弟子等得蒙法潤，信心開敷，意欲仰酬洪澤，莫能從遂，是以共相勸合，爲國興福，敬造石厝形像九十五區，及諸菩薩。願以此福，上爲皇帝陛下，太皇太后，皇子，德合乾川，威踰輪轉，神被四天，國祚永康，十方歸伏，光揚三寶，億劫不墜。又願義諸人，命過諸師，七世父母，內外親族，神栖高境，安養光接，托育寶花，永辭

穢質，證悟無生，位超羣首，若有窮殘，墮落三途，長辭八難，永與世別。又願同邑諸人，從今已往，道心日隆，戒行清潔，明鑒實相，暈揚慧日，使四流傾竭，道風堂扇，使慢山崩潰，生死永畢，佛性明顯，登所住地，未成佛間，願生生之處，常爲法善知識，以法相親，進止俱遊，形容影響常行大士八萬諸行化度一切同等正覺逮及累劫先師七世父。

魏太和七年，當西曆四八三年。雲岡的碑碣，摧毀雖甚多，現所存者，此碑當是最完整最古遠的一個了。據此碑文所記，可見雲岡石佛，當時不僅帝王揮霍政府的資財，尚有不少私家的財力，以五十四個私人的能力，完成這樣一大佛窟，可見當日佛教之盛及信仰之堅了。

「碧霞宮」後一洞，有一大立佛，高六丈，披袈裟，名萬佛衣，衣上刻萬尊小佛。洞中潮濕也甚，鴿羽鳥糞，霉氣撲鼻，四壁如沙，雕刻之跡，已不可尋。自此西行，有數洞已經泥封，不能入觀。沿山而西，崖壁間錯落落的不斷有大小石佛出現。疑當初皆是佛窟，經多年的風雨剝蝕，多已傾圮，現在只餘窟底的殘痕了。再西行，一個露天大佛盤膝坐在突出的山崖上，面目尚完好，兩傍立着兩個侍佛。此佛當初當然也在窟中，想是窟崩龕圮，使佛外出，與日月爭輝。再經若干年的風雨剝蝕，我們的後人將有看不到這尊大佛的一天。再西皆是零星殘洞，不及詳觀。遂繞經山下村莊而歸，別墅之東，尚有一窟可觀。經寺僧導往，景象益爲

蕭然，大洞中樓鳥驚飛，全洞不留一沙窩，四壁剝落，已無古刻殘迹，惟存中央一大佛及兩侍佛。兩侍佛所戴之冠，作紋細麗，刻工絕美，為此窟一大特色。

雲岡石窟，規模宏大，我只用兩小時的功夫，匆匆一看，當然難得其全，這只算遊覽與憑弔罷了。總觀雲岡形勢，覺得現存的或僅當原蹟十之二三。一片童山，無草木掩護，石為沙質，較易剝蝕，即使沒有不肖子孫來鑿頭削足的摧毀，而終年為風雨浸削，也將逐年銷損。胡適之先生說：「曇曜鑿石作大佛像，要使佛教和岩石有同樣的堅久，永永不受政治力的毀壞。這個志願是很可欽敬的。只可惜人們的愚昧和狂熱都不能和岩石一樣的堅久！時勢變了，愚昧漸漸被理智的風蝕了，狂熱也漸漸變冷靜了。岩石鑿的六丈大佛依然挺立在風沙裏，而佛教已不用『三武一宗』的摧殘而自己毀滅了，銷散了。雲岡伊闕只夠增加我們弔古的感喟，使我們感歎古人之愚昧與狂熱真不可及而已！」我對於雲岡的感想，覺得這是北中國的政治勢力與宗教狂熱的產物，它的正面意義已不存在，現所存留的卻是這東方大雕刻的藝術價值。從藝術觀點上來看雲岡石佛，是值得我們中國人安慰的。胡先生慨歎於佛教狂熱的消逝，我還深推這藝術價值也將不能與時間永存！

九點遊畢，回別墅略憩，九點三刻登車而[illegible]。歸途中見武州山迤邐一線，沿山外崖多作孔洞形，我頗

懷疑這些孔洞都是即席的修竣。『續高僧傳』所謂『櫛比相連，三十餘里』，當不是故意的誇大。時間能使山川變形，這沙崖上的雕刻同壽命自也大為可疑。我在車中回望雲岡只見一片荒山，黃沙濁流，點綴其間，心中起一種莫名惡感之感。同行某君說『雲岡怎麼沒有一點兒氣魄？』我雖答不出所以然來，卻也深覺雲岡已是生氣索然了。

大同是西北交通的要道，我在赴雲岡道中，看見許多驢子背負兩塊大煤，登山涉水，這樣的生產與運輸，不免與現代化相離太遠了。汽車仍是那樣顛簸，這來去兩小時的汽車路程，我常是手捏兩把汗，肚子裏旁着一股勁，而仍不免於顛簸。坐這樣車子，孕婦可以墮胎，老頭子可以送命，我們中年人卻正好借此鍛煉一下筋骨。

車到大同城內，順便一遊上華嚴寺。據說此寺也是北魏時的大刹，中經數度重修，一樣巍峨的大殿，佔地四畝餘。殿甚莊嚴，站在殿前，可以眺望市景。殿內供佛像多尊，皆係泥塑，較之雲岡石佛，自有美俗之別。殿中壁畫，係明朝之物，甚為工細。

十一點半返車站，略事休息，十二點進城吃午飯，飯後步遊城內，四門馬路都已走過，看了九龍壁，又遊了城隍廟街。這條街很熱鬧，好似北平的天橋，天津的三不管，野台戲，雜藝小販，應有盡有，同時還看見

一面『招募新兵』的小旗。城的建築很雄壯，市容相當整齊，但不見怎樣繁榮，不失爲一個三四等城市。

大同是代北的名城，歷代軍事必爭之地。東晉既衰，拓跋氏建都於此，是爲北魏。北魏據此，蠶食鄰方，併有中夏，及六鎮之亂，魏以覆亡。說者即謂舉代北而遷河南，非魏之利。周齊之間，突厥漸强，迭施憑陵。唐初，亦被寇患。後建設軍屯，以藩衞河東。李克用復出此以併盧龍。蓋燕代間必爭之地。石晉歸其地於契丹，宋不能復有，遂基靖康之禍。女眞之亡遼，蒙古之亡金，皆先下大同，燕京遂不能復固。明都燕京，以大同爲肩背之地，鎭守甚重，正統末，恃以捍禦寇之衝。天順中，石亨鎭此，嘗言：『大同士馬甲天下，若專制大同，北塞紫荆，東據臨淸，決高郵之堤，以絕餉道，京師可不戰而困』。蓋大同的地位甚高，其高度拔海一〇六〇公尺，較北平高一千多公尺。古人謂『大同據天下之脊』即指此也。這地方無疑的是中華民族的一個軍事要點，現在則孤峙於冀察晉綏四省之間，地位如昔，形勢全非，將何以拒外寇之憑陵耶?

三點復回車站，大雨，即枯坐候車室中候車，五點復大雨，七點五分登平包通車東歸。

登臨八達嶺

平包通車的下行車，每日午後七點十八分東開，翌晨四點半鐘到青龍橋，我便預定七日早晨在青

龍橋下車，登八達嶺。每晨四點多鐘，我才離開編輯室的燈下，走上回家之路，現在卻預想在這個時候登高山，爬長城，甚感異趣。我因昨夜失眠，且經一日勞頓，登車不久便已入睡，一覺醒來，已是清晨四點鐘。這時車在停着，雨聲淅瀝擊窗。逆料這時已到康莊，及問車僮，始知車尚停在西灣堡，因路橋被山水沖毀，待修，誤點七小時。我現在是一個閒人，聽見這就擱旅程的報告，轉覺喜慰。七點十分到張家口，雨停，賜兒山撲在目前。擬登天橋一瞰張垣景色，而車已開，頗爲悵悵。幸喜白日行車，得覽塞外風光。敷沿路碧樹，看莽原牧馬，亦快事也。八點一刻到宣化，途經大山，甚雄偉。八點五十五分到下花園，沿路與洋河平行，隔岸則是雞鳴玉帶兩山，疏畦密柳，雜觀人家，這一帶的風景煞是美麗。十點五十五分到西撥子車站，遙望八達嶺爲濃雲所掩，滿風被體，預料山上有雨，我的心頭不禁籠上了一縷輕愁。

十一點半到青龍橋，幸竟無雨，遂僱山轎登嶺。由青龍橋站到八達嶺長城之下，有三里路程。沿途青山碧木，中外仕女已不少遊覽歸來者，映人騎驢，素衫紅纓，在鈴琅琅蹄得得的聲中，迤邐下山而來，是很有韻味的。約二十分鐘到長城腳下，遂下山轎，而步登長城。遊覽長城的人們，這時多已下來，往上爬的只有我一個人。雲濃風勁，我特著雨衣以禦涼。我纔緣上行，歷二十五分鐘登達左翼第四墩台，這是八達嶺最高峯。我已大汗淋身，解衣迎風，其冷被體。這時天方正午，而陰雲迷漫，難辨晨昏。極目關外，惟見煙雲滷

湧而已。回顧東峯之上天際露出一抹陽光，在碧油油的山坡上，一羣潔白的羔羊在吃草。那一線蜿蜒的長城，橫山跨嶺，蜿蜒東去，一直到山海關，去俯飲渤海之水。我佇立在西峯之上，涼風瑟瑟，牧牛悲鳴，悠然興躍馬塞外之思。東極山海，西達嘉峪，蜿蜒一綫的長城正是我們中華民族的生命線，這居庸關便是我們這條生命線的要領。滿人入關之後，因疆域的擴展，對此天塹，不甚注意。雍正帝曾有 詠長城 詩云：『萬里經營到海涯，紛紛調撥逐浮誇；當時用盡生民力，天下何曾屬漢家？』須知道是異族的讕言，不足憑信。滿清的入關，係乘明朝內寇（李自成）漢奸（吳三桂）之便，直至思宗殉國時，滿兵尚限於山海關外，未能越入長城一步。明成祖謂：『居庸關路狹而險，北平之咽喉也。百人守之，萬夫莫窺，必據此乃可無北顧憂。』此開國之宏圖也。近之謀國者，曾逃京江左，垂手以形勝委人，眞是國運的大不幸。杜工部詩謂：『古人重守邊，今人重高勳。』我眞不知道現代的中國人尙有邊疆的觀念否？願有一日，天高氣爽，重登此嶺，號角一聲，看百萬健兒馳驟塞外，開邊闢，揚國威，爲之執鞭，所深幸也。

我一個人坐在墩台上冥想，窮目遠望，除了滾滾的灰雲外，別無所見，遂霍然而起，就下城之路，平綏路的火車又把我帶回北平。

依戀故都

北平是我的常遊之地，從近幾年起發生一種異常親切的感情。每到一次北平，輒增一次留戀，每逢與她別離時，輒有不勝依依之感。

這次我是七月四日晚到北平，那是個月蝕之夜，我與佛泉兄自中山公園騎到天安門，席地坐在中山石橋上，南望中華門和正陽門，萬家燈火，如一條金蛇，可以一直看到永定門。筆直的白石御路，兩行碧樹，更有一線燈火。天上罩着灰雲，額際吻着微風，在這靜極謐極的故都之夜，使人自然而聯想到『九天閶闔開宮殿，萬國衣冠拜冕旒』的氣象。佛泉與我不期同聲慨歎於這個首都的被棄，因而演成這幾年來的國家悲運。我說，『我實在捨不了這地方，預到我們不能不離開北平的時候，先放一把大火，把她燒成灰燼！』

我每次走到中山公園的老松之下，輒發生一種慚感，恍若老松低頭說道：『孩子，你來了。你的祖若父們，我均曾見過，怎麼竟一代不如一代的把國家弄到這步田地？』我實在怕聽這個聲音，常是面紅耳赤的逃開了。

我還是第一次登景山，立在萬春亭上，俯瞰全城，帝王宮殿，百姓人家，盡在眼底。遠山近水，碧樹彩屋，既富麗，也秀美，簡直是一幅天然的錦繡畫圖。景山東麓是明思宗殉國處，那株老樹，根幹已枯，枝葉猶甚繁衍。碑碣上有人用鉛筆題上『此恨綿綿無絕期』一句詩，這七個字寫在此地，比在白香山的長恨歌裏沈痛多了。我看到這七個字時，幾乎掉下淚來！

（二十五年七月二十八日於天津）